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一部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惊世之作

1421

中国发现世界

1421——明成祖永乐十九年，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36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可能会改写一切，爆炸性的内容，颠覆既有认知。

(英)加文·孟席斯◎著
Gavin Menzies

师研群◎译

1421

中国发现世界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在总兵太监郑和的带领下，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船队从中国出发，其中不乏150米长的巨舰，中国船队如同海上仙山，阵容最浩大时各种舰船达100余艘，各类人员28000余名，其出航的目的为“宣德化而柔远人”，这次旅行历经两年，并环游地球一周。

当他们回航时，盛极一时的明成祖朱棣早已体衰势微，中国也走上锁国道路。巨船任其腐朽，远航的记载也遭到毁弃，从此再也没人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本书作者的研究结论是，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并且在麦哲伦的100年前便已环游地球，除此之外，中国人更是在库克船长的350年前就发现了澳洲与南极洲，并且领先欧洲人300年解决了经度测量的问题。

作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花了14年时间研究这段中国船队惊人的传奇之旅，他应用得天独厚的天文导航绘图以及航海专业知识并广泛搜集古地图、东西方断简残篇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成功地解释了近年所发现的中国船队沿路留下的遗物与铭文，以及中途的沉船，还有水手在各地祭拜妈祖的遗址。

ISBN 7-80724-051-2

9 787807 240518 >

ISBN 7-80724-051-2/K·44

定价：39.80元

1421

中国发现世界

(英) 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 ◎ 著

师研群◎译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21：中国发现世界／（英）孟席斯著；师研群等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ISBN 7-80724-051-2

Ⅰ.1… Ⅱ.①孟… Ⅲ.郑和下西洋－研究 Ⅳ.K24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3686号

Copyright©Gavin Menzies 2002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answorld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421：中国发现世界

作　　者／（英）加文·孟席斯
策　　划／师永刚
责任编辑／刘　凯
特邀编辑／刘珂碧　万莉萍
装帧设计／领读工作室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　100011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责任发行／臧威威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360千字
印　　张／26　　插页／18
版　　次／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051-2/K·44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英国皇家海军退伍军官，1937年生于中国，两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始离开。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1957年在“钻石”号驱逐舰上服役于地中海海域，1959年，在“纽芬兰”号上担任航海指挥官，服役于远东海域。1960年调到“决心”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任作战官，1968年担任“鳐鲸”号潜艇艇长，被授予海军中校，执行全球航行访问任务。在皇家海军的服役期间，他曾率舰沿着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航线行遍世界，退伍之后，他曾多次走访中国与亚洲各国，专注于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调查与研究。

加文·孟席斯先生已婚，有二女，现寓居于伦敦北部。

策　　划：师永刚
责任编辑：刘　凯
特约编辑：刘珂碧　万莉萍
封面设计：领读工作室

关于本书

2002年3月，从伦敦传出了一个惊人的学术信息：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中国明代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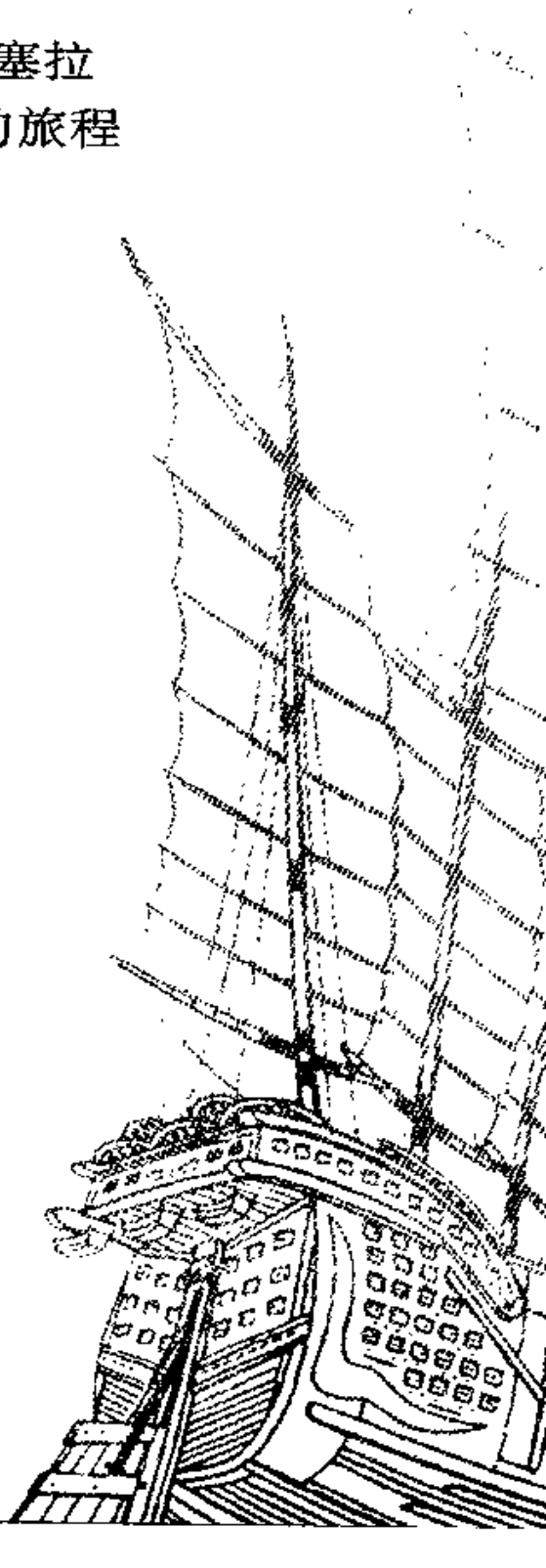
消息传出，全世界为之震惊！连中国学术界也有些意外。这意味着，中国人将把所有早已闻名遐迩的航海家抛在后面。

孟席斯不是信口开河，他经过了14年潜心的研究，做了大量调查，追踪了郑和船队在全球的航线，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还走访了中世纪末期世界所有的主要港口。他把全部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书中，书名表明了他的主旨：《1421：中国发现世界》。

孟席斯石破天惊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世界各国的专家、历史学者对之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看法，赞同、商榷、有待研究、否定或怀疑者均有之，尤其是在西方的评论界引发了是否需要改写世界历史的讨论。一直书写着由西方人开辟了航海通道的世界历史，要改写成中国人的名字，世界怎能不为之哗然？

该书在世界出版界急盼的关注下，英国首印10万册，紧接着美国开机20万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版，销量早已突破百万册。孟席斯认为要为中国航海“正名”引起了中国学者及读者的极大兴趣和期待，中文简体字版在保持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录部分，收有国内专家学者的介绍文章及郑和航海遗迹考古的新发现，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孟席斯先生专为中文简体字版题写了致中国读者的前言，值此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际，该书由孟席斯先生授权，京华出版社隆重出版，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必将在华人圈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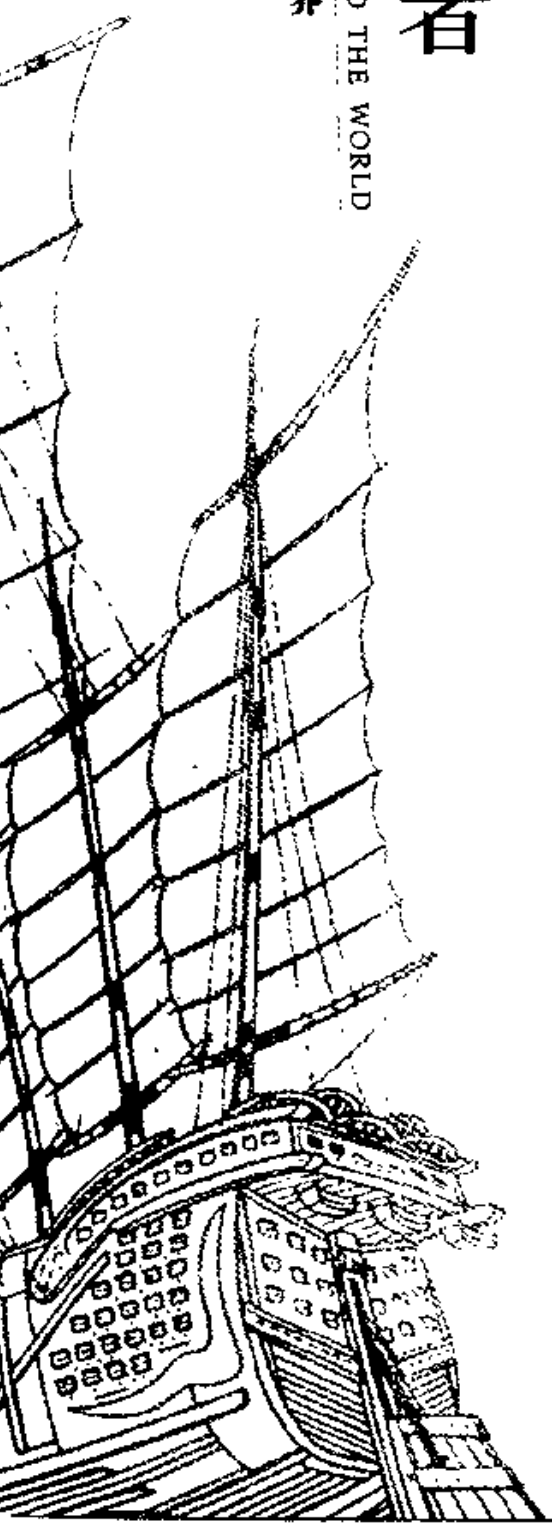
本书谨献给我的妻子玛塞拉
她陪我走过与本书有关的旅程
并且和我相伴一生



致中国读者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 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 (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Malcolm Brocklebank），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

序言一

中国发现世界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我非常高兴孟席斯先生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简体中文版终于和读者们见面，能使他花了十几年心血和不懈的查考结果公诸于众，让国内外中国人都可以见到600前中国航海舰队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多以朝代的更替，统治者间的纷争混战、宫廷政变为主题，对科技、航海等事叙述不多。正如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其阵容之强大和设施的水平之高，在当时都是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只是因为朱棣稍后的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对此国内历史记载不详。中国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苦难，到今日才又逐步恢复自信。这本书的内容列举很多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600前的事迹，对我们树立自信是有很大帮助的。

前年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后，在英国经过友人的介绍找到了作者，鼓励他早日出版简体中文本以资推广，今日喜见其即将问世，谨略陈个人感受，亦作为介绍。

查济民

2005年5月3日

序言二

孟席斯的故事终于回归故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1421年中国人大发现的故事填补了世界历史中的一大段空白。孟席斯讲述的新大陆如何被发现的故事使我颇为受益。中国本来可以为世界带来幸福和现代化，但仅仅一道闪电就把这一辉煌成就变成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悲剧。这个故事埋藏了600年，现在是到了向世人揭示的时候了。“1421”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一个人的想法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斗争。虽然“1421”讲的是历史，但它在很多方面却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告诫我们，不受理性束缚的盲目和歇斯底里，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人的悲壮旅行以及15世纪前几十年中国所积累的航海知识的消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在把“1421”这个故事讲述给世人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把孟席斯的这本了不起的书制作成一部故事片。在原书成功的基础上，这部影片将启发一直以来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的公众，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美洲人的人种构成，重新认识人类的科学史。

Samantha Rose Ol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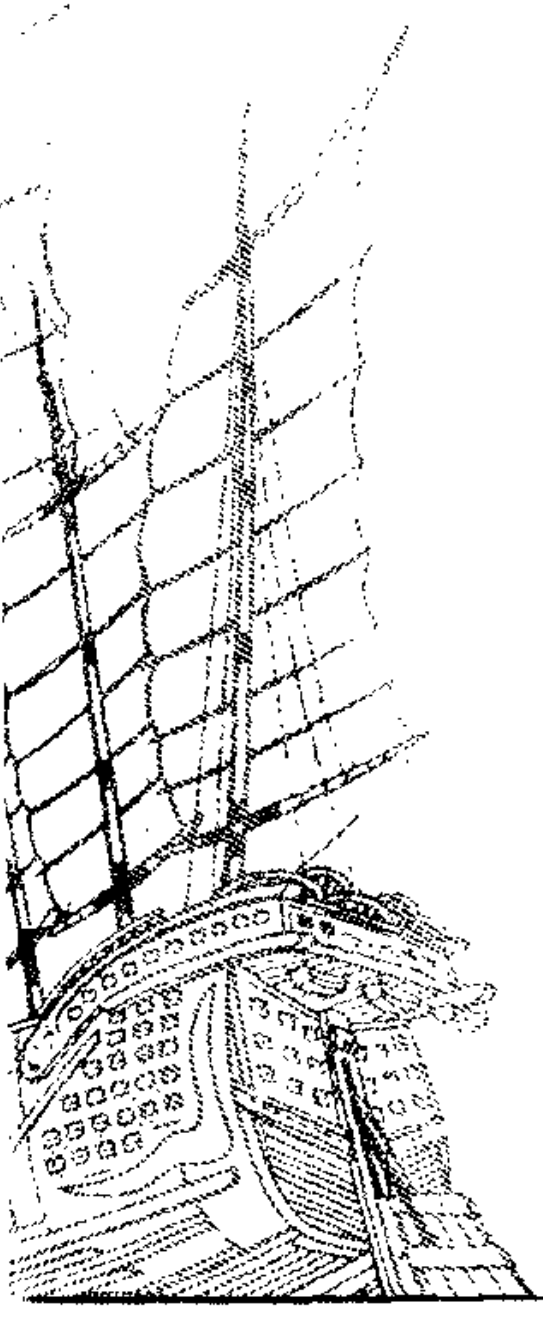
萨曼塔·奥尔森

电影制片人

2005年5月5日于加州好莱坞

致谢

中国发现世界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本书的附录是一些我在正文中用作支持结论的材料的纲要，包括部分非常重要的地图、文献以及其他的证据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第一手、第二手的史料。但是，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而非专业学者，限于篇幅，次重要的证据不得不省略了。因此之故，证据和结论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大量的支持材料都放在了互联网上，网址是 www.1421.tv。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回答任何特别的问题，以使我的研究为研究者所用。可以写信联系，其中首先可以选择通过拙著的出版社。

尽管在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本书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私帮助，此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而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却无法将他们一一列出。我衷心地感谢那些给予我建议、指导和支持的人们，对那些我不得不省略姓名的人们，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在本书的再版中我将作出弥补。

我首先要感谢在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中工作的人们，他们教会了我驾船技术、如何制图和天文航海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本书所基于立论的发现就不会出现。在我

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观了九百多个博物馆，其中，我必须列出拥有丰富精美藏品的几个，它们是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Shaanxi Historical Museum in Xian, China）、利马历史博物馆（Lima's Museum of History）。我同样很感谢威尼斯马西昂纳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和科莱博物馆（the Museo Correr in Venice）、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Barcelona's Museu Marítim）、位于瑞典哥特兰岛维斯比市的福尔纳塞尔博物馆（the Fornasals Museum, Visby, on the island of Gottland）、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詹姆斯·库克博物馆（James Cook Museum in northern Australia）、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瓦卡道艺术与历史博物馆（Waikato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Auckland , New Zealand）、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提拉穆克国家先行者博物馆（the Tillamook Country Pioneer Museum, Oregon）、位于墨西哥米乔阿肯州的Zihuantanejo 博物馆（the Zihuantanejo Museum, Michoacán, Mexico）、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瓦南布尔艺术画廊（the Warrnambool Art Gallery）。

在英国，我衷心地感谢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尤其是其中的地图部和人文科学一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儿有着非凡的收藏和极好的服务。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斯拉夫学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伊斯兰学院（the School of Islamic Studies）、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公共档案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 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牛津波德林图书馆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剑桥大学图书馆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和剑桥大学东方艺术图书馆 (the Eastern Art Library) 也都给予我许多帮助。

所有我约来阅读和评点我的书稿的著名专家，都为此花费了各自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但我也必须强调，书中的观点以及错误和疏漏之处都将由我个人负责。首先，让我向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 (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馆长卡罗尔·乌尔讷斯 (Carol Urness) 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约瑟夫·麦克德莫特 (Joseph McDermott) 博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斯·杰 (John E. Will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世纪史和伊斯兰史教授G·R·豪廷 (G. R. Hawting) 教授、康拉德·希尔谢勒 (Konrad Hirschler) 博士、约翰·朱利叶斯·瑙韦西 (John Julius Norwich) 先生、牛津大学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文学系(the Facult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 泰勒·泰莱克 (Taylor Terlecki) 博士、威尼斯州立档案馆 (the Venice State Archive) 依仁亚·希阿冯 (Ilenya Schiavon) 博士、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 (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博士、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皇家教授约翰·埃利奥特 (John Elliott) 爵士和海军上将 (Admiral)、被授予英帝国大十字勋章 (GBE) 和高级巴思勋爵士 (KCB) 爵位的约翰·伍德沃 (John Woodward) 爵士表示感谢。

在其他我应表示谢意的人当中，我必须提到国会历史研究部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Offices) 琳达·克拉克 (Linda Clark) 博士、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考古学和古

民族植物学学院古民族植物学中心（the Palaeoecology Centre of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迈克·伯利（Mike Baillie）教授、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the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罗伯特·马萨伊（Robert Massay）博士、伯肯黑德 Proudman 海洋学实验室（the Proudman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Birkenhead）海伦·斯达福德（Helen Stafford）女士和菲利普·渥德渥斯（Philip Woodworth）教授、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the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鲍勃·海德兰德（Bob Headland）先生、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同时也是大不列颠地理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会员的谢恩·温瑟（Shane Winser）先生、格林威治皇家海事博物馆凯尔德图书馆（the Caird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比兰·提讷（Biran Thynne）先生、威尼斯马西昂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 Venice）图书馆学家皮埃罗·法尔切塔（Piero Falchetta）博士、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London's National History Museum）克里斯·斯君厄（Chris Stringer）、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希克斯（Bryan Sykes）教授、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费尔南达·艾伦（Fernanda Allen）博士和荣·胡格斯（Ron Hughes）。

我还要向哈勒姆（Haarlem）Enschedeb博物馆（the Museum Enschede）馆长约翰·德造埃特（John de Zoete）博士、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波斯－土耳其藏品收藏部主任穆罕默德·韦利（Muhammad Waley）博士、斯图亚特·斯特灵（Stuart Stirling）、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艺术史系蒂莫西·劳顿（Timothy Laught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生物学系遗传学学者休·波委（Sue Povey）教授、已故的约西·希克斯（Josie Hicks）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评议员克里斯梯·G·特那二世（Christie G. Turner II）教授、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天文学系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教授、马歇尔·帕因（Marshall Payn）先生、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前任航空管理人艾伦·斯廷森（Alan Stimson）和K·唐（K. Tan）博士。

以下的中国学者专家对我也是帮助甚多。关于郑和舰队的还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郑明教授、中国海洋史研究者联盟主席辛元欧教授，以及孔令仁副教授；关于中国地图：朱鉴秋；明代外交政策有关郑和航海部分：时平教授、陈显泗教授、朱亚非教授、Chao Zhongchang教授、陈启懋教授，以及刘达财中将；关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郑一钧教授；关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Tao Jinyi博士；关于中国与满剌加的关系：廖大珂教授；关于中泰关系：李道刚教授；关于中印关系：Zhu Wei教授，以及Cheng Beibei；关于南京的守军：徐玉虎教授；关于郑和舰队的补给以及太仓的作用：浏河的郑和纪念馆馆长黄守频教授，以及太仓市委书记陈惠明、副书记孙耀明；关于郑和如何款待外国使节：Yang Zhao教授、Yang Sunming、Yang Hongwei，以及Zhou Zhiya；关于郑和航海的目的：陈显泗教授、Du Xiujuan，以及Yan Xiaomei；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Su Haitao教授、Zhao Jijun、Du Xiujuan、Luo Mi、Zheng Yongtao、以及Liu Kun；关于“中国发现美洲”：朱鉴秋教授，罗宗真、Liu Manchun；关于郑和舰队的医疗：龚锦涵教授；关于天文导航：Zhang Guoying教授。

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the Portuguese Embassy）若昂·卡米罗·德斯·桑托斯（João Camilodos Santos）教授、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the Torre do Tombo）馆长、

昆士兰州金皮（Gympie）古代社会博物馆（the Gympie Historical Society Museum，Queensland）、布雷特·格林（Brett Green）、瓦内萨·考林瑞杰（Vanessa Collingridge）、特帕帕（Tepapa）博物馆馆长（the Museum，Tongarewa）迈克尔·菲茨杰拉德（Michael Fitzgerald）、瓦卡道（Waikato）博物馆（the Waikato Museum）馆员凯瑟林·马瑟（Catherin Mercer）、罗宾·J·瓦特（Robin J. Watt）和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洛德瑞西·毕达克（Roderich Ptak）教授也都对我很有帮助。我也得向世外桃源出版中心（Xanadu Productions）的史蒂文·哈莱特（Steven Halltet）、南京（Nanjing）的刘迎胜（Yingsheng Liu）教授、菲律宾马尼拉博物馆（Museum of Manila，Philippines）水下考古研究所（Underwater Research）主任埃塞比奥·蒂庄（Eusebio Dizon）博士、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广播前任主任彭文兰（Wenlan Peng）女士、理查德·加农（Richard Channon）船长、迈克·图奥西（Mike Tuohy）中校、赫拉克利特号游船（RV Heraclitus）船长克里斯廷·汉德特（Christine Handte）、澳门海事博物馆（the Macao Maritime Museum）馆长、亚非学院汪涛（Wang Tao）博士、维维安娜·王（Viviana Wong）小姐、许靖华（Kenneth Hsu）教授、约翰·福瑞（John Furry）博士、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和里德和圣路易斯家族（the Reed and St Louis family）、罗伯特·麦特卡尔夫（Robert Metcalf）、百慕大陆海空三军（Bermudan Armed Forces）前任司令海军准将（Commodore）比尔·斯温赖伊（Bill Swinley）、蒙尼休·格拉尔德·拉弗洛尔（Monisieur Gérard Lafleur）、大卫·波顿（David Borden）、Kristen和保罗·西维（Paul Seaver）教授、佛罗里达技术学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乔治·莫尔（George Maul）教授、默德·斐皮斯（Moude Phipps）教授、K·K·唐（K. K. Tan）博士表示感谢。

我也必须得感谢Voyages Jules Verne，它为精彩的旅行安排了知识渊博的导游，得感谢安东尼·西蒙德斯－谷丁（Anthony Simonds-Gooding）、温迪（Wendi）和迈克·瓦斯顿（Mike Wast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迈达斯公共关系公司（Midas Public Relations）的史蒂文·威廉斯（Steven Williams）和索菲克·兰塞姆（Sophi、Ranson）、杰克·皮泽易（Jack Pizzey）、皮尔森·布洛德班德（Pearson Broadband）和帕拉丁·因维欣（Paladin Invisi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我也很感谢约瑟夫·麦克德默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伊丽莎白·海（Elizabeth Hay）、休伯特·拉尔（Hubert Lal）博士、泰勒·泰尔赖克（Taylor Terlecki）、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伊恩·哈德逊（Ian Hudson）、艾米·克洛克（Amy Crocker）、我的妻子马塞拉·孟席斯（Marcella Menzies）和我的大女儿、瓦内萨·吉洛蒂·约翰逊（Vanessa Gilodi-Johnson），他们为我翻译了各种外文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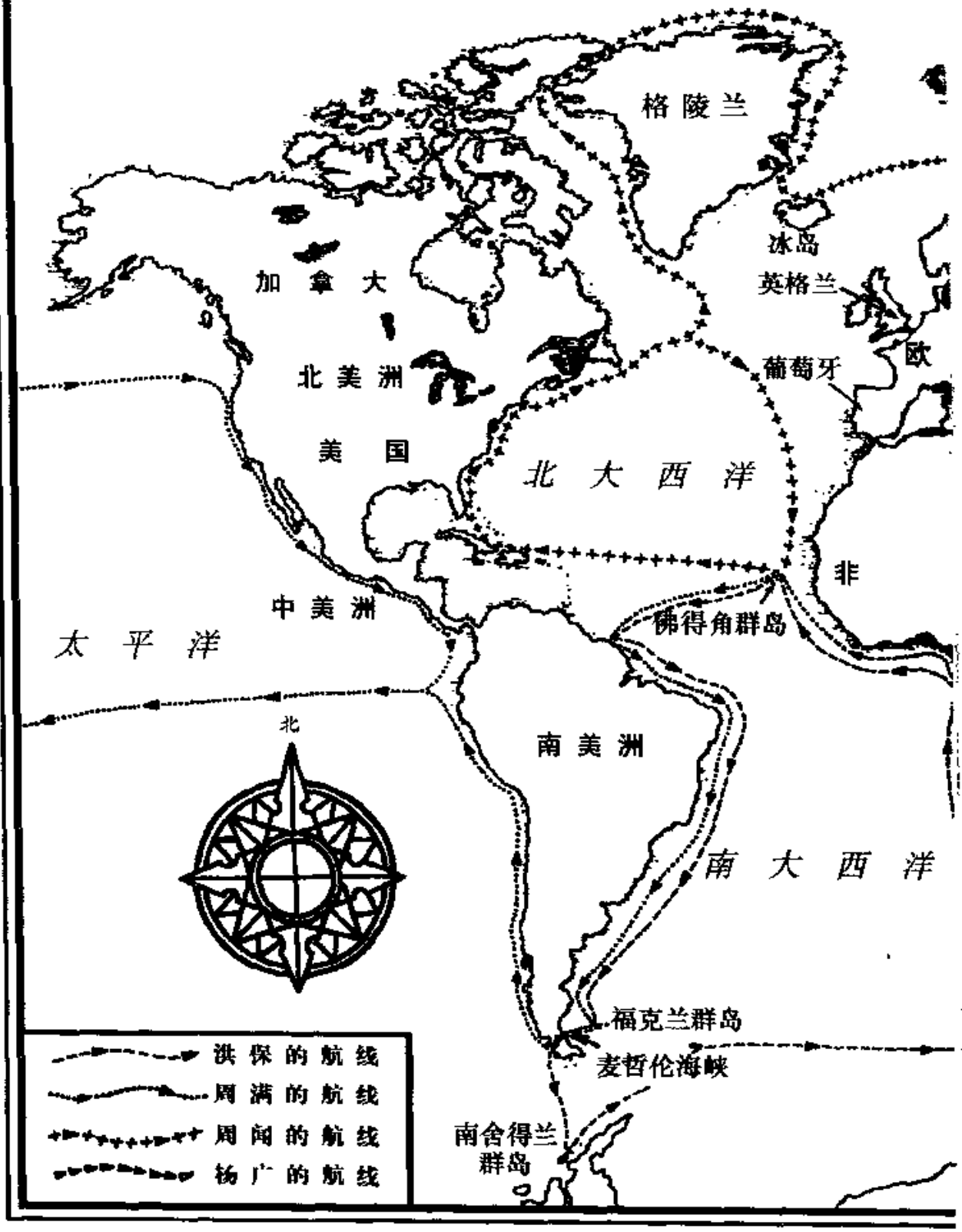
Sheil Land Associates的露吉·勃纳米（Luigi Bonomi）是一位优秀的书籍代理商。我衷心地感谢本书的出版社——环球出版社（Transworld）的拉里·芬赖（Larry Finlay）、萨利·加米那拉（Sally Gaminara）——她是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Press）的出版总管、西蒙·托洛谷德（Simon Thorogood）、黛博拉·亚当斯（Deborah Adams）、朱莉娅·劳埃德（Julia Lloyd）、艾莉森·马丁（Alison Martin）、丽贝卡·温菲尔德（Rebecca Winfield）、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希拉·李（Sheila Lee）、尼尔·汉逊（Neil Hanson）、加利·普赖尔（Garry Prior）、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爱德·克利斯蒂（Ed Christie）和他们的工作组。我同样感谢吉莉安·鲍姆赖（Gillian Bormley）、丹尼尔·布拉道（Daniel Balado）、伊丽沙白·道布逊（Elizabeth Dobson）、乔安妮·希尔（Joanne Hill）和莎拉·爱里艾拉（Sarah Ereira）在文字方面的工作。

最后，让我感谢那些支持我和这部书达14年之久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老朋友，牛津的历史学者弗兰克·霍普金斯(Frank Hopkins)，感谢劳拉·塔塔姆(Laura Tatham)——一位非常有经验而又忠诚、奉献的助手。末了，感谢我的妻子玛塞拉(Marcella)给我的永久的爱和支持，以及研究中的经济支持。我和这本书处处都得益于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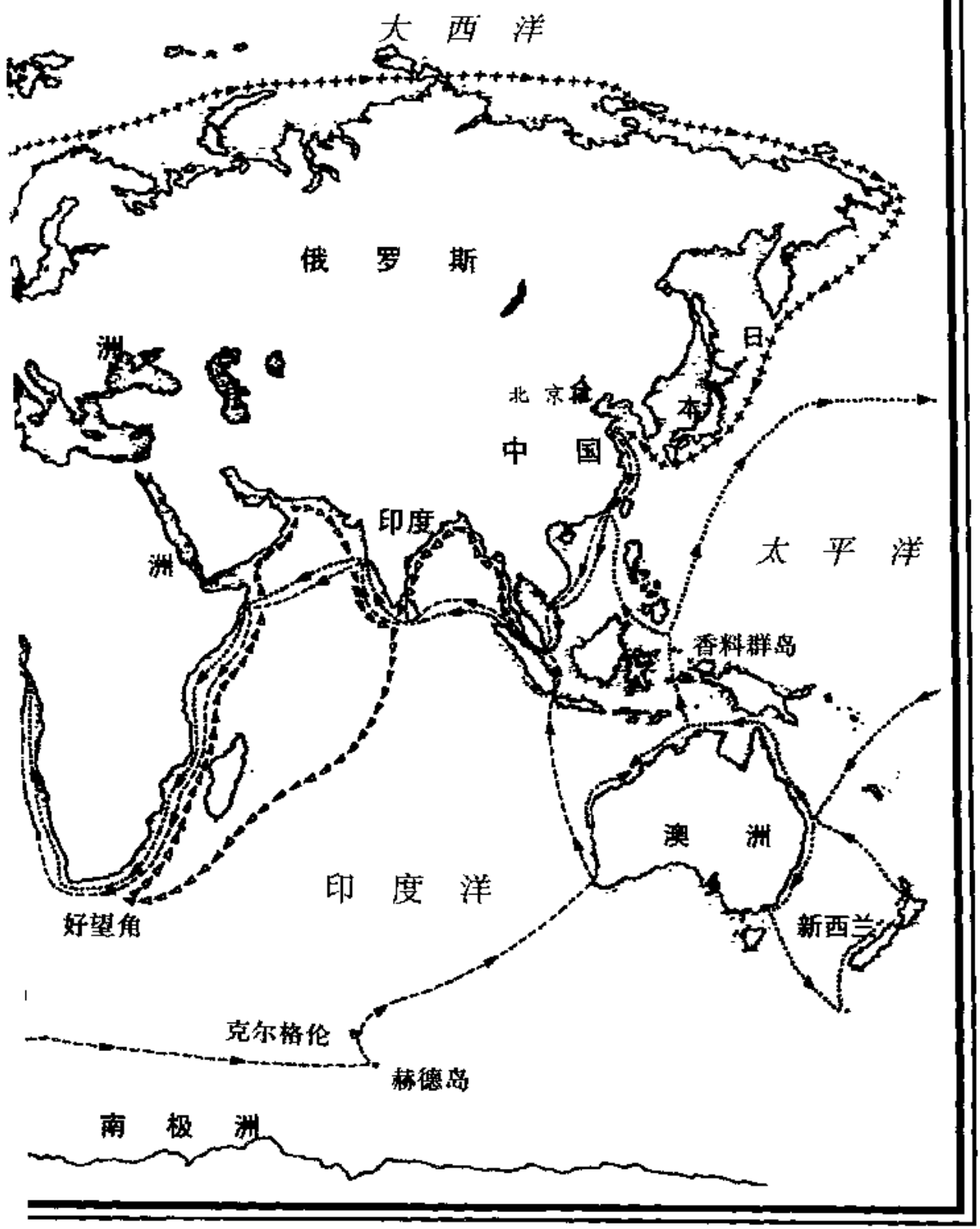
加文·孟席斯

2002年7月于伦敦

1421-1423 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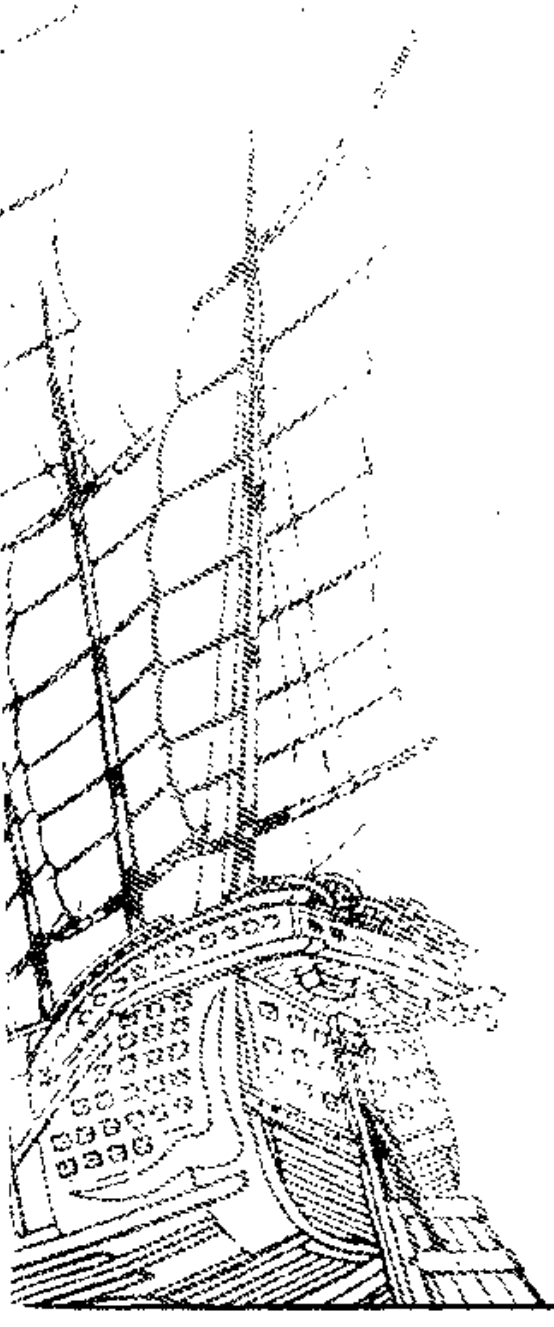
宝船舰队的航线



引言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

中世纪历史，特别是探险家的地图和海图，成了我欲罢不能的追求，消耗着我的热情。我喜欢仔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海图、描摹的轮廓线、海岸线、改变着的浅滩和沙洲的外形、岩石和暗礁的危险。我顺着潮汐起伏，顺着暗潮的牵引和季风的推送前进，一层层地剥出藏在海图中的信息。

我的研究是从明尼苏达寒冷的草原上开始的。发现那样的一件具有深刻内涵的文献，这儿未必是一个首选之地，但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收藏着值得注意的早期地图和海图，其中特别的一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ips）爵士的收藏品之一。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18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

这幅海图绘制于1424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图中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当

我将它和现代的地图比较后，我发现这位制图学家很准确地绘出了欧洲的海岸线。在那个时期，这是了不得的制图学成就，但这并不是那幅图惊天动地的意义之所在。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幅地图的奇特之处。这位制图学家除了画出大陆，还画了处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他标出的名称分别是：*Satanazes*、*Antilia*、*Saya* 和 *Ymana*，和现代的地名都不一致，而且在他所绘岛屿的位置，现在并无大的岛屿。那有可能是在计算经度方面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尚未能完全掌握计算经度的技术。但我第一反应是迷迷糊糊地觉得那些岛屿是想象出来的，只存在于那位制图学家的头脑里。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其中的两个大点的岛屿是用深颜色画的，*Antilia* 用的是深蓝色、*Satanazes* 用的是鲜红色。而图的其他部分并不着色，看起来可以肯定，匹兹加诺（Pizzigano）是想强调那是近来才发现的重要的岛屿。所有标识的地名都显现出中世纪葡萄牙语的特点。*Antilia* 中的 *anti* 是在对面的意思，*ilha* 是岛屿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岛屿与葡萄牙隔大西洋相望。除此之外，在名称方面没有能帮助我们确定它的地点的信息。*Satanazes* 是“撒旦（Satan）或魔鬼之岛”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名字。最大的那个岛——*Antilia* 岛上标出大量的城镇的名字，说明对它有足够的了解。*Satanazes* 岛上只有5个地名，以用 *con*、*ymana* 这样高深莫测的字眼最具特色。

于是，我的兴趣被完全激发起来了。这些岛屿是什么？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上面却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我在地图收藏室和档案馆中查了几个月的海图和文献之后，我确信 *Satanazes*、*Antilia* 事实上就是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中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要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么两者之间就有过多的相似之处了。但是这暗示了在哥伦布（Columbus）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七十年有某个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这看起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新发现：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而他的航行却早被看成是绝对决定性的时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在葡萄牙人的引导下，欧洲人开

始着手发现世界的伟大航行，同时也是对世界的漫长的、无休止的征服过程，这构成了此后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的发现，于是我向一位中世纪葡萄牙研究的专家求助，他就是若昂·卡米罗·多斯桑多斯（João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他后来作为葡萄牙大使馆的一员被派驻伦敦。他检视了匹兹加诺（Pizzigano）海图，然后纠正了我对*con/ymana*的翻译错误，将之更正为“火山在此喷发”。这个词写在*Satanazes*岛的南部，恰巧在今天的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上的同样位置有3座火山。1424年之前它们喷发过吗？带着高度的兴奋，我敲响了位于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大门，得知这几座火山曾在1400～1440年之间喷发了两次，但在从前的几百年和此后的250年中处于休眠状态。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加勒比海区域没有其他的火山喷发过。我感觉找到了答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相信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早于哥伦布68年已有人到达了加勒比地区、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聚落。

卡米罗·多斯桑多斯教授给我介绍了位于里斯本（Lisbon）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国家档案馆馆长，在一个宜人的初秋午后，我开始在那儿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确证我关于葡萄牙人到达加勒比海的预感。使我惊讶的是，在偶遇之中，我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葡萄牙人发现加勒比海群岛之前好久，即在匹兹加诺绘制他的海图的时候，这些岛屿完全不为人所知。而在另一幅年代稍晚一点的另一位无名制图学家所做的海图中，这些岛屿被表示了出来，直到1428年这些岛屿才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此外，我发现了1431年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给他的海军船长的一份手谕，命令他们去寻找1428年海图中的*Antilia*岛，如果说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Antilia*岛，那亨利的手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但如果说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并登上*Satanazes*岛和*Antilia*岛，那究竟是谁干的呢？又是谁给匹兹加诺和其他的制图学家提供的信息呢？

我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追寻尘封已久的兴起又衰落的中世纪文明。我依次逐个排除世界上在15世纪早期能够实施如此雄心勃勃的航行的船队。威尼斯舰队，欧洲最老

牌和最具实力的海上力量，此时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威尼斯年长的总督（Doge）在病中，他的权威正受到威胁，他的接任者正准备大展宏图，转变为发展陆上力量，这迫使威尼斯放弃它的航海传统。北欧的船队仅能穿过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更不用说去发现新大陆了。埃及的统治者正陷于国内战争的泥潭之中，仅1421年就有不少于5位苏丹即位。伊斯兰世界同样也陷于分裂之中，北非的心脏地区为葡萄牙人所侵占、蒙古皇帝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建立的曾经强大的亚洲帝国分裂了。

那又有谁能够去探查加勒比海呢？我决定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像1424年地图那样的海图，显示了在欧洲人的大发现航行之前就已发现的大陆。我钻研得越深，令人惊异的事物就发现得越多。我惊奇地发现，在欧洲人发现之前100年，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安第斯山脉（Andes）就已经被标识在地图上了；在欧洲人到达那儿之前大约四百年，南极洲（Antarctica）就已经准确地画在地图上了。另一幅海图标识了非洲东海岸地区，而且还非常准确地标着经度，此后3个世纪欧洲人尚不能完全掌握这样的技术。还有一幅地图标明了澳大利亚(Australia)，早于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发现有300年。另外一些海图标明了北美和南美的加勒比地区（Caribbean)、格陵兰岛(Greenland)、北极（Arctic)、太平洋（Pacific）和大西洋(Atlantic）的海岸线，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

这些探险者——不管他们是谁——能够如此准确地在地图中绘出整个世界，肯定曾经做过环球航行。他们必定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导航术，也必定发现了一种绘图时用来测定经度的方法，虽然带着不小心的误差。他们必须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数月，那意味着他们能够脱去海水中的盐分获得淡水。我后来还发现，他们也能够勘探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同时他们还是熟练的园艺家，能够恰当地在世界范围内移养动物、移植植物。一句话，他们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面貌。我看起来像是专注于人类历史中一连串最传奇的航行，其中的一次航行已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主要的记载已遭人毁坏，这次航行的成就被忽视了，最终直至遗忘。

这些新发现既使人惊骇又使人不安。如果我继续追踪此事，我将要向有关新大陆发现历史的一些基本的设想挑

战。在学校里，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晓得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和航海家的名字，他们的探险事迹传遍了这个世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1487年离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的人。他被一阵暴风雨带到了好望角的南面，当他发现无路可走时，便折而向北，绕过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登陆。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公元1469～1525年）沿着迪亚斯的足迹到达非洲东海岸，又由此出发，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开辟了第一条香料贸易的航路。在1492年12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公元1451～1506年）从欧洲向西，来到了现代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那片岛屿继续向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尽管哥伦布本人没有意识到此，他相信自己事实上是到了亚洲。他又做了3次航行，发现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和中美洲大陆。费尔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公元1480～1521年）沿着哥伦布的足迹，成为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海峡的人，这一海峡直至今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的船继续向西，完成了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于1521年4月27日在菲律宾被杀死，没能活到他的探险队光荣地回到西班牙。

所有这些人都从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公元1394～1406年）那儿获取了大量帮助，亨利使他在葡萄牙西南部的基地成为探险家、制图学家、造船工匠、器械制造工人的大本营。在那里，欧洲船只的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海仪器和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进，那些伟大的航海家获得了用于探险和殖民的资助，航海事业由此得到有力的推动。

当我在里斯本档案室结束研究的时候，一种全然紊乱的情绪吞噬了我。一个雾气迷蒙的日子，我在里斯本滨水区的一家酒吧整整坐了一晚，凝视着航海者亨利的雕像。我现在似乎能够读懂他谜一般的笑容了。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秘密：他是追随着他人的足迹去发现新大陆的。我想得越多，我就变得越有兴趣。那些高明的水手是谁呢？他们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又将之绘到海图上，却没留下任何线索，比那些谜一般的地图更为神奇。

某些奇妙的线索泄露了那些高明的雇佣水手的身份，

展现出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海岸线、安第斯山脉、南极（Antarctic）大陆、南舍得兰群岛（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都以惊人的准确度绘在海图上。所覆盖的范围北起厄瓜多尔（Ecuador）、南达南极半岛，非常辽阔，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中航行。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但是寻找远在欧洲人之前，中国人的船队就探查了世界的可靠证据的想法，使我心中充满了不安。想弄清楚差不多六百年前任何一件事的细节的企图就足以使人踯躅不前了，而这项工作还有一项巨大的、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面前，这无疑是难上加难。15 世纪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转为封闭，几乎任何一幅当时的中国地图和任何一份当时的中国档案都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发现之后，中国不再去探索外部世界，而是转向闭关自守。任何当年对外积极拓展的记录都从档案中消失了。

如果要是把关于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辉煌的故事连缀到一起的话，我不得不去别处寻找证据，光想到要动手，我就心生敬畏。一个退役的潜水艇船长，何以能够揭示一个许多伟大学者都没能揭示的故事，看起来是自以为是到狂妄自大的程度了。虽然我相比这个领域中的著名专家而言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在开始之时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便利条件。1953 年，15 岁的我成了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的一员，那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和大量的基地，能够做到环球航行。17 岁那年，我还在皇家海军，在欧洲的大探险家的激励下，我环行了世界。1968～1970 年间，我指挥着皇家海军鳁鲸号（HMS *Rorqual*），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经过太平洋达到美洲。

我从潜水艇潜望镜中看到的海岸、悬崖、山脉和早期的探险家从他们的后甲板上所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观。我立刻明白了，从海面上看到的未必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卫星导航术尚不为人所知，我们不得不依赖星星确定航路。我看到的星星和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我通过测量太阳的高度和方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就像他们所尝试的那样。在南半球，水手的引路之星是老人星（Canopus）和南十字星座（the Southern Cross）。在我要揭示的非凡的故事中，这些星座扮演了一

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在皇家海军掌握天文导航术的经历，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的发现也许要继续埋没好多年。

一个航海的外行，不管他在其他领域多么有成就，当他在看一幅地图或是海图的时候，只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轮廓线而已，好像是某处熟悉的陆地的奇形怪状的轮廓，又好像不是。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在看同样的地图时，可以推理出更多线索：第一次绘制此图的制图学家航行到了哪儿、是以什么方向航行的、航速是快还是慢、距离陆地有多远、他掌握经纬度知识的情况如何，甚至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看出来。如果这幅海图包含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话，一位航海家还能解释为什么海图中表示的岛屿现在会变成山峰，为什么一块广阔的陆地现在会变成浅滩、暗礁或是岛屿，而一些陆地为什么会画得那么奇形怪状，有些陆地又大得令人玩味。

我曾经看了些15～16世纪早期的地图，其中绘出的一些地区，尚不为欧洲的探险家所知。有些地图上真有错误存在，比如画出的有些陆地是未被承认的、或是形状奇特的、或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陆地存在。因为从中看出的世界面貌和我们已经接受的探险史相抵触，所以长久以来它们被视为神话、谎言，至少也就是被看成让人迷惑的不合常理之物，因而受到排斥。但我发现，当我一次又一次再去审视这些早期的地图和海图、研究它们、正确估价它们时，一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史观开始显现了出来。

我的研究证实，一些中国船队确实在15世纪早期开始了它们的探险航行。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个由4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初，舰队开始出发。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夏天和秋天，最后幸存的船只也回到了中国。关于途中船队到了哪儿，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地图表示了他们不仅到了好望角，而且还穿过大西洋，到达我在匹兹加诺所绘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地图中看到的群岛，他们随后继续在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探险，还通过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他们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难题，并以同样的精确度绘制地图和绘制星图都很准确。

我出生后的头5年，由一位中国保姆带大，我为我们的分离而伤心的那些日子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在过去的一

些年中，我多次来到中国，但是尽管我对那个伟大的国家很有兴趣，我对它的历史的了解绝对不多。在我沿着这些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前进之前，我首先不得不致力于学习我不熟悉的中国中世纪历史。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发现之旅，我猜想，我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们一无所知。我学得越多，我就越为惊叹那些古代的、充满知识的、使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辉煌。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以至于要到300年、400年后，有些方面甚至要到500年后，欧洲人的知识才能赶上中世纪的中国人。

学习了一些有关中国这一伟大文明的知识之后，我花了几年时间，沿着中国探险船队的航线在世界上旅行。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做研究，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宫殿和中世纪晚期的主要海港，探查充满岩石的海岬、珊瑚礁、荒凉的海滩和偏僻的海岛。所到之处，我都发现越来越多的支持我论点的证据。这转而说明一小部分有帮助的汉文文献和航海指南在大规模的毁坏时幸免于难。还保留着几份第一手的报告，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是欧洲商人，此外是在中国人的激励下最先从事探险的欧洲人，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先辈留下的蛛丝马迹与遗留的文物。

同样还有大量的实物方面的证据，包括中国瓷器、丝绸、贡品、纺织品、石雕——中国船长留下的用于纪念他们成就的纪念碑，以及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的中国帆船遗骸和来自遥远的起源地、而当欧洲人来到时已是茁壮成长的植物群、动物群。我发现的一切都证实了引起我想象的那些地图的准确性。那些地图包含的重要信息总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但却从许多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前溜掉。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历史学家的勤奋，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天文导航术和世界海洋的知识。要说我能发现从他们眼前溜走的信息，那只是缘于我懂得如何解读那些揭示了公元1421～1423年间强大的中国舰队的航行路线以及范围的地图和海图罢了。

目录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致中国读者 / 加文·孟席斯 /1

序言一 / 查济民 /3

序言二 /（美）萨曼塔·奥尔森 /4

致 谢 /5

引 言 /1

第一编 中华帝国 /001

第一章 皇帝的伟大计划 /005

第二章 一场霹雳雷霆 /022

第三章 舰队起航 /029

第二编 指路星辰 /041

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 /042

第五章 新世界 /066

第三编 洪保的远航 /081

第六章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 /082

第四编 周满的远航 /097

第七章 澳大利亚 /098

第八章 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114

第九章 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125

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 /137

第五编 周闻的远航 /151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 /152

第十二章 宝船队搁浅 /168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 /178

第十四章 北极探险 /190

第六编　杨庆的远航 /201
第十五章　揭开谜底 /202

第七编　葡萄牙人夺得桂冠 /213
第十六章　地球的尽头 /214
第十七章　殖民新世界 /227
第十八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37

结　语　中国人的遗产 /251

附录一　公元1421～1423年间中国人的环球航行：有力的证据 /263

附录二　目击者之记录 /289

附录三　描述首次环球航行的重要海图 /299

附录四　15世纪初中国人确定经度的方法 /301

附录五　因特网上的进一步信息 /311

附录六　图版一览表 /313

附录七　参考书目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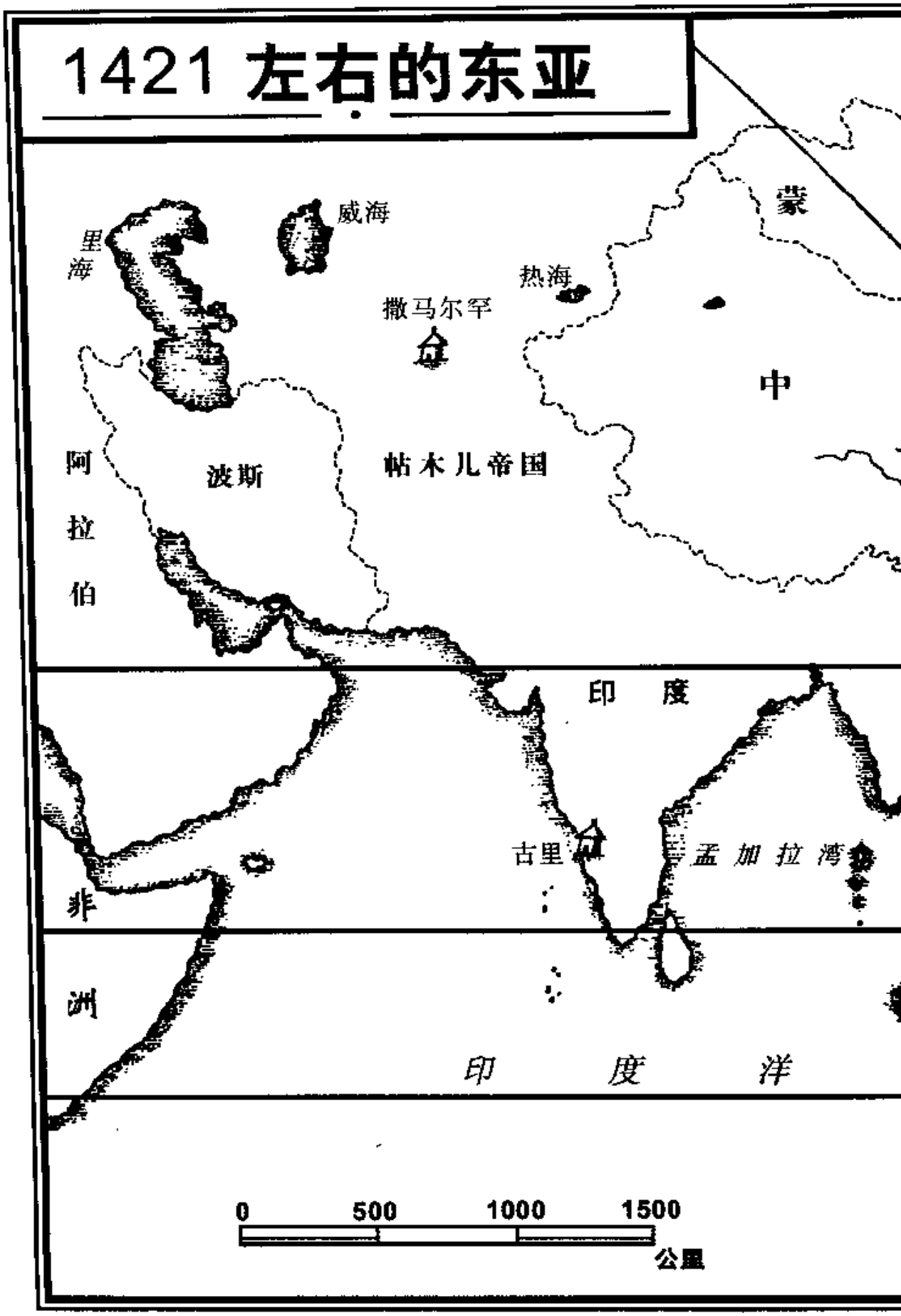
中文简体字版附录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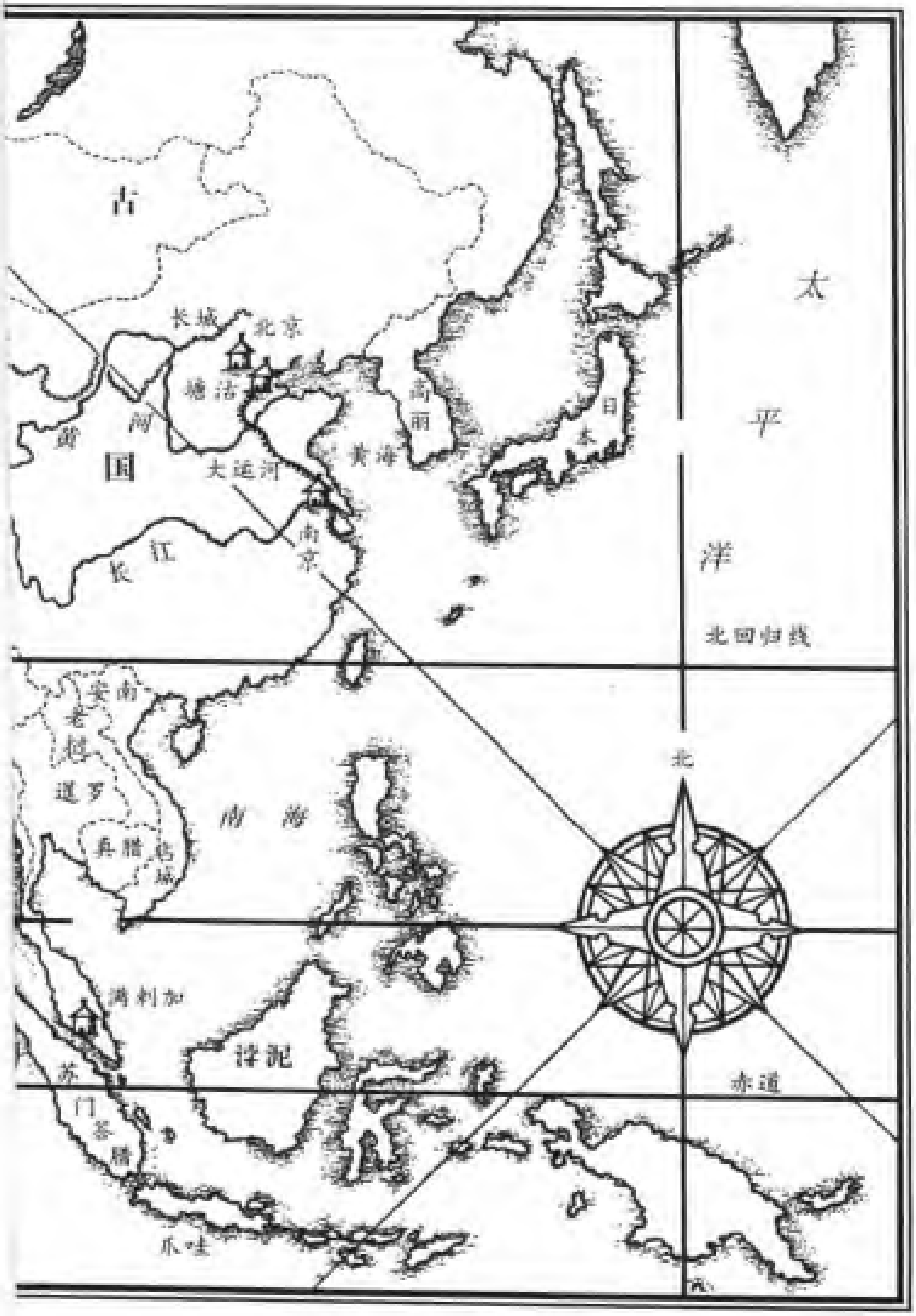
一部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书 / 陈显泗 /336
我所知道的孟席斯其人 / 郑　明 /339
郑和——环球航行第一人？
——访业余历史学家、英国前海军潜艇指挥官孟席斯 / 陈菁闻 /343
郑和研究的一块丰碑 / 高发元 /346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第一编 中华帝国


1421 左右的东亚
威海
里海
热海
撒马尔罕
蒙
中
阿拉伯
波斯
帖木儿帝国
印度
古里
孟加拉湾
非洲
印度洋
0
500
1000
1500
公里


古
国
长城
北京
塘沽
黄河
大运河
长江
南京
黄海
高丽
日本
太
平
洋
北回归线
北
南海
安南
老挝
暹罗
真腊
马城
满剌加
苏门
答腊
泽泥
赤道
爪哇

第一章　皇帝的伟大计划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 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之日，来自亚洲、阿拉伯、非洲和印度洋各地的国王和使臣们聚集于宏伟的北京城向明成祖朱棣即天子宣誓效忠。一支靠指针标明航向而航海的巨型舰队，带着这些统治者和其使臣们来向皇帝进贡，并且让他们目睹了雄伟神奇的都城——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至少有28个国家的首领在场，但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王、法王、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他们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且缺乏贸易的货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以供交流而被排在中国皇帝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外。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卑微，是中国某个最贫穷地区雇工的儿子，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即朱棣出生前的第八个年头，黄河流域大水泛滥，淹没了大量农田，冲走了村庄并且随之留下了饥荒与瘟疫。全国还挣扎在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中。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伟大的忽必烈汗——最伟大的军事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南宋起，中国便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但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劫掠，导致了饥饿和疾病下瘟疫的流行，人民都沦为赤贫，于是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行了起义[①]。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且很快出人头地，成为了领袖，为了他的事业朱元璋重整了士兵和农民。在此后的3年中，起义蔓延至全国。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后，原本骁勇好战的蒙古勇士，那些曾经横掠整个亚洲的战士，开始变得闲散且自满。而且由于内讧导致分裂，他们根本不是朱元璋所率领的军队的对手。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南京，切断了通往蒙古人的位于北方的都城——大都（北京）的粮食供应线。

当朱棣父亲的军队进入大都的时候，朱棣才8岁。最后一个在中国的

① 此处误，元末农民起义起事于淮河流域。——译者

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撤逃至北方草原——蒙古的心脏地区。朱元璋宣布新王朝——明朝建立了，他自称为皇帝，年号洪武。朱棣曾当过骑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官。他21岁的时候被指派参加抗击依旧盘据在云南的蒙古军，此地是西南一多山省份，与今天的老挝接壤；洪武十五年（公元1386年），他又受命去摧毁位于云山南面的昆明残留的蒙古人的堡垒。攻下此城后，成千上万的蒙古男孩惨遭去势。许多人因受刺激和生病而死去；存活下来的阉人有的被征召到帝国的军队中，有的被当作侍从或家臣。

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官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始皇宫里就出现了宦官，多至7万个宦官曾供职于都城及周围地区。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皇帝有成千的嫔妃，这不仅象征着他的权力，而且在每次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保证他有大量的男性继承人；确保王朝的延续性和祖先的尊严是中国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避免其他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的介入保证了嫔妃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皇帝自己的。

宦官也有助于维护帝位周围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虽然皇帝“受命于天”，如果皇帝无道，或是失政，或是胡作非为，天命仍然可以收回。臣民不得直视龙颜：甚至高官们在皇帝面前也要低眉垂眼，而且当皇帝经过街道的时候要树起帏幔以免公众看见他。只有那些完全依靠皇帝过活的娘娘腔式卑躬屈膝的宦官们被认为是足够驯服的，可以默默地目睹皇帝个人的缺点和不足，而绝不敢张扬。

马和是一个在昆明被阉割的男孩，他被分配到朱棣家里，改名为郑和[①]。朱棣和他父亲驱逐的蒙古人中有很多改信回回教。郑和除了是一位厉害的士兵外还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也成为朱棣最亲近的参谋。他身体强壮，比朱棣高；一些记载说他有两米多高、一百多公斤重，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朱棣升任为燕（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王，担负起保卫中国北方诸省这个新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郑和跟随着他。朱棣立基

① 郑和受赐姓为郑事在朱棣造反之后。——译者

于蒙古旧都——大都，并将它改名为北京。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后，蒙古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出了中国。朱棣的父亲，这个年日渐老且日渐多疑的洪武皇帝，系统地整顿了他的军队指挥权，消灭了那些可能一点点威胁到他权威的人。许多高官被勒令自杀，以免因流放或处决他们而使其家庭和祖先蒙辱，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文官武将被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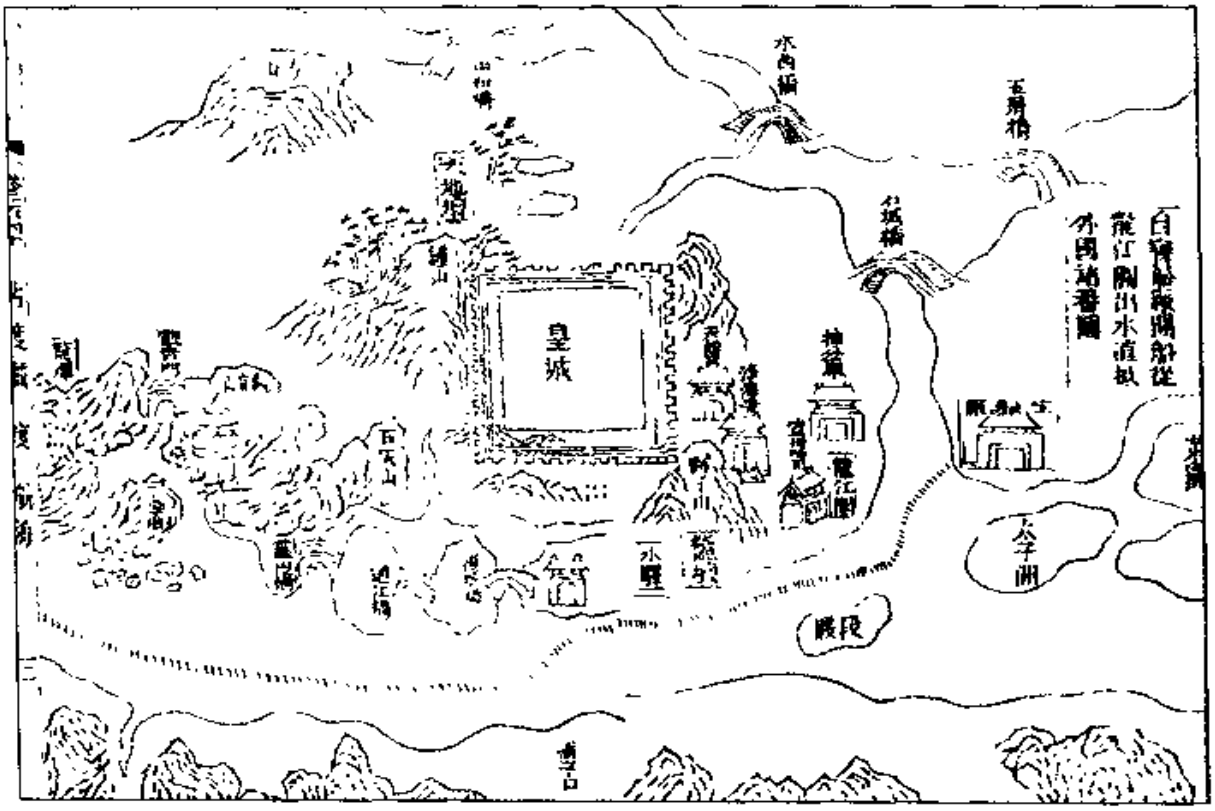
洪武在其长子死后，选择孙子朱允炆(朱棣的侄子）为继承人。老皇帝怀疑朱棣是蒙古人，故而并不信任他。因为洪武曾娶了一个蒙古公主，但不知道她已怀了朱棣。6年后，即1398年，老皇帝死去，朱允炆秉承祖父遗志，继续剪除异己。次年夏天，暗杀团被派到北方去刺杀朱棣。为免于被害，朱棣放弃了舒适的家，好几个月流浪在北京的街头，晚上露宿沟渠，白天在街上游荡。他佯装疯了，变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简直无法认出是个皇族的王公，负责处死他的官兵毫不在意地从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威胁可言的流浪汉身边经过。接下来朱棣的追随者们扶助了他。在他忠诚的宦官卫队的帮助下——此卫队由郑和领导——朱棣秘密地聚集了军队以抗击所谓的生死敌人。他在北京的一个军库里召集了800人，事先这儿就放了嘎嘎叫的鹅以掩盖盔甲和武器的哐铛声。令人奇怪的是，暗杀团内部居然自相残杀起来。初战告捷的朱棣立刻招募并训练了一支军队。

朱允炆得知他派去的人失败的消息，便立即编遣了一支50万人的军队去粉碎朱棣的力量，但天气却陡变，而他从南京派往北方的士兵仅仅穿着夏装和草鞋。当无情的冬季来临之时许多人都冻僵了。在朱允炆军心涣散的部队挺进北京之际，朱棣的军队却设计调往城外。当两军相遇时，朱允炆的军队受到城内、城外的两面夹击。战争中，甚至北京城的妇女都参加了战斗，她们从城墙上向人侵者扔下罐子。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面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

·《武备志》的一幅插图所见的皇都南京。《武备志》这部17世纪的军事著作是根据更早的手册编成的。船厂在桥右侧。



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炆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炆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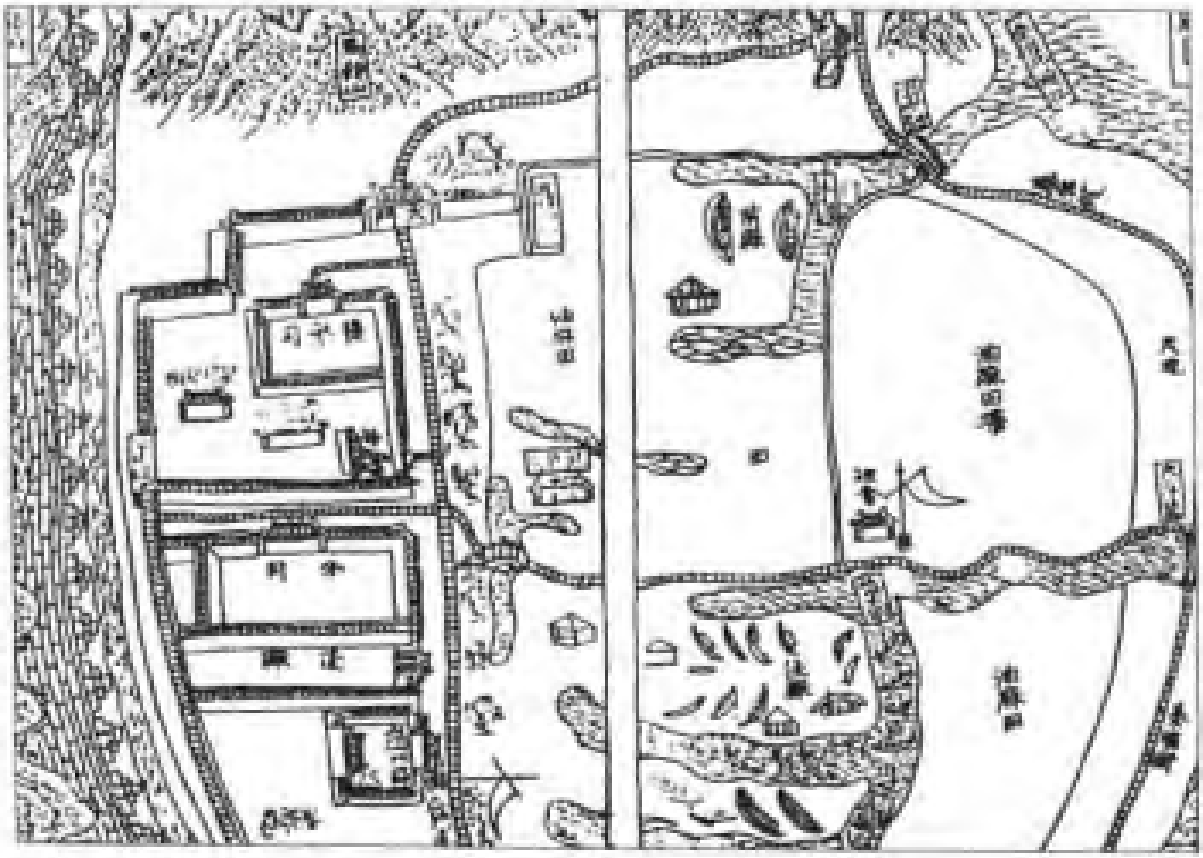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

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

《龙江船厂志》里的龙江船厂插图。此书记载的是郑和时代的船厂的历史，刊印于1553年。图左边是管理局，右边是船台和船坞。



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炆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于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

① 原书据路易丝·利瓦特（Louise Levathes）所著《当中国控制海洋之时（*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一书中引用的《明通鉴》引出此语。《明通鉴》上可查原话为：“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从迹之，多资金币，率兵三万七千余人，造丈船，由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达占城，以次偏历西洋。” ——译者

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面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

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跋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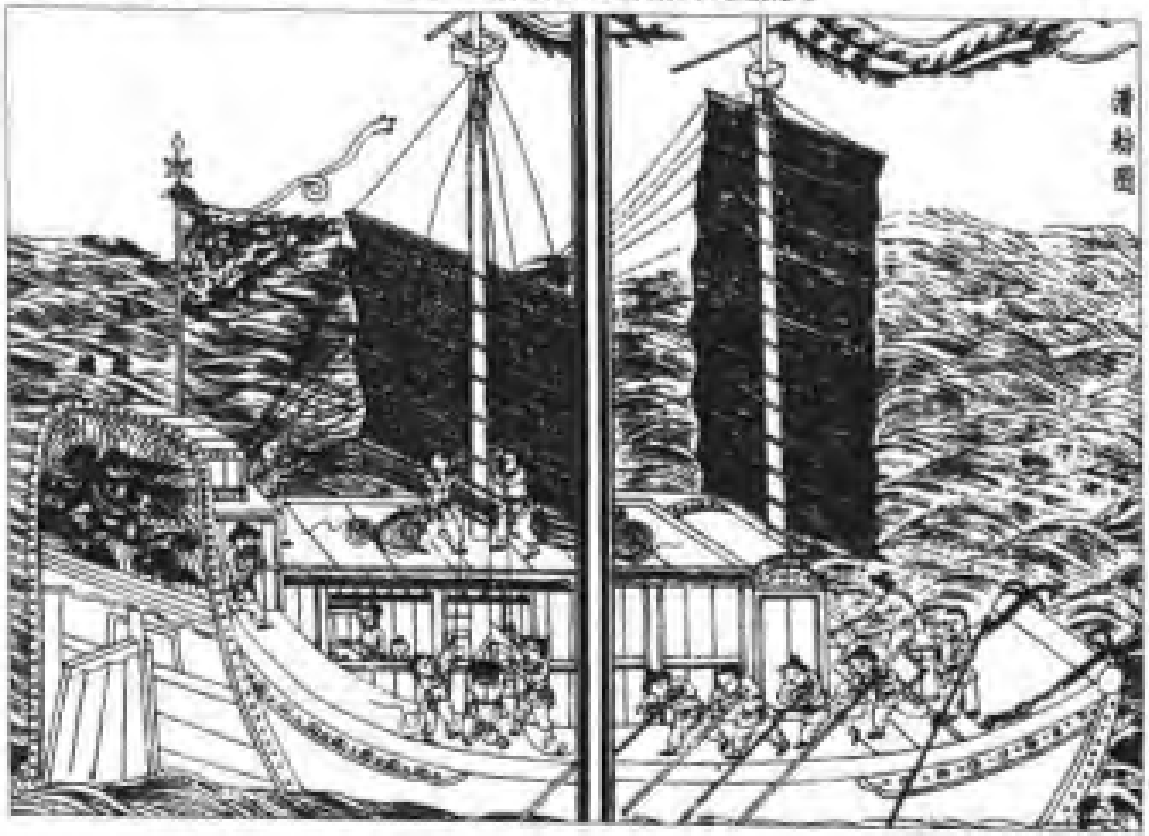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

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

* 《天工开物》（出版于1637年）中所载的明前期的运粮船。



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现在全中国为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都被动员起来了。大队工人被派往中国的江西省、山西省[①]、四川及安南和占城的森林去砍伐更多的柚木。许多砖窑拔地而起以成批制造大量的砖。大量的技工、士兵和劳力被从全国各地征召而来。总之，有100万人直接参与了建造紫禁城，间接消耗的人力还有350万人，另有100多万士兵被安排去看管这些工人。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

① 原书作 Shan Xi，有陕西、山西两种可能，姑译为山西，待查证。——译者

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

① 今柬埔寨人。——译者

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外国的统治者和使臣来到智慧的天堂北京，这一旅程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物欲上的享受。乘坐豪华舒适的巨舰、享受着美食美酒和专门为这些外国显贵服务的女子。在正式的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极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顶峰

① 哈立麻的译名及朱棣给予他的封号皆据《明史》卷311《西域三·乌斯藏大宝法王》。——译者

② 《永乐大典》为解缙、姚广孝、郑赐3人共主监修，其中以解缙为首，原书中的Liu Chi或为Zhen Chi（郑赐）之误。——译者

地位。与此相对比，显现出当时的欧洲落后、未开化且野蛮。仅仅在紫禁城落成仪式后3个星期，亨利五世和凯瑟琳（Catherine de Valois）的婚礼便在伦敦举行了。有26000贵宾尽兴于北京，在那儿他们享用十道菜一席的筵席，每道菜都使用最精美的瓷器餐碟；而亨利的婚礼仅仅只有600人参加，淡鳕鱼干（腌制的鳕鱼）被用来招待客人，这些鱼干盛放在被当作餐碟用的不新鲜的圆面包上。凯瑟琳在婚礼上既没有穿裤子也没有穿袜子；而朱棣最宠爱的妃子却身着最漂亮的丝绸织物，她的首饰有波斯的红玉髓、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的钻石和和田（Kotan，位于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玉石。她佩戴的香料里有产自太平洋的龙涎香、阿拉伯的没药以及香料群岛（Spice Island）的檀香。中国的军队有一百万人，装备有枪支；而亨利五世只能将5000人集于野，他们仅仅装备有大弓、剑和长矛。运送朱棣的贵客回国的船队有100多支，足可容纳30000人；当年6月英王亨利与法国作战时，他的军队只靠四艘渔船往返于英吉利海峡，每次只可装100人，并且仅能在白天航行。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

① 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西南170公里之巴拉韦。——译者

② 今坦桑尼亚之基尔瓦·基西瓦尼 Kilwa Kisiwani。——译者

③ 今肯尼亚之蒙巴萨 Mombasa。——译者

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过了两天，经过36道水闸，他们到达了黄海边的塘沽（在今天的天津附近）。在塘沽欢迎这些使臣的一幕必将永远留在他们脑海中。一百多支巨型平底帆船停泊在港口，高高耸立在码头上的看守人面前——这些船只比海湾边鳞次栉比的屋顶还要高出好多。它们周围是一队小一些的商船。每一个主要的船都大约有480英长、180英尺宽——可容纳50支渔船。船头上的闪烁的蛇眼是用来辟邪的。成千的桅杆竖立如林，在它们上面飘扬着锦旗；在它们下面是丝质的红帆，每条船上有九根桅杆裹着帆，帆很轻但很牢固。“当帆展开的时候，它们像天空中一片硕大的云”。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

① 明成祖朱棣对郑和的指示。引自明宣宗、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的两大块石碑。——译者

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面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

① 明四夷馆中有回回馆，教习波斯语；有西天馆，教习一种与印地语有关的语言；但并无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泰米尔语的课程。——译者

② 据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收入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1～68页）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哈三同行，第四次下西洋，胜慧同行。——译者

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当船长们和使臣们都上了船，船队也将要出发的时候，其周围的水面上还布满着黑压压的往返于大船和海岸的小船。好几天码头都很繁忙，大量的蔬菜、干鱼和几百吨的淡水被运到船上，以供船队里30000人途中所需。所以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驳船陆续送来淡水和粮食。船队可以在海上航行至少3个月，长达4500英里而无需靠岸补充食物或水，因为有单独的供粮船和水箱跟着它一起航行。供粮船上还带着一些植物，中国人想把它们种在国外的土地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中国朝贡体系未来的受益者，另一些可为那些将要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华侨提供食物。狗也被作为宠物带到船上来了，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被饲养作食物或用来捉老鼠。

《证类本草》明宪宗成化四年（出版于1468年）中所载的槟榔树。上面画的是整棵植物，下面是果实。画左的说明文字说到它生于南海。

同时还有成笼的亚洲鸡是作为给外国显贵的贵重的礼物的。还有单独的装马船装着骑兵的坐骑。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ña）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

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① 原文的Shao Lin应即“妈祖（天妃）”，但Shao Lin的确切对音未找到，妈祖本姓林，Shao Lin之Lin应即林。——译者

第二章　一场霹雳雷霆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 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 由于极度痛苦，他无法确定如何安葬死去的要人，朱棣病倒了……死去妃子的私用马匹被放生，可以自由地吃草了……在修筑坟墓的山上，派遣了许多宫女和太监于坟墓附近……给他们预留了可供五年的生活用品，五年后，当食物耗尽，这些人也就陪葬于此（3）。

---

① 明代接见外国使臣和重大朝会均在奉天殿，此处是否指奉天殿，待考。——译者

② 引文作者为格斯林，因此用祷告计算时间。——译者

③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北京明皇宫大火，烧毁的三大殿名为奉天、华盖、谨身。——译者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4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

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 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人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

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

>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
>
>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

① 此查对中文诏令原文译出。——译者

② 原文在“太仓”前还有“福建”字样，误。——译者

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 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蒟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

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

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第三章　舰队起航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

郑和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航线上用的航海图，为《武备志》（刊于1628年）所翻印。

纬度或0° 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 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

① 此处应为浮于水面，因为油表面张力不够，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古书都说是水。——译者

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中国有能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的造船经历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造船技师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分体造船的有机模式。每一部分包括两端的水密隔墙，就像竹子内部结构，水密部分用重几公斤的铜栓将其固定在一起。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框架上，然后用椰子外壳纤维捻缝，并涂上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这种牢固的防水漆自7世纪已被用作漆中国的远洋船只。然而，建造郑和的宝船需要如此多的桐油，导致沿扬子江两岸数英亩土地都被辟为油桐树种植园。

龙江造船厂的造船技师们设计的船只在广阔的海洋上能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加固的船头能使船只乘风破浪，而且在船头两侧有通往船舱内的通道。当方形船头颠簸在浪谷时，海水会进入；而当船头漂浮在浪尖上时，水又从两侧排出，以此来缓减船的颠簸。用铁圈箍在一起的柚木龙骨控制着船的长度，专门切割成巨大的长方形石块作为压舱物装塞在龙骨周围。能升降的附加龙骨安装在其两侧以保持平稳。在暴风雨中，半沉于海中的锚也可越过船舷抛入水中以减小船的摇晃。甚至在恶劣的天气和海洋条件下，通过这些独特的改进，船的颠簸和摇摆被大大减小了。

大船能经历台风而幸存，而且它的组合结构减少了因与礁石或冰山相撞而沉没的危险。它们被设计成即使两个船舱被珊瑚或冰块戳漏进水，也仍然不会沉没。为了增加货物承载力，中国帆船的船体与它们的长度相比是非常宽的，而船底则设计成平底。它们的帆起平衡作用，四边形帆呈倾斜状从帆桁端悬挂——形成中国特有的帆。这些帆通过安装一根根竹条使帆面绷紧，在顺风时，这种设计使航行变得特别有效。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帆也可以迅速卷拢或降下来。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最大的船是这种中国帆船。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横穿亚洲的旅行中记载，整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货物均是由中国船来运输的。几个世纪后的1848年，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乘一艘当时设计建造的中国帆船，从上海经纽约到伦敦，他

们一路顺风航行，帆船的性能表现极好。尽管这些中国船硕大无比，但是它们主要是为在中国与非洲间的航行而设计的，顺季风（季风每年改变两次方向）航行已达数世纪了。虽然四角帆在风中航行也很有效，但是当船身形状与帆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船也试图如此时，它们就显得笨拙而效率低下了。中国帆船绝对不能抢风航行，这实际上强迫顺风航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季风带之外受到严格限制。当要探索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伟大航海期间的航线时，这将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这些巨大宝船的太监船长和海军将领们是一些有相当才能的人。但是，与随其之后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中国的这些船员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数是罪犯，被发配到海上代替坐牢或国内流放。而作为船员，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要比牢狱之刑好得多。出海时，舰队给他们提供制服——一种至膝的白色长袍，饮食则有食物和酒；在海上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海军将领的组成人员还包括180名医官，每条船和每150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医官。宝船上的食物丰富而又品种多样，然而，穿越不明水域的航行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伟大探险与发现的航行中生还的人只有1/10。但是，这些能从早期的宝船航海中幸存下来的人均得到很好的奖赏，他们往往获得自由并得到捐助或养老金。

像中国人也讲迷信一样。郑和船队的每只船上都有一小舱室供奉着水手之女神——妈祖，而且每次晚饭前都有要向她祈祷。当船员在外国登岸，都随身携带圆形铜镜来辟邪，铜镜背面有8根辐条的佛教法轮。

全体船员中的关键人物是导航员和火长（“compass-men”，又称为“船师”），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起居和饮食与船上其他人分开。在他们远洋航行中，为了能使船得到高质量的维修，帆船也载有能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工巧匠：有捻缝工、帆匠、修锚和修泵匠、脚手架工、木匠和桐油漆工。在北京宫城里雕刻有各种作品的石头雕刻者和石匠也乘船航行，给舰队航行所经之地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船上甚至还有一位叫马欢的历史学家，是来记载航行的，他的日记《瀛涯胜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海之后，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出版。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大豆一年到头生长在盆中，它有好几种

用途。绿色的大豆浸泡在水里，能生出“黄色的卷芽”。这种发芽过程增加了抗坏血酸、核黄素和烟碱酸的含量，它们是构成维生素C的基础，并可保护船员不得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坏血病。中国人对坏血病的危害及其防治有很好的了解。大量的柑橘属水果——酸橙、柠檬、橘子、柚子和椰子——被装上船为每个人防治疾病、保护身体可长达3个月之久。柚子——一种类似水果的葡萄柚，也通称为文旦（Shaddock）——自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时代起，柚子特别受到重视。“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_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 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 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子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

们属于一种被称为“蜑”（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 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 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 70 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

① 江盈《广自序》原文为：蛤蚧，偶虫也。采之以为媚药。——译者

② 出自江盈《广自序》。——译者

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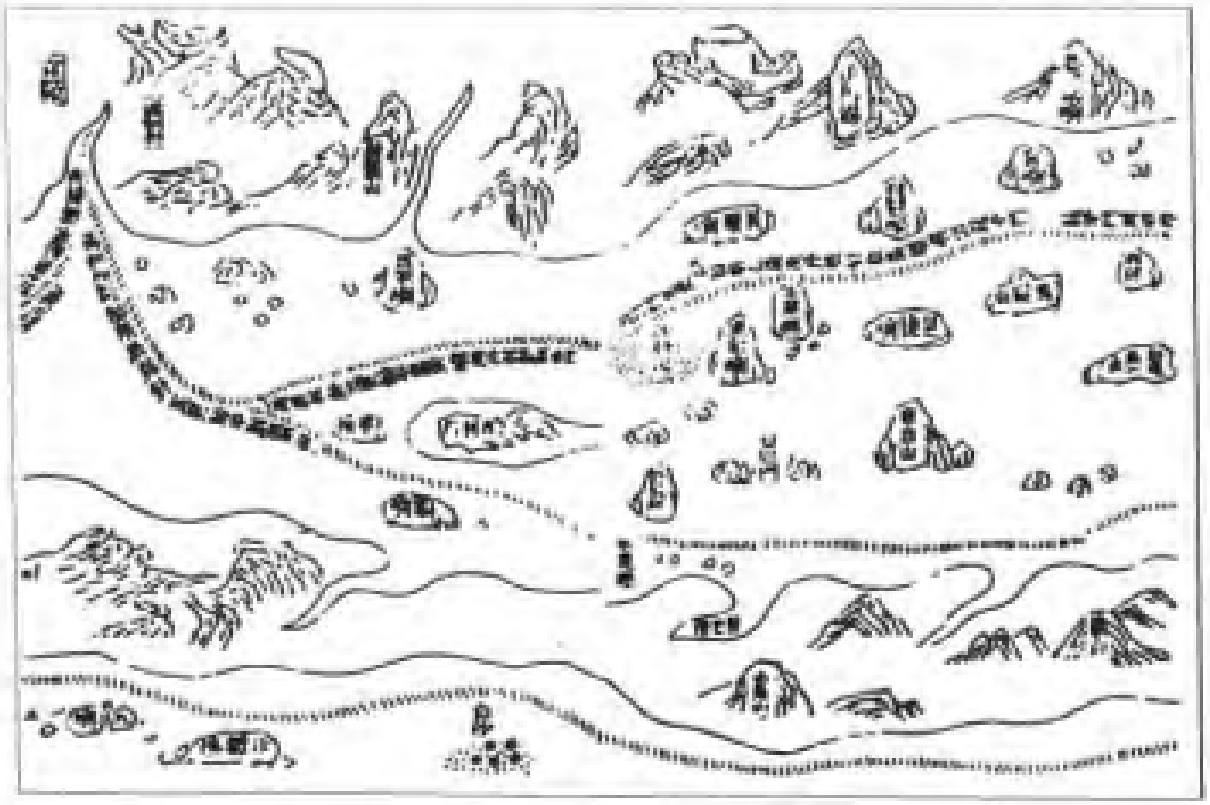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

① 今马来西亚马六甲 ——译者

② 今印度尼西亚美洛加群岛 ——译者

《武备志》郑和图中的马六甲海峡图。马六甲在左上角，底端为苏门答腊。



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盾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 (15)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 (16)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性感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 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茶剌（古

① 以上据马欢书《瀛涯胜览》（丛书集成初编影记录汇编本）原文译出。——译者
② 据马欢书《瀛涯胜览》原文译出。——译者
③ 据马欢书《瀛涯胜览》原文译出。——译者
④ 据马欢书《瀛涯胜览》原文译出。——译者

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

>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 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

① 指满剌加。——译者

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 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

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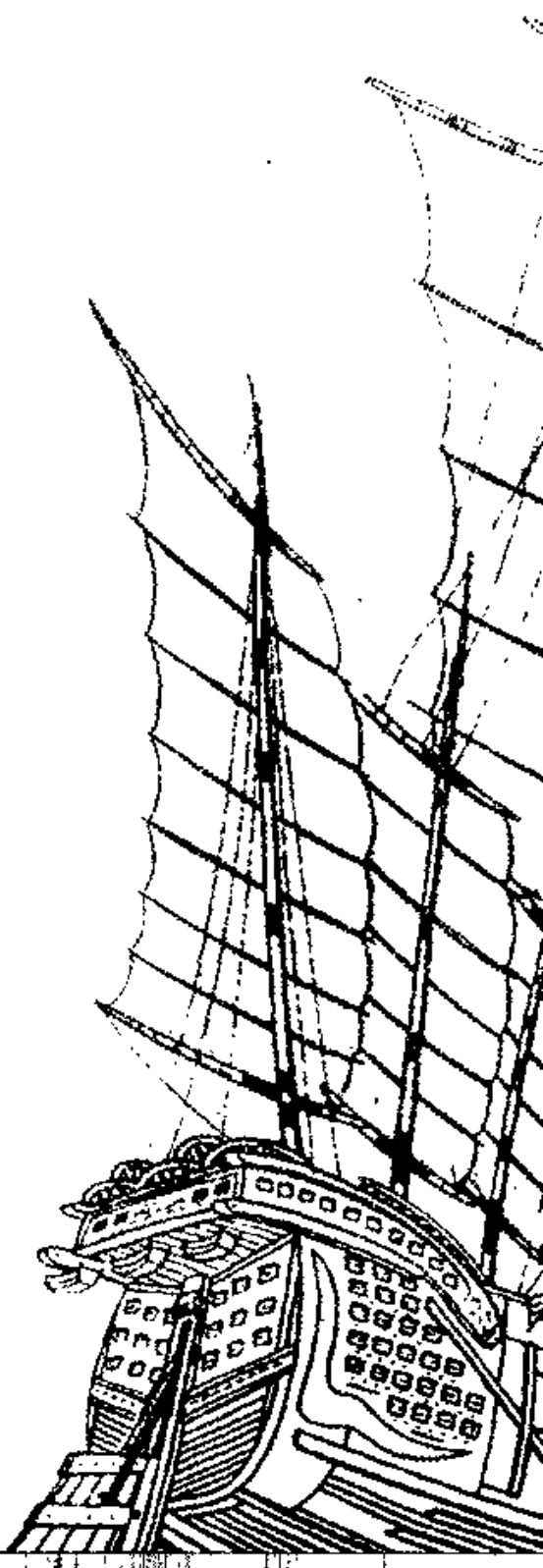
---

① 据1983年发现的《周闻墓志铭》，周闻为太仓卫副千户，当非太监。又周闻仅是副千户，并无资格率领分宗航行。（参考郑一钧《何以令人信服？》一文，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第18期，北京，2003年10月。）——译者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第二编 指路星辰



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

① 有些看法认为刘大夏是为了阻止皇帝可能再次进行的劳民伤财的航海，而隐藏了相关方面的档案记录。——译者

② 原文作Chiang-su，也许是指江苏，误，福建省的郑和所立天妃宫碑在长乐。——译者

③ 所引碑文实际上出自刘家港的天妃宫碑，原书误。此据碑刻原文译出，所据为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附录二之四“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2000年，页51)。值得注意的此书作者并不像多数学者那样，认为其中的“三千余国”是“三十余国”之误，说见后。“三千余国”是收录《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的《吴都文粹续集》一书的原文，原石已佚，无从查对。——译者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贲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 (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

① 原引文字颇有割裂之处，“涉沧溟十万余里”一句应属前，而此段最末一句作者又未引，今据碑刻原文译出并补全。——译者

② 本书作者似乎不知道中文的“十”和“千”只差一笔，根据碑文的照片，确实是三十。——译者

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子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l Razak，活跃于

① 即《郑和航海图》中之慢八撒。——译者

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 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 (6) 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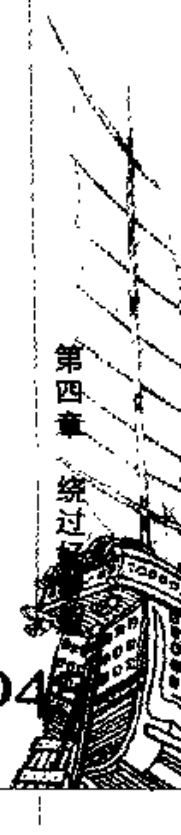
>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来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
>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挈，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 (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da Conti,

① 此据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原文译出。该引文有删节，全文应为：“王系南昆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国人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王是南昆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不食猪肉。”（丛书集成初编影记录汇编本） ——译者

② 此处所引语焉不详，按马欢原文，被指控者的手指要放在油锅里烧焦，然后用棉布包起来，两天后，看看是否溃烂，溃烂则有罪，若完好无恙则无罪。 ——译者

③ 此据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原文译出。 ——译者



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

采载《武备志》的李神图所见的阿拉伯海。图上端是南亚次大陆的西海岸，图底端是阿拉伯半岛的海岸。

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1]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① 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译者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 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

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 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

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子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人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 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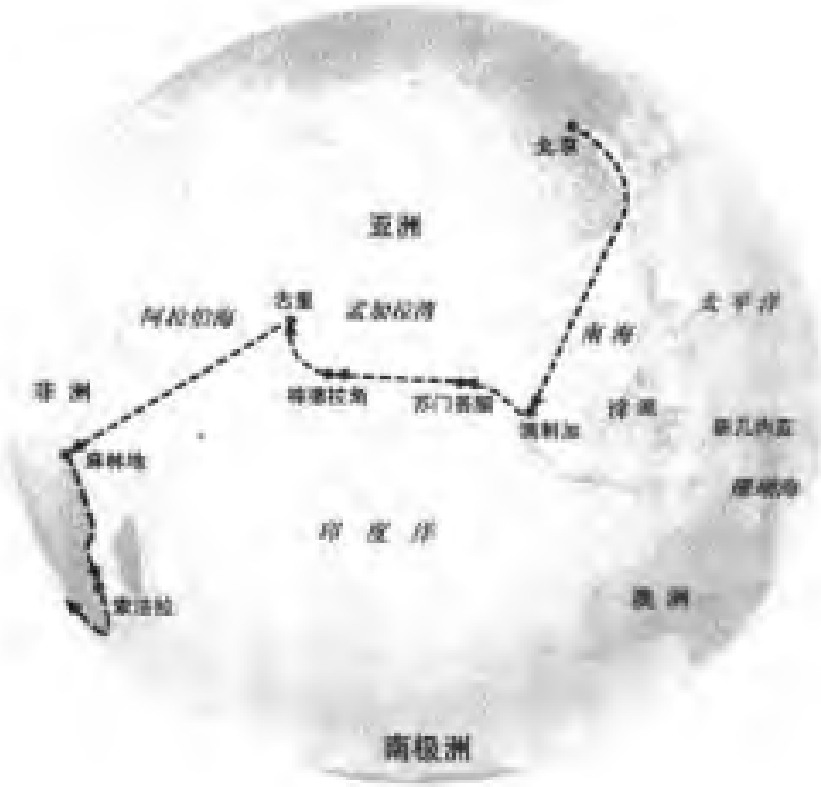
① 指达·康提若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那么他将成为当时的主要当事人，而且其提供的文献资料也就相应的重要可信，他就会是该文作者作为参考考证的最佳候选人了。——译者

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 40′ 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

通往索法拉（Sofala）的航程。



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3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域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船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 *Al Gharb* ——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

① 在这里，作者将文献研究看成一种不同于自然探险但有自然探险"味道"的探险，二者都是发现新事物的行为。——译者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Á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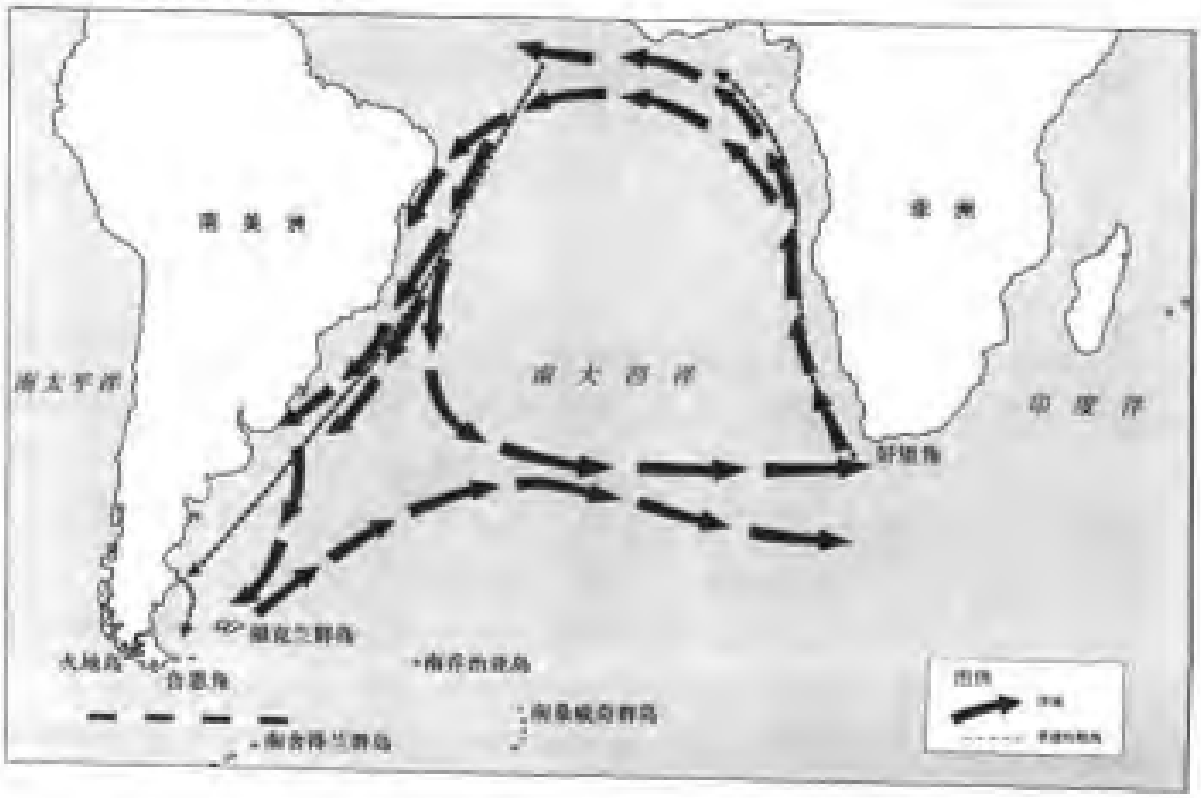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

("Roaring Forties") ——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
>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

· 南大西洋的季风和洋流。



驶5或6个罗经点[1]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① (a) 罗盘卡圆周围32个精确标志的等距点之一，指出水平各部分所在的方向；(b) 两个这种连续点之间11 1/4度的差。——译者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

疆理图的非洲。

经过经度校正的疆图。

现代的非洲地图。

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

① 名为阿鲁曼日子Alamangia，法文的德国至今还叫Allemagne。——译者

“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ão Tomée Prín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 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 ——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

① 指北纬6° 78′，西经10° 47′。——译者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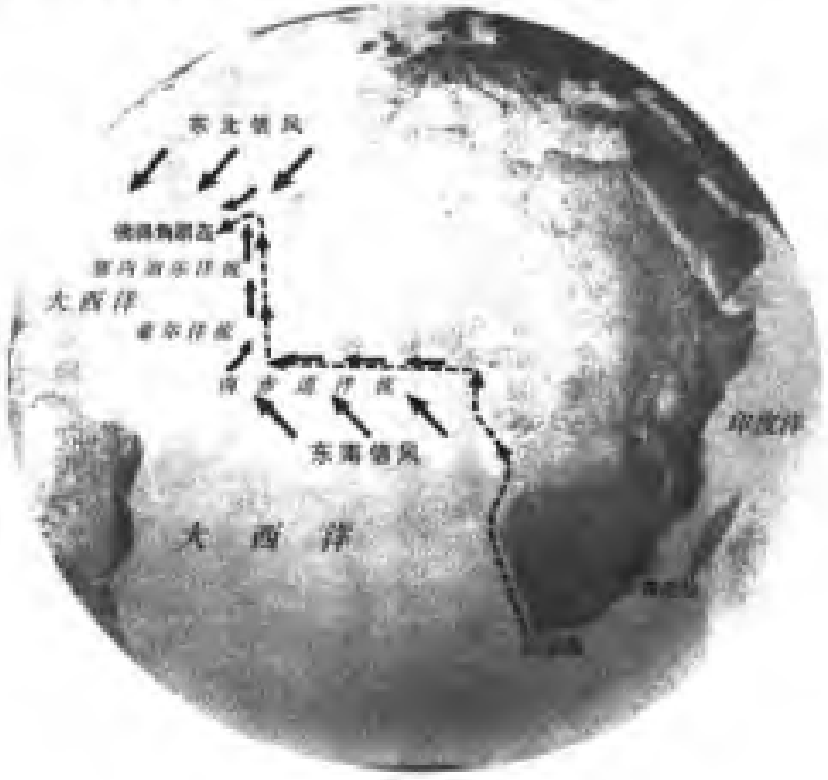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ão)。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

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3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

- 通往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航程。



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ón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àd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

① 这种语言通行于北非。——译者

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②]，”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 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面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

② 印度西南部的达罗毗荼语（Dravidian）的一种方言。——译者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面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 *Le oscuritade* ——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

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ão，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 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Alcobaza，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

① 即巴勒斯坦，特别指耶路撒冷。——译者

② 原书中是按照西文的习惯，将部分引文改为斜体以示突出，现在按照中文的习惯改为加下划线。——译者

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 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

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① 意为“大炮宫”，旧奥斯曼帝国王宫 ——译者

第五章　新世界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

① 据史载慧深来自扶桑并非从扶桑归来。——译者

② 据《梁书·诸夷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原文译出，又《南史》倒作桐。——译者

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 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

· 通向火地岛的航程。

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 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

① 此乃音译。——译者

在显示麦哲伦海峡方面，皮瑞·雷斯图与现今巴塔哥尼亚地图的比较。

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 皮瑞·雷斯地图描绘的其他巴塔哥尼亚的动物都是相当准确，在它们所被标注的地方今天都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如果这种动物真的存在的话，我认为它们的生活范围应在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南部或者在智利的麦哲伦省的北部。这种怪兽是否在此生存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不能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帮助，所以我决定在皮瑞·雷斯图上所表示那种怪兽存在的200英里半径的范围里考查每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在智利麦哲伦省“佛得河”（Rio Verde）的法那博物馆（Museo de Fauna），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我的兴致并没有

灭退。我拜访的第四个博物馆是在布埃尔托·那塔勒斯(Puerto Natales)的司提奥博物馆(Museo de Sitio)附近，得到的结果很令人振奋。

"我正在找一种有两倍人大的一种怪兽，在你们这儿是否有类似这样的动物吗？"

"有啊。"

"你们的博物馆有展览的吗？"

"有的。"

"那它叫什么啊？"

"它叫大树懒。"①

除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零落的关于大树懒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我对大树懒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树懒是南美洲独一

19世纪复原的一副大树懒的骨骼。

① 这种动物究竟是何种动物，译者查找了大量的文献，均未有所获，故暂此译，有待查证。——译者

无二的一种动物，它的体重大约有两百多公斤。在1834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的白巴尼亚（Bahía Blanca）附近发现了一幅骨骼，这个地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明的就是这种怪兽出没的地方。达尔文把这些骨头送给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学院的里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博士，他把骨架做了复原。它像一个有着狗头的巨大的人，在它要摇倒一棵小树的时候，它用尾巴和双腿组成一个三脚架蹲着。放倒一棵树之后，它要把这棵树的没有果实的枝条都剥去，然后再去毁坏下一棵树。据说这种动物有3米多高，有的甚至更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巴塔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冬天里把它们拴在洞穴里，夏天就带出来吃草，它们的肉尝起来很像味道清淡的羊肉。据说大约在三百年前，这些没有“恶意的东西”(7)的最后一只在地球上消失了。然而，近年里却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这种动物的碎片在山洞里被发现，看样子很明显是被当地人屠宰的，以致有人推测在巴塔哥尼亚的野地这种动物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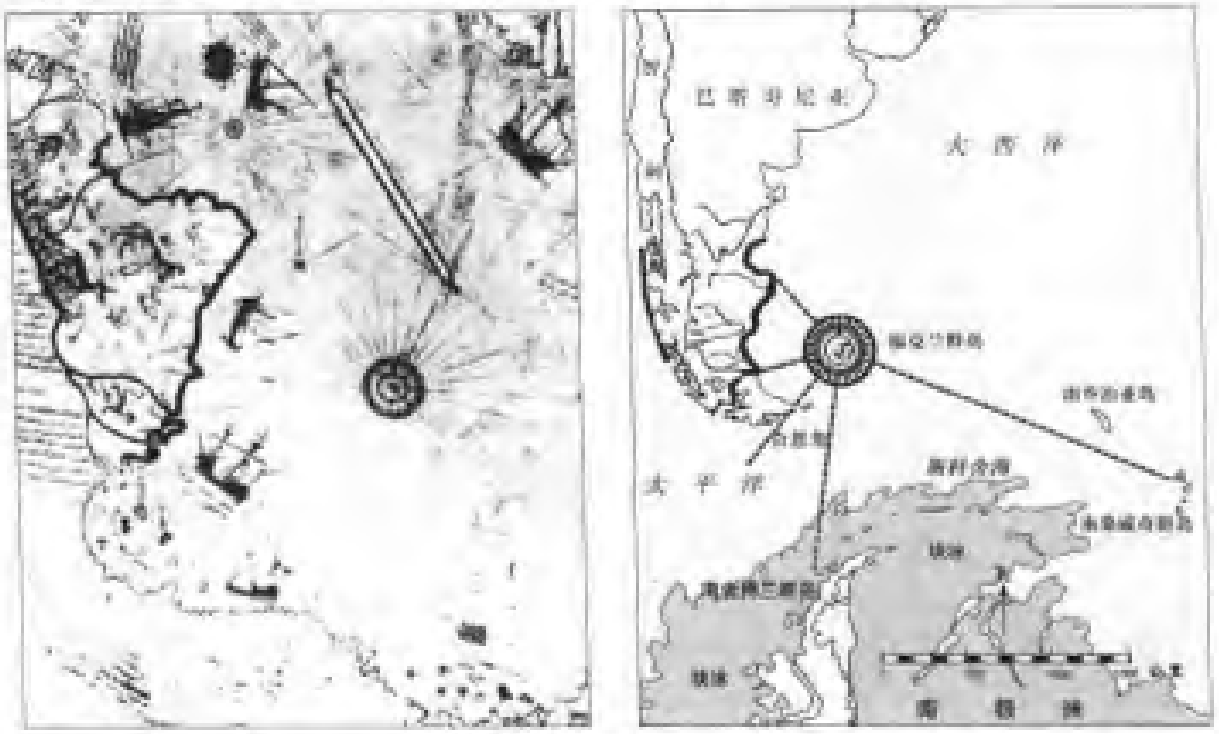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国书籍，名曰《异域图志》[①]（*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正如它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航行中 所见到的一些奇怪的动物。有一种长着狗头的动物与在皮瑞·雷斯图上画着的大树懒很相似，并有文字说明，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两年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这部文献仅这一部分被翻译了出来。

那些中国人在发现这种动物时肯定是很惊奇的，并立刻想方设法地去捕获了一些。那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遇到奇怪的异国动物时，他们会抓一些回去献给他们的皇帝，以充实他的动物园。(8)一连串的麒麟（长颈鹿）被郑和将军带回献给了朱棣，这使朱棣很惊奇和高兴，因此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大树懒被带上了中国帆船，其中的两只带回了中国。(9)我能够想象的出来，那些中国水手们一步一步的引诱着这些有点笨、长着狗头的动物从它们的山洞里出来，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大船里，并且给它们载了成吨的树叶来喂养。

在皮瑞·雷斯图上，对这种动物的外在体形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还表明这种动物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此图只能是图示的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我确信图上西面所画的山就是安第斯山脉。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从大西洋那面看是看不到的，因为群

① 作者指的是哪本书，尚有待查证。——译者

皮瑞·雷斯图上的福克兰群岛，与现代地图的比较。



山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者太平洋之前，那个最初绘这幅图的人肯定是从太平洋沿岸航行的，载着他的船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勇敢地面对合恩角永无休止的惊涛骇浪。

由于知道了巴塔哥尼亚的面积，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皮瑞·雷斯图的比例，并标出图中陆地和岛屿的纬度。白角（Cabo Blanco）是在南纬47° 20′，所以皮瑞·雷斯图底端的岛屿的纬度肯定是南纬48° 43′——恰好与南舍得兰（South Shetland）岛的纬度一样。我现在了解到，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舍得兰之前，那个最初绘图的人已经在400年前乘着船发现了南极洲和南舍得兰。正如后来我发现的那样，那些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绘制南到南极洲、北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覆盖了从陆地到大洋绵延数千里的地图，肯定要花费那些富有技巧的测量员和水手们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时间。要想覆盖这么远的距离，绘图的工程必须通力合作，这就涉及到了对不同舰队的使用问题。在欧洲人到达南大西洋之前，惟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船队航海的国家是中国，而这种提供给中国舰队测量的机会只可能在郑和航海中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那两年"失踪"航行。虽然我想我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人航海到过南美

洲的第一手证据。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将是来自一艘装满明朝早期瓷器的宝船的残骸。在世界上要来推测中国的宝船是否在某地出现过，这样的残骸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南美洲的沿岸找到这重要的残骸却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况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暴风雨和强烈的潮起潮落会冲毁船的残骸，并且卷走那些撒出的货物。所以寻找宝船的工作虽然有待进行，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

此时，我需要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比如，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时，他们是否发现与他们到达中国时发现的植物或动物是一样的呢？或者说，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是否发现中国的植物是与美洲一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舰队是否带了一些回国呢？幸运的是，许多知名的学者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10) 我之所以能够被他们的工作吸引是在一次拜访秘鲁的旅程中，在一个黎明被鸡鸣声叫醒的一个结果。我在马来西亚居住过，记得很清楚在早上亚洲鸡的叫声——“咯咯咯(kik-kiri-kee)”——与它们欧洲的同类“咕咕咕(cock-a-doodle-do)”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听到了熟悉的“咯咯咯”的鸡叫声，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是亚洲鸡而不是欧洲鸡，它们是如何来到秘鲁的。

这些家养的鸡起源于数千年前东南亚洲的丛林，包括中国南部、安南、占城、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这种类型的鸡与欧洲鸡有着明显的不同。当麦哲伦到达里约（Rio，此地现在也用此名），他“得到了很多鸡，……因为用一个鱼钩或一把小刀就换了当地人6只鸡，甚至担心当地人是在骗我”。(11)但后来麦哲伦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发现南美洲的鸡和欧洲的那些“粪堆上的家禽”有很大的不同。鸡分为完全不同的四类。马来种瘦瘦、高高的——以至于能飞到餐桌上来抢食物吃。它们的头细细的，更像是火鸡，从喉部到胸脯都没长毛，光秃秃的。中国种的则是矮胖矮胖的，身体有点肥，羽毛松软，翅膀短短的，腿上长毛。这种鸡有着很小的尾毛，还有着小小的、短的、不甚发达的骨刺。它们都不擅长飞翔，性情很温顺。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着松软羽毛、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的鸡(“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是指这种奇特的鸡的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在拉丁美洲已经到处都能发现了。第四种鸡就是亚洲卷毛鸡，[①]这种鸡身上的羽毛是弯弯曲曲的，而不是

① 作者看来第三种鸡就是那种“粪堆上的家禽”——欧洲鸡。由于本书最早在欧洲出版的，所以作者未谈论这种鸡，因为欧洲人对欧洲鸡是很了解的，没必要说了。——译者

1604年阿尔德文蒂的书 *Ornithologia* 中的一幅卷毛家禽图。

平直的。而且在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卷毛鸡已经遍布南美洲了，而在地中海世界还没有相似的鸡。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不同是，这种亚洲母鸡生下来的蛋是蓝色壳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欧洲母鸡产下来的蛋是白色的或者是奶黄色。从智利到墨西哥，这种蓝色的鸡蛋依然在各处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1]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2]。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

① 托帕卡·尤潘基是印加王国时期的一位君王。——译者

② 译名参考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一）》（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62。——译者

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 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 (13)
>
>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 玉米就已被引人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 ——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

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 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i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 (lada)" ——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 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 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 ——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 (Puntas Guzmán)、梅塞德斯 (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 (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 (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 (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 (Cabos Buen Tempo) 和圣埃斯

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 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者人星殊高。者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① 原文300光年，有误。——译者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 40′ 。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 40′ ，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 53′ 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 ）。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 × 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 40′ 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 40′ 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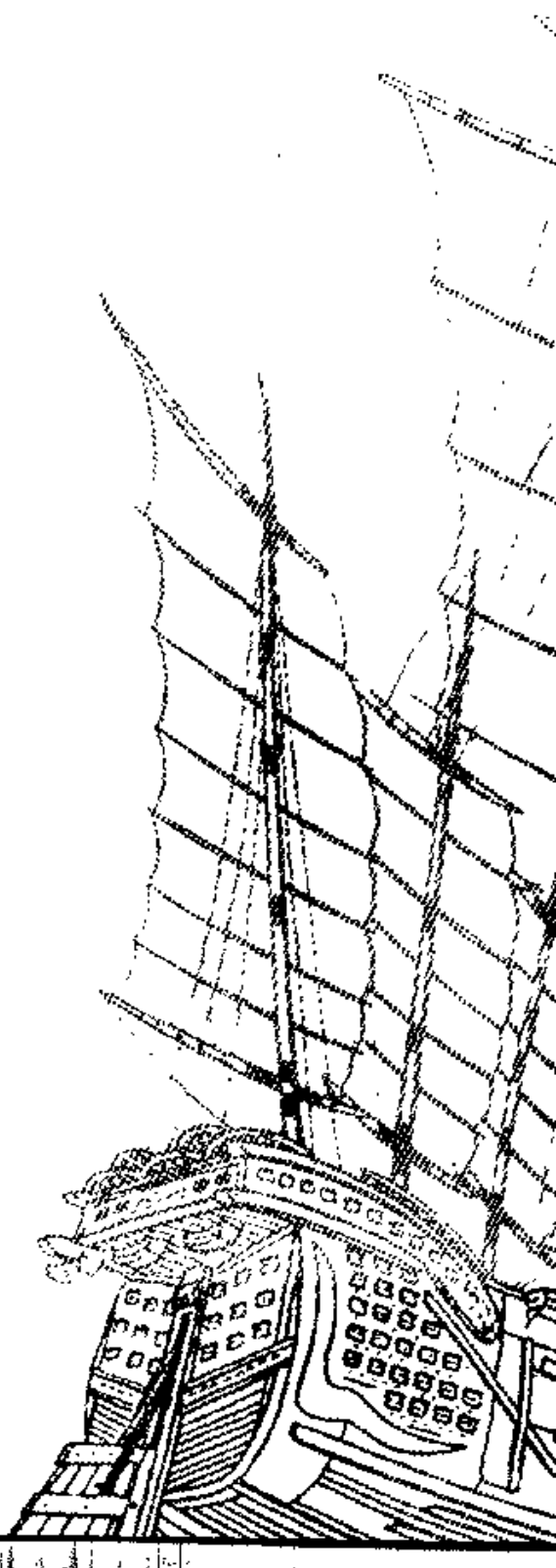
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

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国。周满没有带回来一名大使，而洪保也只是从古里带回了一名大使。基与此，我能推导出，周满将军的舰队向西航行，以绘出太平洋，经香料群岛返回。为了测出南十字星的位置，洪保将军的舰队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满剌加和古里。于是我开始寻找他们航行的路线，首先我要追寻的是洪保通过南半球的海洋的航线。

THE N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第三编 洪保的远航



第六章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

洪保将军的特定任务是从建立在福克兰群岛上的固定点向东出发，以绘制世界地图，这个固定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出的罗盘是南纬52°40′。现在在他的供给船上的大米越来越少了，在桶里的发芽的大豆可能已经吃完了。在开始向东航行驶向未知的南部大洋之前，他必须要带上足够的新鲜食物。

福克兰群岛上只能提供卷心菜、野芹菜、企鹅、鹅和鱼，肉类很少，更谈不上新鲜水果。在福克兰群岛上曾被发现的惟一的哺乳动物是“瓦拉”（Warrah），那是一种当地的狐狸，达尔文这样写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远离大陆，面积如此之小，而上面的土地却是大片的贫瘠，上面生活着数目众多的很奇特的当地四足兽（Warrah）……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岛屿在人们逐步的定居后，这些狐狸极有可能和渡渡鸟（dodo）一样成为地球上消失的动物。”（1）

正如达尔文所断言的那样，一些奇怪的事情在这些动物身上发生了，在19世纪7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上，它们彻底灭绝了。达尔文和其他的一些自然学家留意到这种动物是非常温顺的。英国生物学家朱立特·卡卢顿·布若科（Juliet Clutton Brock）从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动物标本上分析出了它的身体特征，长的有点像一种澳洲的野狗，曾经被人驯养过。它是南美狐狸和欧洲人到达南美洲之前被越过海洋带到福克兰群岛的野狗的杂交品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留下了他们所带的一些狗在福克兰群岛（他们在船上养狗以供食用），随后这些狗和当地的狐狸交配。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一项关于现存的“瓦拉”的DNA的实验已在进行，以便它们能够和中国食用狗的DNA比较，结果将在网站上公布出来。

如果福克兰群岛提供的只是非常有限的食物的话，那么往西300海里的巴塔哥尼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食物贮藏室，正如后来的探险者会在这里大快朵颐一样。用鱼网来捕上一个早晨，就有足够让整个舰队的人吃饱的鱼上钩，浅水湾也满是像螃蟹一样大的贝类。南美骆马、骆鹿

(huemil)[1]，还有像狗一样大的野兔都非常温顺；只有在面对那咆哮的山地狮子，水手们才没办法。含有丰富维生素C的草莓和野苹果到处都是。或许是洪保将军好好地利用了在南极洲夏天中常见的一个平静阶段，为了重新补足给养，他从福克兰群岛直接往西回航去了巴塔哥尼亚。洪保将军的舰队依然在南纬52° 40′ 的老人星下面航行，应该会发现维京角（Cape Virgines）南边的一个大港口可作为安全的停泊地。对于洪保而言，他并不知道这个海湾可以直接驶向太平洋。在洪保进入这个海湾后，一股速度总计到达6海里／小时的强烈的水流拽着他的舰队往西南航行，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底下流掉一样。

第二天早晨，这支舰队已经在海峡里航行了一半的路程。终于离开洋流，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布隆斯维克（Brunswick）半岛了（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尖角），在皮瑞·雷斯图上能够清楚的辨认出来。现在，洪保的舰队已经处在老人星的南面了，他会希望他的舰队向北航行，以便能够再一次在他所设定的参考点下面航行，此处的纬度是他用来绘制直到东方的世界地图的。但在驶向吉若诺米诺（Canal Geronomino）运河的路上，海峡变得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甚至不超过一英里，对于洪保的大船只来说，简直是太窄了，甚至船只根本都无法驾驶。因为那些大船转个圈也差不多要一英里的地方。因此舰队被迫掉转船头，所以制图师把吉若诺米诺运河画成一条河流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

返回到布隆斯维克半岛，这支舰队取道马德莲娜（Canal Magdalena）运河，向西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在阿固若岛（Isla Aguirre）附近进入太平洋，而阿固若岛是在沿岸数以百计海岛中的一个很小、无人居住的但已有了名字的小岛，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麦哲伦海峡”的发现和绘制完全是偶然的：海峡入口的纬度同时也是中国人在南半球的引导之星——老人星的纬度。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因为在这里面，猛烈的狂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是很普通的，如此恶劣的天气导致能见度很低，而中国人的船只又是巨大、方方正正，在此环境下航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香料群岛的海道。这样看来，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铭感五内才对。

① 此物有待查证。——译者

因为海峡的任何一边都是遥远、荒凉的陆地，所以这儿被最早的欧洲探险者称为“极恶之地”是不无道理的。尽管有没完没了的暴风雪经常被大风顺着地面刮过这片旷野，火地岛还是有着迷人、壮丽的景观。冰山垂直地滑进了大洋中，在冰川上面的冰山的顶端在苍白天空的映衬下，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数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航海者们还是害怕这儿剧烈的洋流，因为看起来，它的开始和结束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甚至没有明显的中断，向西面掠过的狂风无处不在，在几分种之内就能把大海搅得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直到19世纪，这儿咆哮的大风和冷酷的地理环境还使人们望而却步，只留下亚马拿族（Yámana）土著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安然地生存。他们在火旁挤成一团，以致麦哲伦命名这个地方为火地岛。在达尔文看来，亚马拿族人“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幸、最悲惨的生命，在他们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比野生动物和驯养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2)

发现了是中国人最早驶过这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这一刻对于我而言是相当震撼的。我非常想知道洪保是否意识到他此举的重要意义。于是我来到大英图书馆寻找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和跟随他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日记，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关于在此一世纪前的那次破冰之旅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麦哲伦背弃了他的祖国，于1519年9月20日，在西班牙的旗帜下，他开始了那次伟大的环球航行。出发时，他的舰队共有5艘船，一共有265名水手，但在完成环球航行后，只有一艘船以及18个人幸存了下来，最终完成了环球航行。麦哲伦自己也因在菲律宾卷入了两支部落的械斗中，在1521年4月27日身受重伤而死。关于航行中的这一关键时刻，皮加费塔在日记里写道：

> 在圣母节（Eleven thousand virgins，10月21日）那天，我们离开南纬52°，向传说中的南极点驶去。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发现了一个海峡，我们称附近的海岬为圣母角（现称维京角）。这个海峡长有110里格，就是440英里长，在宽度上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到1/2里格。[①] (3)

从他们“航行的路线朝着52°”的事实上，可以暗示出麦哲伦事实上知道在南纬52°他将会发现那条后来以他名字命名、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① 1里格为3英里。——译者

的海峡。在1520年10月19日，麦哲伦的舰队到达了那片阴暗、难以航行的地域。此时此刻，麦哲伦和他的水手们已经溃不成军。咆哮的狂风无情地折磨着船只，暴风雪又使他们难以辨得清前面的出口和四周的岩石岛。舰队找不到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很多水手又得了坏血病，在这之前，他只是用绞死叛乱领导者、或抽签将之致死（抽签者中的1/4将被处死）这些残忍的权宜之策把叛乱镇压下去了。现在一起新的叛乱又见端倪了。

“被群山包围着，使得该海峡呈现出一个圆形……对于船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找到一条道路驶入传说中的太平洋的”，(4) 麦哲伦未能说服众人一直朝前走是能够安全的通过海峡的，因此为了解决危机，他下令众人们把他们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到西班牙的理由都写下来。他大声朗读他们的看法，随后他穿上佩戴了所授的圣詹姆斯（Saint James）勋章的斗篷，并发了神圣的誓言，面对他的水手，麦哲伦庄严的宣誓“存在着一个通往太平洋的海峡，他对此很熟悉，曾经在葡萄牙国王的一个海军部门他见过该海峡的图，这副图是由一个名叫波希米亚的马丁（Martin of Bohemia）[①]的伟大水手绘制的”。(5)

麦哲伦讲的是实话，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真相。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早就知道存在的一条从大西洋驶向太平洋的海峡。西班牙国王给麦哲伦看了一幅图，图上显示了那条连接太平洋的海峡。麦哲伦和西班牙国王的条约突出了这次航海的目的——向西航行，驶向香料群岛——所得利润是双方共享。麦哲伦希望关于这条海峡的知识能够仅仅被他一人所知晓，别人都不能知道，并宣称巨大的财富就在前面等待着他，但是西班牙国王对此爱莫能助，因为原版海图在葡萄牙人手上。

麦哲伦的言语和他的冷酷无情以及他令人振奋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水手们能够继续前进，最终他们驶过了这条海峡，而这条海峡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这条海峡的人洪保来命名。在描写船只通过这条海峡，进入太平洋时，皮加费塔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在我们离开了这条海峡后，如果我们一直向西航行的话，除了圣女角，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岛屿……在纬度的52° 上正好朝着南极点。”(6) 皮加费塔的注释透露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要么从在该纬度航行过的人那儿获得，要么是从一幅显示出在南纬52° 的太平洋是一片空白、没有陆地的海图中获得。在离开这个海峡后，麦哲伦向北航行，驶向赤道，对于他而言再在这个纬度上航行的话是发现不到任何土地的。因此麦哲伦肯定

① 此译名参见了范信龙等译《归来没有统帅——麦哲伦传》（[奥]茨威格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中的译名。——译者

看过了地图，所以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该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罗修士是正确的：来自印度洋的一艘船绕过了好望角，驶向“无名群岛”。关于皮瑞·雷斯图的谜底已经得到解决了。在麦哲伦航行之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实实在在的被绘制了出来，它不是像一个权威机关所猜想的那样，(7) 在埃及法老之前的一个文明所创作的，也不是像一位学者所论证的那样是来自外太空，(8) 而是有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舰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失踪的岁月”里所绘制的。

在通过这个海峡之后，洪保下令他的舰队向南航行，驶到了火地岛的西面。皮瑞·雷斯图的制图清楚的反映出舰队航行的路线，一方面巴塔哥尼亚得到了精确的绘制，另一方面火地岛南部诸多的岛屿根本没有表示，这暗示出中国人是沿着多山的西海岸航行的。

我拿皮瑞·雷斯图与现代的卫星地图做了比较，立刻辨别出中国人向南的航线周围的海湾和岛屿。沿着海岸再远一步，库克海峡(Cook Strait)是被精确的标识了，可以猜想洪保将军曾经在此抛锚。在这个抛锚地，洪保将军应该会看到巨大的被积雪覆盖的科迪勒拉·达尔文（Cordillera Darwin）山脉，山脉东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拱形山峰。它们在地图上被画成分散的岛屿，因为从绘图者所在的距离来看，他们只能看到被积雪覆盖的群山山顶。我把皮瑞·雷斯图放大到与现在地图一样大的比例，(9) 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巴塔哥尼亚的南部表示的所有的11个岛是与在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是一致的。我的具体研究已在网站上登出。

中国人已经确定了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在南半球距南极最近且最明亮的星，类似于北半球的北极星。但是为了确定它相对于南极的位置，他们必须测定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并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确。因为从对晚间天空的观察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的两个主要星星，十字伽马和十字阿尔发会和极点成一直线，所以他们相信只要沿着同一方向航行就能到达极点。

对于航海者而言，极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夏天是这里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晴朗的天空，清澈的蓝色大海上点缀着片片浮冰。但是气候突变的时候，就会狂风大作，巨浪排山倒海而来，飓风和着冰雪像针一样扎着水手们的皮肤。在冬至期间，连续数周不见阳光。即使太阳开始重新出现，它也顶多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转瞬间就落下的暗淡光点。云团和凝结的雾团遮蔽所有的轮廓，让观测的水手根本无法看得太清楚，在他们周围的那些移动的浮冰或者露出水面的冰山都显得很朦胧，以致它

们最初出现的危险迹象都难以发现。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如此冰冻地区航行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8个世纪在北极地区航海的经验，同时也有了一千年在冰上航行的传统：离北京最近的港口是塘沽，在每年里都有3个月的结冰期。根据关于1506年一位来自波伦亚（Bologna）名叫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①]（Ludovico de Varthema）的年轻贵族的航行的叙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即在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人的确试图驶向南极。(10) 卢多维克·德·瓦特玛在婆罗洲和爪哇之间航行，在那里他得知了一个奇怪的传说。他的两个中国基督徒和一个东印度的同伴告诉他，来自爪哇的另一面的（中国的）水手已经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驶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那里白天只有4个小时。如果没有航行到那里，(11) 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皮瑞·雷斯图提供了中国水手向南航行的进一步证据。图上的冰是正向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漂移，要把这种情形画下来，中国人肯定是沿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航行的。他们正向着南方，径直驶向南极。南十字星座的主要两颗星在他们头顶，(12) 指引着他们航行的方向。在火地岛南面大约两百多英里的地方，(13) 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这块浮冰已经开始向东弯曲，在皮瑞·雷斯图上，它是以一个C 型的拱形出现的。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未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先是向东航行，然后是向东南方航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驶向极点的路。当他们又航行了三百多公里后，(14) 他们遇到了坚冰，它们堵住了所有通向南极半岛的道路。这些在图上绘制的冰山与夏至期间浮冰和坚冰正常的最大范围的契合。(15)

现在洪保将军正在接近南极圈，在此纬度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南极，纬度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点。在这里除了北是没有任何别的方向的。在夏至（12月），太阳一天到晚挂在北方；到了冬天，又是无止境的黑夜，不见阳光。受南磁极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就是南十字星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的纬度，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整天都在天空上能看到，位于南纬68°。由于老人星自身所发出强烈的光以及南极洲清澄的空气，以至于白天也能看见这颗星星。

皮瑞·雷斯图表示了格雷汉姆（Graham）岛，这是南极半岛的最

① 此处乃音译。——译者

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可以确证探险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公元1422年1月）达到了那里。图上从合恩角伸出的C形浮冰，暗示在最初他们遇到了一股来自东面的洋流。继续向南航行，随后的洋流多多

就向南极洲的航程。

少少消失了。图上反映的就是东西方向延伸的坚冰。此后他们在遇到另一股比较弱的洋流，这股洋流使浮冰朝东南方向微微弯曲。这种独特弯曲形状的浮冰表明，中国人遇到了一个好的天气，在不至于吹断冰块的微风下，驶进了极地洋流。我推算他们当时的最高平均航速大约是3节海里／小时。照这个速度计算，从合恩角航行到南极半岛，最多只需14天。

在皮瑞·雷斯图上有一群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岛屿。在形状上它们与南舍得兰群岛相似，我想知道它们是否就是舍得兰群岛。依靠老人星，中国人能够精确的测量出纬度，但是他们测量经度时就没有像纬度那样精确，考虑到中国舰队航行时水流的运动，就像曾经对疆理图中的非洲所做的经度调整那样，我不得不再次调整皮瑞·雷斯图上的经度。考虑到在他们南行的途上，逆向他们的水流平均速度大约是2/3海里／小时，所以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岛事实上要比所画的位置再靠西四百多英里——这正是南舍得兰群岛的准确位置。

从皮瑞·雷斯图上我知道中国人肯定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

近了南极洲，中国人在南舍得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这些岛屿中的三个岛绘制的非常准确：西面的是斯诺岛，南面是马靴形状的迷幻岛(Deception Island)，北面的是有着4座山的利文斯敦（Livingstone Island）岛。在迷幻岛的附近有一条题记："此地炎热。"乍一看，对于一个在南极洲积雪覆盖的岛屿而言，这样的论述甚是奇怪，但迷幻岛是一个火山活动频繁的岛屿。现代的游船停在这里的环礁湖里，好让游客们在有火山温泉的杰明湾（Benjamin Cove）里泡个痛快。

除了迷幻岛，南舍得兰群岛则是一片没有生物生存、碎石头满地、常年冰川覆盖的荒凉之地，甚至连一片草地都看不见。据我自己在极地水域的航行经历来看，我知道那是异常寒冷的，手指随时都可能被金属粘住。为了避免这种撕肉之痛，你需要温暖你的手指。通常的唯一方法是朝手指小便，但如果你是暴露在南极的风中这么做的话，你要冒着被冻成重伤的痛苦了。在甲板下面，中国水手们依偎在牲畜之间，挤在一起，竭力维持温暖，尽可能地少到甲板上面去。他们的粮食必须仔细的盖好，以防被严寒冻坏而不能食用。放鱼和训练过的水獭的水箱不得不放空，因为水箱中的水冻起来后膨胀，会把船舱撑出裂缝来。而且，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的岛屿观察仔细必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那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寻烦恼地这么做呢？我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到达过此地。后来，我突然悟出了早该想到的答案：这个地点正对着十字阿尔发星，这是南十字星的一颗主要星星，在南纬62°49′。

关于数百年之前中国水手航海的技巧和熟练程度的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但在人类关于对地球认识的历史中，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是至为重要的一刻。因为中国人知道地球的周长，所以现在他们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真正方位和它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间（公元1421～1423年），南十字星和老人星在北纬28°——加那利（Canaries）群岛的纬度——能被观察到。在这儿，北极星也清楚可见。(16) 通过比较老人星和北极星的纬度，一个校对纬度的参照系就能够获得了。在《武备志》一书中就可以得知这是一种中国航海家经常采用的方法。而葡萄牙人在50年后才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纬度。

现在中国人可以像在北半球一样沿着正确的航路向南航行、测定精确的纬度了。但经度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一旦在南半球纬度能够被准确

的测量出来，中国人画的地图就能够让人很容易的看懂，而不是像在《武备志》里的那样是代表航行方向的一张表格或者是一个长条，而是一种

可以识别的地理绘图。皮瑞·雷斯图附加的一条题记确认了这种变化："（这幅图）的绘制……来自大约二十幅地图……它以几何方法表现了巴基斯坦（Sint，信德）、印度（Hint）、大秦（Cin，中国）的这些国度。所有的图都是缩小成同一比例，才最后组成了这幅图。"（17）

对中国天文学家、航海家以及制图学家而言，找到了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准确地绘制世界地图，想必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动的成功时刻，就像欧洲人在1473年发现了同样的方法一样。把老人星的纬度作为一个基准线，现在中国舰队又能够继续去探索世界了。他们不辱使命已经完成了皇帝交给他们主要任务中的一个。现在中国水手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严寒的侵袭，在再次向南航行探索南极大陆之前，中国水手们捕获了一些企鹅作为食物，顺便切下了一些冰块作为新鲜水，然后欢快地跳进迷幻岛的环礁湖里尽情享受泡温泉的乐趣。他们还酿了一些米酒，烹调狗肉，好好地欢快庆贺了一下。

在中国的平底帆船通过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

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小。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确。在皮瑞·雷斯图上，我能够认出63个南极大陆的主要特征。我的工作图的细节在网站上面。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不符合常规——在象岛（Elephant Island）的冰上，一条奇怪的大蛇躺在上面休息。但是如果海豹匍匐在冰上滑动时，就很像蛇；而且和蛇一样，海豹也有尖牙。在象岛的东面，威德尔海（Weddell Sea）被画成一大片坚冰。事实上，它正是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在制图方面，皮瑞·雷斯图真的是相当准确的。

我的脑海里不必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也不用古埃及人或外星人去解释为什么在最早的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之前就已经在皮瑞·雷斯图中那么准确地绘出南极洲了。皮瑞·雷斯图的信息来自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洪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他们已经精确地确定了南十字星的位置。

在皮瑞·雷斯图还显示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罗盘刻度盘，位于福克兰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得兰群岛的东北方。这个小罗盘刻度盘相对应的中心是博德岛（Bird Island，意为“鸟岛”）。正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博德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它们把这个岛作为人水的平台，以捕获浮游生物和南极洋中丰富的鱼类。这是一个有3公里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的北面的边缘是陡峭的有一千多英尺高的悬崖，而它的南面却是沙滩。

罗盘刻度盘显示出，在中国的绘图学家眼里，博德岛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舰队从福克兰群岛和舍得兰群岛航向博德岛的路线和路程，他们能够参考这3个地点以减少经度测量上的错误。我采用了以前计算出的图中的巴塔哥尼亚的经度与实际经度的比例，在此处做了计算，结果发现皮瑞·雷斯图上的南极洲上的迷幻岛到博德岛的距离是正确的。仅有的错误是图上南舍得兰群岛和南乔治亚显得比它们实际的位置更靠东一些。和之前一样，是极地洋流导致了经度上的错误。

在洪保将军到达并绘制好博德岛后，除了在老人星下继续向东航行，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正如“四十度风暴带”这一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风把他的船只吹向了东方。这些风是对最勇敢的水手的勇气的一种考验。风咆哮着卷起巨浪，排山倒海的涌来，泡沫在空气中飞溅着。水手们全身浸透着冰冷的海水，他们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着，希望有人听见，但这只是徒劳，因为这时的狂风呼啸着刮过轮船的每个角落，船壳受到挤压，船身木材发出碾轧的呻吟声与撕裂声，似乎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轮船已经失去控制，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来抛去。甲板下面的人也饱受摧残，好像在等待着缓刑的执行，他们也浑身湿透，被抛来抛去

的船只都被冻胀了，损坏异常严重，好像时刻都有解体的危险。

船只被无休无止的大风控制着往东飘，洪保将军根本找不到可以抛锚的地方，直到在南纬52° 40′，他才找到了下一个可以抛锚的陆地，就像他在南美洲一样，他能够从事另一项具体的制图观测工作了。但是在这个纬度上，向东航行根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大块土地，只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岛屿。最终，在穿过南面的海洋大约有五千英里路，这时明亮的发着黄白色的老人星就全天径直高悬在他们头顶了。随着一些海鸟数目的增多——有信天翁、燕鸥、贼鸥、海燕——种种迹象提醒洪保将军陆地就在附近，最终瞭望的水手观测到正好在向南15英里，在一群小岛中间的赫尔特岛（Heard Island）上的莫森火山（Mawson Peak）顶的轮廓已经出现了。他现在又开始为船上的绘图家们观察选择另一个“锚点”了。

对于洪保和他的随从而言，赫尔特岛看起来就不是个风景怡人的地方。岛上冰冻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海岸线都为冰崖所覆盖。虽然在岛上零星散布了一丛丛的草、苔藓和地衣，但它的岛上80%的地方都是永久的被冰雪覆盖的。然而还是有一些岛屿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如位于向北300英里的克尔格伦群岛（Kerguelens Island）——它是以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克尔格伦（Le Comte Yves de Kerguelen·Tremarec）命名的，他在1772年2月12日发现了它们。此地的风的推动，意味着克尔格伦群岛是来自西面——也就是来自南美洲，更准确的说也就是洪保将军舰队航行的方向——帆船舰队是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些关于洪保的舰队到达该群岛的独立证据：（18）在《明代名人传记辞典》中有一些记载：“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一个名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岛。”（19）哈甫泥在中国人茅坤海图中也出现了，此图是大约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左右编纂的《武备志》的一部分，（20）在边上注释着“风暴阻扰了舰队继续向南航行”。但是洪保已经发现了更多新的陆地。

由于克尔格伦群岛的主岛上面主要是耸立着1800多公尺高的罗斯山（Mount Ross），所以它被库克船长形容为“极端贫瘠的岛屿”。一年中有大概三百天是下雨、风雪交加或者是下雪的天气，30%的地方终年为冰雪覆盖，但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而且长在丛丛的草和苔藓中的克尔格伦岛上的卷心菜对水手们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与我们平时所吃的卷心菜相比，克尔格伦岛的卷心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在随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大量的捕鲸者和猎豹人来收割并食用，这种蔬菜可以防止坏血病。在穿越南面海洋时，洪保将军的水手们经历了马拉松似的航

行。他们差不多都受着坏血病的折磨。因此在此地，他们尽可能的收割多的卷心菜，但克尔格伦岛酸性和贫瘠的土壤并不能生长出足够能供给这支有成千上万人的舰队食用的植物。所以新的供给，就成了当务之急。

发现了是中国人发现了哈甫诧，或者说克尔格伦岛，这让我激动万分，因为在离开了该岛后，中国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航行了。正如茅坤所言的那样，“四十度风暴带”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往南航行，他们也将停止往北的航行或者往西返回的路线。取而代之的是沿着海洋走廊，中国舰队全速往东航行，巨浪径直引导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我丝毫不怀疑洪保一定到过了澳大利亚，因此我返回大英图书馆去寻找一幅在第一个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前已经绘制的澳大利亚地图。

在皮瑞·雷斯图上澳大利亚没有被绘制出来，但在大英图书馆却有

洪宝驶向澳大利亚的航程。

另一幅非常清楚的早期澳大利亚地图，它是由让·罗茨（Jean Rotz）绘制的。让·罗茨是英王亨利八世任命的“皇家水文学家”。这幅图包括在1542年由让·罗茨进献给英王的《地理全书》中。比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早两个世纪。罗茨毕业于迪耶普绘图学校（Dieppe School of Cartogrphy），这个学校因为他们绘制的地图和海图清晰和准确而闻名于欧洲。在当时，让·罗兹是一个拔尖的绘图家，他因绘制新土地的细致而闻名。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在他图上所画的全是他曾经见过的旧地图的内容。

这点很容易被大家接受，(21) 即在当时罗茨和其他迪耶普绘图者复制了许多旧的葡萄牙地图。皮瑞·雷斯图和让·罗茨的图在风格上十分

相似：两者都用葡萄牙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岛屿。在让·罗茨的图上显示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一路上画到现在的香港，整个海岸都画得非常仔细。波斯湾、印度以及东南亚都能够立即识别出来。最早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对印度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海岸线很了解。这首先可以排除葡萄牙人，因为虽然罗茨的图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的，但也不可能是麦哲伦或者是他的随从，因为他们不可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把中国海岸绘制的如此准确。他们的目标是香料群岛，他们要去的是更南的满剌加（Moluccas）。如果这幅图的最初作者不是葡萄牙人，那么反过来，让·罗茨一定是取材于一幅更早的祖图。

尽管在罗茨图上准确的绘制了中国、亚洲、印度和非洲的海岸线，但很多历史学家还是不能识别在该图上赤道南面的一片新的巨大陆地。它有两个岛组成，苏门答腊南面的“小爪哇”，还有“大爪哇”，“大爪哇”是从赤道附近一直延伸到了南极的一大片陆地。在这片陆地的北端末尾有一块突出来的沙嘴，和澳大利亚最北端的约克角（Cape York）很相似，这块南面大陆的东北部分也和澳大利亚海岸的东北面很相似，但是在罗茨图上显示的陆地面积比实际澳大利亚的往东南方向延伸得更远。

生活在公元87～150年的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被重新发掘了出来。托勒密关于行星对称的理念，使其在《地理学入门》（*Geographia*）一书中推出这样一个理论，即在南半球还存在着与北半球欧洲和亚洲对应的大洲。我最初的假定是罗茨图的最原始关于南面土地的图不是根据观察得到的，而是根据托勒密的预测得出来的，但这不符合罗茨绘图准确的声誉。此刻我不得不将我的困惑推到一旁，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大爪哇”的西南海岸上去，此地的绘制是相当准确的。在现代的班伯里（Bunbury），该海岸的形状是符合洪保舰队着陆的要求的，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Perth）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季风和洋流将会把他们送到该海岸抛锚，这个地方是天鹅河（Swan）的河口，它分隔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Fremantle），这与罗茨图上所显示的很吻合。

在洪保将军的舰队上，收获的克尔格伦岛卷心菜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于治疗坏血病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了，但是澳大利亚的西南部，他们将会发现在这里盛产的苹果和李子里含有了丰富的维他命C，而且，蓝色可爱的企鹅和蟹类可以就地捕捉，考拉和沙袋鼠（一种类似袋鼠的小型有袋动物）都行动缓慢、性情温顺，容易捕获，而贾拉（Jarrah）、美林（Marri）和红桉（Karri）树则提供了坚硬的木材，可以用来修理船

只。虽然在罗茨图上也很准确地显示了澳大利亚东西海岸线，但是西海岸只绘到班伯里，没有再向南，海岸线结束得有点突然。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坏血病的减少，洪保将军另外派遣了船只前去绘制澳大利亚的南海岸，根据今天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发现的一艘船只的残骸，这艘船只是在166年前发现的，它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的一艘。

在1836年，此时维多利亚州刚建立两年，有3个猎豹人在泥泞的霍普金斯（Hopkins）河里航行，随后他们继续向西航行，进入了该海岸的河口和环礁湖里，这是美林河（Merri River）的入海口，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该船一直被称为“红木船”，这是因为该船是由这种木材建构的。7年后，一个当地港口的老板米尔斯船长（Caprion Mills）代表政府察看了这艘残骸。他对这种木材的坚硬程度感到很惊奇；当时他想用刀切一块木头下来，但他的小刀没有起到作用，“简直就像从铁上划过一样”。(22) 欧洲人的船只不是由红木建造的——红木在当时是用来称呼那一系列红褐色的木材——在当时欧洲没有这种树木，但是中国的船只是由柚木建造的，这是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米尔斯船长同时也对该船的起源很迷惑：“我照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在这艘船的建筑上，有一些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了解的……至于这艘船的国籍，我承认我还不能判断……但是我敢断定这不知来源的沉船不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建造的。”(23)

20年后，一位名叫曼尼弗尔德（Manifold）的澳大利亚女士检查了这艘沉船。有不止25个人记了他们对此沉船的印象，她是其中之一。船里内部的隔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固耐用”。(24) 找到了一个青铜长钉，一把铁梯子和一块木材；(25) 他们已经被拿去做碳元素测年。但是我确信这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失踪的一艘船。生活在这片大陆靠近轮船残骸的地点，有着一支名叫“杨格里”（Yangery）的山地人部落，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传说有“黄色”的人在很久以前在他们中间定居了下来。(26) 很多观察家对这些来自南澳大利亚小地方的山地人做了评述，这些山地人有着明显不同的肤色和脸部特征。在化验上面提到东西日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被洪保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一些水手，他们的船舶失事了，一些船员和婢女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卫聚贤教授推得更远，他相信在瓦南布尔轮船失事的人骑在马背上，沿着默里河（Murray River）、达令河（Darling River）和马兰比吉河（Murrambidgee River），到达现在

叫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他们的行程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的。(27)卫教授的理论看起来被1474年的托斯卡尼里（Paolo Toscanelli，公元1397～1482年）[①]的图确证了，该图显示了被中国骑兵勘探过的河流。

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公元1423年3月），中国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已经航行了地球最下面的海洋了。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已经完成了他们任务中的主要部分——确定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继续进行对南半球的绘制——但是这次航行中还有一个方面没有到达计划的要求。在离开印度洋后，将领们希望能够问候一些国外的有钱人，并给他们呈献一些上等的丝绸和瓷器，把他们的国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中。然而沿着这条路线，他们遇到的一些人根本是不需要贸易的，也没有什么国王。对于像南非的班固（Bantu）人、澳大利亚的山地人和巴塔哥尼亚的裸体人而言，丝绸和瓷器是没有用的，像南极洲和佛得角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居住。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发现的人们的生活比他们期望的原始得多，因此，结果肯定还有一些船只上面装满了他们的宝货——丝绸和瓷器。但是在洪保将军从澳大利亚西岸起航时，他肯定知道在回家之前仍然会有机会拿出货物进行贸易，因为香料群岛和大贸易港口满剌加都是在他要到达的范围里面，是很适合贸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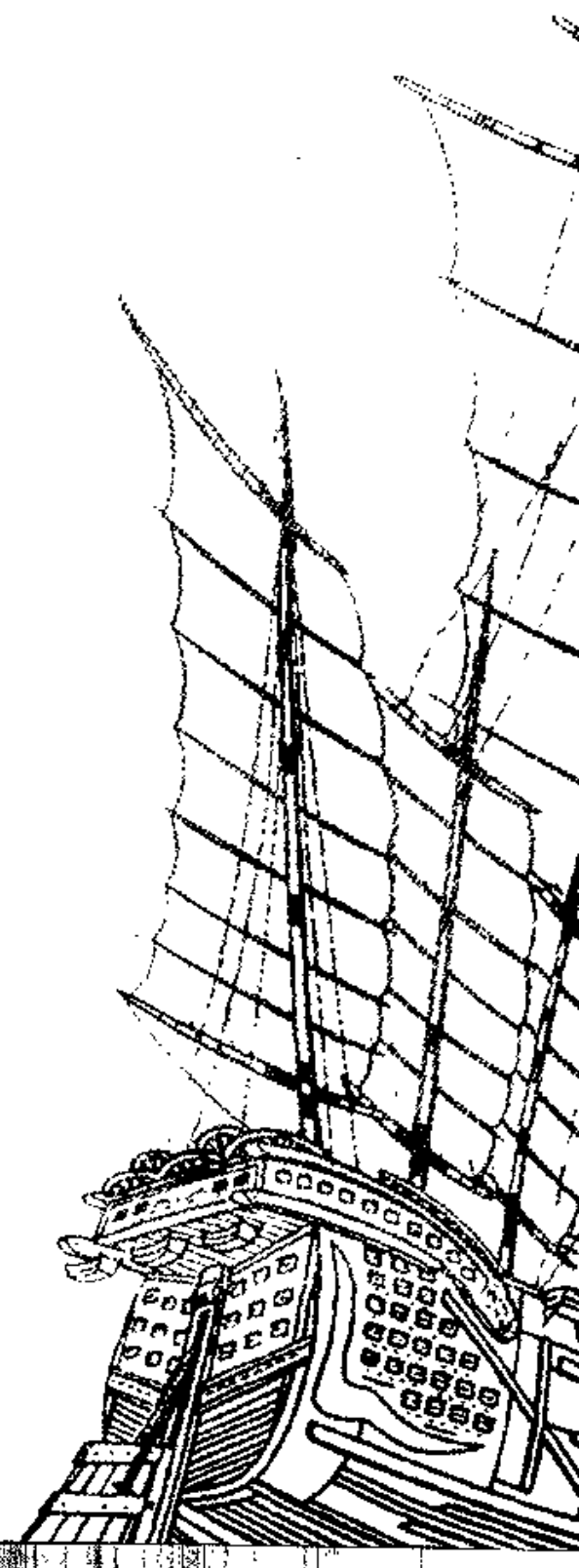
罗茨图绘制的澳大利亚的北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和婆罗洲的西海岸都是相当准确的。这表明了船队从珀斯出发往西北航行，剩余的船只在洪保将军的率领下，环航了苏门答腊，在满剌加停泊靠岸，满剌加是印度洋上面的一个最主要港口，随后是通过南中国海返回家乡，这是沿着婆罗洲的西海岸航行的——东海岸在图上没有绘制出来——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423年10月22日），他们最终抵达家乡之前，他们还到达了菲律宾的西面。

洪保将军的舰队成为第一个航海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航行者。他们还发现了南极洲，并在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公元1603～约1659年）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前的两个世纪前到达了南澳大利亚。客观的说，洪保的航行是非常值得现代人纪念的。在人类历史对于这个星球的探索中，他完成了世纪旅程的一个壮举，他的名字应该被铭记和赞美的，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功绩的结尾。当洪保将军准备胜利回航时，另一支舰队在周满将军的率领下，沿着南面的纬线从相反的发向朝着澳大利亚前进，在早于麦哲伦一个世纪前，穿越太平洋。

---

① 托斯卡尼里，15世纪天文学家，最早大胆地提出“地球是圆形的”这一科学论断。——译者

第四编 周满的远航



第七章　澳大利亚

周满此行一个早已定好的任务是勘测南美洲以西的世界，像已经向东方航行的另一个舰队首领洪保一样，当周满在穿越老人星[①]下面的海洋时，他也需要南纬52° 40′ 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参照点。但当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的时候，他的中国方型帆船遭遇到了寒冷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②]，并向北被席卷至今天智利（Chile）的海岸。麦哲伦、卡特里特（Carteret）[③]、布干维尔（Bougainville）[④]等人和其他难以计数的探险者在中国人之后到来，他们也都有过同中国人一样的经历。皮里·雷斯图（1）上绘出的安第斯山脉清晰地证明，这一切也在周闻的舰队身上发生过。但我仍然不知道中国人向北航行了多远，他们是否到达了秘鲁，或是否遇到了印加文明——哥伦布来到之前南美洲的一个伟大的文明。

曾有一份免于中国官员毁坏得以保存的文件，可以派上用场。位于伦敦的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告诉我一部写于1597年的关于郑和航海的小说，名叫《西洋记》（*His-yang-chi*）。此书当时在中国公开出版后，一度十分畅销。但是由于现在已十分稀少，所以现存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这个抄本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孤本了。尽管此书是在航行结束近两百年后才写的，而且它的大部分都充斥着富于想象的冒险行为，但作者作为现代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即列出了一份由舰队在航行时所遇到的野蛮人向舰队进献的详细贡物表。这份表不同于从来没航行超出过印度洋的马欢所提供的那份货物表，这暗示着作者一定是利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现在已经消失的材料。但这份表的细节和奇异之处却给人留下了令人信服的印象：

鲸睛一双——一般都叫作亮目珍珠。

---

① 夜晚天空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亮星。——译者
② 又叫洪保洋流（秘鲁寒流）。——译者
③ 卡特里特（公元1690～1763），英国外交家、演说家、国务大臣。——译者
④ 布干维尔（公元1729～1811），法国航海家。——译者

鲂须一根——这些东西散发着光泽而且可以作为发簪或耳朵装饰。它们的价格非常高。

千里骆驼一对——可以在没水喝的情况下跑1000里（相当于400英里——这可是动物在没水的情况下所能旅行的最远距离了）。

龙涎香四箱。

乳香八盒。

山水磁碗八对——当倒水进碗之内后，山变成蓝色的和水变成绿色的。

人物磁碗四对——当水倒入碗中后，逐渐地会呈现出一张人物彼此行礼的画。

花草四对——就是这些花草植物。当水进入它们之间后，它们看上去似乎在移动和波动。

翎毛四对——就这些是羽毛，当水倒进去后，他们看上去在飞（2）。

很清楚，这些碗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而正是这些中国人为他们能制造世界最精致也最薄的瓷器而自豪。这些碗一定是更好的。当装满水的时候，这些瓷碗变成半透明状，可以证明，那些画在底部的画都能透过碗身显现。这已经超过当时或者更早时的印度、非洲或伊斯兰国家所能拥有的能生产如此质量瓷器的能力，而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早期才拥有生产精瓷的技术。那个时候，惟一的薄瓷来自乔卢拉（Cholula，在现代的墨西哥）；当西班牙征服者站在阿兹特克人（Aztec）的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Ⅱ，公元1480～1520年）的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毁光所有的乔卢拉瓷器。它确实像蛋壳一样薄，价格昂贵，无数的人对它梦寐以求。当时，它被从乔卢拉销到太平洋沿岸和南部美洲。

当中国人航海的时候，乔卢拉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生产着大量的这种广受好评的瓷器，并且还建造了许多金字塔，比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还要巨大。假如贡物表里的那对骆驼是骆马的话，那么贡物表里每一件东西包括龙涎香都可能是在秘鲁北部被发现的。当西班牙人刚在那里登陆的时候，发现了亚洲的母鸡。至少，对于这些是周满的舰队和喜欢禽类的印加人交换礼物后所留下来的观点还是可以讨论的。我后来发现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航海联系的至关重要的证据。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

现在回到对周满航线的研究上来。离开秘鲁之后，他的舰队首先被近赤道洋流带到最北边的厄瓜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舰队穿过太平洋。这条路线就是以后的一批批探险者所走过的那条。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叫唐·路易斯·阿里亚斯（Don Luis Arias）的西班牙外交使节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描述了在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前从智利（Chile）横穿太平洋的一个南美的传奇，这个传奇是被“穿着白色针织服装的浅肤色人和白种人所创造的”(3)。当这些传奇中的航海者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Samoa Islands）时，他们发现南赤道洋流流到这的时候一劈为二，就像今天一样，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凯若琳群岛（Carolines Islands）、新几内亚（New Guinea）、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s），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

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周满的舰队就是在这个点上分开的。向北的那支分舰队在凯若琳群岛中的吉尔巴斯岛（Kiribati Islands）上建造了观察点，在新几内亚也建了另外的5个。它们耸立在那，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星阶梯状金字塔样式。上个世纪在凯若琳岛上发现的用满是刺的牡蛎擦宝贝的贝壳[①]做成的玫瑰红的珠子，在式样和大小上和在中美洲的米特拉（Mitla）附近的河流发现的非常相似的。发现时它们和黑曜石的碎片和一片像矛头一样的铁块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从岛外来的。中国的母鸡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在秘鲁发现；原产美洲的玉米被第一个到达菲律宾群岛的欧洲人在菲律宾发现；1993年，专门用来碾碎玉米的凹面磨盘[②]在一艘沉没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海底的中国帆船上被发现，这艘船据信是在1423年沉没的。所有这一切和中国人顺着南美洲西海岸（这在皮瑞·雷斯图中绘了出来）的航行然后穿越太平洋是相符合的。

向南的分舰队顺着赤道洋流经过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这里距南美洲的西部有4000英里。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Pedro Fernandez de Quiros，公元1565～1615年）——一位为西班牙王国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4）的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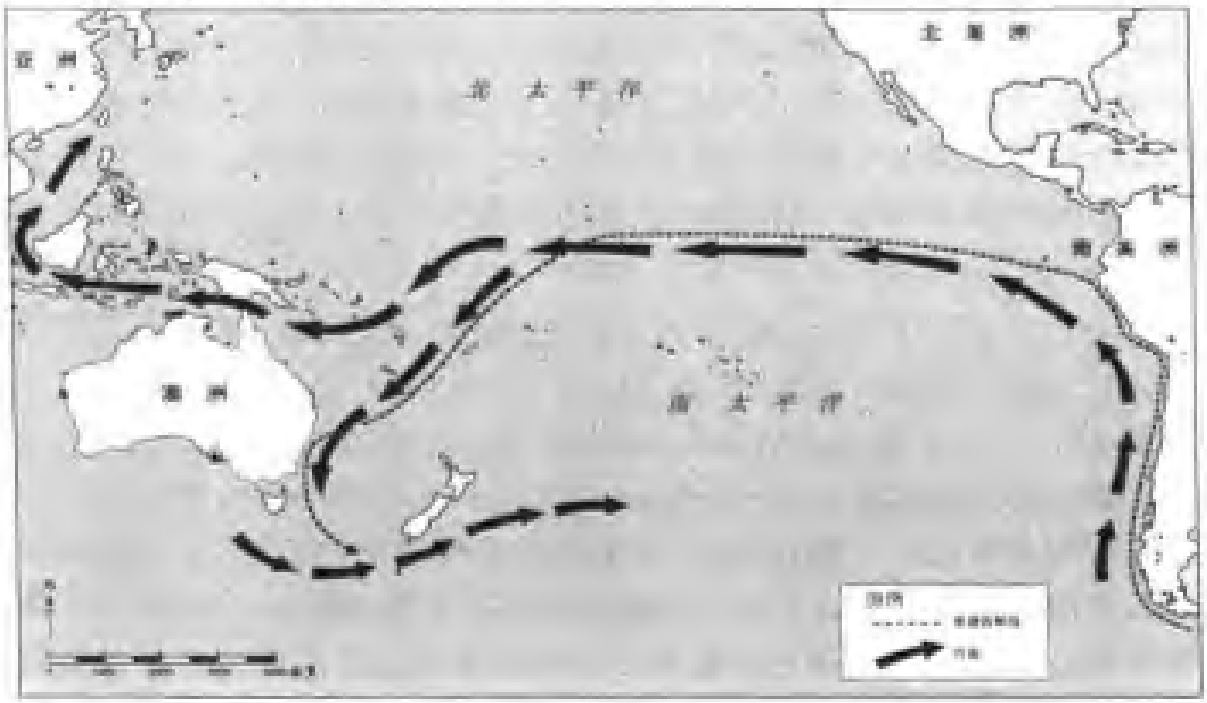
① 宝贝科贝类，古时在亚非一带做贝币用。——译者

② 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用以碾磨谷粒、玉米。——译者

环礁[1]（Hao Atoll）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金戒指。于是他想用自己的货物和这个老妇人交换，但遭到了这个老妇人的拒绝，因为它太珍贵了。在土阿莫土群岛周围数千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像这样的戒指是整个明王朝早期曾被输出而且是被朱棣派出的使臣作为礼物来赠送的。位于大溪地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的西南航线的沿线，还发现呈阶梯状的金字塔。最早到达斐济（Fiji）的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开采铜矿了，而当地的土著人并不这么做。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可以携带着他们的手工艺品乘坐独木舟穿过太平洋，但这仍不能解释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母鸡和手工艺品这种大批量的货物是如何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进行运输的。我觉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们被中国的宝船队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商船带过去的。

中国的舰队在经过如图上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s）后仍然被洋流携带向西，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相当于今天悉尼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七千余英里，费时约三个月。当洋流遇到澳大利亚海岸的时候便转向南，于是周满的舰队也随着改变方向转向老人星所在的纬度，这是他们的参照点。

周满航向澳大利亚的航程。



① 位于今天的波利尼西亚。——译者

洪保的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情况已在第六章里描述过了。周满的舰队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的存在。因为从隋朝(公元589～618年）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善使回力飞镖[①]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动物：它有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的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地图上显示了两个爪哇，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爪哇，另一个是“大爪哇”——盛产海参和海蛞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美味。它们对渔民来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在现在的中国它们仍然是价格很高的美味。马可·波罗访问了中国之后，他称“大爪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即便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之前，北京的帝王动物园里就有袋鼠了。袋鼠，当然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关于中国人航行到澳大利亚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台湾大学看到：一幅绘在瓷器上的地图，年代是1447年，显示了新几内亚的海岸线、向南直到维多利亚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的东北海岸。可惜的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这张图已经遗失了。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

①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打猎用的一种武器。——译者

(Stephens)、布罗肯湾 (Broken Bay) 和波特尼海湾 (Botany Bay) 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 (Newcastle) 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 (Benjamin Boyd) 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 (Eden) 附近的比唐加比湾 (Bittangabee Bay) 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 (Newcastle) 也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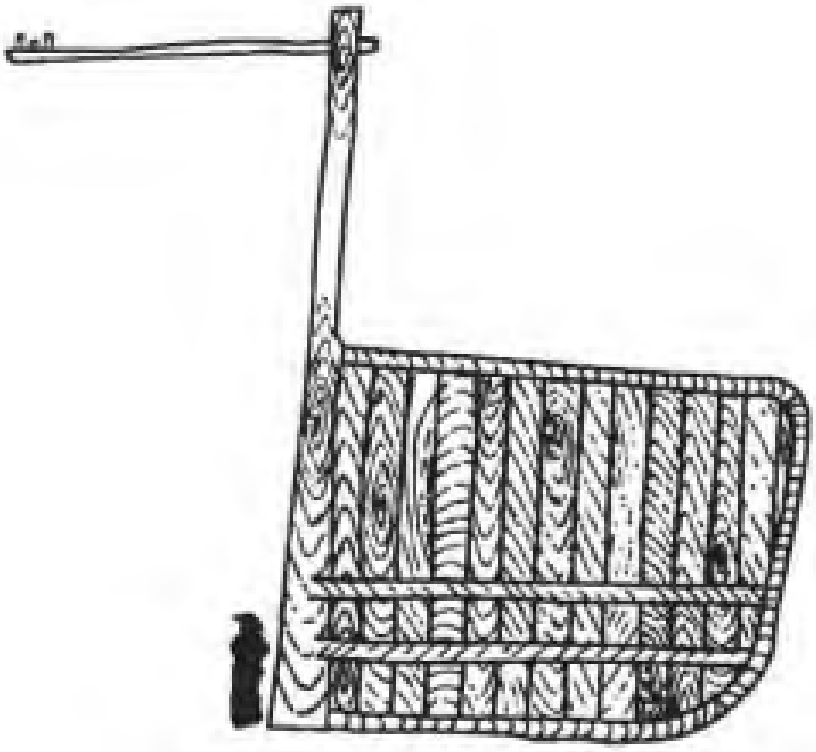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 (Hawkesbury) 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 (Cape York)、金皮 (Gympie) 的海岸和安享地 (Arnhem Land) 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 (Hawkesbury) 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 (Tweed) 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 (Brisbane) 西南部的沃宁山 (Mount Warning) 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 (Byron Bay) 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

① 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市。——译者

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1965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1]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

一复原的宝船的舵，左边立了一人，以见其大小。



（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

① 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市。——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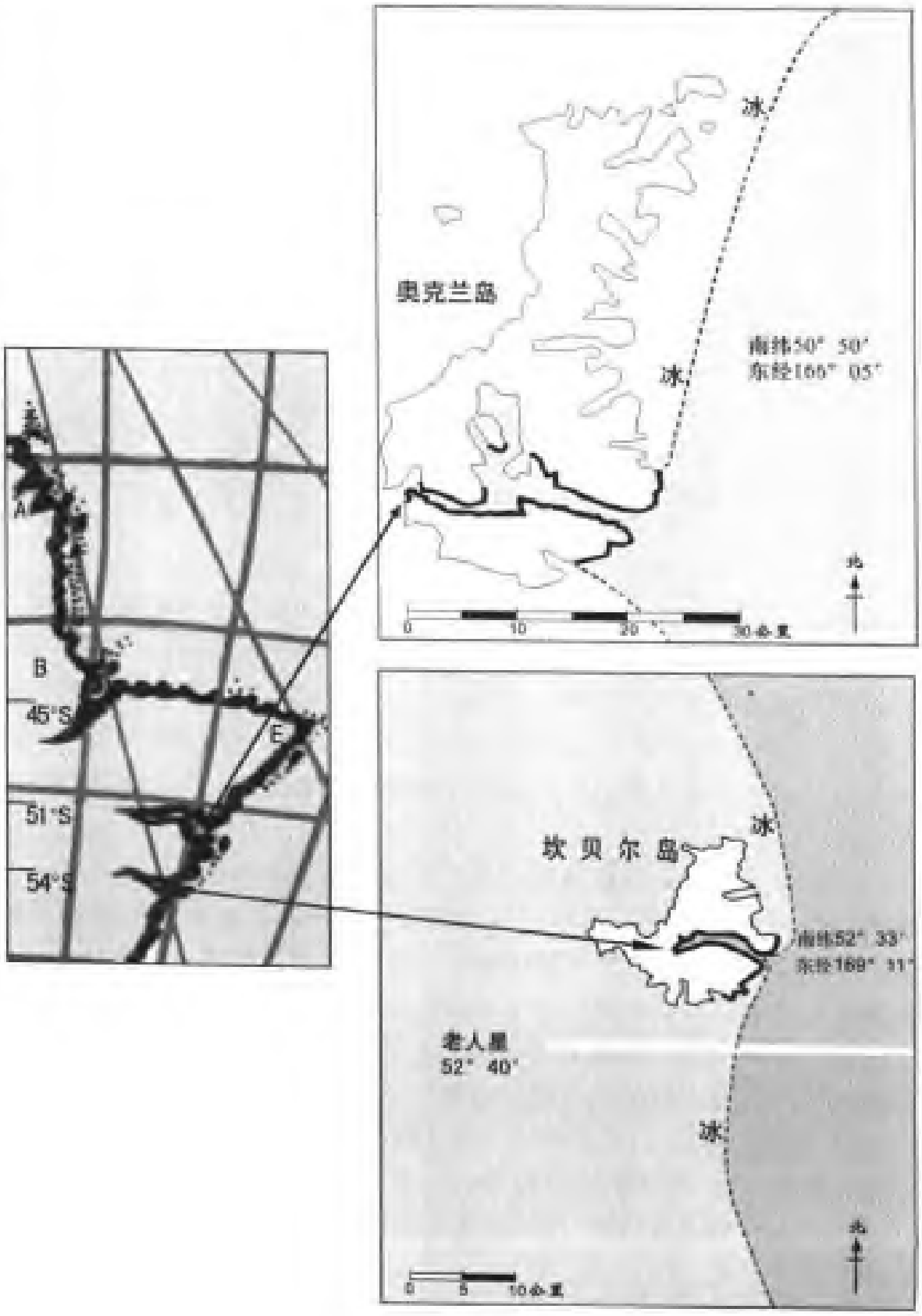
中国宝船队达到澳大利亚的证据。

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

·证·罗茨图中的奥克兰岛和坎贝尔岛。



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 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

① 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译者

倒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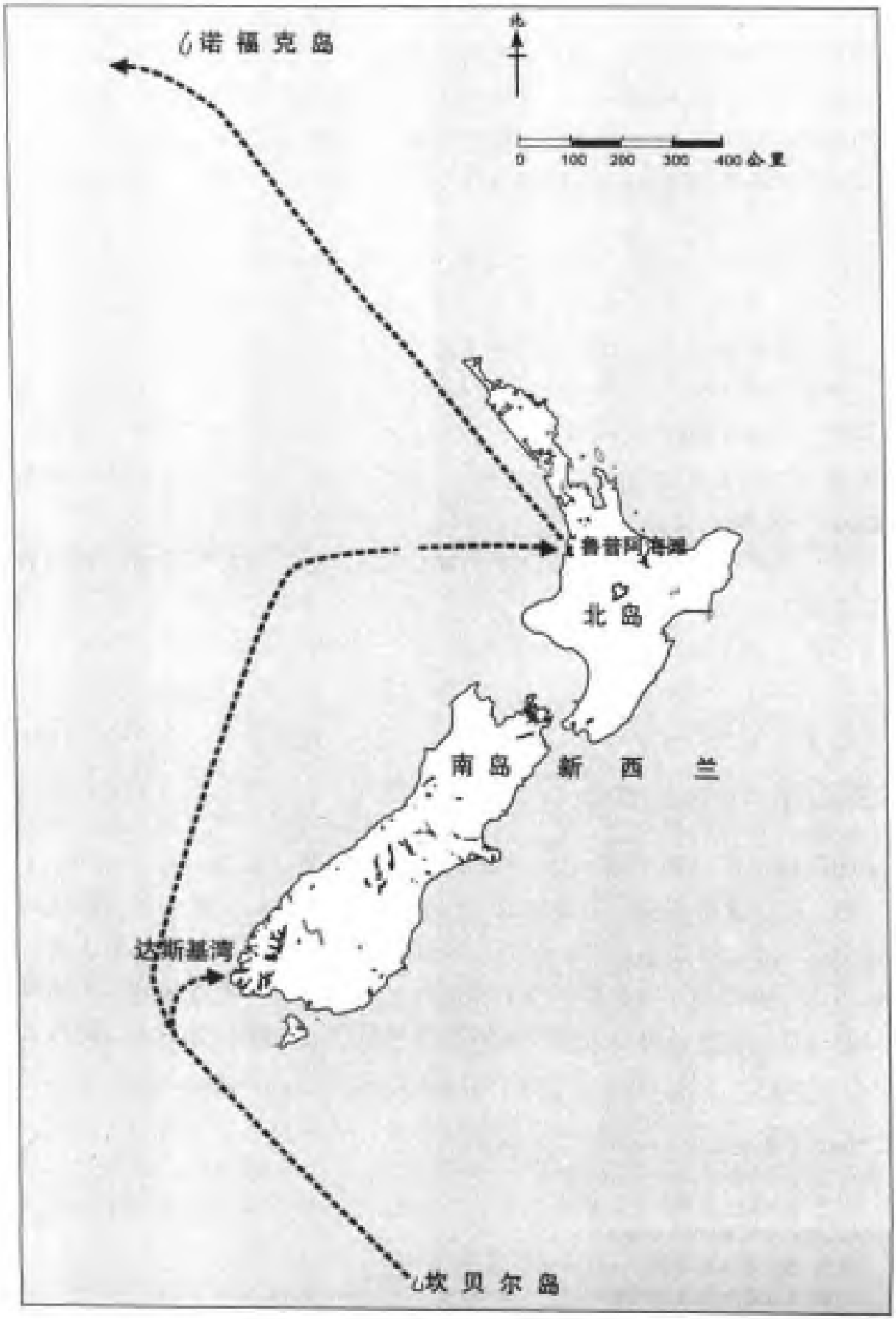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 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 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 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 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6.3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

① 库克（公元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译者
②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译者
③ 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的人。——译者
④ 位于今天的斯里兰卡。——译者

· 新西兰周围的航线。



拉巴拉[1]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2]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3]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 Catariana）[4]、珊瑚岛（Coral Land）、坎佩切[5]（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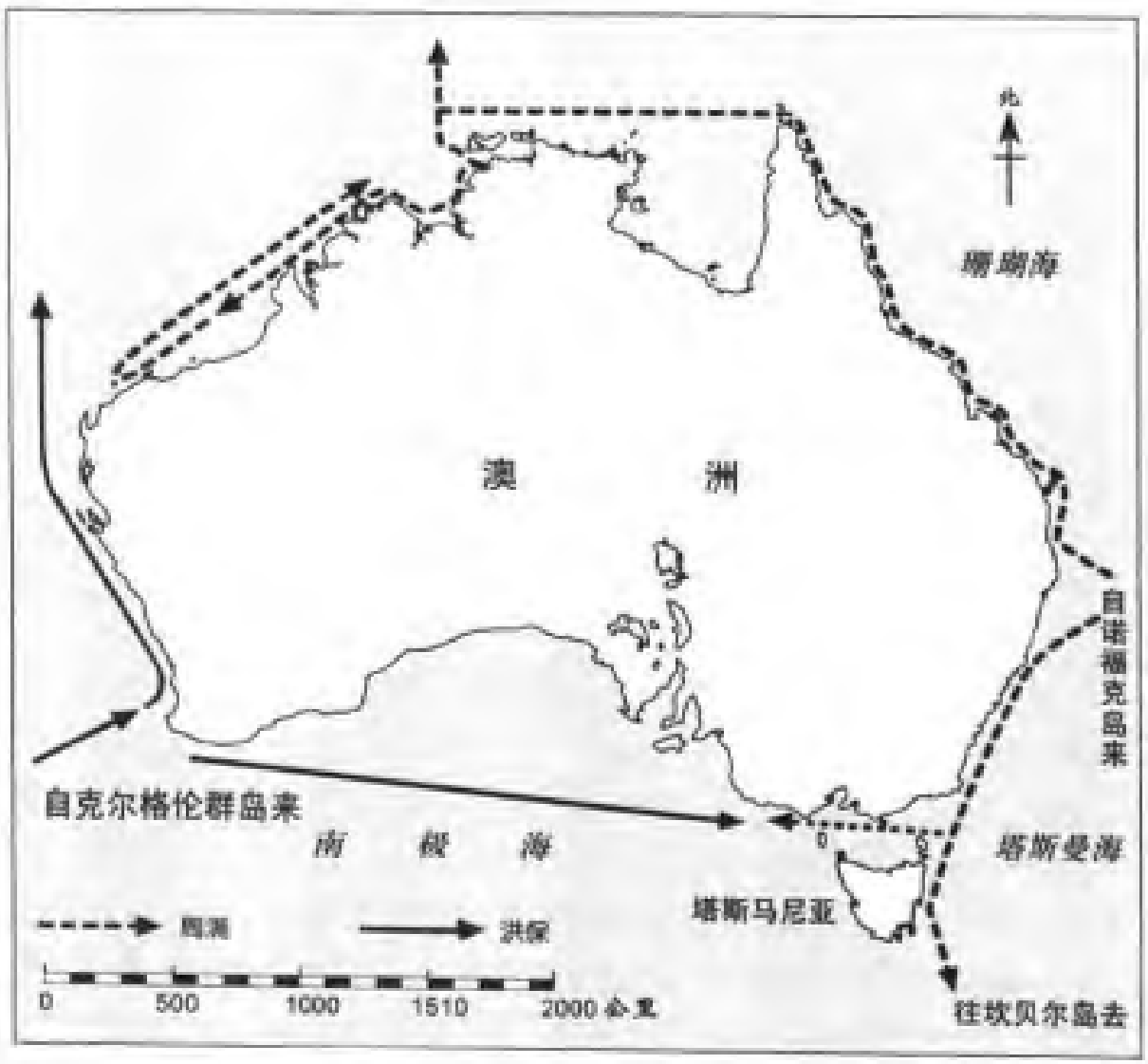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6]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 Baksh* ——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伊斯兰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á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á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

① 印度西南部一沿海地区。——译者
② 位于非洲中部。——译者
③ 南美洲东南部。——译者
④ 位于巴西。——译者
⑤ 墨西哥东部港市。——译者
⑥ 居住于新西兰的土著人。——译者

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狗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1]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

米保和周满环行澳大利亚的航线。



① 澳大利亚州名。——译者

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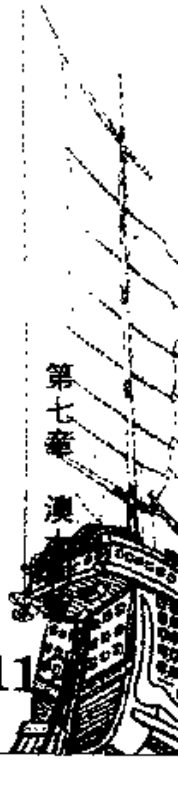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 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 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在鲁阿普基附近的毛利人就有这样一个传说。(14) 他们把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陌生人叫作*Patupaiarehe*，或者叫作“浅肤色的人”，几乎就是一神奇人

物。*Patupaiarehe*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精灵”。他们穿着白色外衣，和毛利人不同，他们不文身，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娶了毛利妇女。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而那些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非毛利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第八章　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周满幸存下来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Tasman Sea），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让·罗茨航海图上的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形状连同坎贝尔岛（Cambell Islands）的方位，与新西兰的西北、西南失事船只，都与顺着从澳大利亚海岸到坎贝尔岛的风、顺洋流航行的船只，然后又因风而绕过新西兰的事实相符。如果继续顺风航行，就会使他们在布里斯班（Brisbane）北部再次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假设由于洋流和暴风的缘故，平均速度由4.8海里／小时降到了3.8海里／小时，至少需要10个星期才能完成往返坎贝尔岛的航行。

布里斯班周围海岸在让·罗茨图中已被标示出来，其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澳大利亚地图并不是惟一一张由迪耶普学校（Dieppe School）的绘图员画的。所有的图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画出了。1536年的多芬（Dauphin）地图和那些德利安（Desliens，1551）和德塞利耶海图（Desceliers Map，1553）对澳洲大陆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二十多年前，布里斯班的拉特罗布图书馆（La Trobe Library）展览了迪耶普（Dieppe）地图中的一张。参观者都很震惊："看！布里斯班，看！还有斯特拉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 Island）、莫顿岛（Moreton Island）、派恩河（Pine River）、赫德岛（Heads Island）和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还有冲浪者的天堂——礁湖（lagoon）。"（1）东部澳大利亚海岸绘图的准确性使我相当震惊。为了准确的测量海岸线，中国舰队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澳大利亚的今天被称为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海岸，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丰富的矿藏。

或许由巨大的宝船队带来的最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家是开采工程师。那时，中国和印度一起拥有世界全部财富的一半。（2）而印度工程师引领了世界的开采技术，他们开采了西非的金矿与铁矿，促使了原材料向东穿过印度洋的流动。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与宝船队一起航行，然而中国在地质学、矿物提炼和加工方面已有几世纪的经验。正如要求的那样，很早时期中国人的记录中已有所描绘（3）：宝船队可能已开采矿石，并将绿宝石和提炼的金属装入船舱中运回中国。但是为了开采他们在航海中发

现的矿物，中国人也可能建立了长期的殖民地。

到公元1世纪时，中国科学家已将矿物分为几组。(4) 早期科学家能辨别出不同的氯化物、硫化物和硝酸盐，并知道怎样去开采。他们用硫化汞矿物制成红墨水和颜料。将滑石作为过滤器加入纸中，皮革由于硝酸钾的缘故，第一次变干。接着，加入氯化铵，由于硫酸铁化合物的作用，皮革被染色了。

在地理勘测方面，他们是相当有才能的，他们能够通过磁铁测量或是测量由爆炸声引起的波动，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他们也知道他们寻找的矿石和矿物经常与其他东西有地质上的联系：软玉(Greenstone)常出现在铜矿周围，它们甚至呈有规律的联系："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①] (5) 类似的是，铁矿与地表的赤铁矿有联系，硫磺与铁、黄铜矿结合意味着明矾。中国化学家还推断出：一定的植物在特殊的矿物作用下会成长得更加茁壮。当植物生长得接近一定的矿物时，植物就会改变颜色和味道。西布勒（Cybule）葱标志着银，韭菜（shallot）标志着金，生姜与铜和锡。[②] 18世纪，中国人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植物可以真正标志金和其他金属的出现，几个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才知晓。(6)

澳大利亚的让·罗茨航海图和失事船只残骸以及那个国家周围发现的中国装饰品都表明：不管是靠机遇还是有计划的，在马队的陪同下，庞大的中国舰队已经发现了一些世界上种类最多，藏量最丰富的矿物层的位置。中国人在马的选择上表现了过度关心，他们最喜爱的是塔吉克斯坦有名的"汗血马"，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认为此马流带血的汗水（皮肤上的红色印记实际上是由皮肤上的寄生虫引起的）。汗血马得到很好的喂养，奔驰在中国的天山山谷中，天山——是马穿过覆盖这一地区的胡桃林奔跑的地方。它们的动作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它们很强壮，能够穿过厚雪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最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来。朱棣统治时期，引进了百万匹汗血马，建立了特殊的"茶马司"，用茶交换牲畜，这样避免了白银外流。

中国骑兵队的几千匹马被装在马船上与宝船队一起出航。这些马用捣成糊的熟米喂养，每匹马每天需要两加仑水。有证据说明是中国人带

① 引自《管子》。——译者

② 出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6"山上有葱，下有银山；山上有韭，下有金山；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译者

马上岸的。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马还不被人所知道，但是，在迪耶普学校瓦利亚德（Vallard）航海图中却得到了很详细的描绘。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它们不在让·罗茨图中。悉尼周围有很好的牧马场，从那儿有一条穿过尼皮恩（Nepean）和霍克斯伯里（Hawkesbruy）山谷进入内陆的捷径。在悉尼周围200公里内可以发现大量的矿物包括金、银、宝石、煤铁。与让·罗茨图中的完全一致，深入纽卡斯尔（Newcastle）海岸内，有相当丰富的矿产。沿海岸航行一星期的范围内，到处都可看到钻石、蓝宝石和各种其他矿物。

与现代人一样，周满舰队上的中国和印度的地质学家一定都认为他们到了一个矿物王国。澳大利亚的许多矿物都被舰队直接利用，他们把铜和锌混合制成了黄铜；硝酸钾与硫磺、碳混合成火药；砒霜是一种毒药，也是杀虫剂，并且能加速蚕的生长。由铅和铜制成的白颜料可防止船舷周围的木头腐烂。高岭土是制陶的原料，然而钴氧化物、铜、铅可以当成上色的油彩。白矾对于制革、制水提袋和收敛物质的特性有特殊的用处。石棉被用来防火已经有6个世纪了："周穆王大征西戎……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7) 地方土著传说提到了穿着石衣来这些地方开采矿物的外国人。(8)

16世纪来到中国的方济会的传教士的记载中有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说起中国人到澳大利亚的探险与大陆的地图一起记录在黄铜卷轴上(从6世纪开始的)。(9) 这些早期中国亡佚了的记录，已经描述了有大量帆船(60～100艘船）组成的舰队的航海情况，每一艘船上有几百个人，他们的目的是去搜集矿物。

海岸上的残骸和岸上的石建筑、土著的石刻和漆画描绘了穿着长袍的外国人，石刻的还愿供品都是中国人出现在新南威尔士采矿区的标志。一个优美的石刻妈祖是海中水手的保护神，它是1983年从新南威尔士的米尔顿(Milton)前的沙滩上挖掘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卡通巴(Katoomba)的开敦巴（Kedunba）自然博物馆中。郑和的每一支船上都留有一个小壁橱供放它。然而，关于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的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金皮（Gympie），这是深入海岸的一个开矿区，离布里斯班北部有4小时的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时，一条小溪将金皮、锡罐海湾(Tin Can Bay)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根据古老的土著传说，一个"文化英雄"的种族驾着鸟状的船航行穿过这条小溪，进入金皮港，他们后来回到运送石头的船上。(10)

靠岸后，这些神奇的人建立了锥形金字塔，其中一个被地方研究者雷克斯·吉尔罗伊（Rex Gilroy）于1975年所发现，并拍了照片，现在已被故意破坏。这个金字塔是用花岗石建成的，高度达100英尺，带有阶梯的构造，简直与横越太平洋在南美看到的其他的金字塔一模一样。吉尔罗伊先生描述了发现欧洲人到来以前已有的露天采铜、锡、金矿，并且他自己还发现一个看来是用来注入水银用以分离金和矿石的古代管子。离金皮金字塔半英里，接近古代露天采金矿区有一个盛着熔化金属圆块的炉子。到1920年，金皮仍是昆士兰最大、最丰富的金矿区。许多其他装饰品在这个地区也有发现。两个优美的石刻还愿供品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是印度天神中的象神，是用棕灰色花岗石刻成的，另一个是哈奴曼中的猴神，这次是用铁石块制成的，天神和哈奴曼是南印度的印度教崇拜者最重要的神。当舰队航行时，印度教士、开采工程师和地质学家在南印度登陆。

今天在金皮的黄金博物馆仍可以看到两个相当迷人的石刻动物。1966年挖掘的金皮猿人是一个头比人头大的怪物，它的鼻部被打破了，但是第二个动物（现已丢失）的照片展现了类似磨齿兽（大树懒）的鼻部、鼻孔和嘴。(11) 不管是有目的的还是巧合，动物被收集了起来，从一个大洲运往另一个——长颈鹿、鸵鸟、犀牛从美洲运往中国，亚洲鸡运往南美洲，中国的看船狗留在了南美并穿越太平洋到达新西兰的陆地上，袋鼠从澳洲运往中国，水獭从中国运往新西兰。许多磨齿兽很可能被捕捉，带到巴塔哥尼亚的中国船上，有一对在新西兰可能跑了，另一对则到了中国。或许中国雕刻家希望在他们的记忆衰退之前，这些奇异的动物能长存下去。一个世纪以后，从新西兰带回的外来种类的出现，给欧洲政界造成相似的感受。

金皮金字塔建造的目的使澳大利亚的观察者不解，但是它的尺寸、高度和形状是明朝观象台的典型，对中国人建立天文台准确确定出他们发现的富饶的地点位置来说，它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使得未来舰队能回到同样的地方。

当周满的舰队重新开始航海时，船向北航行遇到了大堡礁。这个又一次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展现在让·罗茨图上。堡礁和内外部的陆地都有正确的纬度，并且可清楚的辨别出大约超过一千里。然而，在他们航海到坎贝尔岛后，他们对经度（与罗茨图中展现的一样）的计算整整差了20°。为什么他们认为它们比实际上更向西1800英里远，答案当然是

在南大洋的10个星期期间，它们应该在南极的洋流中。他们航行的水体自行向东移动，周满将军也没有任何准确测量经度的方法。

我意识到在让·罗茨图上的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在周满舰队回到的地方北部，不得不调整到东部1800英里。当工作进行到此时，结果就清楚了，澳大利亚展现在我的面前。绘图员做了一个非凡的工作，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办法测量经度。他已经非常准确地画出了东部澳大利亚海岸和大堡礁，这比库克船长做得早247年。当我进一步修改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的南部海岸时，我绘制了一张相当清晰的澳大利亚地图。

库克被大堡礁的尺寸和形状吓呆了，"这种结构类型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它是一个珊瑚石墙，从深不见底的海洋中几乎垂直地升起。"(12)对于一个水手，任何一个接近尖锐珊瑚礁的航行都是令人紧张的局面。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惟一的警报就是拍岸的浪声，如果你的船碰到珊瑚礁，它会震破船壳，在不把船身的剩余部分打碎的情况下，摆脱暗礁是很困难的。我从带领皇家鳁鲸号（HMS *Rorqual*）在暗礁内航行的经历中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时我带着精确的航海图，穿过未制图的堡礁的航海是一个经常缠绕你，久久不肯散去的噩梦。晚上看不到在岸上的不单是一点亮光。白天除了绿色丛林地带外，什么也没有，好像从没有人深入这个美丽而封闭的地区。这个堡礁从布里斯班南部的希克森湾（Hickson Bay）北边延伸到约克角约1500英里长。在碰上它以后，库克船长勉强死里逃生，就像我一样，他有航海图帮他。难以想象，周满的舰队能使乘客不受严重苦难或船只受损而穿过那些未绘成图的水域。最终穿过它，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伟大创举。

让·罗茨图展现了大堡礁、暗礁与海岸间的岛屿和其他暗礁以外海洋中的岛屿。在许多地方一旦进入暗礁便很难离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潜水艇是如何被暗礁包围的，当我摆脱布里斯班末端的暗礁的束缚后，我感到轻松极了。让·罗茨图的大量细节表明几艘中国船只一定将海岸、暗礁和岛屿制成图了。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向北航行时并肩在一条直线上，一些在暗礁内部，一些在外部的海洋中。我估计一定有至少6艘，可能是10艘或者更多去搜集大量信息。

堡礁本身、海岸线和内外部的岛屿都极其准确地画在今天的库克镇周围，表明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测量。库克船长后来用迪耶普学校的几张地图到达了库克镇，船撞到暗礁后，他将船奋进号（HMS *Endeavour*）停靠在那儿，这些在其他的早期图中也描绘过。

让·罗茨图中的部分细节和精确性意味着中国人可能为了修理被迫做了类似的停泊。

堡礁突然结束于约克角半岛顶端北部几里远的地方。噩梦结束后，那些中国船中生存下来的探险的乘客一定会有所伤亡，最后他们向西北航行到中国。当官员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船只中的航海者绕澳大利亚北段环行穿过约克角，到达西部的岛屿时，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在这儿，帆船进入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将澳大利亚从新几内亚岛分离出来。洋流从东部流到新几内亚，推动水手向西穿过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这个湾在让·罗茨图上画的比实际上窄的多。中国人因他们所航行的水域的水体向西移动穿越北部澳大利亚，再一次低估了它们在经度上的变化。(13)

在让·罗茨呈献给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rry VIII）的一批海图中，有一幅更加详细更加清楚地画出澳大利亚这部分的一张地图。他画出小爪哇岛——中国人称其为小爪哇，以一条海峡把自己从大爪哇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迪耶普学校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将它画为一条河。决定谁是正确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将它与同在一纬度的现代地图相对照，立刻看到罗茨画的沟在西部是维多利亚河（Victoria River），而在东面是罗珀里河(Roper River)。让·罗茨图上的小爪哇是安享（Arnhem Land）地，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东北澳大利亚的形状现在清晰可见。

在罗茨的更为详尽的图中写有相当多的中世纪葡萄牙语的记录。名字很容易翻译，并且所有的都与今天在那里发现的东西相一致。桑达海峡 *Canal de Sonda* ——在中世纪葡萄牙语中意为“狭窄的海边渡口”，被标注在界分梅尔维尔(Melville)岛和巴瑟斯特*Bathurst*岛的狭长的阿普斯利海峡（Apsley Strait）所在的地方。阿瓜达海峡 *Aguada dillim* ——“通达内陆海的水路” ——相当于邓达斯海峡（Dundas Strait），它的确通向范迪门海湾（Van Diemen Gulf）。“阿伽尔西姆” *Agarsim* ——译言“是有，这里真有水” ——铭刻在卡卡都（Kakadu）国家公园的黄水死水潭(Yellow Water Billabong)旁边，被联合国标明为“国际重要的湿地”。“农格拉尼亚” *Nungrania* 意为“无耕地” ——那儿什么都没有。“林格拉尼亚”(Lingrania)译为“椴树”，今天这些树仍生长在那儿。安享地东部尖端的加瓦（Gova）半岛是“芬爪哇” *finjava* 或者是“爪哇末端”。只有一个地方我不明白—— *chumbāo*，是“铅”的意思。

安享地的西部海岸被精确的画出。罗茨展现了在正确纬度上一直延

伸到南纬10°，超越澳大利亚北部尖端的主要海岸的特色。他也画出了大量横跨海参湾（Trenpang Bay）几内亚海的渔具，正像它的名字暗含的那样——是捕海参的中心地带。今天中国渔船仍在海岸的这一地带捕鱼，寻找大的海参。这个简洁的信息预言了两个多世纪后第一个欧洲人的到来。这个图也展现了内陆的细节——芬尼斯河（Finniss River）向西流淌，树被认为是桉树和黑木松树，两种树在安享地都很常见。一块高高的石头也在图中绘出，靠着现在是卡卡都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的努朗基·安班邦滩（Nourlangie Anbanbang Billabong）。最初的绘图员一定看到了这块石头，然后准确地画了出来。

当我研究安享地的现代地图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神秘词汇*chumbāo*的答案。铅仍在大的伽比鲁漫游者矿区(Jabiru Ranger Mines)大量开采。铅是铀235自然衰减的派生物。铀当然是高放射性元素，接触到它或吸入便会致命。伽比鲁漫游者矿区是世界最大的铀235储存地之一。由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中国人一定在他们开挖他们发现的铅矿石的同时，挖掘出铀来，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周满舰队中可怕的死亡率，因为当他们回国时，只有原来9000人的1/10幸存了下来。

为了发现铅，中国人不得不深入此国的内部。那时，与现在一样，土著人将安享地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是有能力的艺术家，在石洞上留下了优美的壁画。我希望在石洞艺术中发现描绘中国人来访的证据。后来南澳洲的政府官员乔治·格瑞（George Grey），1838年对安享地进行了考察。当他们进入从格莱内尔格河（Glenelg River）涌入科利尔湾（Colliers Bay）之处逆流而上20英里的一组石洞中时，看见了一批精彩的画，其中一幅绘有“一个长10英尺，高6英寸从下巴往下一直到腰部和脚踝都穿着红色外衣的人”（14）。格瑞船长（Captain Grey）的描述与墨西哥土著部落所绘图画穿着到脚踝都是红长袍的中国人到达尤卡坦（Jucutácato，见第十章）恰恰相符。格瑞的发现也与土著传说相一致。土著传说中记录着：不久后，欧洲浅色人居住在安享地东北部，这儿的男人穿着长袍，女人穿着裤子。他们深入内地寻找清水虾、檀香木和龟壳，种植大米，住在石屋中，不像土著人住在木屋中。女人穿着当地植物染色的绸子。

在安享地东北海岸发现了一些带有弯曲的锚钩（在泥中连住锚的那一部分）以直角接在锚柄上的阿德泽（Adze）锚——这是中国式样的一

种，还在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的东部海岸和接近大陆的布拉德尚港（Port Bradshaw）发现了大量破碎的上起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下至明（公元1368～1644年）初的陶片，那里恰恰就是洋流和暗礁易使船舶发生海难的地方。

让·罗茨所绘出的海岸与内陆的情况，中国人即使骑马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资料收集和测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清水的安全的锚泊基地。我希望将它确定在海岸绘制最准确的部分。安享地西北部旁边的比格尔湾（Beagle Gulf）画得很好，在海湾西南末端的达尔文（Darvin）有一个很好护卫的锚泊地。今天，一个榕树观光旅馆坐落在博士沟（Doctor’s Gully），在一棵大榕树的遮蔽下。穿过博士沟的水流现在已被填上。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可提出有用的净水。这个旅馆是背包旅行族喝啤酒常去的地方，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晓围绕在身旁的历史。

19世纪后期，长生不老的道长寿老（Shu Lao）像被发现埋在那棵榕树下，现在是陈列在悉尼技术博物馆（Technological Museum,）的中国藏品之一。它非常有价值，被有意地深埋在榕树根中。经一位专家确定，是明代初（14世纪末）的物品（15）：这个人骑着鹿，右手拿着一枝象征长寿的桃枝。此像由优质云母制成，雕刻和磨制得十分优良。寿老是道教众神中的长命三神中的一个，不像佛教和儒教，道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宗教，从来没有远播海外。

然而，榕树是澳大利亚外来的，所以一定是引入的。当雕塑于1世纪前发现时，榕树存在已有几百年了。在中国南部，神龛经常建在大树，比如像榕树根部四周的洞中。达尔文的神龛几乎确定是一个世纪前由一位中国人建造的，其结构和位置与新西兰鲁阿普基的相似。理论上一般认为：神龛可能是由中国寻找海神的渔船船员建造的，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没有渔船能运载这样有价值的雕塑——它可能值一个船员一生的工薪，更可能属于富有的中国船长或是大船的海军将领。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是：周满舰队用达尔文做基地，设立神龛将雕塑放在里面，感谢它保佑他们完成了长途航海。

我非常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所说的事实。当他告知教皇的秘书波乔·布拉乔利尼时，他已经乘中国船登陆在大爪哇，并与他的妻子在那儿度过了9个月。或许他妻子是穿裤于女人之一。

当欧洲人最终抵达时，他们不是盲目地航人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迪

耶普学校的其他图中的多芬图，也是最与让·罗茨图一致的海图，在19世纪中叶成为首席海军大臣埃德门·哈利（Edmund Harley），即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所有，后来以“哈利物品”（Harleian）为人所知道。后来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获得。他是与库克船长乘“奋进”号航行的年轻科学家。因此，当库克船长航行时，英国政府已能使用“哈利物品”（Harleian）和罗茨图，因为后者在那个时候由海军部所有。库克船长从海军部所得命令是一直搜寻至南纬40°之地，即上述两幅海图中所示的南澳大利亚的纬度。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足够的理由”（16）认为南方存在一块大陆。他们确实做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已拥有两张展现南纬40°的这样一块大陆的海图。

当他们离开澳大利亚时，与之前的洪保舰队一样，周满的船只也装满了瓷器和丝织品，而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位于澳大利亚和他们的家乡之间，香料可是中国极为昂贵的商品。甚至就在舰队减少到仅有几支船的情况下，他们船舱中仍载运了几千吨的瓷器。通过航向香料群岛，周满最终能够有机会用瓷器交换有价值的物品，如豆蔻、胡椒和丁香。

如果让·罗茨图是以周满舰队上的绘图员所绘的更早的地图为基础的话，它应该标识出香料群岛。事实也的确如此。昂邦（Ambon）与香料岛的特尔里尼特岛和蒂多雷的（它们是那样小以至于一个人几天就可走完一圈）重要性在地图上以红颜色体现出来。中世纪时，特尔里民特岛和蒂多雷岛就是香料贸易的中心，但离物产最丰富的岛屿相距甚远。它们带有传奇色彩，几个世纪以来是人们争夺的要地，因为实际上在那儿可大量获得所有的香料。今天，清晰的丁香味飘荡在遥远的海中，在进入视线之前就可以在空气中嗅到它们的芬芳。

再向北，在北纬10°上，让.罗茨图展现了吕宋诸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中南部的棉兰老（Mindanao）岛与北部莱特（Leyte）岛之间的海峡。但是罗茨只绘出了莱特岛的南岸，这可引出明显的结论：绘图员在一条顺海峡中央航行的船只上。以同样的常理来判断，我确定绘出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的香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角度，且接着推断出周满舰队穿越这些岛屿所经路线。沿着这条路线，现在在平静明朗的海中航行，周满会有很多机会：不仅可以得到香料，也可以用瓷器交换蜡花布、装饰品、净水、蔬菜和肉类，尤其是猪肉。中国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喜欢猪肉。周满舰队中的人可能已好几个月没吃到猪肉了。

周满舰队曾经有大量丝织品和瓷器用来交换香料和必需品。但是今

天有留下任何痕迹吗？经过6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后，我如何能发现这样的证据呢？我想知道麦哲伦在他的环球航行中是否也走过这条路，如果走过，他的解释可使问题清楚明白。当我去大英博物馆要求一张麦哲伦死后制成的航行路线的详细地图的复制本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他从太平洋穿过菲律宾，向下到达香料岛的航程，有超过1000英里的距离。与我重新推想的周满舰队的航迹，除了方向相反外，是完全一致的。好像这两次用了画在同一张地图上的同样的通道，这种一致的几率性是极微小的。我推测麦哲伦的航海图展现了周满的路线。

与皮加费塔关于麦哲伦航海描绘得一样，我发现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份与麦哲伦一起航行的热那亚领航员的描述。他描述了麦哲伦在菲律宾发现陆地和他发现由太平洋进入香料岛的海峡。这个海峡与罗茨图上的棉兰老岛与莱特岛间的海峡是同一个。麦哲伦穿过这条海峡，锚泊在第一个岛屿利马萨瓦，国王接见了他。皮加费塔描述了国王和王后穿着中国丝绸，用埋藏了50年价值愈加昂贵的中国瓷器吃饭。他们房子中挂着丝织的窗帘，摆设着瓷器装饰品。他们用正孔的中国钱币作为交易货币。同样的故事在麦哲伦船只到达香料岛的沿路岛屿重复传播着。周满在麦哲伦前一世纪沿着此路线航行时，一定清空了瓷器船舱。

皮加费塔也解释了麦哲伦与利马萨瓦国王见面的情景。麦哲伦向他展现了航海图和指南针，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发现他穿过的海峡的和到达这儿用了多长的时间。番王大为佩服。麦哲伦向国王展现了描绘海峡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的海图。西班牙国王的代理商（御命买卖的商人）塞巴斯蒂安·阿勒拉雷兹（Sebastian Alrarez）致其国王的信：从弗里奥角（Cape Frío）到美洛居诸岛（Moloccas）的整个航程，没有陆地标记在他们麦哲伦探险队带着的地图上。(17) 把这些放在一起，这些解释只意味着一件事：当麦哲伦航行时，他带着一张航海图，不仅展现了麦哲伦海峡，还有南纬52°的太平洋，还有从那儿到赤道上的香料群岛的空旷的海洋。一定有人在麦哲伦之前航行穿过麦哲伦海峡和太平洋制成这张航海图。这种人只能是中国人——“穿着长袍的黄色人种”。(18)

幸运的是，从麦哲伦访问菲律宾的证据是一位中国人永乐十九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年～1423年）间中国人远航的进一步证明。麦哲伦在菲律宾看到的朱棣统治时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和钱币可能是周满航海前中国人贸易的结果。但是麦哲伦在一个个岛屿上看到的数量非常大。清楚的是，一定有过大量的交换，这可以说明周满的船装载有大

量的贸易货物，主要是极有价值的胡椒。如果的确如此，胡椒便应在周满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回国后不久，在中国储存的档案的记录中出现。

我研究了一些现存的中国记录的存本，发现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中国的仓库中有大量胡椒储备，朱高炽皇帝（明仁宗）即位那年，他命令大量赏赐：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胡椒一斤……监生、生员吏与知印、天文生、医生胡椒一斤……坊厢百姓、僧道、匠人、乐工、厨子并各衙门皂隶、膳大夫等胡椒一斤。(19)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北京的人口一定超过百万，皇家军队的士兵和侍卫还有60万人，赐出的胡椒可能超过1500吨。当麦哲伦船回国时，他船上装载的可动用的胡椒不到26吨。当胡椒出售时，其价格是他在香料群岛购置时所付价值的1万倍，产生的利润足够支付整个航行。与中国官员声称的相反，宝船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光是永乐二十一年年底（公元1423年）后来加入中国仓储的胡椒，在国际市场上算是价值连城。

皮加费塔(Pigafetta)关于麦哲伦航海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舰队从美洲航行到香料群岛和菲律宾。皮加费塔描述了玉米种植在菲律宾以及麦哲伦船员装载它们的情景。玉米对美洲人来说是惟一独特的，因为其谷粒只能由人传播。此外，一些残存下来的中国史料说明郑和舰队航行中带回了玉米。中国帆船不仅从中国装载瓷器、丝织品和货币，而且将胡椒运回中国，同时他们把玉米从南美运到菲律宾。(20)

第九章　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虽然现在离中国大陆有一千多英里，周满非凡的航海仍远未结束。下面我必须随着他的船队的航迹继续前行，从菲律宾到达另一个新陆地海岸。满载着货物离开香料群岛后，船只最方便且直接回国的路线可能是继续向北行驶，航行穿过菲律宾的明多洛（Mindoro）岛的西部。从那儿，盛行的夏季风吹着它向北朝中国航行。绘在让·罗茨图上的岛屿表明：周满已改变航程向东行驶，经过莱特岛南部，重新进入太平洋。（1）假设4月末西南季风开始时已离开达尔文的话，他可能7月初进入太平洋。我知道周满1423年10月8日（永乐二十年九月初四）到达南京，没有带回一个外国使节。他在太平洋的4个月里做了些什么，行驶到哪儿了呢？

北太平洋是一个大循环系统，风不断的以顺时针呈椭圆形吹动。7月，吹到莱特岛的季风是朝北的。当海军上将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时，在顺时针向北美海岸航行之前，黑潮（Kuroshio）或日本洋流也带动他们向北航行。事实上，周满只是扬帆离开莱特岛。风和洋流可将他带至现在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加利福尼亚洋流接替它，推动舰队向南沿着美国到巴拿马的西部海岸航行。从那儿开始，北近赤道洋流带动横帆穿过太平洋返回向菲律宾行驶。整个环形航行顺风顺洋流，可能大约有三万公里；平均以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航行需要约四个月的时间。与周满8月回南京的日期相当。其原因以后将会明了，我推测，主舰队中的分舰队船只单独行动，沿着加利福尼亚到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建立殖民据点。

我开始研究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的舰队真正到达了北美洲太平洋海岸。1540年第一个勘探这个海岸的欧洲人赫马尔多·德·阿拉尔孔（Hermado de Alarcón）曾在新西班牙[①]寻求名誉和财富，他于那一年5月9日离开了阿卡普尔科（Acapulco）率领一支舰队支持征服者科罗纳多远征墨西哥。阿拉尔孔首先将加利福尼亚湾（Bahía Califórnia）的半岛绘成图，接着绘上加利福尼亚本身。我知道他是第一个测绘这个地

① 新西班牙：New Spain，原则上是今天的美国西南部和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后来连菲律宾都包括在内。——译者

区的欧洲人，因为哥伦布和其他早期勘探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到达北美西海岸的任何地方，所以任何早于阿拉尔孔航行的太平洋岸的地图，都会是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不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人。

这样的证据真的存在于瓦尔德塞米勒世界地图中，这是张1507年出版的第一张正确地画出纬度和经度色彩鲜亮的大地图。起初为一位纽伦堡（Nuremberg）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 SchÖner，公元1477～1547年）所拥有，长期以来被认为丢失。直到1901年在德国南部的沃尔夫埃格（Wolfegg）城堡中重新发现。它一直保存在那里不显于世，直到2001年当美国国会图书馆花1000万美元从约翰内斯·瓦尔德堡·沃尔夫埃格（Jahannes Waldburg Wolfegg）亲王手中相求时才变得沸沸扬扬。这张图的主要绘制者马丁·瓦尔德塞米勒（Martin Walolseemüler，大约公元1470～1518年）生于德国，是最优秀的宇宙学家之一，他将他那个时代的地理与天文研究结合起来。这些1507年和1516年绘成的全球地图和壁挂的地图第一次称这块大陆为“美洲”。名为《葡萄牙文版已知陆地与海洋之导航图》（*Carta Marear A Potuguese Navigational Sea Chart of the Known Earth and Ocean*），号称是“第一幅且惟一的世界海图刊行本，原先仅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及其赞助者所知”。(2) 从现在加拿大到厄瓜多尔的北美的西部海岸清楚地画在这张图上。

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的加勒比和佛罗里达（Florida），也在坎提诺（Cantino，1502)和卡韦里欧（Caverio）这两张早期地图中得到描述。前一张在意大利摩德纳（Modena）埃斯腾斯（Biblilteca Estense）图书馆中。在我们研究世界（见第十一章）其他地方中起了重要作用。后者放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詹姆斯·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中。它们也展现了第一个欧洲人到达那儿前画出的陆地。但是那些地图一定不是瓦尔德塞米勒的原始材料。大巴哈马岸（the Great Bahama Bank）在3幅地图是一致的。但是卡韦里欧（Caverio）图展现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这在早期坎提诺图中没有描述。因此卡韦里欧图一定不是坎提诺的复制本，瓦尔德塞米勒也不是它们的复制本。因为瓦尔德塞米勒图在上述3幅图中展现了北美的太平洋海岸，而坎提诺和卡维里欧却没有。这3张地图都有不同的原始特色，而且一定是从一个更早的地图上复制过来的。

瓦尔德塞米勒地图的北美洲太平洋海岸真是惊人的准确，从北方今天加拿大的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到南边的厄瓜多尔，一路的纬度都很准确。这完全符合一位绘图员坐在一艘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的船上，但没有画出海岸的更多细节。俄勒冈（Oregon）清楚可见。几艘古船的残骸发现在尼阿卡尼湾（Neahkahnie Bay）的沙滩上。一处是用于升高以“卡奥费鲁姆”（Caeophyllum）帆的柚木制成滑轮，这是一种东南亚独特的木头，这个木头也经过碳测定。但是如果证明来自15世纪早期的话，它会提供大量周详的证据说明周满帆船中有一艘在尼阿卡尼（Neahkahnie）湾失事。一些船残骸考察者声称发现了石蜡，这个被郑和舰队用来除去海水中的盐分以饮马。

即使从失事船中没有任何发现，中南美的太平洋海岸也充满大量中国人航海的证据。从智利到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亚洲鸡，这在第五章中有所描述。许多其他动植物种经由中国船队运往全球各地。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加利福尼亚时，我记得穿过一个优美的金樱子（camellia roses，Rosa laevigata）的岸区，那是一个安静的夏天的晚上，清新的香味在周围的空气中飘荡着。1803年，欧洲殖民者发现了野生的优美清香的茶花，他们命名为奇罗基茶花（Cherokee Rosa）。它是中国东南部土生物种，并且在12世纪的药典中有所说明：“它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到达美洲是植物介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3) 但对于郑和船队中的水手来说，他们用小花盆种植的金樱子，它们所散发出的持久的香味能够抒解思乡之苦。中国人也携带植物和种子回国。苋籽（Amaranth）是一种北美土产的谷类，含有高蛋白，在15世纪初被从美洲带到亚洲，就像玉米一样被带到了菲律宾，为麦哲伦所见。南太平洋的土产椰子，为最初到达的欧洲人发现于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巴拿马、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和哥斯达黎加西部的科科斯岛（Cocos Island）。将谷类从美洲运到亚洲，玫瑰和鸡从中国运往美洲，椰子从南太平洋运往厄瓜多尔的运输者，只能是中国人。

旧金山（San Fransicisco，圣弗朗西斯科）和洛杉矶（Los Angeles）被清楚的描绘在瓦尔德塞米勒图的正确纬度上。我确定周满一定一直航行到那条海岸。在航海穿越如此辽阔的海洋的两年中，他的一些帆船必定船况不佳，需要紧急修理。即使造得最好的船也不能在海中待这么长时间，在风暴与波涛之中而无所损伤。至少他们需要检修和保养——将船壳中的藤壶刮掉。损坏最严重的船可能是拆掉，再拼配起来修理其他

船。如果是这样，正如其他残骸发现在澳洲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些失事船的剩余部分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旁发现。

我探求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外来沉船的询问没有答案。但是我的确发现那里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明朝青花瓷器。公众所接受的说法是，那些东西是装在西班牙大帆船舱中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但是许多中世纪的中国锚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外发现，这些不可能是由西班牙船带来的。我开始认真探求明朝瓷器的渊源，它真是由西班牙人带来的吗？中世纪中国的瓷器可根据钴含量测定年代：钴中含铁量越高，釉彩光泽越深蓝。蒙古时代的深色钴料来自波斯，波斯当时也由蒙古人统治。但是，1368年朱棣的父亲将蒙古人驱逐出去后，封闭了中国的边境，这样波斯钴料也就无处可求了。然而，朱棣重新打开边境，恢复了沿丝绸之路穿过亚洲的贸易，又一次允许波斯钴料进口。中国浅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应用在明代中国的这个时期是有限的，加利福尼亚博物馆陈列的瓷器色彩可以表明它究竟是不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制成的。

我确定宝船队已经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但是我的研究没有能揭示结论的确切证据，诸如失事的中国沉船。因为希望其他人能够发现我未发现的痕迹，我决定将这个问题于2002年3月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raphical Society）的讲座上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它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48小时内报道从加利福尼亚传来，引起了我对埋藏在旧金山湾东北角旁萨卡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沙滩之下的中世纪时中国船失事的注意。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报告——位置在离大海100余英里远的地方。这个发现看上去似乎过于美好而显得不真实。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一些描述同一艘船只的电子邮件相继出现。当我开始一些基本研究时，我发现了海岸上流行的东北风吹动船直接穿过海湾，进入了萨卡拉门托河。6世纪前，这个河比现在更宽更深，因为森林的减少降低了这个地区的雨雪量，导致水平面下降，这是真正可能的。如果不可能的话，进入旧金山湾的帆船会被风吹到萨卡拉门托河。

北加利福尼亚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约翰·福瑞博士(Dr. John Furry)，20年前当他读了一篇关于曾在船舱中（沉船当时很明显比现在更浅地埋在沙滩和淤泥中）发现的那具很奇怪的盔甲时，第一次知道了这艘帆船。此盔甲是由一种不寻常的金属（本土美国人不知道怎样仿造）制成的，呈罕见的银白色。根据当地的专家鉴定，已经确认它是一件中世纪中国物品。福瑞博士解开这个故事之谜的尝试

旧金山湾区域，图示风吹进萨卡拉门托河。

遇到阻碍——那位专家在此期间去世了。这件盔甲曾借给了一所当地的地方学校，现在已丢失，但是他很感兴趣地开始了失事船只位置的调查。

这一位置现在已经被几世纪所积累起来的40英尺厚的沉沙和淤泥地层覆盖了，因此福瑞博士开始用地磁仪勘测这一地区。它们展现了一个

强大的磁性反常物体的轮廓：一个被掩埋的物体，长85英尺，宽30英尺，形状与陪同郑和舰队的贸易船非常相似。核心样本也是从这儿提取出来的。挖出的木头碎片经碳测定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左右，表明帆船也是那年建造的，正如当地报纸报道的一样，这一时期包括古代中国的航海高峰期。(4)

碳测定的证据激励福瑞博士用更先进的仪器钻探，这样获取了更大的样品，包括更多木头碎片和小巧的80磅一团成千上万黑色的种籽。他将木头残片和种子送往中国进行分析。由于福瑞博士的帮助，中国林业科学院将木头暂时认定为油杉，这是一种土产于中国东南部而非是北美的松柏科植物。在中世纪，中国人种植油杉来建造船只。福瑞博士还告诉我：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前任教授和研究古代种子的领导专家张温煦博士临时将从船失事的地方挖掘出来的大量黑色种子辨别为4种不同类型，3种既原产于中国，也原产于北美，但是另一种是中国特有的。然而，最有趣的是：福瑞博士在打捞起的材料中进一步发现了大米和甲虫体。原产于非洲和中国的大米，在15世纪的美洲仍无人知晓。当我写报告的时候，正对大米和甲虫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是目前仍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关于木材和种子分析的检验报告。

我现在基本不怀疑对这个位置包含中国帆船的残骸，那正是我要寻找的证据，当帆船在萨卡拉门托河的沙岸上搁浅时，船员都溺水而死好像是极不可能的事，更可能的是他们在山谷中苍翠而富饶的土地靠岸时，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将船舱中的大米抢救出来。尽管大部分粮食用来充当紧急粮食，但他们也应储备一些种子，将它们种植在合适的地方——萨卡拉门托河的冲积平原。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大米是由欧洲人介绍到西非，而由西班牙传到美洲，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朱迪斯·阿·卡内（Judith A. Carney）觉得：这个命题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令人广泛接受的是：中国人在发展加利福尼亚富饶土地的农业上，尤其是在萨卡拉门托低地的湿地上种植大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8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75%的农民来自中国。中国人实际上教给美国农民怎样种植、耕地和收获。(5)但是这些在萨卡拉门托峡谷的田野上和种植园中劳作的中国人，都是19世纪移民美国的大浪潮那些部分呢，还是有可能有一些是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留在萨卡拉门托海岸上的殖民者的后代呢？在一则意想不到的史料中，我发现了这个谜底。

1874年，加利福尼亚政府任命的官方调查员史蒂芬·鲍尔斯（Stephen Power）（6），花了许多年搜集加利福尼亚部落的语言材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他已发现加利福尼亚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①]上离萨卡拉门托船西北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的中国居留民的语言证据。鲍尔斯还指出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已杀死了中国居留民和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印度人，“1833年，忽轻忽重的感冒使萨卡拉门托谷荒芜了，并使大平原由人口众多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僻静和荒凉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活了下来”。（7）虽然鲍尔斯坚定勇敢的努力坚持他的观点，但是他的报告并没被政府官员接受，1877年出版的他的正式报告是一篇他的观点的淡化版本。尽管如此，这还是值得一读的著作。

除了以语言证据为基础声称存在一个中国人的定居点之外，鲍尔斯描述了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通婚了几个世纪的中国移民，他们的后代比海岸的人更苍白一些，与其他印地安部落不同，较老一代有大胡须，而女人“则以与中国人有一样的黑发自豪”。女人不穿皮革，“而穿着一件简单的长袍形状像一个羊毛袋子，无袖，在颈部折起，颜色多多少少接近白色”。他们“纯洁、友好、爱好和平的又与世无争。死后，他们渴望像中国人一样埋葬在部落的古老土壤中。又如中国人，但不同于其他北美狩猎部落，萨卡拉门托和俄罗斯河周围的人是定居民：至少他们饮食的八成来自植物，他们知道药草、灌木和叶子的品质，比美国近九成的人了解更多的植物的名称。他们祖先的传说可以在像古代中国形状的陶器上看到，然而，（现代）印地安人只会捡起一块暗色的圆石（一种黑色的火成岩），绿宝石，并且中间打出一个洞，而外部却保留粗糙。”萨卡拉门托与俄罗斯河诸部落的祖先也用“长而重的黑曜岩和碧石”，但鲍尔斯发现他们的后代却不知道制作。虽然其祖先制造了优雅的蛇纹石吸烟管，但他们的后代却只用简单的木制的吸烟管 。在设计用鸭引诱捕捉猎鸟的方法上，他们也“发展了中国人的创造力”，（8）这是中国人的风俗，但在印地安人中没有发现。像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蜗牛、黑蛞蝓、蜥蜴和蛇，并以蛤蚌壳建成贝冢。

萨卡拉门托帆船位置的南部约七十英尺的旧金山湾的西边，有一个小村庄，带有石建的低墙。1904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Uniersity College，Berkeley，California）的东方语言教授约翰·弗赖博士（Dr.

① 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这个地方是为了纪念最早开垦此地的俄罗斯移民。——译者

John Fryer）声称："毋庸置疑这是蒙古人的杰作……中国人自然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定居地筑墙，正如他们在他们中国所有的城镇所做的那样。"(9) 这与鲍尔斯简洁描述的中国人建立了定居点，与美洲原居民互相通婚相一致。

很显然，周满的船队在加利福尼亚留下了一个定居点。他们是第一批在美洲种植大米的人吗？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明朝青花瓷器财富，真的是与传统想法一致是由西班牙大帆船带来的，还是装载在周满舰队的船舱里的呢？调查正在继续进行，肯定的结论尚需时日写出；同时，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研究，追踪舰队又一次从旧金山湾出航时的航迹。

周满舰队从这个海湾出现后，会被风与洋流推动向南行驶到新墨西哥(New Mexico)。瓦尔德塞米勒地图以合理的准确性展现了这个海岸，制成的图就像经过船只上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在危地马拉(Guatemala) 的特华特佩克 (Tehuantepec) 湾的纬度上有一条沟，好像太平洋与大西洋交汇在那儿，这当然不是事实。这与航行进入这个湾的中国人发现它太浅而无法续航，只好返回时从入口处所见相吻合：水面在面前伸展许多英里远，造成北美与南美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开口的样子。

我做了一个假设：他们航行越过巴拿马地峡，这个清楚的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正如人们对一艘装备有方形帆的帆船所预料的那样，接着被风和洋流推回穿过太平洋朝中国方向行驶。但是在他们沿海岸航行的路上，他们会被推动穿过加利福尼亚湾，并在现在科利马省 (Colima Province) 曼萨尼罗 (Manzanillo) 某地的墨西哥海岸登陆，此外壮美的科利马火山 (Nevadode Colima)，海拔约为一万两千七百英尺，并在海中数十英里处便清晰可见，一定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我决定在曼萨尼罗与阿卡普勒科之间，一条突出的长仅为300英里的海岸线，且清楚的展现了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来探寻另一个失事船只遗骸。我的搜寻始于第一批于16世纪20年代抵达此海岸的西班牙人的说明，即裴南迪诺·德·萨阿贡 (Fra Bernardino de Sahagún) (10) 与贝尔纳勒·迪亚斯·德·卡斯蒂略 (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 (11)，此两人均描绘了奇特的玛雅文明 (Mayan civilization)，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到来时已衰落。两个人所描绘的许多东西，如鸡、漆盒、染料、金属工艺和宝石——所有这些好像都有中国的印记。

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当他们到达墨西哥时，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亚

洲鸡与他们在家乡的欧洲家禽非常不同。玛雅人将鸟称为 *kek* 或 *ki*，和中国话极为接近。墨西哥人只把鸡用于祭祀仪式，如占卜，与中国人一样但不像欧洲人，只为了蛋或肉。由于这些非常明显的相似处，我认为应当到墨西哥海岸这块小地方一访。

在离开前，我还调查了新墨西哥和墨西哥西部生长的植物是否起源于中国。中国山茶花就是如此，但是它可能从加利福尼亚向南方传播。除了金樱子，我发现没有其他源于中国的植物种植在墨西哥。但是我却发现了相反的一面，原产于中美洲的植物，在欧洲人“航海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了。(12) 在复活节岛发现红薯、西红柿和木瓜；在夏威夷有红薯，而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有玉米。玉米可能出自南美洲或北美洲，但是其他上述植物均来自一块相当狭小的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地方。

中国人遇到的玛雅文明几乎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样古老。玛雅的前身是奥尔梅克人 (Olmecs)，他们是中美甚至可能是整个美洲最早的文明，都城在墨西哥大西洋海岸的拉温特 (La Venta)。到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人在拉温特和圣洛伦索建造了两个大的人工平台，在其上他们建造了几乎与巴比伦一样古老的宗教城市。这些伸展几英里长的丘冢是定居系统的中心，这一系统将奥尔梅克的镇子和小村结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统治着在我们现今所知道的南部墨西哥。

他们建立了与南方人贸易的广泛的网络，进口黑曜岩、玄武岩、绿石和铁矿，出口陶器、美洲虎皮、可可和具有很强表现力的雕塑。今天在拉温特公园 (Parque La Venta) 仍可看其样本：吊在树上的顽皮的石猴；石海豚是如此地生动，我们简直可以从它们的身体上看到挥洒的水珠，跳跃于水塘间；以玄武岩雕刻成的一个坟墓口爬出的人；一位悲痛的母亲摇着怀中已死的婴孩。这是一个奇妙的雕塑，一件的确是惊人的人民大众的作品。但是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奥尔梅克人不知什么原因消失了。建立了横跨中美洲的贸易帝国的玛雅接替了他们。他们，玛雅时代到永乐十九年 (公元1421年) 已近尾声，且内战在尤卡坦爆发了，但是中国人可能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杰出的文明。

当我乘一辆巴士车从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的玛雅文明的痕迹，大西洋沿岸杂陈着系停船的柱子，它们中的每一个好像有它自己的放哨塘鹅，注视着海面鱼的出现。然后出现的是无边的湿地，到处可见成群的鸭子和飞过天际的天鹅。朱鹭和鹳

无精打采的站在池塘里和礁湖上——这是玛雅人的国度，有着几世纪来未曾改变的农业结构玛雅文明。 耕地被称为“密勒巴斯”（Milpas），延伸穿过丛林，这是砍伐和焚烧的结果。在旱季，大约是圣诞节的时候，农民用他们的大斧砍树。从3月一直到5月几乎不降雨，炎热越来越暴虐。这时是焚烧干木的理想时期，这样可以得到一块边界清晰而覆盖着草木灰的可耕地。

第一场雨在无声的闪电之后于5月底出现。这时农民们都拿起粗棍，在湿土中戳出小洞，将玉米粒、豌豆和西葫芦种子放入，这三种神奇的作物向美洲人提供了健康的食物，依靠这些，美洲各民族人民，如奥尔梅克人、玛雅人、托勒特克人（Toltee）、印加人（Inca）和阿兹德克人（Aztec）维系了上千年。当谷类生长时，豌豆绕着它的茎弯曲盘绕。西葫芦藤伸展穿过地面，到处充满生命的迹象。到7月，太阳发出烈焰，但是雨水充沛。9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国人应当已发现这样丰饶的农作物，以及完善的灌溉系统还有足以支持比今日的墨西哥乡间人口密度更高的农田。这里的农业可以和中国媲美。

蜂窝沿森林边缘分布。蜜蜂对玛雅人的糖的需求是重要的，它是小麦发酵制酒的基础，也是一种交换媒介，使农民能用来买鞋和棉布衣，他们的妻子们会在衣服上绣上传统的图案。直至今天，他们的孩子仍穿着带有生动图案的刺绣的并可辨别村落与家族的罩衫，与很久前绘制的壁画非常相似。他们把传统的房子称为“纳”（Na），在雨林中隐约可见，1000年来未曾有变。椭圆形的石台基是用石灰砌造的。水平横梁是用龙舌兰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捆在立柱上。小竹子则用来建造框架。屋顶用干的扇形棕榈叶做成。这种传统的建筑仍在整个南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旅馆饭店使用。玛雅人仍睡在吊床（hammock）上，他们每天仍用“上吊床躺一下吧”来问候。

中美丛林提供丰富而多变的食物；男人每月只需花上两、三天打猎、钓鱼、摘果子，在酷热天气里也不用穿什么衣服。凡是提到过的材料，周围都有：建筑材料、蔬菜、药草、可可、咖啡、可食用的鸟类和动物。丛林中从来没有安静过，在夜间充满各种动物的哭号声、口哨声、尖叫声以及乌鸦的叫声。在这样富饶的丛林环境下，玛雅人建造了巨大的石头城。我走过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在夏日时分，再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墨西哥帕斯·帕连克（Chiapas Palenque）的玛雅城市从白色薄雾中升起

的景象，就连马出·比出[①]（Machu Picchu）或是卫城[②]（Acropolis）都相形失色。这座城市是玛雅人在其黄金时代（约公元325～925年）建造的，并隐藏在丛林的遮盖下已超过千年。它建造在一系列相连的小山上，俯视底下占地约3.5平方英里的平原。每一组小山都由一串建筑物组成一金字塔、寺院、宫殿。在每一个团组中，白色的宫殿围绕着一个迷人的中心市场，其背景为翠绿的丛林。建筑物规模雄伟，以强调山木和谷地的自然特色。而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遗址的中央。当中国人遇到墨西哥人时，很可能人们已经向他们示明了帕连克城（Palenque），即这座最好的玛雅城。

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帕连克是作为一个与自己才能相当的人的作品出现的。这座完整的玛雅城，突然与它的财富一起全部的消失了。这里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想要的一切："丛林法老（pharaoh of the jungle）的奇妙坟墓，里面装满珠宝，讲述这一遗址故事的象形文字覆盖着国王和教士的宫殿。观象台、寺院、球形法庭，可能最重要的是平民的住房。艺术的每一方面，从面具、雕塑、珠宝、陶瓷艺术品到平民用来活动的简陋的壶、平底锅、鱼钩、矛这儿都有体现。

帕卡勒（King Pakal）国王的非凡白色金字塔占据这一遗址显著的位置。古巴学者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Alberto Ruz Lhuillier）花了几年时间挖掘了一条进入底部地下室的秘密通道。1952年他的队员拉出了一大块石头，进入了黑暗的拱顶室。

从黑色阴影中出现了一个幻想中的景象，还有来自另一世界的神奇超俗的景象。好像一个大神奇洞穴，用冰雕刻成。墙壁发出像雪晶样的微光。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废弃的小教堂。穿过墙便可以看见泥土做的矮小神像。接着我的目光看到的是地板，这儿几乎全是雕刻完美的石板。一千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批看到这些的人。

在极度兴奋时，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和他的队友抬起那个大盖子，向里面望去。

我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绿色、红色和白色像马赛克拼图

① 在今秘鲁。——译者

② 在今希腊的首都雅典 。——译者

的景象。接着看到的详情是——一绿色的玉饰品、漆了红色的牙齿和骨头、一张面具的碎片。我盯着这位死者的面孔，所有这些惊人的艺术品，地下室、雕塑、楼梯和大金字塔及其上面的寺院，都是为这个人建的……然后，就是一个石棺——即第一个在玛雅金字塔中发现的石棺。(13)

陪伴帕卡勒到来世的最异乎寻常的财富，有埋藏的带着贝壳制的眼睛和黑曜岩虹膜的玉面具。这一定是由人类制造的最好的艺术品之一，其价值无法估量。死去国王的腰、脖子、手指和耳朵都佩戴着雕刻精致的玉制珠宝。这里的艺术品之美，使人叹为观止，甚至使中国和日本工匠最精美的作品都为之失色。尺寸比例协调的金字塔，及其简洁光滑表面的石头、隐蔽的楼梯，内部地下室和宏伟的面具和项链，都是具有巨大的建筑、工程和艺术才能的人民的作品。

沿着帕卡勒金字塔向下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玛雅装饰艺术品的博物馆，这些大多是象征性的植物和动物——尖爪子的美洲虎和蛇，带着羽毛和鳞片的鸟，它们生动逼真地像要从展览地跳出来一样。它是令人震惊的艺术财富中最杰出的。最后，经过很多年在破坏性的暴风中在海上航行后，中国人遇到了与他们一样古老一样美好的文明。他们发现了与他们的一样美的玉制珠宝，乔卢拉制造品甚至比中国江西景德镇最好的瓷器还要精细。终于，他们可以用自己带来的丝织品和青花瓷器交换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

当我到达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的乌鲁阿潘（Uruapan）时，我发现那儿有着非常明显的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它距离太平洋大约两百英里。该镇得名于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德·圣·米盖勒（Fra Juan de San Miguel），1533年当他到达时，该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其留下极深的印象，遂将该乌鲁阿潘地区命名为“永恒的春天”。至今，它依然因所产的鳄梨和水果，以及受到旅游者们喜欢的美丽的漆盒和托盘而名闻天下。

漆制品，在墨西哥被称为“*maque*”，在中国称为“漆器”，涂漆是一种极不寻常、复杂、耗时的装饰方法。野生漆树生长于中国，中国被认为是漆的最初发源地，后来也有人大量栽种。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漆脂具有防护的特性。他们将之推行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涂漆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最早留存的中国漆器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8年），那时中国开始将漆用于日用器皿、家具和艺术品上，并用来保护刻写文字的竹简。使第一批到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欧洲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漆饰方法在恰帕斯（Chiapas）[①]、格雷罗（Guerrero）[②]、米乔阿肯（Michoacán）[③]以及向北远至加利福尼亚海湾的锡纳罗亚（Sinaloa）[④]等地区非常盛行。(1) 乌鲁阿潘被认为是漆器艺术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墨西哥人是如何得知的呢？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中国人将之传播到此的呢？

漆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空气中变干。暖湿空气使漆液变成像瓷釉一样坚硬而厚实的固体。漆的密度和干燥的程度随着空气的温度、湿度和漆的厚度而变化。最好的环境是在潮湿、温暖的太平洋海风吹拂中的乌鲁阿潘。在将漆以惯常用法使用之前，用米粉和漆脂的混合物制成腻子，抹平盒子或是器物的表面缝隙，做好涂漆前的准备。腻子要得到合适的稠度，须将其与米糊相混合，在墨西哥，可

①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
②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
③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
④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

以用火山灰。抹平腻子之后，先用沙子打磨盒子，再用一把由人的头发制成的非常好的刷子涂上无数层中的第一层漆。每一层漆均须完全干透，之后则进行砂磨和上光，然后再涂下一层漆。使用磨石砂磨之后，用一块软布将鹿角粉涂上，叫作上光，上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过程。一般说来，要重复这一过程达60～70遍。

实际上，上漆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是相同的，中国的上漆技术在墨西哥被采用后，还根据墨西哥的气候和原料特点做了调整。涂漆之前器物表面的打理工作也是相同的：缝隙用一种称作尼玛卡塔（nimacarta）的混合物加以填涂，器物用沙子打磨，直到完全平整，如此一遍又一遍涂尼玛卡塔、用沙子磨平，每一层干透后，沙磨并用磨石上光。

虽然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墨西哥的原料却有所不同。“*maque*”是一种半液体状的糊，由动物和植物油以及天然的精制陶土组成。主要的动物成分是提取自“阿杰”（aje）昆虫（coccus lacca）的脂肪，这些昆虫是乌鲁阿潘周围的当地居民饲养的。昆虫在雨季被收集起来，活的放进开水里，直到它们的身体释放出一种浮在表面的硬的、蜡状的物质。当水凉下来后，这些物质被收集起来，用水清洗之后，再加热去除其中的水分。它凉下来时像厚厚的黄油块。第二种成分，是“启亚”（chia）植物油，用来稀释“阿杰”混合物。这种油提取自鼠尾草（墨西哥的土产）的种子。“启亚”油有着很高的甘油成分，干燥时可以快速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形成一层坚硬且富有弹性的表层。第三种成分是很好的白云岩，称作“特普楚塔”（teputzuta），乃一种矿土，是“*maque*”混合物中的主要部分。

墨西哥和中国使用的装饰技术和颜料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深黑的背景中用漂亮的红颜料刻出图案。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颜料都是黑色的，用动物的骨骼或是玉米杆烧制而成。如今，在墨西哥南部各州，使用的漆装饰技术与中国和日本的是相同的。图案是以一根尖锐的仙人掌刺塞进火鸡毛管中作为工具刻出来的。羽毛上的软毛用来将雕刻时落下的粘土或是漆的碎屑刷去。接着用对比明显的颜料填满那些精雕出来的线条，一次一种颜色，每次填塞之后都进行足够的晾干、刷净和磨光。最终，经过美丽装饰的盘子或是箱子，乌鲁阿潘产的或是中国产的，已是非常相似，对子那些不是此中行家的人来说，已不能够将其区分出来。

光从理论上想，这一精致且耗时的过程可以在中国和墨西哥——相

距数千里之遥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上漆并不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漆艺作品中惟一一致的地方。两个国家在获得他们作品中的染料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简单和非同寻常的。茜红，靛蓝，猩红，贝壳紫是他们生产五颜六色的颜料的染色原料，但是需要先通过复杂的程序来提取和确定它们。此外，我再次指出，如此的相似实在不可能只是巧合。

茜草染料——茜草属（Rubiacae）灌木的根茎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红色染料。制作染料先要将茜草根茎挖起、烘干，清洁后磨成粉，然后将磨碎的粉末整夜浸泡后，将其在150℃的水中再浸泡一小会儿。织物在被放进染盆中煮沸之前，首先用硫酸铝溶液加以处理、定色，然后用混合有草木灰的水清洗。在墨西哥，植物的根茎选自茜草科植物的亲缘植物——“莱勒本茜草”（Rubia relbunium）和“尼提德茜草”（R．nitidum），小型亚热带灌木，南至阿根廷均可发现。新大陆处理布料的方法是用草酸铝和单宁酸。

亮丽的靛蓝，在整个东南亚通行数千年，是所有的天然染料中最古老的，它的获得需要使用最复杂的技术，提取该颜料的植物需要非常精心的种植。刚刚剪下的叶子，整个的或是只有地面上的那部分，得放进热水中浸泡9～14个小时，这期间，叶子会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混合的液体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纱线或是布放在里面浸泡后遇空气氧化后就会变成鲜艳的蓝色。除使用草木灰和石灰作为溶解的催化剂之外，这一染布过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几乎是相同的。从橡树叶子上刮下的小虫子中提炼出来的朱砂红染料，在东南亚使用的非常广泛。那些虫子先得放在醋盆中淹死，使它们先染上红褐色，当它们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一种染料，溶在酒精中，用明矾或是尿定色。另一种出现于东南亚的红色染料是紫胶（虫脂酸laccai acid），从野生或是家养的“克尔梅斯”（curmese）或是寄生在不同的树上的紫胶虫子。虫子的肢翼被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放入热苏打溶液中浸泡，再把其中的水分蒸发掉，剩余的残渣制成块。无论是马欢还是尼科洛·达·康提都提到在古里有售。(2)

新大陆相应的使用了另一种有鳞的虫子（Cochineal）——胭脂虫，它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上。这种虫子将自己包裹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

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 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 Ernardino de 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 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

① 指前面提到的诸种颜料。——译者

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传说在哥伦布之前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过来到达墨西哥海岸，得到哥拉斯（Coras）——一支优秀的那亚里特（Nayarit）民族首领的热忱接见。我开始从博物馆的收藏中寻找有关材料，起初的过程是冗长且收效甚微的，接着我碰巧见到了“尤卡坦亚麻布”（lienzo de Jucutácato)——19世纪在同名的村庄中发现的那幅油画。

亚麻布画由35个方块组成，其中的30个大小相同，每一个方块讲述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场面是人们从一艘船上登陆，在他们前面跑着一条狗，狗的尾巴与众不同地在它的背上弯成弓形。从狗的体形、大小和步态，尤其是它那非常奇特的尾巴上看来，非常像中国的沙皮狗（shar-pei dog）——最初出现于广州的一种猎狗，对于那些贫穷的广东人来说，这种狗对主人和他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帮助。(7) 那群人中，至少有一人骑在马上，马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一匹马也没有。从船头出现的首领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同样的服装格雷长官 Governor Grey 曾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油画中描绘过），手上抓着一面圆镜。镜子显而易见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其他的画面上它出现的次数不少于14次。其中的一些画面中，镜子的背面有着“由八条分界线标记”，这一“轮回学说”涉及到佛教的重要活动，尤其在它的传道和开导活动中。镜子由穿着红袍的首领拿着，与佛教中的宗教首领到岸边接见当地人民是完全和谐的。

在图画的中心位置，首领坐着，当地的居民将装着金属的托盘放置在他的脚边上——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地提到他们将铜卖给中国人。在画的底部有一棵树，散出光芒，它也许象征着底下坐着佛祖的菩提树。最后，有几幅画画着一只大鸟，鸟的尾巴一直垂到地上。从鸟的大小和姿势来看，这只鸟象征着亚洲马来西亚的小鸡。中国人坐在马背上和步行登陆，持着镜子驱除恶魔，跨上岸边，再经由菩提树和轮回学说的辅证，整体看来，画面中的情节前后都是和谐的。当地居民带给他们金属，可能作为回馈，中国人赠给他们小鸡、漆器、染料和采矿技术。

历史学家尼科洛斯·列恩（Nicolás León），(8) 是第一个对亚麻布画（lienzo）进行分析和复制的人，根据他的研究，这是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画在粗糙的织布上的，时代是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很久。他说到，到了16世纪，此画内容有所变化，西班牙人在画中加了一些建筑和文字以试图说明画的内容，用的是另一种墨水，是较原画晚的某个时期那样做的。

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尤卡坦，尽管它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这一说法可信吗？这个村庄位于乌鲁阿潘南边几十公里，库帕梯造（Cupatitzio）河在那儿不再通航，继续往南40公里处，库帕梯造河注入一个大的湖泊，巴尔萨斯河（Balsas River）把这个湖泊和海连到一起。就像在萨卡拉门托一样，一艘中国帆船可由海中到达尤卡坦，用货物和

技术作为交换来获得矿物和植物。

如果中国人已经在那儿逗留，和玛雅人进行贸易，并把制漆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那么应该有他们在那儿停留的迹象。李约瑟（Needham）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之一，1947年他访问了墨西哥，并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在我停留期间，对于高等的中美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和亚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文明特征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我印象非常深刻。”(9) 他写道，然后列举了三十多个文化方面的相似处作为对前面所描述的冶炼术的添加，例如三脚容器、游戏、计算装置、用来表明一系列复杂的信仰的玉器、音乐（玛雅人乐器有一半多的类型在缅甸和老挝国均有发现）、中国人的扁担和中国人使用的枕头等等。以示对这位伟大的教授的尊敬，我愿意谈得更深入一些。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秘鲁中部，如果你误认为身处中国，是可以原谅的，环境如此相似，妇女的服饰如此熟悉，清晨母鸡“咯咯”的声音也如此亲近，人也是那么的相似。

我认为，早期中国人出现的直接证据在玛雅人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秘鲁就发现了哥伦布之前的中国青铜器，其中的那卡兹（Nazca）太阳神小雕像是以一个中国神像为范本的。狄奥提瓦干（Teotihuacan）——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博物馆，收藏着现代恰帕斯州的恰帕·德·科尔左（Chiapa de Corzo）发现的一些中国奖章（medallions）与中国玉制项圈饰物。雷蒙·曼纳先生（Don Ramon Mena），当时墨西哥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说其中一枚奖章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时带过来的”。(10)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墨西哥半岛著名的品塔达洞穴（Cueva Pintada），有人们用箭刺图画和中国人对1054年蟹状星云超新星的记述（参见第一章）。在画的底部的碎片中，发现了烧焦的木头，据碳14测定在1352～1512年之间。

中国人在玛雅人的地方上停留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危地马拉。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约翰尼桑（Carl Johannessen）和M·福格（M. Fogg）描述，当地居民使用乌骨鸡来实施预言和魔法。(11) 这一论述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不仅母鸡来自中国，面且中国人必定在此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一地区的多批居民。

中国人在中美洲居住的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证据也来自委内瑞拉海湾西部的群山脚下，这一地区清楚地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的海图中。我曾从远离海的一端看过这些山，它们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峰的侧影在落日的辉映下，真是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景。居住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民族的

一些部落，他们的血液里留有中国人的基因。

在1962年，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佐兰诺科学调查（Instituto Venezolan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学院的图里奥·阿兰茨(Tulio Arends）和M·L·加兰告（M. L. Gallengo）博士，报告了他们对美洲大陆的成熟群体按语言群和人种群进行的铁传递蛋白显型(在电场的影响下，悬浮粒子在特殊的蛋白质宏观分子中的移动的研究）分布的电泳研究中的发现。他们把居住在派里哈山脉（Sierra de Perija）山脚下的伊拉帕人（Irapa)、帕劳哈诺人（Paraujano)、马奎塔人（Macoita）的铁传递蛋白进行比较，这些部落是处于灭绝边缘的原始居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民族中的58%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移动缓慢的铁传递蛋白，到现在为止，它仅仅发现存在于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的中国人身上。(12)如报告中所说："这一发现是在南美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种族联系的附加证据。"周满和洪保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应该出生在广东，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的港口——九龙、香港和澳门——在中国是最忙的，挤满了船只和卖船的人。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周满船上的广东船员里的一部分人和委内瑞拉的妇女生育有孩子。

也有中国人到过南美洲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帆船在哥伦比亚称作*champan*，在中国称作舢板；筏子在南美洲称作*balsa*，在中国称作筏子；圆木筏在巴西称作*jangade*，在泰米尔语中称作*ziangada*。直到19世纪晚期，秘鲁的一个山村里的村民仍讲汉语。(13)满山都是证据——船的残骸，血型，建筑，绘画，风俗习惯，语言学，服饰，技术，人工制品，染料，植物和动物在中国和南美洲之间的迁移——到处都是中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海岸一带以及内陆的影响。它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和深，人们几乎可以称那个时代的南美大陆为"中国美洲"。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到过墨西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当我负责英国皇家海军鳇鲸号时，我带它穿过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群岛到达苏比克（Subic）海湾，那儿有着许多装有金银财宝的中国船只沉在海底的传说。我用我的声波定位仪来寻找它们，但可惜的是没有收获。然后我发现在1993年6月9日，一个采珠人在潘达南（Pandanan）——菲律宾西南部的一个小岛——西南的珊瑚湾（Coral Bay，在罗茨地图中标了出来）发现过一艘中国舢板的残骸。船骸已结上一层附着物（附着在水下船底或柱石上的贝属动物）外壳，但是由柚木制成的船体的大部分仍保持完好。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的负责人埃欧塞比奥·第尚

(Eusebio Dizon) 博士的指导下，船骸在1995年的春天被挖掘出来，4722件人工制品被带到水面上。这些人工制品鲜明地勾勒出中国、东南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状况。

船体的木头部分经碳14测定，可以确定为公元1410年，和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处于同一时期。两艘船的长度和使用的梁相同，船有大约97英尺长、26英尺宽，两艘船的控制器都明显的有铁的机件——在潘达南的那些已经在海床上拍摄下来，在萨卡拉门托的则使用磁力计进行了测量，两艘船都装有平常的且是外来的货物。潘达南船装有几百万颗小玻璃珠子，这般大小的珠子常被中国人用作性辅助工具，这一做法马欢和尼科洛·达·康提在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中均已提及（参见第三章），其中做法在今天的菲律宾仍然存在。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带着几百万的黑色小种子，其中有些经过临时分析，被认为是仅产于中国东南部的罂粟。如果这一分析可信的话，说明中国人可能进行药品交易。在潘达南发现的舢板也带有“梅塔特斯”(metates——用来磨碎玉米的杵，——这种东西是南美洲独有的，还有看来好像是乔卢拉器皿的容器，乔卢拉器皿是一种产于墨西哥的蛋壳陶。在沉没之前，这艘舢板已在整个东南亚进行了贸易，因为它的货舱里有出自8个不同国家的瓷器，包括越南产的精美瓷器和中国景德镇名窑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将这些美丽的瓷片进行修复，可以看出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如粘土烧制成的蒸煮罐和盛米、大豆和种子的瓷瓶。还有3个东山（Dongson，今越南）产的青铜鼓和一根青铜刻度秤，那也许是中国水钟——漏壶的补充装置。

在发掘出的4722件物品中，大约有一千件目前仍待鉴别。一旦它们得到鉴别之后，就可以推想这艘帆船当时的航线。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它是顺着北赤道洋流从中美洲返回(和周满当时的航线相同)，在潘达南沉没，可能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雪。由此可见它的毁坏日期一定在1423年9月初，此时接近西南季风的尾声，这段时间有着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揭示出15世纪早期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航行的证据是非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的，面我所获悉的资料的内涵现在也开始为我所理解。似乎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不仅和美洲人进行交易，而且在从加利福利亚到秘鲁一带建立了聚居区。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探索了美洲大陆，且看来非常顺利地在东非和澳大利亚以及越过太平洋在美洲建立了聚居区。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历史将要从根本上进行

彻底的修正，但是一个退役的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将成为开始这一进程的人，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冒昧了。虽然我对我已经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具有信心，但是想到学术圈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我就会在夜里噩梦连连。我断定，从学术界去寻找确定的证据势在必行，因为，虽然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在慷慨地帮助我，但我可以想象一些著名的历史教授对一个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去研究和教学的课题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的反应。

虽然所有的中文文献都被毁坏了，但我确信必有像《武备志》和马欢的日记一样的某种材料被遗漏了，保存在某处；官方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毁坏每种记载、每封信、航程中记载发现事物的每一处记录；一本私人的论文集或是说明，或许它们在某处保存了下来。

我去的第一处是南京的郑和博物馆。郑和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那里过去是围着郑和府邸的私人花园，建筑呈明代早期风格，由竹林、点缀着花儿的如茵绿草环绕着。主要的展览命名为“郑和航海中的历史文物和物品展览会”。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文物是36英尺高的方向舵支柱。根据传统的轮船设计标准，一艘装有如此巨大的方向舵的船大约有四百英尺长。我在该博物馆发现的最能够引起我的兴趣的物品是郑和的钟，它与在路阿普可海滩发现的非常相似，还有极不寻常的脚爪形锚，和那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也非常相像。

这些发现物，虽然有趣，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后我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大学中研究中国或是亚洲的系里的教授，他们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世界闻名；写信给牛津和剑桥的有关教授，给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图书馆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询问他们的收藏中是否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明朝早期书籍。

在大量友好但否定的答复之后，我最终还是很幸运。英国剑桥大学东亚收藏室的馆员查尔斯·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告知我有一本世间惟一的书：《异域图志》——对于陌生国家的有插图的记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中国人所知的人们和地方的汇编。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因此作者当然是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相信是明朝皇子宁献王朱权所写，印刷于1430年前后大约一年内。它是19世纪晚期魏德教授捐给剑桥大学的珍藏品的一部分，魏德教授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教授。剑桥的本子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哀尔默教授和其他博学的汉学家绝对相信这本书的出处和真实性。

我匆忙赶到剑桥。虽然这本书本身已是非常残破，但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已经安排人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使它的98页纸张上的内容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有中世纪中国的大约八千个人物和132幅由不同画家所绘的插图，有的非常传神，有限的几笔就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神态。书中有植物、动物和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对1430年的世界和世界上人物的认知的非常简练和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该书有此书名。中国人仅将他们所发现的奇异的事物合并起来，因此书中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插图中突出地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有到麦加（Mecca）朝圣的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神：有着4条手臂的世界创造者和最高主宰梵天（Lord Brahma）、宇宙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毗湿奴神[①]、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②]；加那希（Ganesh），象神；一幅极其生动的群猴围绕着猴神跳舞的图，是印度猴神；佛祖被绘成在圣树下沉思并朝着圣山朝拜。画家把印度锡克教徒画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威尼斯人戴着与众不同的帽子，穿着长靴和飘扬的斗篷，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逼真的是动物：一匹喂得很好的斑马，有着多脂的、滚圆的腹部；非洲大象和狮子；印度孔雀和老虎，所有这些都以精湛的技术用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有东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鹿的图画，画中还有使用不同的武器——蒙古人使用的双头弓和西亚人使用的长弓在追捕它们的猎人。还有仅生长在美洲的生物的图片：羊驼，一只在地面上慢走寻找蚂蚁的犰狳[③]，一只腹部松弛的美洲虎，抽古柯[④]的人，裸露着身体的巴塔哥尼亚的人，长着狗头的磨齿兽（mylodon），“是在距中国西边两年零九个月的路程处发现的”。(14)

有两件事物使我特别惊讶。第一件是重点放在来自遥远北方的人们身上。有戴着用毛皮做成的头巾拿着鱼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和一大群跳舞的哥萨克人（Cossack）。在那时，莫斯科（Moscow）是俄国（Russia）最主要的公国，但是它还没有开始越过亚洲向东方扩张它的领土。可以想象，中国人在阿留申群岛上看见了爱斯基摩人，但是没有看

① 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之神。——译者

② 印度教的主神之一，作为世界的毁灭者和重建者而被崇拜，它以各种互补的形象出现的。湿婆经常被当作是包括大梵天和毗湿奴的三大神中的一员。——译者

③ 一种杂食性的，掘洞隐居的黄齿目哺乳动物（犰狳科），生于北美洲南部和南美洲，特征为全身有连续的、角质鳞片组成的盔甲状保护层。——译者

④ 南美及西印度群岛所产的一种药用植物。——译者

到哥萨克人。虽然没有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俄国(Muscovy)探险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记录，然而不知何故中国人已经到达某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港口，这是目前只得搁置一边的另一个神秘的问题。

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方面是，对澳大利亚的关注是多么地少；我仅仅可以推测那是因为到了1430年，澳大利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到15世纪为止，已经有很多对帆船船队从中国航行到澳大利亚的描述，每艘船都载有好几百人去。总而言之，“焦侥国（Chui Hiao）的广阔南疆”的北海岸被描述成距中国30000里（大约12000英里），且位于南部温和地区，那儿的季节和北半球的完全相反。(15)该地居住着一种矮小(身高仅1米)的黑人，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罗曼·B·汀代尔(Norman B. Tyndale)将其识别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北昆士兰州凯恩斯（Cairns）的山区。(16)

2002年3月，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做的报告被澳大利亚现场直播，然后电视局9频道邀请我参加一个现场访谈，众多的澳大利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访谈。郑和船队已经到过澳大利亚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争议，随之，我被持同样观点的几本书所提及。如果我的理论似乎要被澳大利亚广泛接受，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是正确的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友好地向我介绍了南京魏教授的遗孀。魏教授毕生的成果是对郑和航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船队发现美洲的研究。他原打算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对美洲的发现》，但是，他不幸地去世了。虽然魏教授的著作现在才要译成英文（或是在中国出版），但是此书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的书中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惊讶。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美洲和欧洲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极力说服世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航行到了美洲了吗？我决定去弄清真相。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一千多本书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航行到了美洲，这类著作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一个两卷的书目。(17)就像乔治·弗·卡特（George F. Carter）教授（他是研究美洲母鸡的专家，写有几本关于早期中国人的航海方面比较权威的书）所说：“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印地安人文明中的影响，有非常多且深入的证据，这打动了广大的汉学家和亚洲艺术史家。表面上看来，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中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而且提到中国人已经在美洲

中国宝船队到达美洲的证据。

① 尼阿卡尼海滩的木滑轮
② 萨卡拉门托的帆船，以及说汉语的人，以及中国村落的遗址
③ 洛杉矶的中国船锚
④ 描写外国人到来的岩洞艺
⑤ 米齐阿肯的文物：漆器和染料都明显受中国影响
⑥ 亚洲鸡
⑦ 冯恩卡湾
⑧ 常有中国人 DAN 的委内瑞拉印地安人
⑨ 秘鲁说汉语的村落
⑩ 刻有中国铭文的秘鲁青铜器
⑪ 刻有中国铭文的秘鲁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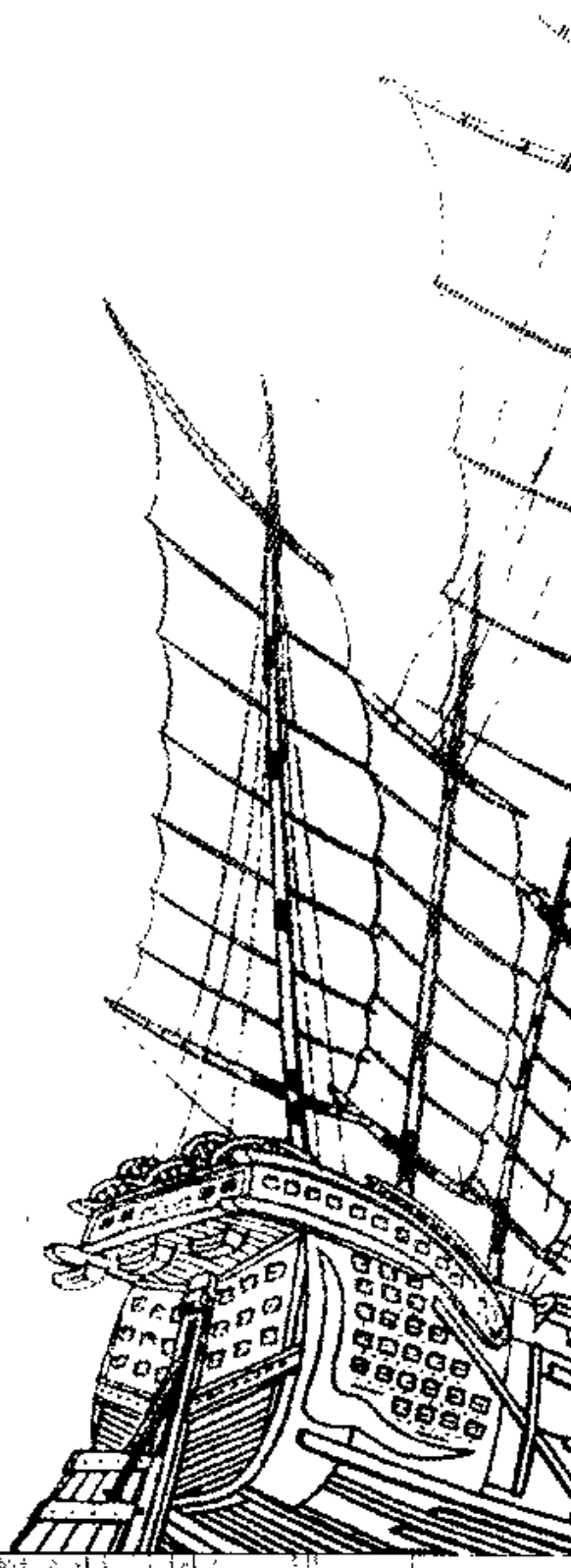
定居了。”(18) 卡特教授的用词老练之极，就像他所暗示的，可能那些学者不知道这个证据；可能他们选择忽略它，大概因为它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相矛盾，而有相当多的职业以那些知识为基础。具有相当开阔思维的学者们将会再次审视这一史实。

当谈及发现这些“新世界”的年代和是谁最先探索并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问题时，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实际上已探索了整个世界这一论题，也许这会成为与传统看法分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在天文导航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也使我能够去发现进一步的证据，除非他是一个天文学家，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要承受多重的打击，我自信这一论点可以经受得住考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将注意力转向周闻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船队。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第五编 周闻的远航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

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0月），当洪保和周满的舰队由加勒比海的出口向西南，朝南美洲海岸航行时，他们已经偏离了周闻率领的旗舰，而后者正沿着赤道洋流的北支向西北航行。我已经知道这个舰队后来想必抵达了与北京同一纬度的亚述尔群岛，因为早在欧洲人发现之前，亚述尔群岛已经出现在《疆理图》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探究周闻在两次登陆期间是从何处航行的。

当周闻的旗舰抵达佛得角群岛的时候，他已经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他想必知道了神奇的扶桑之地就在他的西面。在伟大的地图学家朱思本时代（公元1273～1337年），中国已经对太平洋大西洋之间的距离做出了准确的估计，但是扶桑会在西面多远的地方？这取决于周闻对已经航行的距离的估计。疆理图显示，由于洋流的影响，这个中国舰队对他们航行的非洲“突出部分”少估计了2000英里。当他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Santo Antão）抛锚的时候，周闻可能猜想扶桑可能在西面4000英里开外，而不是200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仍然在舰队航程的范围之内，途中无须补充供给。

在赤道以北，大西洋是一个椭圆型风和洋流系统终年日复一日地依顺时针方向旋转。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告诉航海者如何利用这些风和洋流：“从马得拉群岛航行，最好的航线是，从佛得角海域西面，在看得见群岛的距离上航行……再从佛得角取直线（向加勒比海航行）……然后……赤道以北的洋流和赤道以南的洋流汇聚，形成一个宽阔的洋流带向西流，平均速度达两海里／小时。”（1）他们带着水手从佛得角群岛向西驶向加勒比海，然后向西北，朝佛罗里达行驶，在洋流迫使其朝向顺时针之前北上美洲海岸，在那里洋流变成墨西哥暖流，载着水手穿越大西洋带向葡萄牙以西1000英里的亚述尔群岛。然后向南转弯，再回到佛得角群岛。已配备足够供给的船长可以扬帆离岛并在暂停行程里无所事事。倘若他的船不被风暴倾覆，他的航程会在他起航的地方最终停下来。这种事在北大西洋常常发生。

从佛得角西行的洋流在迫近与多米尼加群岛同纬度的加勒比海的时

候，达到它的高潮。结果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第二次远航的哥伦布、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罗德里奥·德·巴斯梯达（Rodrigo de Bastida）和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都曾经通过多米尼加和瓜德鲁普之间的通道进入加勒比海。如果获得了水果和饮用水的补给，这些中国人可能在10月从佛得角群岛出发并应该在11月初进入了加勒比海。我相信这事有80%的可能性。

周闻将军的舰队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轨迹应该合乎逻辑地与哥伦布的航线完全相同，因为风和潮汐从那一天到现在都是保持不变的。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哥伦布在70年后就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什么。通过考察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笔记，我应该能够重构哥伦布最可能的航行线路。如果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穿过北大西洋的航线上发现了任何群岛或陆地，我料想这些发现会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海图上记录下来。正如我已经对南美和澳洲所做的，我现在开始查找一个海图，就像皮瑞·雷斯和让·罗茨地图的出现一样，描述欧洲人未曾发现的大陆。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弗拉·毛罗的基地，为葡萄牙政府工作的威尼斯地图学家领导着西方的地图制造业。如我所料，威尼斯人和卡塔兰

·周闻穿越加勒比海的航行。

(**Catalan**) 地图（加泰罗尼亚为阿拉贡〔Aragon〕王国的一部分；而加泰罗尼亚人都是可畏的航海家）绘制于1423年以前，但是地图就西大西洋部分没有透露任何新东西。而成图于1424年并署有威尼斯地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名字的另一幅地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匹兹加诺海图大约在70年以前被重新发现并于1950年代初被卖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优秀的历史学家写的好几本书都谈到了它。

> 1424年的这张海图是地理学史上具有极重要价值的文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它是托马斯菲利普先生在19世纪前75年来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中珍贵的(即使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一海图的重要性蕴涵于这样一个我们以前全不知道的事实：它第一次标示了大西洋西部被称为 *Saya*, *Satanazes*, *Antilia* 和 *Ymana* 的四个岛屿。有很多好的例证足资以做结论：*Antilia* 四个岛屿在1424年海图中第一次被标示应该可以看作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地图学的标示。(2)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我对这个海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参见引言)它与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不是像早先的海图那样以地中海为中心，而是穿过大西洋，向西眺望两个大岛屿，到那时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 *Antilia* 和 *Satanazes* 被描绘出来。另两个较小的岛屿也得到标示：*Saya*，一个在 *Satanazes* 岛以南的岛屿和 *Antilia* 岛以北球形的 *Ymana* 岛。同时代的其他记录将这些岛屿放在加那利群岛以西“700大里格”的地方。(3) 它们本该把这些岛屿放到巴哈马附近，但是那里没有描绘大的岛屿。这些岛是虚构的吗？其他的海图绘制者清楚地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这些群岛后来被标示在至少19张15世纪的地图和两个地球仪上，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远航前被绘制成了。(参见第十七章)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的地图学家们将这些岛画得越来越靠向西南，直到荷属安德列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才停住。

航海图上的葡萄牙语名词使我认为它们是葡萄牙地图学家的原创。而皮瑞·雷斯和让·罗茨 航海图上也以葡萄牙语标示地名，但是他们应该不会是南极洲、巴塔哥尼亚或大洋洲的发现者。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所藏中的葡文记录毫

不含糊地说，航海家亨利在接到一份相同且稍后的航海图（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了1428年的世界地图）以后，派遣轻快帆船去探寻 Antilia 岛。(4) 还有，1424年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如此精确地勘测这些岛屿——因为在当时地图学的 *Antilia* 还是个令人惊讶的事物。我认为那只能是中国人。但是我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这是一问题。我又一次发现揭开这一谜底的最好途径是走地图学家们曾经走过的路。当我们在海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巴伦支海拍摄军事设施以消磨时间。我们的部分训练科目是潜望摄影和在相近海拔构建航海图的模糊技术。当我站在一艘中世纪的船的甲板上，与绘制匹兹加诺海图的地图学家大致相同高度上工作。

当周闻的船队迫近加勒比海的时候，他们可能警惕地迟疑了两天以简短地观察陆地。云、风、天气和海鸟的类型都会变化，最后，在群岛变得清晰前的几个小时，全体船员可能开始去试探潮湿植物的柔软轻薄的气息。由于哥伦布是在一个星期天进入多米尼加海峡（Dominica Passage）的，因此他便把海峡南方的岛屿以西班牙语中的“主日”(dominigo)命名；而按照他的旗舰的名字玛丽·格兰特（Marie·Galante)的名字为以北的岛命名为玛丽·格兰特岛。他首次登上玛丽·格兰特岛却所获寥寥。被洋流向北推移，次日在一个岛登陆。他将那个岛命名为瓜德鲁普（Guadeloupe）以纪念他访问过的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同名的修道院。如果那些修士知道这事，肯定会反对他选择这个名字来命名，因为岛上的原住民是加勒比的食人部落。记录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编年史家切昂卡（Chanca）博士，记载哥伦布的船员踏过柔软的沙滩，进入可可树林。在那里他们发现“约三十所房子，以枝条和大苇草编织在一起的木料或杆子建成，遮以棕榈叶，像是方形的乡下小屋……他们用西葫芦做菜……还有，哦！好恐怖！用颅骨来做饮水的容器”。(5) 只有妇女留在村子里；当地男人看到哥伦布的船队开过来，都惊恐地逃到山上去了。

死尸把哥伦布的人吓呆了。“肢解的尸体挂在房子里好像是用作储备食物的；一个年轻人的头刚刚从还在流血的死尸上砍下来，而这个尸体的其他部分正在和美味的鹅肉和鹦鹉肉一起在火上烧烤。”(6) 当地人用的箭头是用人骨做的。同时：

当他们袭击邻近岛屿时，尽可能多地抢女人，尤其是那些

加勒比海的食人族。哥伦布对所偶遇加勒比人的怪异的想象。

年轻漂亮的女人，用她们做情妇——他们吃她们为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些幸存下来的敌方的男性被带到他们的房子，用来制作人肉宴会。而那些被杀死的人则立刻被吃掉。他们说男人肉是多么好吃，世界上没有什么像男人肉这么美味……在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的脖子在锅里被煮熟。当他们抓住任何男孩俘虏时，他们都将他们阉割了，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然后当他们将要举办宴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杀死吃掉，因为他们说男孩和女人的肉好吃。这些人中有3个男孩溜到我们这边来，所以被杀。(7)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提到，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阉割男孩和年青的奴隶，喂肥他们就像阉公鸡一样”。(8)

在15世纪的人看来，哥伦布遇到的食人者轻易被看作是魔鬼干的事情。这可以说明撒旦一名——撒旦之岛的来历吗？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地方吗？瓜德鲁普就是出现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撒旦之岛吗？如果是这样，像70年后的哥伦布一样，中国人想必也从东南方向乘盛行风和洋

流靠近过该岛。

我将注意力转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位于撒旦岛东南的*Saya*岛。我可以生动地想象中国人靠近该岛时的景象，因为我指挥皇家海军鲲鲸号（HMS *Rorqual*）潜艇在加勒比海呆过一段时间，我游览并拍摄了很多岛屿。多数情况下，那些山看上去是黑色的，被绿色的丛林环绕。暴雨说来就来，铺天盖地。海鸟常常在大雨到来之前飞翔环聚，尖叫声预示着雨的来临。

我一参考现代地图就看到匹兹加诺地图上的*Saya*岛与勒桑特斯(Les Saintes）诸岛相对应。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形状且位于与瓜德鲁普相联系的同一位置，正如*Saya*岛相对于*Satanaze* 一样。我认为*Saya*岛确实就是勒桑特斯诸岛，而*Satanaze*岛就是瓜德鲁普岛。基于我对他们航程和速度的结论，我认为中国人曾经于1421年11月到过该岛。如果考虑勒桑特斯群岛的最高峰（大约一千英尺）和站在中国船甲板上的水手的视线高度。我估计他们在多米尼加海峡时就从25英里开外看到了这个岛。从那个位置，他们应该也看到了在他们以北10英里的玛丽·格兰特高地岛和他们以南10英里的多米尼加山地，但是它们均未出现在航海图上。我的明显的推论认为他们是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通过多米尼加海峡的。当我查阅记录，我发现那月的新月是在1421年11月25日。所以我以为他们可能在1421年11月26日大约凌晨从东南方向靠近勒桑特斯群岛。

勒桑特斯（Les Saintes） 群岛是由两个大岛巴斯岛（Terre de Basse）[①]和奥岛（Terre de Haut）[②]和3个较小的岛：南部的拉科谢（La Coche）和大岛（Grand Ilet），北部的卡布里（Ilet a Cabrit）组成。两个大岛远高于三个小岛，如果从东南方向靠近，较低的大岛（Grand Ilet）和拉科谢（La Coche）在背景衬托下显得很高，像一块大的陆地。从它南面的海岸看上去像一个大岛，正如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所画的那样。知道了他们观察岛屿的高度——一艘货船甲板的高度——我就可以在Saya 岛在航海图上的位置2英里内做一个估算。

中国人从这个方位别的还看到了什么？70年后哥伦布在同一个点上所看到："黎明揭开一幅最浪漫的图景。一个火山山峰高高耸立，瀑布沿着山坡飞流直下，如水从天降。色彩艳丽的鹦鹉喧闹地飞翔，其他美丽的

① 葡萄牙／西班牙语，意为"下地"。——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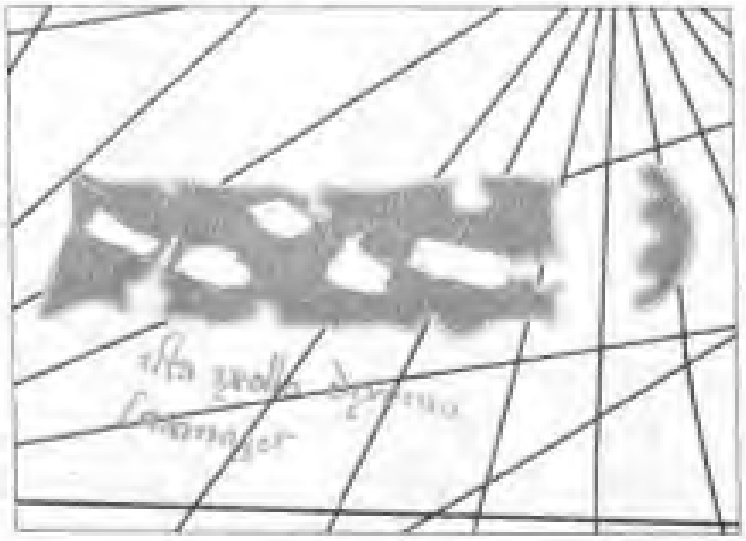
② 葡萄牙／西班牙语，意为"高地"。——译者

热带鸟在岛屿间飞来飞去，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9) 所谓“火山山峰”是指瓜德鲁普岛上的拉苏富里耶勒 (La Souffriere)，在西北18英里的地方。拉苏富里耶勒在内陆，它的山峰常常被云彩和雨覆盖，7条河从它的东坡流下来，其中最壮观的是120米的卡鲁克拉 (Karukera) 瀑布。中国船队很可能在海上停留了至少3个星期。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汲取饮用水的机会。他们想必改变航向而朝瀑布驶去了。

我转而注意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地名*Con*和*Ymana*。我起初试图请教一位纵横字谜专家来解决这些名词的谜团，他将*Con*构拟为贝壳 (shell)、圆锥形山或火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没有多大帮助。后来，效力于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中世纪葡萄牙语专家若昂·卡米罗·多斯桑托斯 (João Camilo Dos Santos) 教授为我翻译这些名词，译作“一座火山”(Con)“在那里喷发”(Ymana)。这一描述具有重要意义。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这些名词的位置重新定位到现代地图的相应位置上，径直将它们放到了拉苏富里耶勒 (La Souffriere) 火山、拉西腾纳 (La Citerne) 火山和勒埃谢勒 (L' Echele) 火山上方。这些火山在1421年爆发了吗？史密森学会证实这3座火山在1400年和1440年之间爆发了两次，经过放射性碳测定，无法确定更准确的时间。(10) 这些火山在以后的250年再没有爆发过，加勒比海其他火山在整个15世纪也没有爆发。(11) 因为匹兹加诺航海图只能记录了南部瓜德鲁普岛上火山的一次爆发，我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到来的68年以前，至迟不晚于永乐二十二年 (公元1424年) 有一个地图学家就曾经来到过加勒比海地区。

航海图上有一些不规则之处，但是只要沿着当年船队想必经过的航线回溯，这些不规则之处完全可以轻易地解释。当中国船队掉转船头朝瓜德鲁普的瀑布航行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向勒桑特斯群岛靠近，尽管当时洋流将他们向西推进。当他们经过勒桑特斯群岛的东北角时，那位制图师在早晨背对着阳光，在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将拜埃·杜·马里果特 (Baie du Marigot) 画下来了。因为这个海湾是如此之近如此明亮，它的规格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画得有点夸张。当船队靠近陆地，制图师在Saya 岛北岸又画了两个海湾。第三是潘·苏杜苏克勒关口 (Passe du Pain du Sucre) 被画在7英里外的地方，比第一次画的远得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假设他们穿过这一水域的速度是4.8海里／小时) 所以阳光已经照在制图师的眼睛上，太阳位置的作用

比较现代地图，瓜德鲁普岛被标示在匹兹加诺地图上。



加上远距离观测，导致第三个海湾比本来的规格画得小了许多。为了检验我的结论的精确，我将航海图和我自己航海画的图展示给皇家地理学会的一位专家看，他和我一样，是职业航海家。他也确信*Saya*就是勒桑特斯，它画得很精确，应该是从东南方向靠近时在海平面观察的结果。

在计算了制图师描绘勒桑特斯群岛的那一天的时间以后，我就可以有把握地估计船队到中午时在南瓜德鲁普岛的大海湾（Baie de Grande Anse）登陆了。可以想象他们在白色、粉色和蓝色芙蓉花兰花竞相开放的背景之下补充饮用水的情景——“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那里有木薯、胡椒和丝兰可供采摘。大海是个鱼类的万花筒，螃蟹在裸露的珊瑚上晒太阳，小龙虾也非常多。我可以生动地想象水手们在宴会开始前在甲板上欢呼雀跃，他们洗衣服，将水果装满船。在海上漂流了近一个月之后，在温暖的水里游泳该会是多么畅快呀！当我指挥皇家海军鲸鲸号潜艇（HMS *Rorqual*）在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湾抛锚时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派遣水手乘我们携带的充气橡皮艇到岸上，那总是受欢迎的美差——在海里游泳，然后享用朗姆酒配上烤龙虾。

在加勒比海东部，陆地在傍晚降温以后，海面吹来阵阵微风。中国人在暴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以后，可能找到掩蔽的停泊处过夜。朝东海岸航行两个小时，他们想必进入了圣玛丽湾（Baie de Sainte）南部两个珊瑚岛之间僻静的停泊处。我的推论是：中国人登陆、取水并停泊的地方与70年后哥伦布发现的地方、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在几个世纪后到达

的地方刚好是同一个地点。乍一看，这好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这么多国家的船队在几个世纪里到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加勒比海，怎么会停泊在同一个地点？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因为他们都同样只能受制于自然力量。

朝顺时针方向流动的洋流和季风将周闻的舰队从北纬18°，赤道洋流会聚地佛得角群岛推到多米尼加海峡。当他们进入加勒比海，被瓜德鲁普岛的拉苏富里耶勒火山的“水从天降”的壮丽瀑布景色所吸引。在大西洋海岸加过水以后，舰队需要找掩蔽处来过夜。他们停泊的地方是距离瀑布最近的可供栖身的海湾。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天堂的地方竟然是“撒旦之岛”——撒旦岛，居住着加勒比食人部落。瓜德鲁普是加勒比人主要的窠穴。即使在游泳的时候，他们也是捕猎人类的高手。我在不列颠图书馆花一天时间熟读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日记，日记有关加勒比人攻击他们舰队的记录：“这些加勒比人在水中也能战斗，就像他们在独木舟里时一样……结果有西班牙人死了。”在一个西班牙水手被杀死以后，哥伦布进行报复。一个加勒比人的腹部被划开了。根据西班牙文的记录，内脏漂在水上，但那个受伤的加勒比人用一只手把内脏塞到肚子里，另一只手还在箭头上点火。(12)

看到这令人毛骨耸然的记述，我决定将工作暂停一天。但是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岛上登陆，应该也会像哥伦布一样受到加勒比人的攻击。会不会有关于那次登陆的记录或遗物留下来。当我回到不列颠图书馆重新翻阅哥伦布第二次航海的日志的时候，又有别的特别的发现，如下一段记录：

> 在一所房子里他们发现一件类似铁碗的东西……但这在野蛮人中是新奇的）——一艘船的船尾的柱子。这肯定是从哪个文明国家漂洋过海而来的。可能这是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残骸的一部分。现在它们都立在一堆人骨——可能是多次血腥宴会的残留吧？ (13)

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甚至在中美洲也没发现铁器。岛民们用挖空的树干做船，他们从不用它们做设计复杂的船尾柱。船尾柱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中国使用；到14世纪时尚未在欧洲出现。哥伦布的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在海地北岸失事，在瓜德鲁普岛西北很远的地方，海

湾的急流也会将残骸的漂浮物带向相反方向，西北方向的新西兰。我很怀疑那个船尾柱来自中国船，而那个铁碗是那些中国人带来的。

中国人可能是将它们抛到海里，以逃脱加勒比人的攻击，就像哥伦布逃跑时一样。到了离岸5公里的安全的开阔水域以后，他们可能从瓜德鲁普南端绕行，在风起之前，驶向他们曾经画过海图的西海岸，维克斯·哈比腾（Vieux Habitants）岛的“小船之湾”（Bay of Anse de la Barque）和“德沙伊”（Bay of Deshaies）湾。到第二天晚间时，他们可能驶入那个海湾，就是今天的“大死巷”（Le Grand cul de sac Marin）湾，制图师从那个角度画下了他能看到的瓜德鲁普的东岛“大地”（Grand Terre）。它是个地势低平的岛，近岸高不过50米，最高处也不超过100米。但是这个时段可能是黄昏之后，而“大地”（Grand Terre）岛可能显现在薄雾笼罩的朦胧之中，制图师可能没怎么看清它，所以没有画好它。中国人又一次赶在季风和洋流之前扬帆起航，朝西北方向穿过加勒比海，可能驶向了北纬39° 53′，就是今天新泽西州的亚特兰大城，也就是北京的纬度，中国船队会选择的另一个明显的参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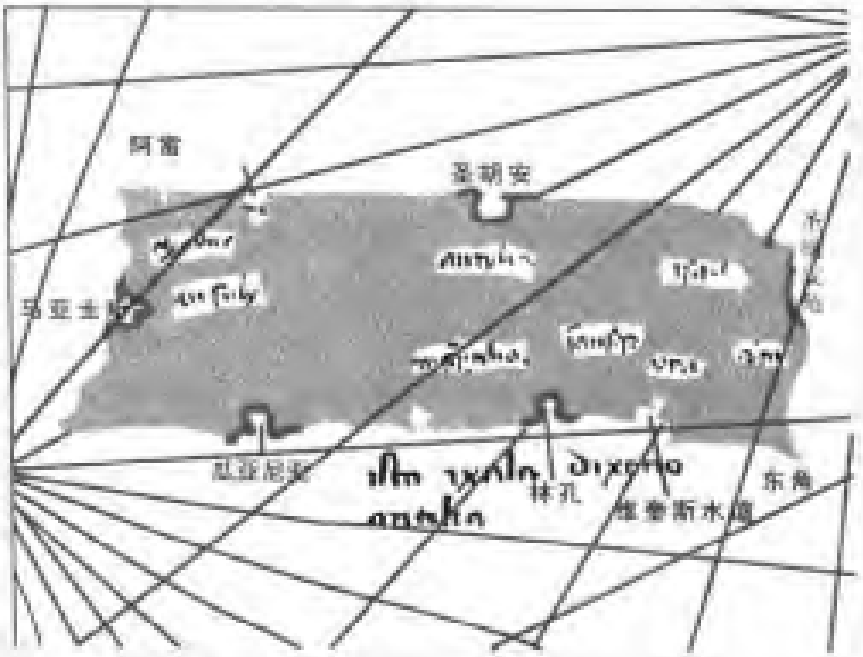
当制图师从海平面看到勒桑特斯岛的时候，已经画下了它，并将它置于相对于瓜德鲁普的西岛“下地岛”的准确位置。他已经准确地绘出了“下地岛”和“大死巷”岛的东、南、西海岸，把海湾和河流置于其准确的位置，并描绘了勒苏富里耶勒火山和它的喷发。同时发现另一个火山正在喷发的岛和南部相同形状的群岛和北部海湾的机会为零；毫无疑问，撒旦岛就是瓜德鲁普岛，Saya 岛就是勒桑特斯岛。知道了“下地岛”的真实大小，我就能将撒旦岛的大小调整到相应的尺寸。由于匹兹加诺航海图给出了安的列亚（Antilia） 岛相对于撒旦岛的尺寸和方向，我也就能够计算它的真实的尺寸和方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也标出了撒旦岛和安的列亚岛的相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为了寻找安的列亚岛，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找一个135公里长，50公里宽，东西走向，位于瓜德鲁普群岛西北约六百公里且在季风和洋流经过处的岛屿。

我求助于现代地图看是否能够发现与安的列亚相对应的岛。地图显示波多黎各恰好在那个位置上，它有正确的走向和规模且正在季风和洋流的通道上。季风和洋流可能席卷了离开“下地岛”的中国船队。

我比较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岛和波多黎各岛的形状，非常吻合，我至今仍然记得得到这个重大的突破沉浸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我在夜里走到街上去找点喝的来庆祝胜利。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不列颠图书馆。我担心是不是疲惫和兴奋使我误读了那个证据。但是经过比较大号的波多黎各现代地图和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所有残留的疑虑都消失了。它们有很多惊人的相同点，尤其是瓜亚尼拉湾（Guayanilla）、圣胡安（San Juan）和玛亚圭兹湾（Mayaguez）的形状。除了东南角，安的列亚岛和它的海港与波多黎各岛契合得像戴手套。制图师的水平惊人，超过了葡萄牙人在1424年

与现代地图相比较，匹兹加诺海图标示了波多黎各。



可能达到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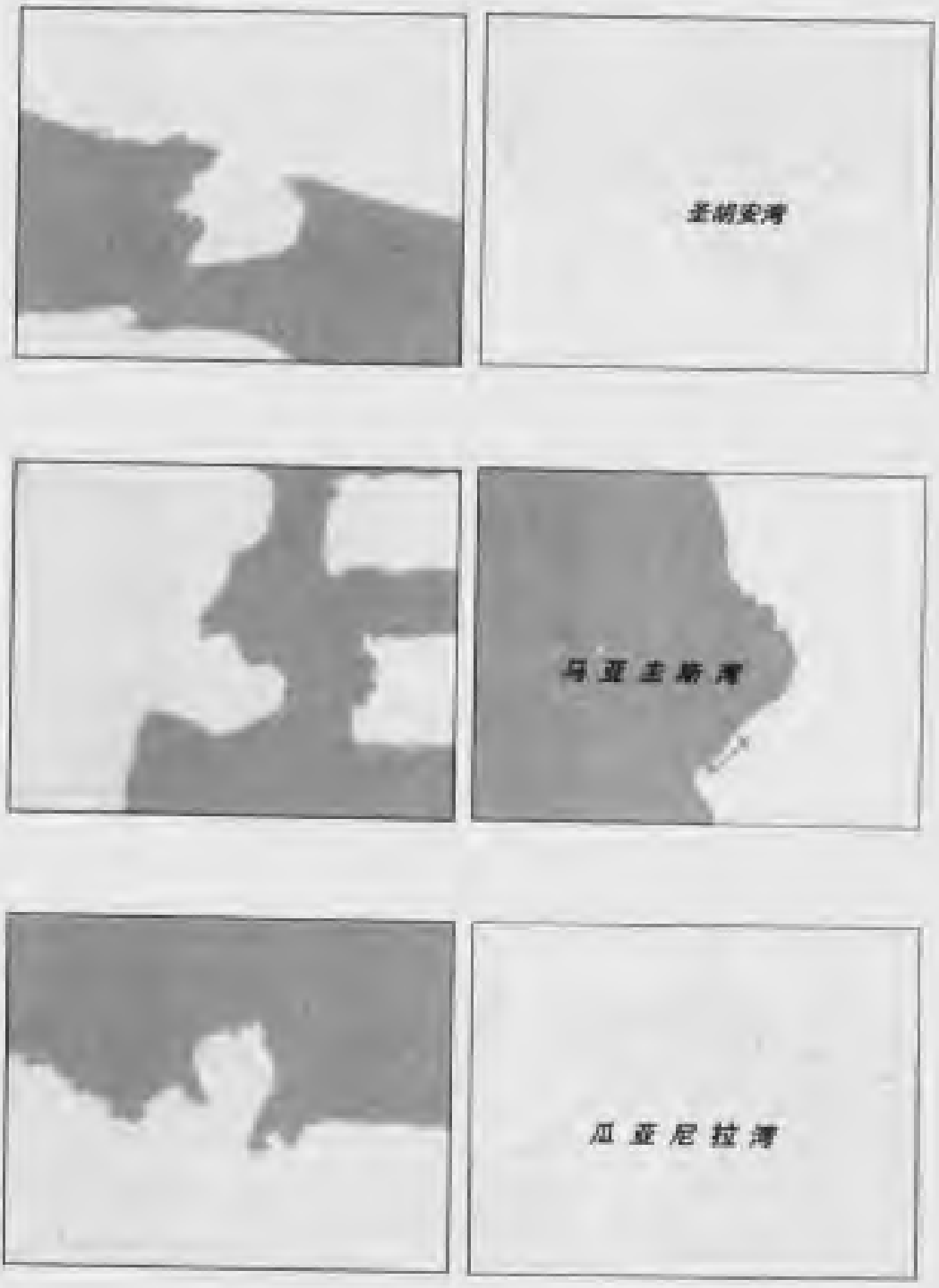
但是被夸张的东南角轻易地得到了解释。离开瓜德鲁普以后，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中国船队向西北漂移——后来哥伦布所走的相同路线——到了波多黎各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能看到了东海岸附近的险恶的砧骨形埃勒·云格（El Yunque）火山，就转而朝那里去取水。就像在航行途中考察岛屿时多次做的那样，这群中国人可能分成了两路，一路向其北侧，另一路则驶向其南侧以同时绘制两个海岸。如果他们在夜里看到了火山，如果他们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夜里经过了维格斯（Vieques Island）岛的南面。在黑夜他们可能看不清维格斯岛是个独立的岛，就把它绘成了安的列亚岛（Antilia）大陆的一部分。（14）匹兹加诺航海图也以名词“乌拉”（ura）——飓风——记录了波多黎各岛东岸的邻近地区，明显地暗示周闻的舰队在驶离该岛时被飓风猛击。周闻可能是出于谨慎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起航，而很少有船可能在避风港里找到锚地。这个情况与航海图所绘波多黎各南、西、北面港口惊人准确是一致的。绘制于哥伦布出生前。

遭风暴袭击的中国舰队已经完成了他们对波多黎各岛的考察。我能想象那支船队在飓风结束后重展大帆并从波多黎各扬帆向北京的纬度进发。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那个纬度上一定会有他们航行的证据。我相信中国人曾经航行到北大西洋，因为郑和在他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以后在南中国的刘家港树立的石碑中说：“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15）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迤北之国”和“西域之西”无非是指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官方把宝船队的所有记录都毁了，我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地图以寻找线索，而北半球的航海图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有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匹兹加诺航海图的配对物。

一幅众所周知的坎提诺世界地图进入我的视野。我在研究周满访问美洲问题期间，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①]埃斯腾斯（Estense）图书馆找出了这个非凡的航海图。它是由一个匿名的葡萄牙制图师绘制并被费拉拉的埃尔科里·德·埃斯特（Ercoli d' Este of Ferrara）公爵的代理人阿尔贝托·坎提诺（Alberto Cantino）阴谋攫取。坎提诺航

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

* 圣胡安岛的海湾，北纬18° 28′，西经66° 07′，马提主兹岛的海湾，北纬18° 12′，西经66° 17′，瓜亚尼拉湾，北纬18° 12′，西经66° 46′，在匹基加诺海图上，波多黎各的水湾标示的非常精确。



海图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怀疑，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获取它的时间是1502年10月。中国舰队必须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起航，离开波多黎各以后他们可能被刮向西北方，到了“西班牙”和古巴，然后穿过加勒比海到了佛罗里达海岸。坎提诺航海图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它标示

了“西班牙”岛和古巴和加勒比海、佛罗里达海域很多其他的岛屿。但是尽管此图在描绘非洲海岸和印度洋及其群岛时反映出非凡的准确性，但一眼即可看出它在描绘加勒比海域时所表现的缺憾。很多岛屿与实际的尺寸和形状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我对于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错误而困惑。

我努力使之在相当多的时间变得有意义。然后，几乎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1421年的海平面是要比现在低的。全球气候变暖使极地冰层融化，缓慢而无情地抬升着海平面。英国比尔肯海德（Birkenhead）的“骄人”（Proudman）海洋实验室的最精确估计是海平面在过去的100年中每年上升约1～2毫米。其他著名的海洋学者则估计得稍高一些，认为平均每年提高四毫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21年迄今差不多六百年中海平面已经抬升了4～8公尺。简单一点，我假定所有的升高为6公尺，即估测范围的一半。

英国海军部的加勒比海航海图（16）使我能够看清这一地区的新图全景。今天已被淹没的大片地区在1421年想必还在海平面以上，带有岩石和暗礁看起来像刺破水面和浅滩。从安德鲁斯岛（Anderos Island）向古巴延伸的巴哈马大堤的岸线与暗礁，直至北回归线在1421年时可能都在海平面以上，今天的现代航海图上标以“几乎无覆盖”大量沙脊，(17)可能也在水面以上。在中国制图师看来，从古巴北海岸中部的卡约·瓜哈巴（Cayo Guajava）直到迈阿密（Miami）纬度的所有的岛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庞大的低平的岛屿，即古巴的一个延伸部分。

盛行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舰队沿着古巴的东北海岸，一直向北驶向安德鲁斯岛（Andros Island）的东面，直到大巴哈马（Grand Bahama）。（安德鲁斯岛是一个潜艇乐于光顾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延伸到海岸东部的深水海沟。我们的数千吨的核潜艇沿着海沟以每小时40英里／小时的速度急驰，以检测其在深水中急速行驶时的静音。然后我们会浮出水面休息，在安德鲁斯岛海滩的棕榈树下喝巴卡第（Bacardi）。如果中国舰队在黑夜经过了通道，他们就不可能看见任何朝西的缺口而只能画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东西。当我调整现代的航海图以表现海平面以下180公分的等深线时，加勒比海群岛之间很多浅的礁湖都变成了干的陆地，面当我将调整后的海图叠加到坎提诺图上的时候，很明显，加勒比海的准

① 一种古巴的兰姆酒和可乐。——译者

确绘制令人难以置信。就如同它在6个世纪之前出现在所经过的水手前时一模一样。又一次证明它是一幅非凡的绘图学的佳作。

现在我必须直面的问题是这幅图的绘制是不是由哥伦布做的事，他在1492年到过加勒比海，那是在坎提诺航海图被获取以前10年。很多有学问的学者对于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第一次登陆的地点的解释小有分歧。究竟是在古巴海岸，在萨马拿沙洲(Samana Cay)或猫岛(Cat Island)，意见不一。哥伦布是个才智贫乏的制图师，第一次远航时他对纬度的计算差了20°——他以为他在新苏格兰(Nova Scotia)的什么地方——他的经度也错算了1000英里。即使哥伦布的船上有一个秘密的更好的应该能在所有四次远航过程中精确绘出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加勒比海群岛的制图师，但是坎提诺航海图还有数万平方英里的海洋和群岛，直到此图绘成20年以后，无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欧洲航海家都没有到达过。我的结论是，这幅海图不可能是哥伦布任何一次航海的产物。

它会是哪个不知名的葡萄牙或西班牙探险家绘制的吗？我们必须考察皮瑞·雷斯航海图和坎提诺航海图所涵盖的所有陆地的图。到1501年，当原始航海图从哥伦布的水手那里获取时，皮瑞·雷斯图的作者已经准确描绘南美洲和南极洲。到1502年，坎提诺正在显示非洲、印度洋和加勒比海。为了使坎提诺航海图和皮瑞·雷斯航海图达到显著的准确性和丰富的细节，只是为考察印度洋便至少要求30条船，更不用说南美洲、南极洲和非洲了。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可能派遣如此众多而庞大的舰队同时去世界不同的部分。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的船只、资源和专业技术去做这样的事情。中国宝船上的制图师应该就是这些非凡航海图的原创者。

通过考察坎提诺航海图标示的加勒比群岛，我可以重构绘制航海图的制图师们所经过的通道。为了描绘群岛，他们必须观察两边的海岸，而且总是在季风和洋流到来前起航，平底船没有机会转回来再走第二遍。为了观察一个岛的两个岸，至少要求助于两条船，一条观察一面。绘图的方法，连同盛行风和洋流使我相信绘制加勒比的海图至少需要5个舰队的船。根据我最确切的估计，可能至少有10～20条船驶过加勒比海以便一次性搜集大量的信息。推想他们在互相看得见的范围内，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们可能每天描绘15000平方英里，可能在4～6个星期内获得了需要的信息。

很多群岛是很低平的。为了准确地表现它们，每条船可能在方圆十

与现代地图相比较，坎提诺海图标示了加勒比海和佛罗里达。

几英里的范围内考察，使自己暴露在可怖的危险之中。为了从古巴穿越大巴哈马岸堤到安德鲁斯岛东部，然后进入别利群岛（Berry Islands，均见于坎提诺海图），船队想必经常经过，而且还是在夜里，英国海军司令部航海图所谓“无数的沙脊几乎未被覆盖”和“无数的石头”的地方。照字面意义理解，在一小段约40海里的距离里，（18）有可以将木制船体撕裂的数百个岩石和暗礁。经过这一小段航程可能使人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我想不到他们是如何能够穿过那个通道而未损失一艘船。当船队穿过了巴哈马岸堤，到达别利群岛的时候，他们一定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麻烦之中。船舱灌水，月光照亮的平静的海面上也可能回响着对死难船员哀伤的哭泣。

这个想法有些伤感，但是它也突显了一个事实，我的探索正在结束。这些航海图准确地告诉我该往哪里找。我必须在佛罗里达海峡（Florida Strait）的别利群岛方圆几英里范围内寻找宝船残骸的踪迹。

第十二章 宝船队搁浅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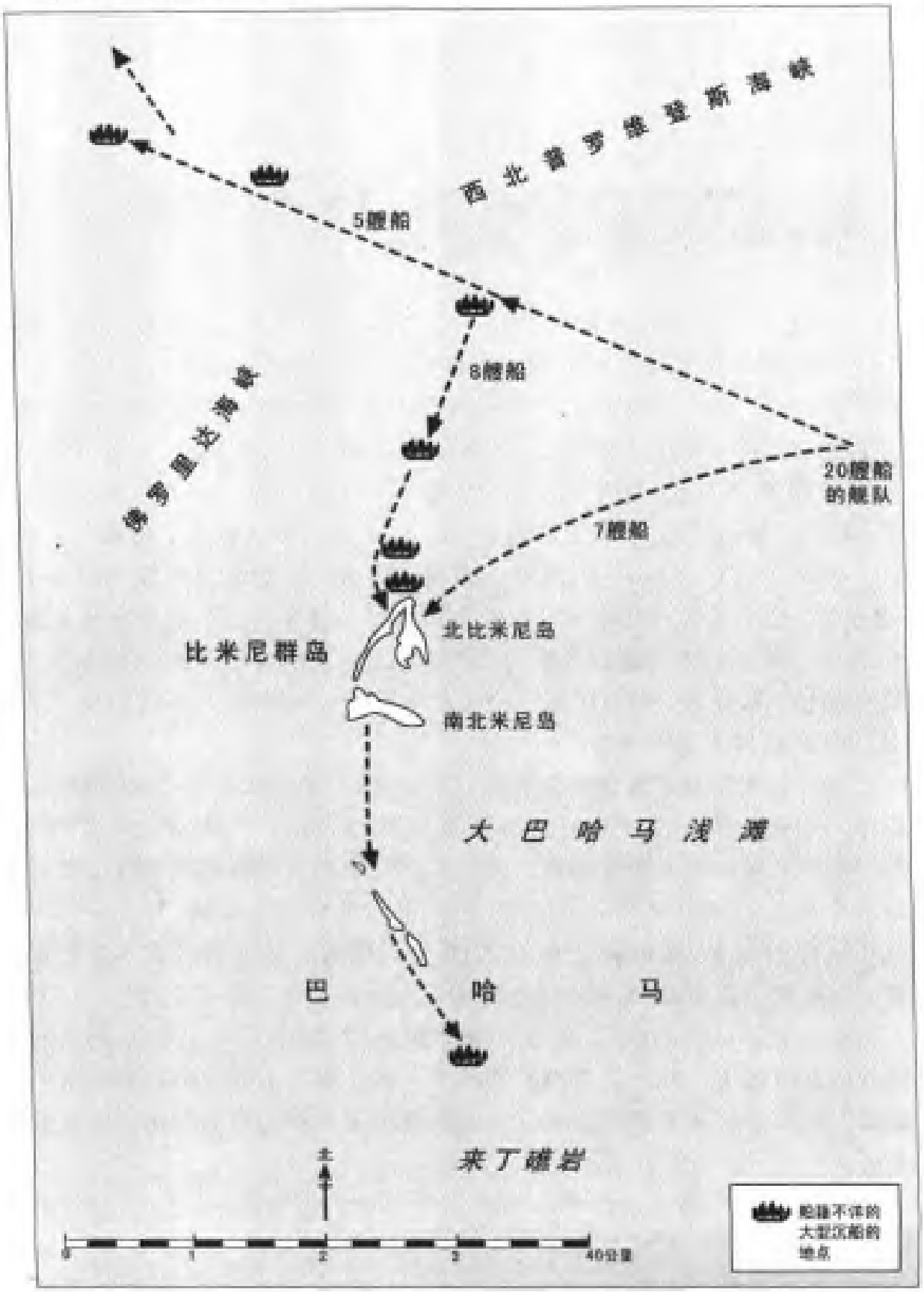
当从浅水区域驶向大海深水区域时，海水的浪型和浪高是处于变化之中，其水色与味道也有所不同。这对于所有航行于大海的海员来说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周闻将军的船队穿过别利（Berry）群岛时，他马上意识到其船队已进入到一个深水区域——通往佛罗里达海峡的普罗维登斯西北海峡（The Northwest Providence Channel)。我怀疑周闻的几条平底船在穿越海礁时，可能触礁受损。为避免船沉入深海，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让船队靠岸的地方。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岛屿，对船队来说是一件极其紧急的事。因为很多平底船处于危急状态，难以在大海中幸存。

我这才开始仔细研究别利（Berry）群岛周围地区的有关资料，并在大型的英国海军军部地图（*Large—Scale British Admiralty Charts*）(1) 和科夫曼（Coffman）珍宝地图集 (2) 中，发现了失事船中有中国船的痕迹。科夫曼（Coffman）珍宝地图集（Atlas of Treasure Maps）把这些失事船划归到西班牙大帆船（15～16世纪），是早期还是晚期的失事船，尚无法确定。但我所关注的是这些后一类的失事船只，并把这些船和英国海军军部地图的材料进行比较。令人惊奇的是未明身份的8条船的残骸在6小时或40英里航程的地方发现的。此地应是中国人进入佛罗里达的地方。4条失事船是在小巴哈马浅滩（Little Bahama reef）和佛罗里达海岸发现的（3)。其余4只是在正南方发现的（4)。当我查阅一幅大型海图时，发现南边的四条船骸行进方向指向15英里之外的一组小岛，即南北比米尼（Bimini）岛、枪岛（Gun）和洋礁（Ocean Cay)。失事船的位置显示4艘竭尽全力驶向海岛的中国平底船。最后一条失事船是在北比米尼岛一英里范围之内。失事船所处的水域都是浅水区。如果没有受到鲨鱼的袭击，那么船员是可以游到海岸上的。我敢肯定应该还有其他失事船的证据——这些受损的船企图驶向比米尼岛。

我飞往该岛进行详细调查之前，探寻一下第一批中国人到达比米尼

① 本节地名主要依据《21世纪世界地名录》，主编 萧德荣 周定国 现代出版社，2001年。本节人名主要依据《世界姓名译名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 ——译者

·在前往比米尼岛途中的不明沉船位置。



岛时是否留有什么东西，诸如失事船、瓷器等。第一位登上比米尼岛的欧洲人是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大约公元1510～1521年）。他是一位西班牙征服者，并于1510～1511年任波多黎各（Puerto Rico）总督。1512年2月23日西班牙国王给他的敕命为：

> 国王
>
> 传谕西班牙岛官员恩准对胡安·庞塞·德·莱昂授职，并委命其探寻传说之比米尼岛（5）。

国王急切地要确定神秘的比米尼岛所处的位置。起因就是一个传说，传说称凡饮此泉水者，会永葆青春。其梗概为："距离西班牙岛325里格的地方有一个海岛，岛上有一个一年四季长流不止的神奇泉水，凡饮此泉水者（有可能的话配以食物），就会使人返老还童……用其洗浴或待在泉中会使老人变年轻。"（6）哥伦布航海以前，这个传说在欧洲广为流传。后来，这个泉水被确定为北比米尼岛东边刺鼻的硫磺泉。经由一条浅河可以到达那里，成群的美洲大鳄鱼——短鼻鳄鱼属常出没于此水域。这个传说中的泉水，不管多么遥远，对任何一个追求永生的国王而言，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力。而且，这一发现自然含有无可限量的商业价值。和今天一样，任何一个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富人无法用自己大量的财富换得永远的青春。

南北比米尼岛的海湾在坎提诺（Cantino）海图上标注得相当清楚。这个海图是庞塞·德·莱昂航海之前12年绘制的。可以肯定在庞塞·德·莱昂之前，有人到过那里。这个岛不仅绘制在坎提诺海图上，而且对这个岛上的神奇泉进行了描述。比米尼岛仅有几英尺高，并在一日内就可以环航完毕。数世纪以来，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屿拯救过许多失事船员。这些船员是在飓风季节到此地的。20世纪，当时正在创作小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喜欢到这个岛上，晚上到当地酒吧喝上几杯。成千上万的游客乘着水上起降飞机和游艇从佛罗里达到这个充满着历史色彩的岛屿寻访海明威的足迹。

1968年9月，身兼动物学家和水下考古学家的梅森·布兰廷（Mason Blantyne）博士从北比米尼岛下水。他在离岸1000码，水深1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几个平板石，每块8～10平方英尺，呈长方形。他的这一

发现被命名为："比米尼之路。"这是由两个在比米尼海湾石头构成平行线，其上是沙丘，面朝西南的深海。西边部分呈160度角，伸向海边，弯曲直通海岸。朝岸部分是一个长约1200英尺，宽200英尺的直线。其中间有一个没有石头的壕沟（slabs）[①]。

1974年，美国科学家戴维·津克博士（Dr. David Zink）带领一支（9支中的第一支）探险队调查了这些神秘的石头。他得到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条路是人造的。把小石头置于大石头之下，这显而易见是为了使海床平稳。大石头部分有箭形的"指示"标志，这只能是人为的。路的各个部分都有平板石，切割成相同的尺寸，并排放置，有些小方石还是榫卯连接的。从国外运到美洲的微晶灰岩矿，几乎总是伴以铅锌矿。这些矿石分布于海底平板石周围。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些岩石已浸入海水中。有些在海浪的作用下变成圆形，像巨形面包的样子。有些岩石不是原产于加勒比地区。从空中可以看到这条海水中蔚蓝色之路。这是一条米色的石头，笔直地深入到海水中。津克博士探险之后，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因制作节目（7），详细调查了这条"路"，而且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y*）上刊登了几次特写。许多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调查，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此物是人为建造的。

后来，津克博士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认为比米尼之路的石头是倒塌的神庙柱子的一部分。这个神庙是公元前约28000年大西洋文明时期的人建造的，而这一文明早已消失。他认为巨石神庙是大西洋人利用天空上的星团——卯宿星团的样子建造的，其类似英国的史前巨石群(8)。尽管我不同意津克博士得出的这种奇异结论，但是这并不抹杀他所做的全面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测算和调查的价值。

当周闻将军的船队驶向比米尼岛时，其中有许多船吃水线以下已经漏水。有一两只船隔水舱还装满着水。这些受损的平底船船长尽一切办法在船沉以前靠岸，这样他们可以修理船体和舀出船里的海水，以防海水弄湿他们基本的粮食供给——大米。使用了数世纪的，尤其在二战发挥重要作用的救助受损船的标准方法就是依靠风浪将受损船冲击到岸边，面那些耐损船就会漂浮在海岸，得到应有的救助。有可能的情况下，那些水淹马匹与谷物船会和艰难靠岸的主要船只以及外界取得联

① 网页中有详细说明。——译者

系。试设想一下，那些获救的船员和侍妾看到点缀着棕榈树的沙岸是什么样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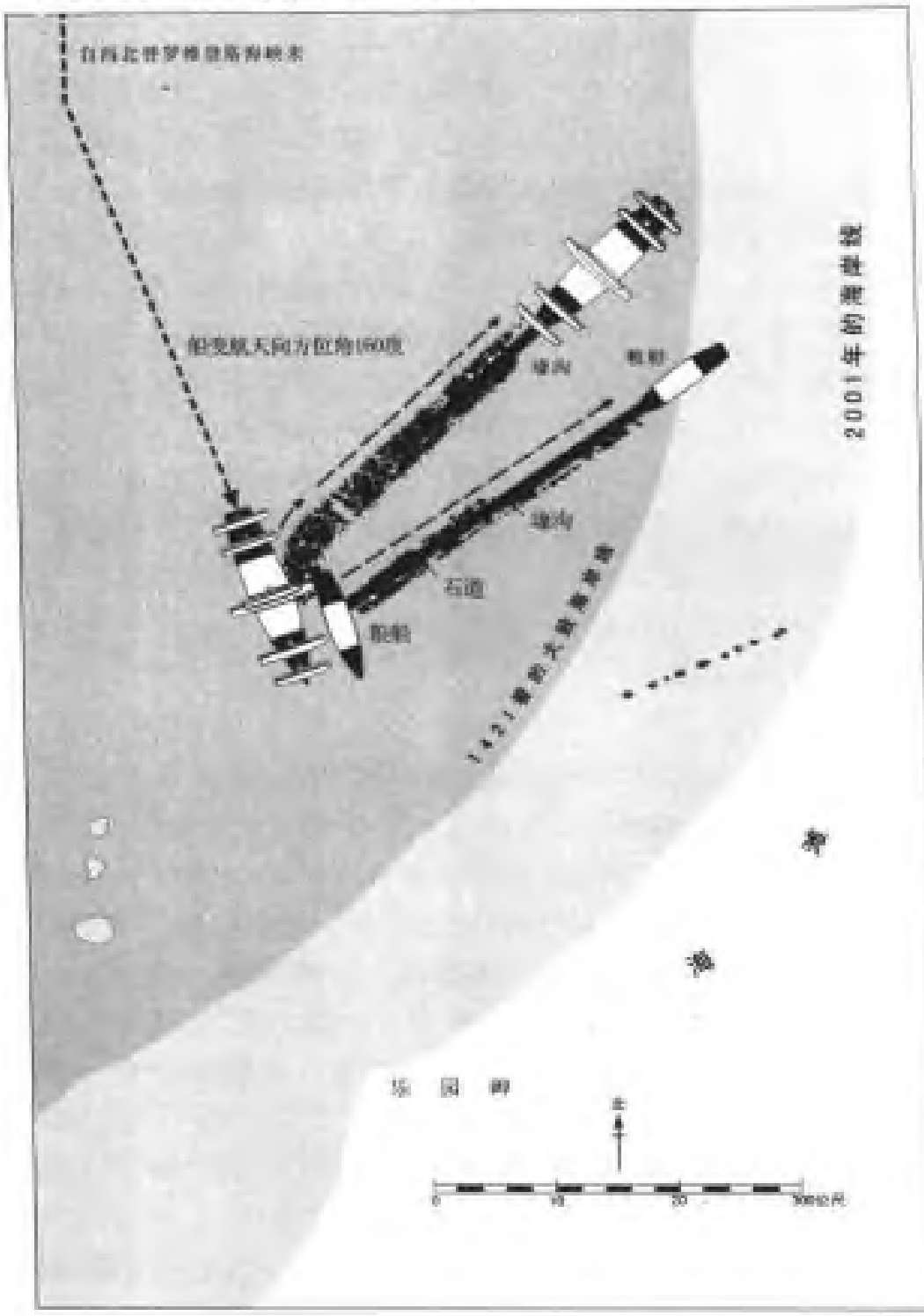
一看到北比米尼岛，船长就必会带领船队直驶过去，因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海平面比今天要低1寻（6英尺）。若是装货或有压舱物，平底船可以行驶到平均2寻（12英尺）半的地方。我计算过这些平底船停泊在今天水深18英尺的地方——相当于比米尼之路向海一端的深度。路的末端位置像倒置的“J”型，此地恰好是一只平底船绕过巴哈马大岸堤，然后转而直接驶向北比米尼岛靠岸的位置。

这个假设使得我重新审视比米尼之路。通过我的研究，我想找到解决神秘之路用途的方法。这条路是不是一个光滑石头组成的来防止靠岸船体和漂浮船体进一步损害的滑道？此路的弯曲部分可能起到转盘的作用。当宝船队的一只船靠岸时，船的龙骨和船舵可以防止船脱离岸边的滑道。大船的船尾只得回转面向海岸，船才能改变方向，这样就背对着海岸。当我在同样大比例的路上拖一条宝船和一条载谷船，然后转动其船尾，结果宝船在路大的一端靠岸，载谷船在小的一端靠岸。两路都有用于船的龙骨和船舵的漕沟，使其先把船尾能拖到岸边。

比米尼滑道所需的规定大小的石头和岩石应不难得到。平底船上本来载有成千上万的压船石。周闻的船队装载着炸药，可以用来炸岩石，且在船上有中国石匠。中国石匠曾用各种击锤、钻孔器、钻、锯和铁锤在1403～1421年间修建了数千公里的长城。假设15只宝船到达比米尼岛，大约有六千水手和侍妾，那么他们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有关的理由，在后文将说明。乍看起来，置于海底的石头使人疑窦丛生，但中国人已有六百多年建造隔离舱、密封舱的经验。这些舱是用“阿基米德”(Archimedes) 螺旋泵抽干的（几个世纪以前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发明的），使其在吃水线以下确保运转。到明初前，中国人就已经用呼吸管和面具等设备用来潜水(9)。水下置石方时会有困难，但是他们良好的设备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当滑道建成后，每条巨船可以依次拖到岸边，并使船舵和龙骨处在漕沟中。其次，宝船的排水量达数千吨，这看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挑战，但中国工程师发明了各种绞盘，这些使用索和麻绳的绞盘可以拖船只，而且绞盘安装有棘轮和各种传动装置，这些装置用人或马做动力。中国人可能设想用吃水浅、平底、方形帆船临时靠岸登陆。船员的训练中可能

中国机船前往比米尼岛及比米尼之路。



包含了将进水船拖到岸边修理的内容。有理由可以设想，每条船上应该有必要的设备，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处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疑惑，这些疑惑和我的方案有抵触。因很多大长方形石块不是在比米尼岛找到的岩石制成的。那里的基岩比较软，

而且和“外来”岩石相比，其形显得杂乱无章(10)。连接各个缝隙的“水泥”也不相同。津克博士找到了一个文石晶体和一个裂片方解石的样品，这暗示与邻近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由此可以确定这些岩石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比米尼岛有大量的石材，如果这些石料不是中国平底船的压舱石，有什么必要将巨石和方形“建材石料”运到比米尼岛?

津克博士把一件样品送到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检验(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由于，其石没有在窑中烧过，他们无法做碳日期鉴定，但首席化学家爱德华·塞耶博士(Dr·Edward V·Sayere)证实较小的方形石料中的有些是由砂岩和石灰岩混合而成的，并提出这些石块“可能是由某种古代批量生产技术制成的”。而且，每块“建筑石料”都用榫卯把相邻的石块连接。这些石块在平面上是方形，但在厚度上变细。显然石头在海底是没有必要用榫卯连接的。而这些“建筑石料”却曾用榫卯连接，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榫卯可以在平底船底将压舱石连接在一起，其可以防止船上的大石头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中到处移动，进而损害船体。

一条船的船幅和其长度相比是相当宽的，而且船是平底，需要大量的压舱石。大船的排水量为3400吨。按标准的船舶工程技术而言，我预计每条船要装载500～600吨压舱石——18个密封舱中大约各装载30吨左右。这条滑道是由地产岩石、建筑石料和大型的“外来”石混合而建成的。大约450块“外来”石还放置在滑道上，但最近几年，疏浚工程时将一部分石头运移到迈阿密用以修建防波堤。我估算在滑道上有大约600块石头，每块约重10吨，恰好等于12艘平底船所载的压舱石的重量。

我现在试图重建可行的场景，这个场景是曾经发生过的。一条平底船撞到岸上，船体受损，而后有些石头或建筑石料滑落到海底——是“路”的第一部分。由于增加了浮力，另一部分较大的石头可能通过船体裂缝滑落到较低的地方，而这些长长的石头像“带子”一样处在船体下方，石头的两端都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当石头到达海底时，在海底“支撑”的石头可能留下了这条带子。

大“外来”石(11)在加勒比地区以外世界其他地区是寻常之物，而且在长江流域被探明可开采，并在南京东郊的明代采石场将其切割成一定的尺寸。那里就是宝船建造地。海底的建筑石料为一尺见方(约32公分)。砂岩和石灰岩混合而成的建筑石料广泛发现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石灰岩隙度低于2%，其渗水性几乎等于零，非常适合做建筑石料，至今

在中国还在使用。

此处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点——在海底发现了微晶灰岩矿。微晶灰岩在加勒比地区尚无探明。1421年，此矿不是用来贸易，也不具有商业价值，更没有和其他金属矿伴生．为什么平底船要运载微晶灰岩？位于中国长江上游的秦岭泥盆纪带蕴藏着世界上最大的微晶灰岩矿床之一，约有两千万吨的铅锌储藏量。最具开采价值的矿床是在长坝，位于长江中游，武汉以西不远的地方，从南京逆流而上约有400英里。至今南京和武汉仍有航船往来。明成祖朱棣在武汉投入大笔资金修建各项工程，其中最壮观的工程就是天柱峰上的金殿，今天还悠然尚存。该殿是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全部用镀铜建造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镀铜建筑物。它象征着此地是两千年来重要的铜业开采中心地。也说明这里是明朝造币所需铜的来源地。朱棣传旨修建了一条连接长坝铜矿和长江水道的运河，此足以说明武汉在铜业生产上的产量和价值。有了铜锌储备，南京的航海工程师（工匠）就有所需的铜料，按规格大量生产铆钉——每个长6尺，重约7公斤——铆钉把宝船的密封舱连接起来。一旦把铜锌矿石从微晶灰岩矿中筛选出来，剩余的微晶灰岩石就可以在南京船场包装用来做压舱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加勒比海底的比米尼之路石头周围存在此矿物的原由。

一旦平底船被拖到岸上，排出船上的海水，接下来的紧急任务就是晒干储存的大米。中国船员在比米尼岛周围捕得大量的海螺、海龟、鱼，这些可以补充基本的饮食。淡水可以从著名的泉水中得到。该泉水是冒着气泡的硫磺味的水池。此泉被庞塞·德·莱昂描写成一泓生命之泉。中国木匠的技艺不管多么高超，有些平底船一旦损坏还是无法修理。于是，拆解损坏的船只，腾空储存货物的货舱，而船体的厚木板用来修补仍可起用的平底船或当柴烧。剩余的船体像一个巨型的木骷髅遗留在远离滑道的海岸上。若此种情况确实发生过，那么就仍会有一些遗存的证据。

1989年，津克博士探险队的一位陆面勘察员瑞蒙德·E·利（Raymond E.Leigh）飞过北比米尼岛，他用该岛东北端的红外线设备进行了测量，此处的对面就是上岸的滑道。于是，他发现了4个长方形的沙丘，最大的长500英尺，宽300英尺。其形状大小提示这些可能是被沙覆盖了的宝船船体。这一位置恰好处在我预计可能找到那些被飓风吹到岸边平底船船体的地方。另一个沙丘是津克博士在滑道附近的海边找到的。作为中国的战船，从技术上说，遗存的平底船仍是中国政府的财产。我自己同巴

哈马政府着手解决所发掘物品所有权的有关问题。一旦漫长的谈判结束，那么就可以允许考古学家发掘沙丘。这其中可能会找到有关周闻船队的详细信息。有些船说不定装载着珍宝。这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是无价之宝的发现：每条平底船可以运载2000吨货物。就是明初的一只盘子最近的拍卖价就达89500英镑（12）。

我得出结论：认为4艘平底船恰好沉没在北比米尼岛附近，另外5条废弃在东比米尼岛。其余的修好后，重新起航。这些遇险船上载有数千名海员和侍妾，而比米尼岛能养活的人可能不超过100人。尽管大部分人转移到得救的船上，但很难想象都能在船上找到安身之地，并被运送至中国。这样，有一部分人必须留在比米尼岛上。另外一部分人只得安置在岸边，这里可以给渴求生还的人们提供较好条件。当周闻缩编的船队继续航行时，船队上层甲板上挤满了从遗弃平底船移来的船员和乘客，其余的许多人只好听天由命，如同70年后哥伦布船队的海员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哥伦布的一些船和海员留在拉丁美洲“西班牙”（Hispaniola）岛。一旦比米尼岛上储备的食物用尽，那么被遗弃的中国人只得涉海到最大的岛——古巴，比米尼岛南180海里，或到佛罗里达。要是他们想办法这样做的话，那么当哥伦布到美洲时，中国人的后裔应该还活着。

1494年夏，哥伦布第二次航海时，他把船停泊于附近有大片椰林的古巴海岸，从那里得到淡水和木材。

当下船的海员砍木材、装淡水时，有一位弓箭手进入到森林里寻找猎物，不久返回来，讲述了一个使人困惑且可怕的经历……他迎面遇到一支30多全副武装的印地安人……3个白人和当地人在一起。

穿着至膝战袍的白人立即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其中的一位白人朝这位猎人走来，并开始同他说话（13）。

而后，这位猎人就逃了。哥伦布听到他的叙述，派了另一支人员搜寻那些人，但没有找到。“穿着至膝战袍”的白人就是墨西哥尤卡坦和澳大利亚“安亨地”（Arnhem Land）的当地人对登上其海岸的陌生人的描述。哥伦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就是蒙古（Mangon，中国）人，由此认为他已到达亚洲海岸（14）。

孤立地看，那些记载穿着白衣服，向哥伦布的船员打招呼的人可能听听而已，但一位探险家接着一位探险家一次又一次转述着同一个故事。我根据已经出版的海图一直在寻找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陆地以前中国人的足迹，并力图构拟之。在南美洲，西班牙使节唐·路易斯·阿里耶

斯（Don Luis Aries）重述故事说，在16世纪，有一些穿着白色纺织袍，浅色皮肤的人，他们越过太平洋到达今天的智利。蒙克拉罗（Monclaro）神父是一位耶稣会士，他同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1569年到达过东非。他描述道帕泰（Pate）的居民自称是中国遇难船上的海员的后裔。这一点可以通过长颈鹿（即麒麟，是给明成祖朱棣的贡品）的故事得到补证。印度海员报道说一支中国探险队根据南十字星座到达南极洲。在南澳大利亚，一个“红木”失事船的旁边有一个叫“杨格里”（Yangery）的部落，其族人称有“黄色人”生活于他们中间。在北澳大利亚“阿包里津人”（Aborigines，土著人）说一群肤色美丽的人居住在澳大利亚“安亨地”，男人穿着长袍，妇女穿着裤子。毛利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Bougainville）报道说1769年在太平洋见到过中国人。如果说所有这些传说都是臆想的，或是虚构的，那显然让人难以相信。

当然，比米尼之路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议。有些人提出了各种奇异的想法和理论。我的提法应当是最新近的。我完全赞同要跳出想象的圈子，要依据可靠的证据。只有当巴哈马政府允许考古工作者发掘海边的沙丘，我们才能验证我先前的提法是否正确。虽然很有挫折感，但我也只得放下宁静的沙丘，离开比米尼岛，跟随着周闻将军。因为他已经集结他幸存的船队，向北航行。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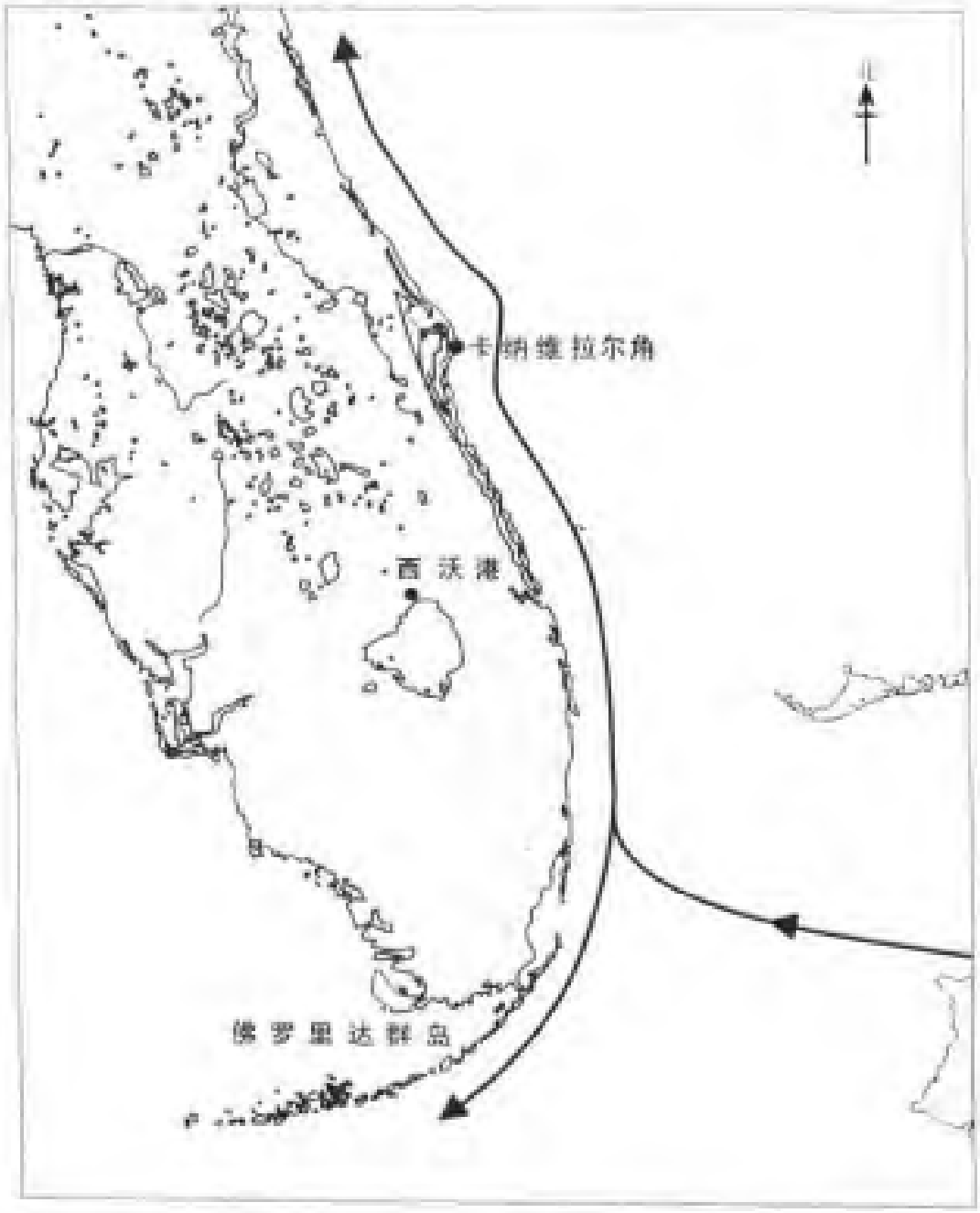
周闻将军得马上解决船只的破损和毁坏问题，因为又有4只船下沉了。尽管周闻的船只有一些仍可以航行，有一些大米仍可以得救，但他必须给那些因船只失事而留在比米尼岛上的海员和侍妾做出必要的安排。有几千海员和几百侍妾留在了那儿，他们需要吃住，而补给却严重短缺。很多阿拉伯、非洲和印度等国的统治者是由侍妾伺候的。当船队离开印度洋时，不少侍妾已经怀孕，有的已经生了孩子。解决幸存船只一直拥挤不堪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海边建立居民点，这样至少有些海员、侍妾和孩子可以有机会生存下来。若是以后有船只来的话，还有可能把他们接回去。

如果在北美洲确有中国人的居民点，那么应该是有证可寻的。但是和以前一样，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他们定居的位置。标在坎提诺地图上的佛罗里达海岸，制图员把佛罗里达群岛（Florida Keys）、休厄尔港（Port Sewall）、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和萨凡纳（Savannah）河口绘制出来。我对卡纳维拉尔角比较熟悉。因为我在英国战舰“决心”号（HMS *Resolution*）上是一位作战指挥员。1968年2月，我们在那里发射了英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式导弹。此枚导弹溅落在2800英里外的南美洲沿岸的水面上。其落地与浮标仅差15英尺——弹头落到水面，激起的浪花使读数仪表暂时无法看清。当我们的潜艇在佛罗里达浮出水面时，发现海蛇已在潜水艇的指挥塔上安了家，它们是被潜艇的热量吸引来的。此海角本是荒凉之地，以海牛和传说生育美人鱼的海怪哺乳动物而闻名。卡纳维拉尔角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零星分布着失事船只。其中的一些比较早，而且身份不明。加之，在强大海流的冲击下，船骨破损极为严重，很难辨认。不管怎么说，要想办法立即处理这些问题。

坎提诺地图突然终止在波因特泰比（Point Tybee）的萨凡纳河口。这说明平底船曾到达过此地，然后，离开这里向东北而去。准确地说，此方向

① 本节地名主要依据《21世纪世界地名录》，主编 萧德荣 周定国 现代出版社，2001年。本节人名主要依据《世界姓名翻译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译者

周闻前往佛罗里达东岸之行。



正是季风和加勒比湾暖流流动的方向。它可以把平底船送到北卡罗来纳的哈特勒斯（Hatteras）海角。海湾的暖流离开哈特勒斯海角分成两支。其中的一支向东北流到大西洋北部的亚述尔群岛。这些岛屿出现在《疆理图》，绘制的时间要比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此岛要早。因而我可以肯定中国人曾经到过这里。西一点的另一支暖流离开哈特勒斯海角向正北流动，然后缓慢地转向东北经过费城。在北纬40°，沿海岸流向长岛（Long Island）、罗德岛（Rhode Island）和科德角（Cape Cod）。

这一海岸同样也分布着不明失事船，其中不少年代较早。有一个重

前往罗德岛之行。

要意义的点需要进行详细调查，因为中国人足迹停留的地方就是北京所在的纬度——北纬39° 53′。航行于这条航线上的平底船可能到达过今天的新泽西州海岸同一纬度（北纬39°）。我所指挥的潜艇曾出现于这一海岸，并可以证实巨大的海流流向东北。风和海流径直把船推到科德角。我开始调查纳拉干西特[1]（Narragansett）湾、巴泽兹（Buzzards）湾和科德角半岛附近地区。我首先要做的是查找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此处海岸的记载。

① Narragansett：旧时美国的罗德岛（Rhode Island）。——译者

著名的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德·韦拉扎诺(Giovanni de Verrazzano，公元 1480～1527年）在1524年曾到达那一海岸，而坎提诺地图已经出版22年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曾雇佣他探寻北美海岸。其目的就是寻找到达太平洋和香料岛——“中国幸福海岸”（The happy shores of Cathay）的海路（1)。韦拉扎诺（Verrazzano）的航海与西班牙派麦哲伦对南美的航行和葡萄牙派探险队对好望角进行的一系列探险差不多是同时。三国竞相找到了到达特尔里尼特和蒂多雷香料岛的最便捷最安全的路线。因为陆路——丝绸之路——到达东方已被切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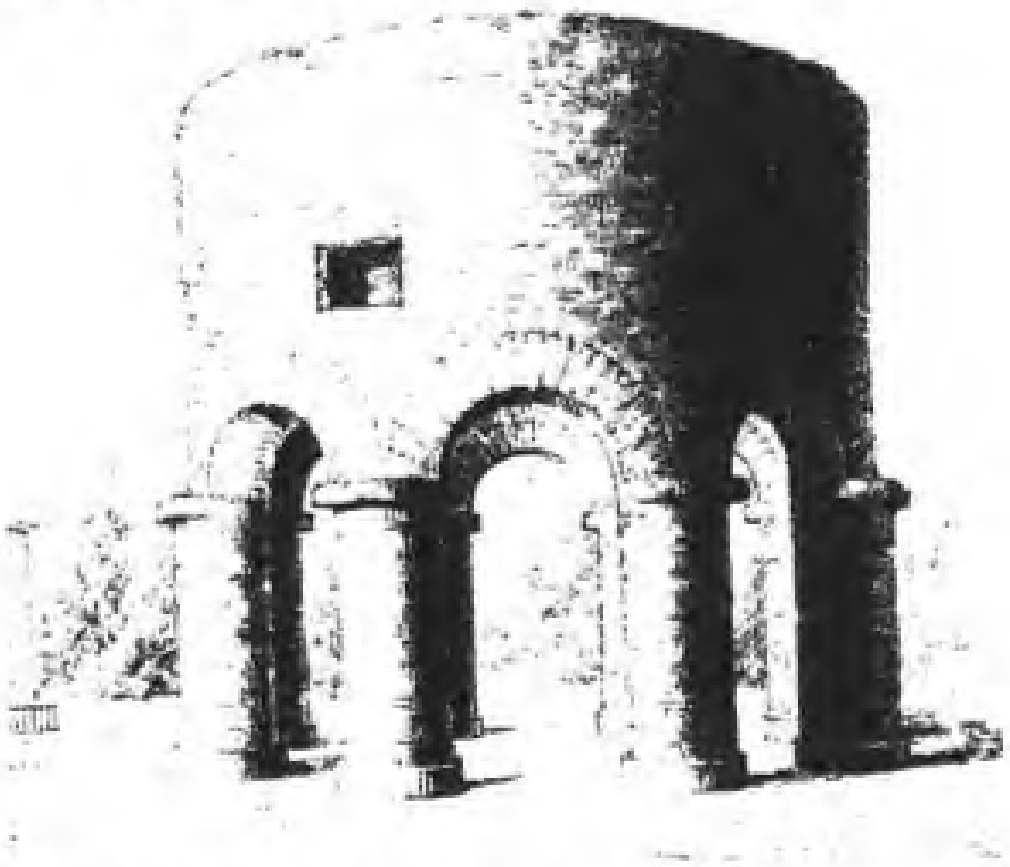
1524年，韦拉扎诺（Verrazzano）带领小船队从弗吉尼亚向北航行到新苏格兰（Nova Scotia）东端的海岸，并描写了他愉快的经历以及他在此地看到的野蛮人。就在和罗马纬度相一致的42° 2′ 分的地方，他进人到一个大湾，和罗德岛沿岸的纳拉干西特一致的。他在那里待了15天。当地人是：

> 古铜色的皮肤，其中的有一些人比较接近白色。其他是黄色的，长相标致，头发又长又黑。这些人乐于修饰打扮自己。他们乌黑的眼珠，炯炯有神，以及有亮丽的面容……
>
> 妇女和顺而美貌，非常动人而可爱，具有姣好而标致的长相。她们和其他妇女一样举止优雅大方，富有教养……（妇女）用各种服饰打扮自己，如同埃及和叙利亚的妇女。年纪大一点的和已婚的妇女身上穿戴好几种装饰品。男人和妇女（珠宝）戴法与东方人一样（2)。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记载。韦拉扎诺把这些铜色皮肤且动作雅致的人与他南行遇到更黑且没有文化的人进行比较。他两次将妇女同东方联系起来，提及其服饰和衣着时，他没有像先前所遇到的人那样穿兽皮和裘皮的记载。尤其重要的是韦拉扎诺没有记述当地妇女与外国人通婚的情况，但他提到北美妇女似乎和东方的妇女有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些人源于不同的文明。这种文明既不是北美洲土著文明也不是欧洲文明。

韦拉扎诺记载暗示年轻姑娘并没有依从其祖母的传统。祖母们带来的传统正在消失。这说明她们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了。这些记述确实和叙利亚或埃及的妇女相符，也如同中国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均穿长袍、

罗德岛的石塔。



戴珠宝，而且梳理乌黑的头发。但埃及、叙利亚海员曾到达过大西洋。不管怎么说，这些地区的妇女不可能远航如此远的地方。这一记录印证了中国侍妾与中东统治者及使臣婚配所生后裔的事实。他们确实是向韦拉扎诺问候的人。

韦拉扎诺离开纳拉干西特湾时的记录，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这个港口的入口的中间有一块来自天然的，适合于建任何城堡或隘口的岩石，为了保持港口的安全，或者是用来祭天……我们将其称为'活的岩石'(La Petra Viva)。"(3) 韦拉扎诺记述的岩石与至今矗立在罗德岛纽波特(Newport)的一处公园里的圆塔上的岩石是一致的。该圆塔位于一个海角上，用于瞭望海港。这个塔本身就是一个谜。游览者疑思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是否由陌生人已建了此塔。使我惊奇的是任何美洲殖民时代的建筑完全不可能处于孤立地位。若是作为制高点又不在要塞，又没有风，因而也不可能是风磨。历史学家们激烈地争论过此塔的始源问题。一派主张这一建筑是16世纪的磨坊；另一派认为是灯塔，约建于14世纪。两派相似的看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比较早的建筑，若不是磨的话，可以改变成面粉储藏室。坚持磨坊观点的历史学家所依据的理由是第一

位罗德岛总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人。他提到了“我用石头建了一个塔”。

20世纪90年代初，以研究古代挪威人于公元1000～1500年之间在北美洲的活动而著称的丹麦委员会对该塔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1992年公布了调查和分析的结果，由此来证明此塔是磨坊的观点。（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约翰尼斯·赫兹（Johannes Hertz）所撰写的报告得出结论说是建筑师阿诺德（Arnold）1667年建造的。但是一位美国建筑学家卡尔森（Suzanne O.Carlson）对此塔进行了小心翼翼的考查，最近她对上述证据提出了挑战（4）。她说她对上述报告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并发现该塔不是阿诺德1667年建造的。同时，她引用了4条特别的证据来支持其论点。

首先，她认为17世纪新英格兰所有殖民建筑都是英式度量单位——码、英尺和英寸——但纽波特（Newport）圆形塔没有一项度量单位采用英式。其次，她声称该塔周围的壕沟仅是17世纪建起来用于稳定早期建筑的。这本是持磨坊观点者的论据。其三，她提出丹麦委员会碳年代测定是根据一项新实验技术测量砂浆中二氧化碳气泡所含碳14量。测定的年代范围在1410～1970年之间，而丹麦委员会却将测定的时间确定为17世纪末期。也即该年代分析应适用于1409年以后的任何时间。最后，该塔是用压碎的贝壳制成特别类型的泥浆建成的，而不是殖民时代建筑者通常用的标准石灰泥浆建的。

以下记述了塔结构的细节，但无法说明其用途：

> “第一层塔用作灯塔，这一层开的较大的窗户和火炉相联。这样从炉火中发出来的光在夜晚可以从南边的窗户中看到。其光就可以给进入纳拉干西特（Narragansett）湾的船只导航。向西开着两英尺高的窗户，从中发出来的炉火光线可以给陶尔希尔（Tower Hill）山脚下所在港口的船只导航。独具匠心的建造者在设计灯塔时……显然具有丰富的经验。”（5）

古代挪威人在10世纪末到17世纪就生活于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上没有木材，因而每年夏季他们航海到文兰（Vinland）——北美——采集木材，每年秋天返回。起初乍看，罗德岛塔狭窄的窗户和圆的拱形看似具有罗马风格。而且我最初的反应就是该塔是由古代挪威人建造的灯塔。要是

可能的话，他们几乎可以深入远至南及纽波特（Newport）。但是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设计灯塔的经验，也不知道在海外修建灯塔。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较接近于宋代（公元960～1279年）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刺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船队。中国船队中的许多船员肯定知道刺桐和那里的灯塔。因为中国宝船队时代，刺桐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港口。马可·波罗将其描述成："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我敢说亚历山大（Alexandia）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者，则有船舶百余。应知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极多。"(6)

刺桐灯塔是纽波特圆塔的两倍，是五层而不是三层。两者的窗户极为相似，中央火炉的设计也相似。像刺桐的灯塔一样，纽波特的塔曾经也是用调匀的泥浆外裹着的。还有其他几项亦极相似。罗德岛塔是以灰色大石头为外表，建在八角形基座上的8根柱子支撑其上形成拱形，同似刺桐的形制。这种石料建筑是由各种形状的石头建成的。这些石头是用强力、持久的泥浆粘和在一起。不论在刺桐还是在纽波特塔的石头在建成了墙以后，再也没有动过。而且依据塔的尺寸说明其使用的度量单位和中国17世纪所有的度量单位是一致的：外直径是2丈40尺，内直径是1丈80尺（1丈=10.167英尺，1尺=32厘米）。

威廉·彭哈络（William Penhallow）教授是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他对圆塔的用途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通过对天文准线进行一番研究，并发现看似随意打开的，且不对称倾斜（张开）的窗户侧墙构成了特别的天文现象，尤其与月蚀和四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太阳的升降有关(7)。实际上这与明朝天文台和观测台的设计是一致的。在任何特定的纬度，根据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来确定精确的时间。并且中国人观看月蚀时有机会观测到天空中的引导星。因此当他们回到北京时就可以确定纽波特圆塔的经度(8)，正如他们在世界各地观测台所做的那样。

这样，该塔具有两个重要的用途。首先，用来确定留下来的中国海员和侍妾所建居民点的具体位置。由此他们可以被随后航海而来的宝船队发现并援救。其次该塔也用来做灯塔，指导营救人员安全地进入到纳拉干西特湾。现在该塔几乎被树木所淹没，但曾经其位于显眼的位置，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地标，从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像刺桐的灯塔一样，该塔也有角度。这样燃烧的火光可以通过一侧窗户向过往的船只警告险情。

而且另一侧窗户也起到导航的作用，引导水手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泊。

若是对纽波特圆塔所使用的泥浆进行一项分析，即可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泥浆中含有显著的区别成分——用来增加硬度的石膏和起到粘合剂的糯米，泥浆也可以确定时间。通过分析长城的泥浆，能确定唐、明时代不同时期所用的糯米和石膏成分，因而就可以知道长城每段所建时间。我曾要求纽波特政府部门允许安排对圆塔做一次分析，但被拒绝了。当然，对他们来说，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这个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物，而不是用它来做实验，但我希望我能劝说他们改变想法。这不仅可以确定泥浆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确定时间，尤其对明初时间更容易确定。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人曾在纽波特登陆过。他们曾到过比米尼岛，后到亚述尔群岛。而且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北美洲以前，有人为绘制地图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从比米尼岛到新英格兰，然后到亚述尔群岛的路线恰好就是一条横帆航海船在信风和海流没有到来以前航行的路线。第一批欧洲人到新英格兰时，记述了文明化的白皮肤或古铜色皮肤的妇女生活于纽波特附近的情况。她们穿着东方式的衣服，头发梳成小髻，如同中国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该塔更有可能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已有数世纪建造灯塔和天文台的经验，而古代挪威人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经验。纽波特圆塔面朝南方，正对着中国人借助信风和海流来的方向。古代挪威人从格陵兰岛向北航行，是逆信风和海流的，这对航海是无用的。

我认为韦拉扎诺在今天罗德岛的纽波特遇到的人只能是中国人。他们是周闻大船队海员和侍妾的后裔。他们知道该塔的经度，下批宝船队的平底船就可以直接航行到纽波特。很自然那些流落到那里的人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来引导援救者安全地进入到港口，以防发生周闻船队那样在加勒比海受到风暴的袭击倾覆的悲剧。周闻船队的几千男人和侍妾可能登上纳拉干西特湾的附近陆地。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有大量的依据还应该留存于纽波特塔附近的乡村。我至少期望找到一些石头，类似于中国人在其他旅途中所立的石头那样。

我开始在网上查寻能否在马萨诸塞找到雕刻的石头。立即搜索到戏剧性的结果，从该塔逆流而上到30英里就有著名的戴顿岩石（Dighton Rock）。这是一种独立式的、易辨别的、呈明显红褐色的岩石，测量的裸面高约5英尺，宽约11英尺。其位于陶顿（Tauton）河岸边，上有凿刻

的痕迹。岩石顶部是一个葡萄牙十字和一头长颈鹿。在这一方面，戴顿岩石与佛得角群岛上的碑铭以及在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附近所发现的石刻有极为相似之处。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证据链条上的另一个链接也有着落了。

对任何一位到陶顿河的探险家停留下来做个标记，戴顿岩石应是合乎情理的。它是该湾最大的岩石，位于今天的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的南边。任何一艘船沿陶顿河航行，可以到达其最北端。佩里·波因特之上，河流狭窄到200英尺以下，深度也降到几英尺。这就是陶顿河游艇俱乐部设在那里，而不是更北的原因。

一位叫丹福思（Mr.Danforth）的当地牧师在1680年首先对该岩石进行了描写。他也叙述了有关这个岩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变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于是，那里有一个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游弋在阿逊奈河(River Asooner，后来被称为陶顿河River Tauton)上，他们同印地安人发生了战争，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9) 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平底船称为"木屋"。诸如其他观察者，像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罗·诺福尔（Pedro Tafur)。后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达·康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见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约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盖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会在吃水线以上。当然要尊重和相信当地土生美洲老人讲的故事：

> "这个纪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仅古老，而且质料也不同于其他碑……有些人猜测碑上的符号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个符号代表没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搁浅的失事船。第二个符号代表一个陆地的角，可能是一个带有半岛的海角，因而是一个海湾。"(10)

这个故事和早几周周闻船队所遇到的可怕经历是一致的。

丹福思（Mr.Danforth）1680年描写过岩石后，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写过6次。当地船员带领游客到那个岩石，他们刮掉海藻探寻象形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形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传述越来越夸大且离奇。这几乎和丹福思的记述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岩石不管记录了什么信息，现已无法辨读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郑重地得出结论认为该岩石是属操非欧洲语言的人雕刻的。这些外国海员是乘着像屋子一样的船

向河的上游航行的，并且用文字记述了失事船。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在其上刻了一个十字。

我下一步查找当地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料。纳拉干西特湾是朝向北大西洋的，并经受着严冬天气。暴风雪侵袭海岸时，居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当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动物都会到内陆寻找庇护所，来躲避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人来说在海湾寻找到一处庇护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顿河就是最佳的选择路线。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内陆的道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驶到该河可通航的最高点，也是合乎逻辑的。其点在戴顿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风雪时，这里可以给抛锚靠岸的船只提供庇护所。

20世纪50年代，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开发房地产开始不久，发现了一大批旧建筑石料。这些房子具有一样的规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浆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于该地的蛇麻草和野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没有人试图阻止房地产开发，也没有人安排进行广泛的发掘（11）。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建造的呢？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因为这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

著名的北美历史学家德拉贝尔（Delabarre）教授（12）认为生活于戴顿岩石附近的“纯血统万潘恼格（Wampannoag）印地安人”和马萨诸塞邻近的部落相比在生理和肤色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推断说葡萄牙探险家米古埃尔·科尔特里尔（Miguel Cortreal）探险到今天的纳拉干西特湾时，其船于1510年失事（13）。他和他的船员就被“万潘恼格”人接纳了，并和该部落通了婚。当然德拉贝尔的提法也可以使用于韦拉扎诺所遇到的铜色皮肤人们的情形。后来看到“万潘恼格”人友好地接纳了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他们在别的地方的经历恰好与此相反：男性清教徒常常被其他部落的人杀死，而妇女和财产被抢掠，人们可以设想“万潘恼格”人早些时候也友好地接待了失事船上的中国人。

我开始寻找更多相关的证据，诸如雕刻的石头等，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我发现了佛得角岩石以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中国人登陆的碑铭，但我在任何一处都不曾找到。令我惊奇的是，我在东马萨诸塞很小的范围发现了至少12个奇异的岩石（14）。这些岩石的大小、位置、表面和位子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刚果（Congo）河岸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以及新西兰鲁阿普基海岸的岩石极其相似。很多岩石在一个角上用圆石支撑着。这与佛得角岩石的式样极为

相似。由此回想到旅游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时有“呈长排堆岩石”的记述，肯定有人把岩石堆成这种奇异的形状。

我决定在东马萨诸塞的一个地图上把岩石标出来，而后立即发现这些岩石要么在南边陶顿河岸和北边的梅里马克（Merrimack）河岸，要么在马萨诸塞湾附近。很有可能这就是拖着巨石航行到达上游的位置。一艘“大屋”航行到陶顿河，另一艘航行到梅里马克河。

在舒茨伯里（Shutesburry）的一个岩石上看似刻着一尊坐式佛像。如果把雕刻的时间确定为哥伦布以前的时代，那么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所到过的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对其日期做出最后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在舒茨伯里以南100多英里北塞勒姆（North Salem），有一个很容易辨认的马的雕像——哥伦布以前的作品。如果是树立岩石的人们使用的马，那么这些马很可能是随同马船一同到来的。因为岩石是在第一批欧洲人定居下来以前的地方发现的，而马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绝迹于北美。眼下大家一致认为巨石可能是人们使用马将其拖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所有结果将公布在www.1421.tv网站上。

可以认为发现于东马萨诸塞的12大岩石和位于佛得角群岛、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与鲁阿普基（Ruapuke）海岸的岩石在位置、大小、形状以及支撑方法上都相似。由此，说明这些都是同时出现的，并且有人认为戴顿岩石上的碑文代表的是失事船上的海员，而不是中国人，但我确信中国船队曾到过加勒比海，而后到了亚述尔群岛。在两次靠岸期间，信风和海流恰好把他们送到发现岩石的地方。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个岩石是中国人立的。韦拉扎诺遇见的妇女就是中国侍妾的后裔。我以为北美的第一批移民不是随哥伦布到达的，也不是随欧洲其他任何开拓者到达的，而是随周闻船队的平底船到达的，登陆时间大约在1421年前后。圣诞节的时候，或许应该将新英格兰更名为新中国。

建立居民点之后，船队又起航了。留在岸边的海员和侍妾凄凄楚楚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他们望着巨大的红帆撑开了，灌满了海风，平底船离开了海岸起航，站在海岸上的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去的船只，直到船消失在海平面上。当他们转身朝陆地走去的时候，他们心中肯定充满着希望：总有一天伟大的宝船队还会返回到他们这里来，带着新的补给，更多的人员，并将留在此地的人们带回到向往已久的祖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为生存而斗争——修建房舍，捕鱼耕地和开拓内陆——他们常常把目光投向大海，搜寻着海面，渴望海上出现滚滚浓烟，预

马萨诸塞州立石的位置图。

示着援救船队的到来。而时间在消逝，希望渐趋渺茫。尽管在老人们的聊天中常常谈及祖国，但后来渐渐成了模糊的传说。再后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他们的后代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祖国也完全被他们遗忘了。依然没有一条中国船返回来把他们接走。

第十四章　北极探险

舰队司令周闻带领着虚弱的船队开始了下一段更加壮阔的航行，却使原本虚弱的船队实力锐减。从残存的中世纪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船队在穿过北大西洋冰冷的水域时被分为了两支：一支朝北继续航行；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按常理能够在一个月内离开新英格兰从西北方向到达亚述尔群岛[1]。亚述尔群岛分布在由西北到东南长达

前往亚述尔和佛得角群岛的航程。

① Azores——亚述尔群岛，位于北大西洋中，属葡萄牙。——译者

600公里的一条链上。从美洲望去中国人目所能及的第一个岛屿便是亚述尔群岛的西北端，这个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科沃（Corvo）岛与北京在同一纬度上。

像佛得角群岛[①]上的圣·安当（Santo Antão）和瓜德鲁普岛[②]一样，科沃岛上盘踞着一座巨大的火山——卡尔德朗（Caldeirão）控制着，它常常为一大片白云所覆盖。数里开外可以看见溪水顺着火山四周淌下，然后蜿蜒数里流入大西洋。该岛只有5里长，放眼望去满目苍翠，像从海上升起的一片至蓝，但生存在这里却很艰难，因为只有在火山山脚和大海之间的南部海岸才有一条狭窄而又贫瘠的土地，大约就是现在首府维拉诺瓦（Vila Nova）所在的位置。所有的房屋杂乱地拥挤在一起，吝啬得好像不愿浪费哪怕一寸珍贵的土地。

在这里我开始寻找灯塔，或者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就像我已经在中国人航行过的路线上沿途找到的一样。如果它存在，它应被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并且应被首次发现该岛的葡萄牙人记载下来。关于葡萄牙人在15世纪30年代到达这里的最早记述是这样的：

> 在被他们叫作拉文（Raven［Corvo］）的岛的山顶上……一尊骑士雕像；他没有戴帽子，是个秃子；左手扶着马，右手指向西方。雕像牢牢地安置在一块从岩石中凿出的石基上，底部刻着我们无法读懂的文字。（1）

这段记录的重要性有几个方面。雕刻马和文字的显然不是欧洲人，骑士不仅不戴帽子而且是个秃子。卫戍秦始皇陵墓的一些俑兵被塑造成光头上戴着一个紧束的“筒袜”，就像一个紧绷的发网。他们看上去也确实光秃。科沃的骑士手指西方，即新英格兰，这个方向想必正是中国人所到达过的。从美洲到达亚述尔群岛对中国帆船而言很容易，但从葡萄牙去却很困难，因为在那儿船会被强大的海风卷至海里。因此尽管亚述尔群岛离葡萄牙很近，葡萄牙人还是在发现加那利群岛（Canaries）和佛得角群岛后很长时间才发现了它们。

我最终断定科沃的骑士确是中国雕像，甚至可能是“马背上的皇帝”

① 佛得角位于塞内加尔之西部，非洲最西端的岬角。——译者

② 瓜德鲁普岛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法属。——译者

朱棣，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岛之前，中韩绘制的《疆理图》上就出现了亚述尔群岛，而阿拉伯的地图上，甚至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尔·伊迪利司（Al Idrisi，公元1099～1166年）和阿本·哈顿（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的地图上都没有发现该岛。如果它不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么谁会在葡萄牙人之前发现该岛，而那些葡萄牙人又是怎样知道遥远中国的制图法的呢？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或许在亚述尔群岛定居过的有力证据来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非欧洲人的尸体被冲到距科沃南边约二十公里的福劳丽丝（Flores）海岸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前就已广为流传了。弗迪纳德·哥伦布指出他的父亲相信这些尸体连同“木雕艺术碎片”证实了中国[①]（Cathay）和西方有联系（2）。

根据早期的地图，当舰队司令周闻的一支船队从亚述尔启程返航时，另一支船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纽芬兰岛（3）大沙洲（Grand Bank）的南部，海湾分流。主流顺时针把船只带向亚述尔群岛并经过加那利群岛到达佛得角群岛。另一股较细的水流——阿尔明格（Irminger）水流把船只载向了东方。对着冰岛南部，转成逆时针，首先向北、继而向西北、然后再向北，把船只带进分开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北部的戴维斯海峡（Davies）里，在那儿变成西格陵兰水流，流经格陵兰西海岸，环绕北海岸又顺东海岸而下成为东格陵兰水流，把船只带回了大西洋。在这条航道上任何船只环航格陵兰岛，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被卷入相反的季风和水流中。

我不得不面临两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想要环航如此荒凉、冰冻的土地呢？即便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现实中又何以轻意地实现呢？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第二个要容易得多。对中国人而言，北极星的象征意义和其现实重要性使得确定北极的准确位置显得异常重要。皇帝有理由命令他们到达“迤北之国”，并探险地球最低的主要部分——正像他们的同伴远在南方定位南极所做的一样。

我发现的第一个有关这一冒险举动的间接证据是两张绘制的海图。第一张是坎提诺海图，这张著名的中世纪地图已经使我对中国航海有很多新的发现。第二张是有着相较争议的文兰地图，其绘制时间在1420～1440年之间，文兰海图上显示的纽芬兰岛、莱布莱德（Labrador）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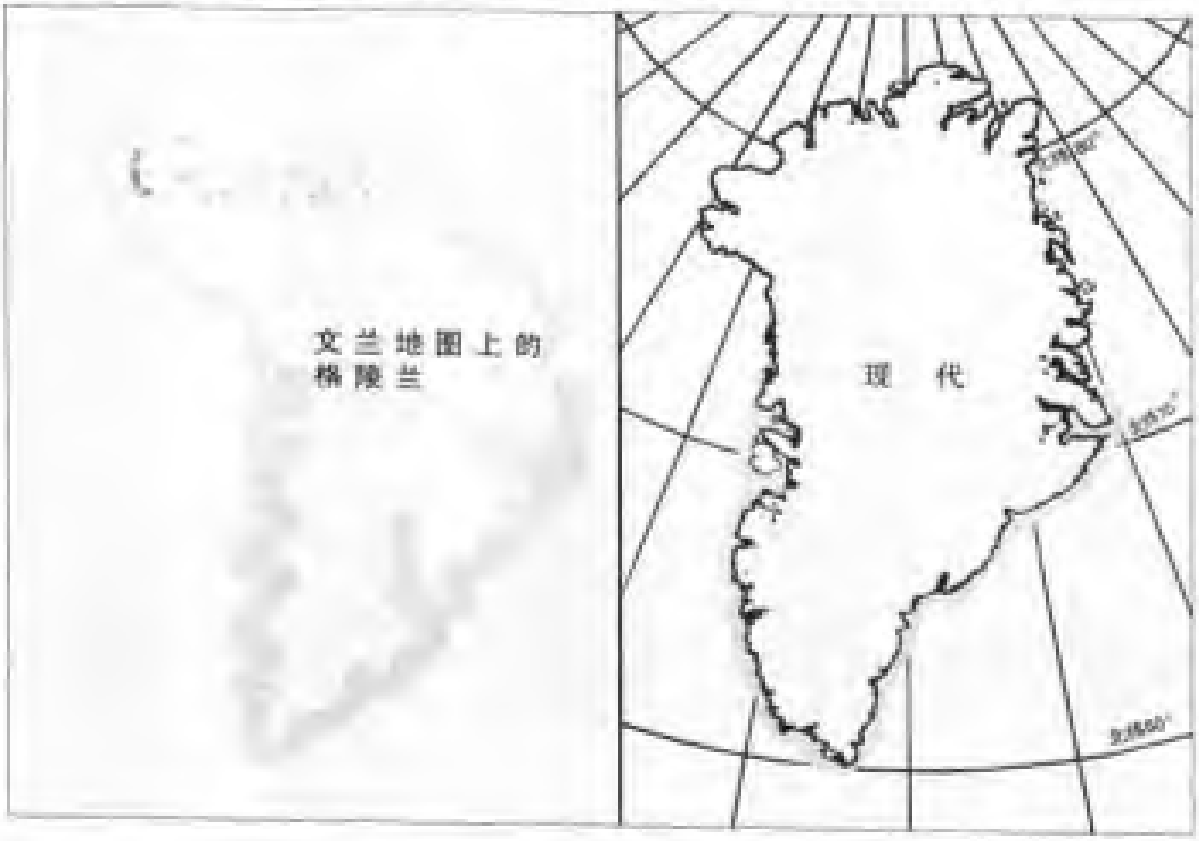
① 古代西方诗歌中对中国的称呼，源自“契丹”。——译者

环绕格陵兰的航程。

个格陵兰岛都非常精确、非常详尽。如果这是据实而绘，那么它就证明有人——或许是中国人——在欧洲人首次探险北极腹地（High Arctic）4个世纪之前就已深入北极至少四百余公里的地方。

利用文兰海图的信息，我明白我将开启潘多拉（Pandora）那富有争议的盒子。海图的可靠性受到很多证据的攻击。其不寻常的出处——1965年从一个地图商人的小菲亚特汽车的后座中首次发现的——引起许

文兰地图中显示的格陵兰，与一幅现代地图相比较。



多专家怀疑的目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制图之精良让人难以置信：格陵兰岛被绘制得如此精确，它只能被认为是现代赝品。麦克科隆（McCrone Association）集团的怀特·麦克科隆（Walter McCrone）——芝加哥公司一位受尊敬的化学分析专家，在1972年宣布该图所用墨水的成分里含有锐钛矿（钛元素的一种，首次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墨水中），这使得地图的绘制日期一时不攻自破。但是在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oll）博士却在中世纪的各种手稿中发现了锐钛矿元素，重又提出文兰地图真实性的问题。

其他对地图可靠性攻击的证据是，最先定居格陵兰岛的诺斯曼人（Norsemen）毫无绘图知识，只是用口头流传代替地图绘制。通过口头描述而绘制的地图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还有人认为格陵兰岛没有被环航过，在文兰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传说中的名字。据猜测是丹麦杰出的制图家科劳迪乌斯·克拉维尤斯（Claudius Clavius）标出了这些名字，人们认为他大约在1424年左右绘制了这幅地图，当然是诺斯曼人告诉过他这些地区在北方的称呼。然而，如果最初的制图者是中国人，克拉维尤

斯将无法翻译标在地图上的地名，这倒能解释他何以觉得有必要琢磨出这些名字，因为当时墨水仍是一个未得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于此的书出版了不少，麦克科隆集团的麦克科隆博士关于该图是赝品的论断，最近受到大英图书馆的R.A.斯凯勒腾（R · A · Skelton）的挑战，他是一位地图收藏者，其权威不亚于麦克科隆。在此支持他的几位博学教授的证据也驳斥了麦克科隆的发现，认为锐钛矿确实在某些中世纪的墨水中存在，尤其是在15世纪早期的阿尔卑斯山的修道院中已发现有使用的痕迹。

声称文兰地图是赝品的人对这些证据极不满意。这也不无道理，这些数据是绘图者制图的基础，而创立这些数据的最初的绘图者，曾在那些中国帆船上待过，这些帆船中至少有一艘在寻求到达北极的航行中曾环航过格陵兰。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回答格陵兰岛是否真被环航过。因为北极海面常年冰封，即使在有核动力装置的破冰船的今天，想环航它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在15世纪早期，那儿的环境与今天的完全不同。

在奥斯陆（Oslo）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有关1408年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Sigrid Bjornsdottir）婚礼的报道，它描绘了与我们所知的格陵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茜格丽特是个寡妇，她的父亲和姊妹都死了，她继承了家族土地，成为格陵兰岛最富有的庄园主。她的第二次婚姻引起了大宗的财产交易，使她在1419年离开格陵兰之前几次削减家畜。她拥有成群的牛羊，放牧在水草丰美的格陵兰牧场，此景根本无法从现在荒凉、冰封的土地上辨认出来。茜格丽特举行过婚礼的教堂（至今）仍在黑峡湾畔荒凉而又壮观地孤立着。我们可以想象她在9月星期天的仪式结束后，匆忙从教堂赶回昏暗、温暖的房子开始婚礼庆典时的情景。

从发掘的她和她的家人、侍从以及仆役所居住过的房屋地板可以看出，大约在1450年小冰期（Ice Age）来临之前，格陵兰岛气候是相当温暖的。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苍蝇的一个变种为此提供了证据，那些生活在暖室内的苍蝇消失了，被能生活在寒冷、没有腐肉的空房中的种类所取代。气候突变的证据从喉管已被割开的牧鹿犬的骸骨上就能看出——或许这是将死的居民最后的一餐。只有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一条宝贵的猎狗才可能像这样被宰杀，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它，一个家庭将无法进行足够的猎捕活动，那么就会很难熬过严冬。

我在乔治·纳莱船长（George Nares，公元1875～1876年）(4) 航行北冰洋的日志中发现了更有力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其船队中的一艘到达北纬83° 20′，正好离格陵兰岛最北端三十余公里。一个军官——洛克伍德（Lockwood）上尉走过这三十余公里抵达最北端，洛克伍德岛也因此而得名。

微型冰期在1450年开始（现在处于结束期）部分原因是由于地轴的移位。根据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武备志》记载的航行方向和星象导航来分析，我能够计算出赤道在当时处在北纬3° 40′ 的位置。因此，浮冰在最大最小的范围随之向北移动3° 40′ 的现象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会发生。有关移动的有力证据从皮里·雷斯图上沿着火地岛南部海岸的冰和让·罗茨的海图上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冰可以看出——它们大约在今天标准线北500公里处。

因此，可以放心地说，格陵兰岛在1421～1422年间是可以环航的，因为无论是极冰的最大限度还是现在它所处的位置，格陵兰岛的气候都要比今天温暖得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它是一个有着绿色牧场的地区。从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复活节后50天）到基督受难日（Cross Sunday，9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牧场上放牧着牛羊，成群的沙鳗鱼在河里自由地游荡，海岸上有众多悠闲的海象在散步。

中国人确实到达过格陵兰岛的另一个证据是来自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写给冰岛斯卡洛特(Skalholt)和豪拉(Holar)主教的一封颇富传奇色彩的信，这封信陈述了他想为格陵兰任命新主教的背景：

> “三十年前，从附近海岸异教徒中来的野蛮人，暴虐无道的用火与剑残酷的袭击了格陵兰岛原住民，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和神圣的建筑，只剩下不到九个教区的教堂幸存下来。可怜的原住民被他们不分性别地带走……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脱困，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5)

当时的教皇认为“野蛮人”是来自附近沿海未开化的异教徒。在其他信中，他把加拿大北部的因纽特（Inuit）部落当成野蛮人，于是附近沿海就被合理的假定为指的是加拿大北部。对一个基督教徒讲话时，教皇区分了异教徒和野蛮人——他们不是一个概念。他不是指诺斯曼人

(Noresmen)——格陵兰是诺斯曼人殖民地——也不能指任何其他基督教入侵者，在教皇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异教徒，但他们不是野蛮人。在那个的时代，从东方侵入欧洲的人被称作是野蛮人，教皇几乎指的就是蒙古人（Mongolian）。教皇不认为北美印地安人（North American）是野蛮人，因为这些人不用“剑”与“火”作战。他们使用弓箭。我认为惟一合理的观点便是这封信中所描述的是从北美出发的中国舰队，或许还携带了大炮。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的家乡赫瓦勒塞（Hvalsey）和格陵兰的主要居民区处于从海上炮击的范围内。他们用巨舰把他们带走又送回。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会以这种不合常理的方式行事是无法解释的，或许是当地人先进攻的。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假定中国人的确到过赫瓦勒塞（Hvalsey）的居民区，那么文兰地图应该显示哪里是他们最精确观测海岸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能够找到定居点、船舶残骸和人工制品等更为直接的证据。彼得·施莱德曼（Peter Schlederman）和法雷·莫瓦特（Farley Mowat)两位知名的作家与探险家，数年不辞辛劳地在北极腹地研究那些坐落在巴赫半岛（Bache Peninsula)上的独特石屋村庄，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发现——巴赫半岛位于卡那盆地（Kane Basin）西海岸上与格陵兰群岛西部遥对的艾黎斯莫勒（Ellesmere）岛上（6)。

巴赫半岛上的移民区非常有意思。半岛大约有25幢房屋和相同数量的灯塔，其中一些房子非常大——差不多150英尺长（45米长)，5米多宽。这些房屋如此之大、结构如此之好，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因纽特人建造的，因为因纽特人没有用石头建筑的传统。它们与众不同的特色完全不似在北极腹地发现的任何建筑。沿屋而建的石造烽火台类似于小型灯塔，这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疏漏”：那就是没有一幢房子有屋顶。格陵兰岛的诺曼底居民几乎一成不变得用草皮做屋顶，但是在巴赫半岛上没有一幢房子有用此做屋顶建筑的痕迹。没有屋顶的确让人很吃惊，这些建筑大到足以容纳3000人，但头上没有屋顶，他们就要靠运气来度过每一个北极夜晚。这些建筑的残墙今天还能见到，在房子的外面，排列着一排排的炉床，总共142个，每一个都用石墙同邻家分开。这些多重安排的户外炉床又是独一无二的，在加拿大北部史前时代遗址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建筑。

要揭开这些离奇建筑的神秘面纱，当地的地理环境是我的第一线索。艾黎斯莫勒岛居民区建在一个靠近大冰间湖(Polynya)的沙洲上——

条狭长的宽阔水域，这是通往北极的所有路上都能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从在这里的冰下航行的潜艇可以断定，冰间湖无论夏季还是冬季都无冰，至于是什么原因，尚未完全清楚。但是因为它们永不冰冻，所以不仅对于探寻新鲜空气的潜水员，而且作为呼吸孔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都格外具有吸引力。在那里，哺乳动物也可以寻找它们的猎物，与巴赫半岛相离的冰间湖尤其盛产鱼类，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海象。在中世纪海象对他们而言是极具价值的肉食来源，它们有名贵的象牙，它们的皮可以炼成脂肪油用于加热、照明，也可通过蒸馏制成油松用来使船身更坚固。对极地巴赫半岛的居民们来说，他们住在高纬度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猎捕海象。这可由附近发现的各种精巧制品作证，例如用象牙制作的鱼钩。

艾黎斯莫勒岛还有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铜。附近德文岛(Devon)(7)上最近发现了古代开采和使用铜的证明；当然，中国人在找矿、开采、冶炼金属方面相当熟练。格陵兰岛上还发现了产自罗德岛（Rhode Island）新港（Newport）的煤，它们肯定是被人携带过来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还有疑问，为什么中国人乘着恢宏的船队不怕麻烦到此建筑石屋，为什么不把锚抛在冰间湖去猎捕海象或者勘探铜矿？但是如果巨大舰队中的船有一艘或一些被冰撞击而被迫靠岸的话，他们当时应该发现自己在一片生长着成千上万吨柚木的土地上，并且临近富产鱼类，如果他们能够抵抗住寒冷的话，就能靠这些生存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许会做几个世纪后萨克莱顿(Shackleton）人所做的事：用当地的材料——石头建造石屋，并用船板做屋顶。据我计算，将有一个重3000吨的中国帆船被作为巴赫半岛定居点上25幢房屋的屋顶。

接下来谈谈石砌的炉床。如果它们是用来做饭的，那么应该放在屋内：砌在外面，必定是为工业用途而建。总计142座炉床坐落在屋外，这一众多的数目更证明了它们是有着工业用途的。一个解释是这些炉床是用来熔炼油脂的，并兼作油松用来密封这些用木板做的屋顶，及提供冬天取暖、照明用的油脂。它们还可用来煮盐或化雪以取得淡水。但是这么多炉床并不都是为了上述目的。我确信中国人还用它们炼铜。

部分中国船队在这个居民区停留了一段时间，但至少有一支船必定去环航了格陵兰岛。因为在文兰地图上出现了格陵兰岛的北部和东部海岸、西南和东南的海岸用正确的纬度非常准确地画了下来，但是西北海岸在从

约克角（Cape York）穿过卡耐（Kane）盆地到皮特曼峡湾（Petermann Fjord），再到派利（Peary）领地这一地区有一个相当显著的凸起。为弄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我研究了这个地区现在的冰图（8），并推断出文兰图上显示的突角实际上是（Mylius Erichsen）领地和（Kronprins）基督教领地上巨大冰河的冰伸入海洋形成的。把冰河的模型放在格陵兰岛现在的地图上，恰好与文兰地图上不相称的那一部分吻合。

除了这个错误，海岸线画得很好。再言之，它是惊人的绘图杰作。渐增的证据——中国人到过加勒比海（Caribbean），水流和季风把他们带到了格陵兰岛周围，教皇的信和石村——暗示着中国人试图到达北极，但是到了格陵兰岛仅剩下七百多公里时他们失败了……或者他们做到了？很多精致的手工制品——企鹅、北极熊、海豹、海象，豪华的工艺品发现于极地甚至格陵兰岛的更北部，距离北极250英里。他们是杰出的艺术家所设计的，难道是因纽特人制造的或者它们是更久远的文明的艺术？

从格陵兰岛启程后，水流和季风就把中国船队推向了冰岛（Iceland）。这一点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证实中得知是行得通的："1477年2月，我越过梯勒岛（Tile Island，冰岛）航行了一百里格（大约850公里），它的南部在北纬73°……当我在那里时，海水并未封冻，但有很大的潮汐，一天两次（9），起伏大到17公尺（braccia，约50英尺）。"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女王大学（Queen University）的迈克·白利（Mike Baillie）教授，一位世界性的树轮年代专家，通过对树轮的分析来确定日期，他的研究表明1477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温暖年，因此哥伦布的表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像这样的一次航行将会把他带到格陵兰岛海岸。当时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接着请列位注意。

哥伦布在教皇皮攸斯二世（Pope Pius II）所写的《任大事经》（*History of Remarka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my Time*）一书的页边上亲笔总结了他的航行，他写道："有人从东方的中国到达到这里（冰岛）的（10）。"

现在我从教皇和哥伦布那里得到了零散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到达了格陵兰岛和冰岛，另外还有1424年的文兰地图所提供的文献证据，地图上格陵兰南部海岸线令人吃惊的精确。此外，伟大的中国明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教授说那里分散地存在着超过20处的有关中国人的记录，这些表明了他们的确到过北极（11）。

当绕过格陵兰岛的北角时，中国人离北极的南端正好是180英里，因

为1422年它所处的位置，是取决于北极星所处的纬度90°（自《武备志》），在今天正好位于其位置的南部。要到达极地，中国人只需向北再航行180英里——不到两天的航程。难道北冰洋海水在这180英里中没有冰冻吗？一份北冰洋7月的水流（2000年）温度表表明格陵兰岛北角外一条相当紊乱的舌状水流——或许是海湾流水的支流最后微弱的残留吧——向北伸展越过北角直到北极。关于中国人的断言完全可能是真的，即他们确实比欧洲人早5个世纪到达北极。乘着潜艇，顺着一系列的冰间湖在北极附近巡弋，我惊奇于中国人的成就。他们在庆祝宴上吃掉了最后一批狗，喝光了瓶中剩余的米酒，最后返航中国。

从北部这一高纬度地区开始的返航路线又解开了另一个谜，1507年出版的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展现了从西边的白海（White Sea）到东边的楚克其半岛（Chukchi）和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这一段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海岸。整个海岸有河流、岛屿，明确可辨。如果不是中国人，谁会观测这么大的海岸线？除非中国人到过这里，否则如何能绘出这张海图，如何能展示出继之3个世纪也没有被欧洲官方发现的土地？而且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首次考察也在两个世纪之后，而首张俄罗斯地图直到19世纪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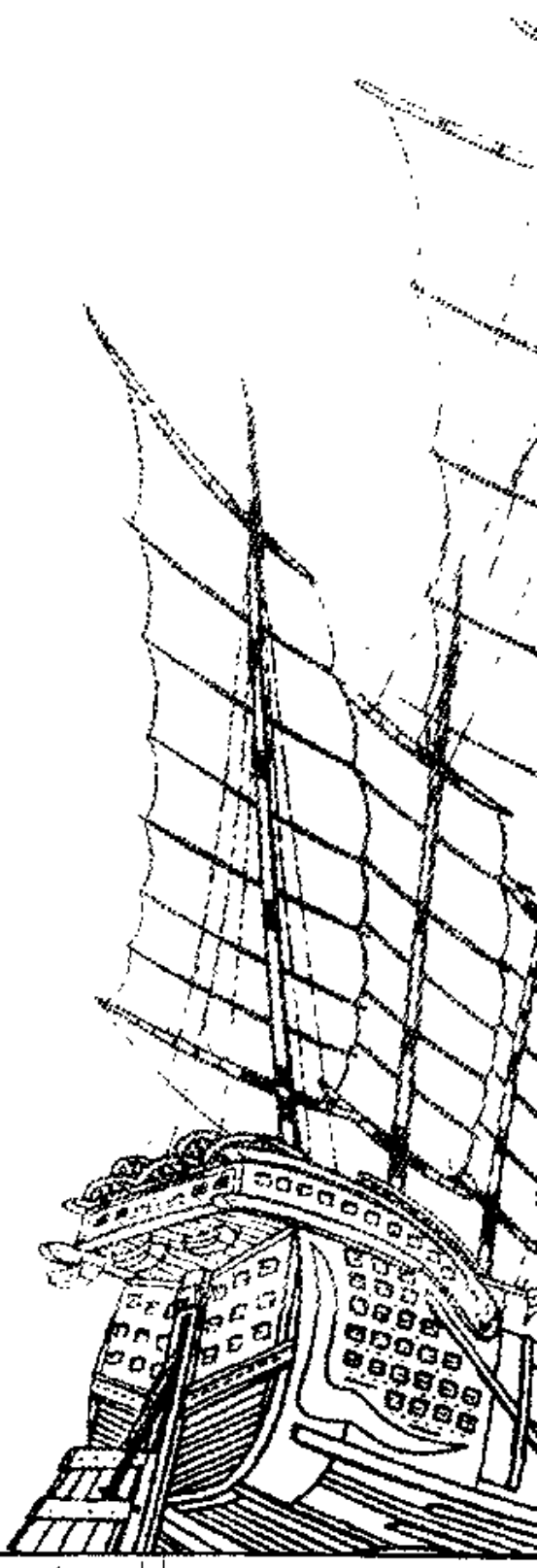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当周闻舰队穿过白令海峡开辟回国的路线时观测的。如前所述，《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中有哥萨克（Cossack）的舞蹈和爱斯基摩人（Eskimos）狩猎特色画图。爱斯基摩人可能是阿留申群岛（Aleutian）上的土人，他们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是哥萨克的画像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在15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中国人到过莫斯科（Muscovy）的记录，那么要是没有到过北极，他们又是如何画出地图的呢？

此时中国海军将领周闻，也已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航海发现。这至少等同或者超过洪保和周满的辉煌航行。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那令人神往的年代，杨庆领导着另一个巨大的船队，开始了新的航程。我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他可能没有其他人航行得远，同其他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上，但是他在航行中的成就同其他伟大的海军将领的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中国发现世界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第六编 杨庆的远航



第十五章　揭开谜底

当他的同伴已经在确定老人星座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进入北极圈，环绕地球发现新的土地和大洲时，大太监杨庆的船队在休整前已离开北京一个月了，航程始终在印度洋水域，要说同印度洋的国家进行贸易，没有人比中国海员更熟悉了，尤其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是中国重要的财富来源。而且不单同香料群岛、东南亚国家、印度、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也和东非漫长海岸线上的港口、国家进行贸易。

到了15世纪早期，沿海的阿拉伯港口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出口黄金、象牙和犀角。东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经常搭乘郑和的宝船去紫禁城。当船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出海远航时，许多人随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辉煌航海的最后，沿途有更多的人一起搭乘两支疲惫的返航舰队又到了中国：杨庆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带着东非和印度沿海十七国的公使横渡印度洋回国；洪保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公元1422年10月）带回了古里的使节回国。皇帝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印度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湖泊。

由于大多数中国记录已被毁，我也同样在到处寻找杨庆的船队往返印度洋路线的证据。我还是在常用的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找到了证据所在，我相信它是根据1421～1423年中国人航海的信息而绘制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评论有关地图（1428年的世界地图）时说“它叙述了东印度的一切航行，包括东印度导航和好望角往返导航（参见第四章）”（1）。在当时，“东印度”即印度、印度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份前所未有的声名告诉大家包括好望角、印度洋与东方早在15世纪就被绘在地图上了。此外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7年5月指示人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已经有一份显示好望角的地图的证据，来自于1487年5月探险家佩鲁·达·科维尼亚（Pero de Covilha，约1450～1520年）去探查通往印度的海路的一级命令，也可以获知，早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就已经得到好望角地图的进一步证据：

他建议他去求证是否可以越过好望角航海到印度……当时国王送走了两名值得信任的会说阿拉伯语的经历丰富的人，即骑士出身的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和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未来〕国王曼奴埃尔（Dom Manuel）给他们一张摘自世界地图（1428年海图）的海图（Carta de Marear）……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怎样出发去寻找盛产香料的国家美洛居。(2)

值得回味的是，1487年5月诺望二世发布这些指示时，迪亚斯还没有“发现”好望角。

到了1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几百年的航行经验，自唐代（公元 618～90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探访非洲。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前有过5次航海经历的马欢和费信写过编年史，在《武备志》中也有详细的航海标向，还列举了到达东非的过程，而且许多中世纪旅行家也记录了有关从东非海岸一直到索法拉南部的商业区中丰富的明代初期青花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贸易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

当我在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服役时，我沿着从肯尼亚(Kenya)到南非长达几千里的东非海岸旅行过。1958年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破坏，沿岸散布着古老阿拉伯的遗迹、葡萄牙奴隶城和偶尔发出霉味的英国俱乐部，代表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点回忆。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枪支是在非洲狩猎的必要装备，而不是照相机。所以当决定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口猎捕鳄鱼时，我们租来了船上的摩托艇，带了几支来复枪和一箱朗姆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到达了光滑如镜的河口，这一幕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儿没有鳄鱼，但是有大量丑陋的长鼻大耳的河马在泥水里游动。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时机！但我们很快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河马的后部非常坚硬（连子弹都会反弹回来），第二河马不喜欢被当成靶子，有一只河马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看到船被撞翻，飞到半空，掠过头顶时，推进器急速旋转，呼呼作响。我们与河马都停了下来，虽然有点擦伤，但没有大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发现我的兴趣更多在这一带敏感的路上探险古阿拉伯和葡萄牙的沿海贸易奴隶市镇。

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东非时，他们发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在现在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3）的国王和王后们穿戴中国丝绸并住在有中国瓷器装饰的石殿里。更多反映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证据是来自拉木（Lamu）群岛或者巴准（Bajun）岛，离现在的肯尼亚北海岸旁的桑给巴尔岛东北500里远。巴准的首府派特（Pate）是郑和舰队的主要活动之地，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巴准人”（Bajuni），肌肤柔和，容貌姣好。一位耶稣会士的牧师蒙克拉鲁（Father Monclaro），在1549年写道：

> 他们生产出非常华美的丝绸，葡萄牙人在它们尚未占领的其他摩尔人（Moorish）[①]的城市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它们只在派特生产，然后从这里运往别处（4）。

派特的工匠也善于制作一种漆器，中世纪非洲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编织篮子的技术同中国南部的一样。

意大利人类学家希格诺·N·普科尼（Signor N·Puccioni），在1935年组队去非洲的朱巴河探险，他断定派特（Pate）巴准人完全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肤色相当明亮，略呈橄榄色，你可发现男人们长髯飘飘，妇女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扎成两条辫子（5）。岛上有一个氏族瓦山伽（Washanga）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船只失事后流落到岛上的中国水手。他们的传说还涉及了当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麻林地把两头长颈鹿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6）的故事。这件事确实发生在1416年，即永乐十四年。

15世纪以来派特变化不大，很多古老的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岛上开始出没嬉皮士。这些人是伊斯兰教徒，男人们穿着白色长袍称为“罕祖斯”（Khanzus），戴着“科菲亚”（Kofia）帽子，女人们则把自己隐藏在布依·布依（Bui Bui）黑色披肩帽里。独桅帆船往来于海岸，它们的设计几个世纪不变——一面三桅帆加上足以在多岩石的海岸靠岸的宽大坚实的船身。他们大都把椰子系在船两边，在他们的船头画上木质的“眼”。拉木（Lamu）群岛的船头垂直，非常独特，单桅帆船的速度相当快并能逆风行驶。因为他们带着发臭的鱼饵，所以在未看见他们之

① 此为比利牛斯半岛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译者

前，就能预知帆船的到来。我过去常常让潜艇浮出水面沿途装载飞鱼，这给海军标准的饮食带来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

在派特岛的东边有阿拉伯人的祖先进行贸易的桑伽（Shanga）小镇遗迹，据猜测是因上海而得名。今天，这个城镇几乎已经荒废，仅留下单桅帆船。两个世纪以前，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公元960～1280年）到明代早期（公元1368～1430年）的陶瓷工艺，同时还有作为祭品掩埋的宋狮小雕像。甚至巴准人这个名字，或许也有中国的根源：*Bjun*是中国长袍的方言发音。东非沿海的土著居民都穿着丝袍，长长的丝绸袍子一定相当迷人且出众，足以誉称当地居民。

中国人早已航行过这些水域，他们肯定在船只和科学知识两方面具有足够能力在印度洋进行准确的考察。

他们能够精确计算时间，描绘出星辰的移动过程，并在两半球确定精确的纬度，但是他们也能确定经度吗？东非在坎提诺地图上与现代地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水湾、海湾和河流的纬度都是正确的，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红海海口的吉布提（Djibouti），长达7000海里。更令人惊奇的是坎提诺图的经度精确到度以内——仅仅30秒的误差，制图者是如何取得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中国人和经度计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我们所能说的是早在1502年坎提诺海图传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能对经度进行精确计算了。

不靠时钟而发现经度的历史很长。关键是标记全球都能同时看到的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观察日蚀及其消逝的时间。公元一世纪，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中记载了希帕科斯（Hipparchos，约公元前190～公元前120年）提出这种方法，并给出公元前330年应用的例子。然而希帕科斯没有解释当地时间是如何发现的，这是因为在月蚀中（7）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下。直到1415年两个因逃避奥托曼人（Ottoman）威胁的拜占庭人（Byzantium）带着托勒密的《地理学》到威尼斯时，可能很少有欧洲人知道希帕科斯的方法。但阿拉伯人却毫无疑问曾知道希帕科斯的理论。

中国人建立的天文台和保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他们通过太阳阴影的长度来计算时间。最著名的天文台，7个世纪前就建成的周公塔仍然屹立在洛阳东南80公里的地方。它是一个有楼梯从地面通到8公尺见方的平台的小型金字塔。平台中心有一个小建筑——一个用来观察当地最高的星

在南尼圣洛海发现的青铜狮像。

量直杆和漏壶、水时计[1]。圭表——20公尺长的金属测量杆——被安放在延伸到两个平衡波谷间的塔北40公尺的石床上。石头铺得很平坦，犹如平静的水面。中国人通过圭表投到石头上的阴影长度来测量子午线。在赤道上的春秋分，太阳如期东升西落。正午（阳光）垂直照下根本没有投影，最长的投影出现在日出、日落时，这两点之间的阴影长度决定了那个特殊地区的精确时间。

让我们重回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2年），这时中国人已意识到太阳投影长度的变化不仅与白天的时间有关，而且与一年中的每一天以及观察点的纬度有关。用一个更小标准的8尺的圭表，他们在从现在越南（Vietnam）到北京北纬度上的几个不同地区同时测量夏至、冬至时太阳投影的长度。"每千里影长差三点五六寸"，这就允许他们在一个特殊时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然而，一年中每天阴影的长度都在变化。在一次不寻常的测量中，他

① 用时的计时器。——译者

们计算出在（太阳）夏至投影的长度为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冬至为七丈六尺七寸四分整。通过对以上描述的两个试验推断，中国人可以得出一年中每一天的正确值和地球表面的不同纬度。此外，通过中午投影的长度他们可以确立这一天在一年中的位置。而当时，无论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除了使用沙漏外都没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当然不能得出任何一天的日期或粗略的时间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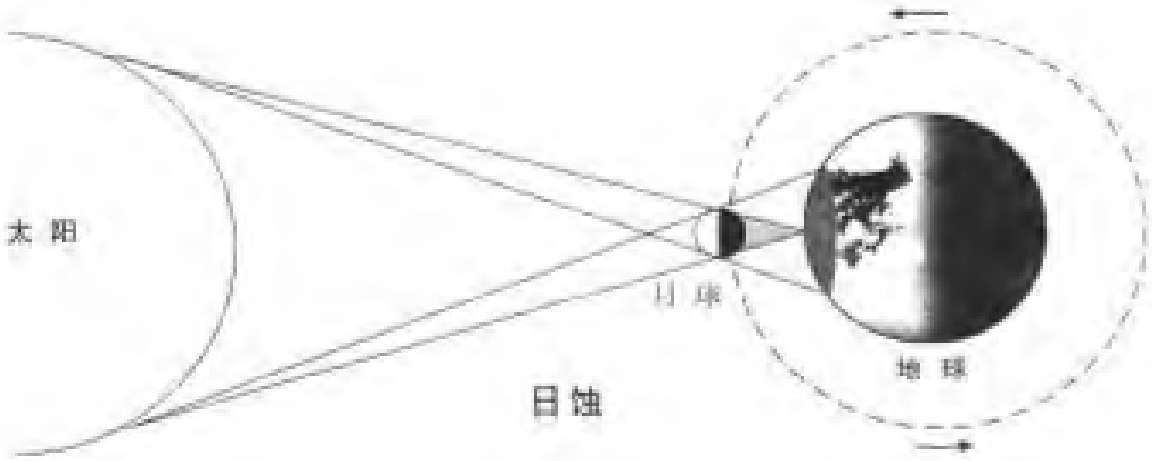
第三个调整是必须纠正地球无规律的环绕太阳运转，此乃起因于地球的偏心率，以及赤道与黄道（天体范围的大运动代表一年中太阳经过天空的明显路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绝对时间与相对时间的不同，2月时会差到正14分30秒，11月时会差到负16分30秒。中国人如此精确的计算来自“1277～1280年间对它们的高度精确的有价值的观察，并且证明黄道倾斜度的减小和过去、现在（8）的地球赤道的反常性是无可争辩的”。用门外汉的话说，在过去7个世纪里地球绕太阳的轨迹是变化的。

中国人先是在南京仿造周公塔，迁都以后，又在北京仿造。郑和的船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建造相似的观测塔。每一座都装置了设备用来放大太阳的阴影并观测其长度，识别天上的星辰，决定太阳和月球在发生日蚀现象中的准确位置，并观测北极星（9）。在罗德岛上的石塔（见第十三章）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每一个观测平台因而拥有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所有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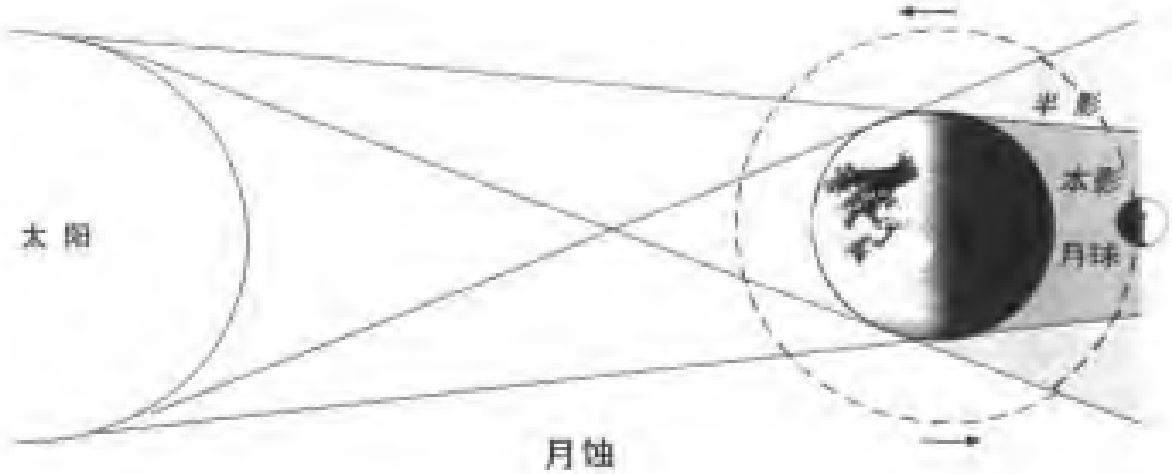
中国人早就知道圭表越高，所测的投影就越长，计算的时间也就越精确。但当其变长后，阴影也就变得更模糊更稀薄了。在明代早期，中国人通过在观测台的房顶上开小洞的办法，发明了“投影摄像”，结果出现了一条狭长的阴影，当阴影穿过放大型的玻璃时，清晰度加强。这条长阴影通过测量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

中国人这种杰出的精确计量时间的方法说明通过他们计算月距的长度——两次新月之间的间歇长度——他们估计为29.530591天（10）。这个数字产生的误差为每月少于一秒。使用这些方法计算时间仅仅是太阳在地平线上时才能取得，天黑之后则用漏壶、水时计，不用圭表仍能按照白天同样的标准来测定（11）。通过他们的圭表和水钟，得出时间的流程，一天天、一分分、一秒秒，白天和黑夜，他们也能预测世界不一定什么地方，每半年就会发生一次月全蚀。

当太阳、月亮、地球彼此在同一条直线上，当月球的轨迹与地球绕太阳的轨迹相同时就会发生日蚀、月蚀。在日蚀中，月球的阴影通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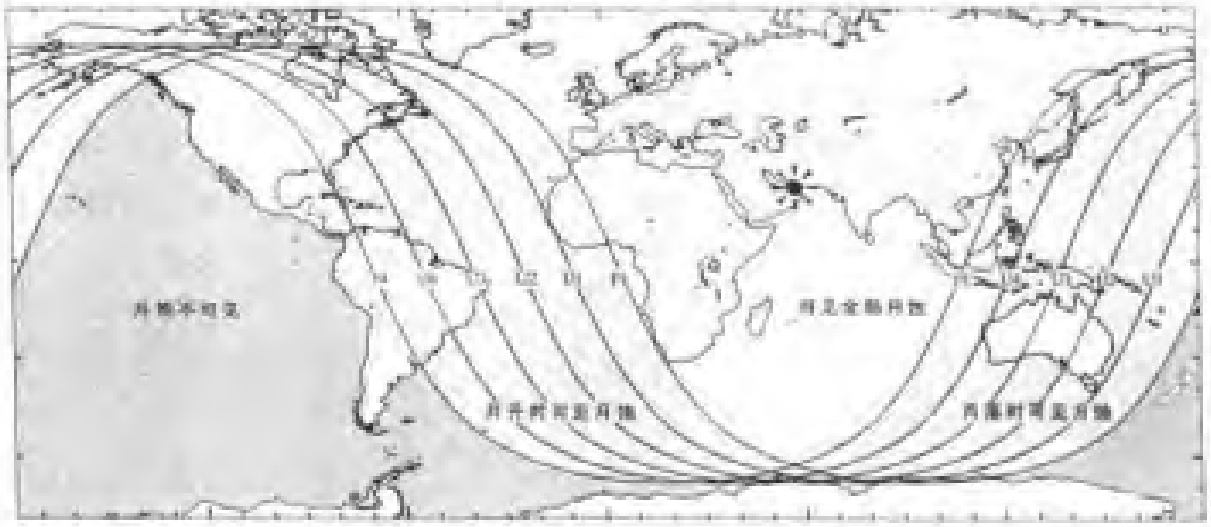
日蚀



月蚀

球的一小部分遮住了太阳，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夜晚。黑点、本影，就像月球绕地球循环一样穿过地球。地球本身自转。观察者在不同的地点看日蚀的时间不相同。在月蚀中，地球在太阳、月球之间，因为地球比月球大，它的阴影也就遮住了月球。天文观测的最大不同在于观察者穿过半个地球能在同时发现这一现象；而日蚀任何时间只能在地球上非常小的范围内发生。精确计算月蚀的能力和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同时看到这一现象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尝试发现计算经度方法的关键步骤。

用月蚀来决定经度的关键是：首先，同时看清半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其次，当月蚀发生时，地球自转使星辰出现并在天空中移动。在一次月蚀中有四次引人注目的事件：U_1 —— 首次接触，当月球进入本影阴影时；U_2 —— 二次接触，当月球刚好完全进入本影并被全部遮住时；U_3 —— 三次接触，当月球首次开始出现时；U_4 —— 第四步，当月球刚



好完全出现时，中国人关注 U_3 并把它作为计算的依据。

当登上一片未知区域后，中国的航海者和天文学家开始指导观测月蚀，等待直到第三次（U_3）现象出现时，接着测定什么星在夜晚刚好通过本地子午线，本地子午线是虚构的经线，从地平线开始直指向观测台的北方，穿过它的上空，消失在它南方的地平线上。当第三次月蚀现象被发现时，已知的星辰穿过那条线对新区的观测者而言是关键的，因为这些观测的数据要带回北京。

天文学家返航以后，他和他的队友们在北京比较所得的数据，利用他们的时间保持设备，通过圭表计算，他们计算出在月蚀发生时星辰经过观测新区与同一时刻北京的天文学家观测此星之间的时间差。地球在24小时自转360°，如果在两次运行之间消逝的时间为6小时，那么地球自转的时刻为1/4。在北京和新区经度的不同将是整个环绕地球经度的1/4 —— 90°，360°的1/4。通过计算4次月蚀现象 U_1、U_2、U_3、U_4的每一次时间差并求得平均值能够减少误差。环绕地球在不同的地区观测同一现象，并确定这次现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中国人接着对比他们的结果。通过测定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的不同，如在不同地区观察，他们当时便能够随之推算出经度的不同。

琼·欧利佛（John Oliver）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天文学教授，通过观测2000年7月16日至17日月蚀来证明这一理论。他成立了观测小组，穿过太平洋从塔希提岛到达靠近马六甲的新加坡，选择同一地点作为中国人的观测平台（附录四）。用这种方法产生的平均经度差是极小的：塔希提岛为1.1°，新西兰（New Zealand）为0.1°，墨尔本

(Melbourne) 为0.1°，新加坡为0°。这是让人吃惊的暗示。在欧利佛教授的试验中，在新加坡与新西兰之间有10公里的经度误差，在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之间则无。总体来看，经度距离超过13000公里即1/3的地球表面计算出来的最大的误差在任何地方都差不多超过150公里。欧利佛教授的观测者都是业余的，通过更多的训练或经历，误差会大大减小。在同一地点使用他们的观测平台，中国人所测定的经度正好与欧利佛教授的队伍同样精确，甚至更好。这个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与纬度的计算不同，六分仪和时钟是不需要的。

精确测出临近新加坡的马六甲的经度，例如，中国船队可能当时用满剌加作为基地重复在印度洋周围其他基地上使用观测平台和圭表的过程苏门答腊(Sumatra)、安达曼海(Andamans)、斯里兰卡(Dondra Head)、柯枝以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东非的麻林地 (Malindi)、和桑给巴尔岛，塞舌尔、马尔代夫，所有的都在《武备志》中出现过。如果能供应充足的大船队调度，那么穿过整个印度洋的经度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月蚀的基础上。人员应该被派往不同的区域迅速取得月蚀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晚上完成。然后他们回到基地对比测量结果。

可以想象这支大船队的船只被分遣横跨印度洋去采取数据，太监长官是如何急切的希望在最好的时间到达。毫无疑问，水手们对以美貌性感出名的当地妇女更感兴趣，她们张开双臂欢迎远道而来的水手们。正如马可·波罗所记述的：他们皮肤黝黑，不管男女都赤裸着上身，他们不以肉体上的放纵为罪恶。他们的婚俗是一个男人可以同他的堂姐妹或者父亲兄弟的遗孀结婚。这些风俗在整个印度洋地区普遍存在 (12)。但是，所有船员都不得不抑制他们的欲望，直到船队的生意做完或月蚀测量工作结束。中国人测量的结果可以在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上看得到，东非海岸被描述得如此精确是在仆从导航的援助下绘制成的。惟有中国人能够在欧洲人发明时钟的两个世纪前，知道怎样从迷幻的极地中分辨出南极。早4个世纪绘制出如此伟大的地图，如果不是中国人所为，难道还有更早的不为人知的葡萄牙人的航海记录吗?

葡萄牙人没有计算经度的精确方法。在坎提诺绘出地图39年后的1541年，一个葡萄牙人试图通过将它放到西部1500英里远的地方的日蚀测量中推断出墨西哥城的经度，但坎提诺能在绵延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将精度准确地保持在30英里以内，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利用日蚀，中国人利用月蚀。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船只来通过三角学测定经度。

在坎提诺地图绘制前已经有3次在印度洋的探险船队回到葡萄牙。达·伽马在1498~1499年到访过索法拉、基卢瓦（Kilwa）和蒙巴萨（Mombasa），在麻林地（Malindi），他雇了一名阿拉伯领航员带他到古里，因此他不可能绘出麻林地的北部海岸。佩德罗·阿勒瓦雷斯·卡伯拉勒的第二次探险开始于1499年，于1501年6月返回。在航行之初，他的船队被一次可怕的暴风雨袭击，损失了4艘船。一艘由迪埃格·迪亚斯（Diego Dias）带领沿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东海岸航行，从那里到木骨都束）。他的船只严重受创，失去了很多船员。在回航时，迪亚斯面海而立，他能够绘出的仅仅是东非海岸即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cu）和柏培拉（Berbera——索马里西北部港市）之间的部分。他的破船队摇摇晃晃从索法拉（Sofala）到了基卢瓦，再到马兰迪。

所以这三支回到里斯本的船队在坎提诺（Cantino）地图绘制之前，没有一艘有足够长的时间在东非海岸做如此精确的制图观测，也没有一艘能够绘出全部海岸线。此外，坎提诺包括了大约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要有40艘船至少花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观测，这在当时远远超过葡萄牙的资源承受能力。事实上葡萄牙人花了60年的时间观测非洲西海岸。指望几艘破船于1502年前在印度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测出整个非洲东岸，画出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和6个主要的群岛，那么与指望测量者只用测量棒、马匹和车子去绘出一块大陆一样不切实际。

排除葡萄牙人以后，我想知道阿拉伯航海家是否是最初的绘图者。我对于富有而致力于地图收集的尤素夫·卡麦勒王子的藏品做了一个详尽的搜检，这是大英博物馆地图博物馆内的复制品，但是在整个纪念收集品中没有发现非洲东部海岸详细的阿拉伯海图。最好的阿拉伯中世纪地图，像阿尔·伊迪利司，在细节和准确性方面不能与1502年的坎提诺相比。虽然阿拉伯人知道怎样利用月蚀来计算经度，但他们从未掌握怎样用必要的精确来计算时间，那是中国人的成就，因此，阿拉伯人不可能绘制出坎提诺或者瓦尔德塞米勒地图。

杨庆海军将领的航行要比其他中国海军将领短得多，但却与洪保、周满、周闻的使命同样至关重要。杨庆的成就与其他海军将领的成就如双塔并立，因为航海后，他的船员获得了更好的测量经度的方法，这要比约翰·哈里森的精确计时的发明早上三个多世纪。

西方世界在这些杰出的世界地图的起源问题上总是保持沉默，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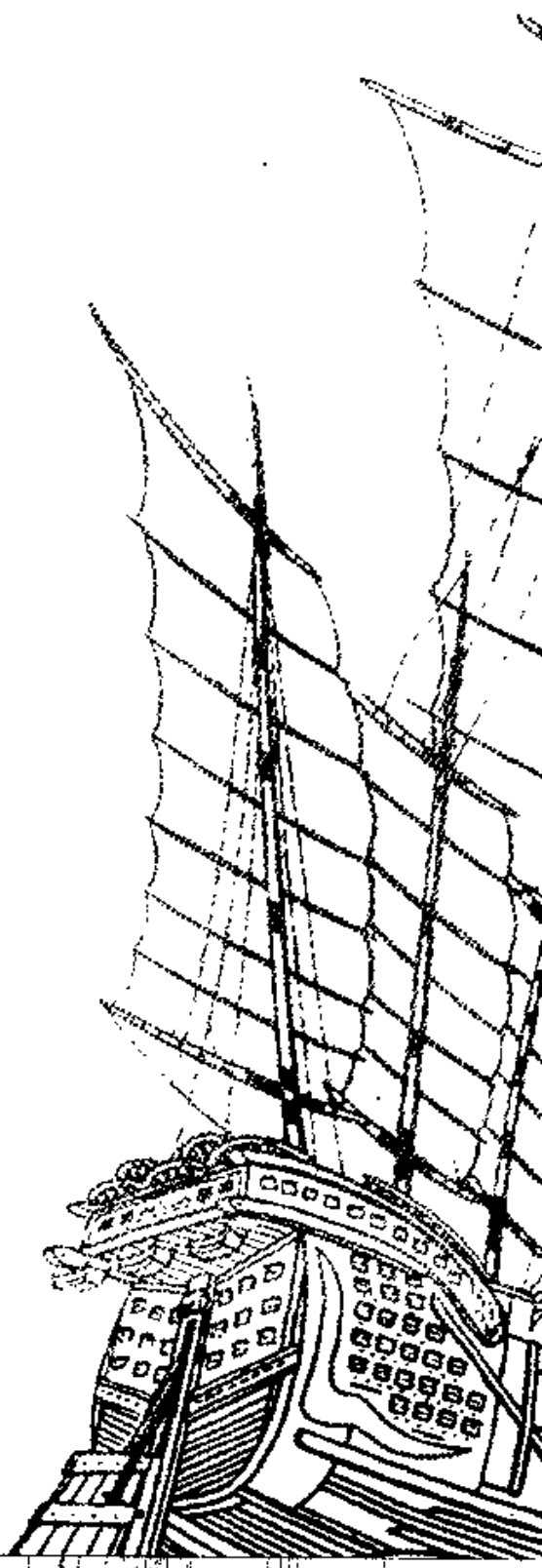
纬度、经度都很精确，正如郑和为他的航海伟绩树碑纪念的碑文上所言："现在航海的结果便是可以在远距离的陆地间计算出航海的距离和过程"，这又是中国船队的另一座丰碑，就像一座燃烧的灯塔照亮了全球的编年史。相反，同美洲大陆、澳洲大陆、南极、北极的发现一样，它也被扼杀和遗忘了，欧洲人要承认荣誉应该归于伟大的中国海军将领和他们的船队。葡萄牙人领导整个欧洲掀起了探险和殖民的浪潮。在这么多国家里，他们是中国人辛苦追寻新天地与新海洋最大的受益者。

THEY F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第七编

葡萄牙人夺得桂冠



第十六章　地球的尽头

永乐十九年五月（公元1421年6月），当中国船队绕过好望角，朝北驶往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之际，远在大西洋的一艘轻快小帆船——葡萄牙的航行船只——在无人居住的马德拉（Madeira）岛上满是树丛的海湾里下锚。欧洲扩张与殖民的大浪潮席卷整个寰宇，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总之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与命运以最不起眼的方式开始改变了。葡萄牙人主动迈出了这小心翼翼的第一步，但是3年之内中国伟大的发现与航海图的讯息展现出那些广大瀚海，已悄悄地传到葡萄牙，而葡萄牙人已不再是航向陌生地。

1421年的那个6月天，葡萄牙的探险家若昂·贡萨尔维斯·萨尔可（João Gon Çalves Zarco）与其家人一定以为他们抵达了天堂。似万花筒的各类鱼群围绕这艘轻快帆船——黑箭鱼、蓝色金枪鱼、金条纹鲹鱼、红鲷和灰鲱鱼——对这片大自然慷慨的赠礼而言，海狮是萨尔可的惟一竞争者。清澈的溪流坠入泻湖，到处是小龙虾和蜗牛。空气充满茉莉花香味与从不知害怕人的鸟的鸣叫声。在兰花、杜鹃花、秋海棠、豆科树木的鲜艳之外，就是一排排从马德拉海岸延伸至好几里的茴香点缀着丛丛的西蕃莲。(1)

同样的圣·卢济亚（Ribeira de Santa Luzia）与桑·若昂（Ribeira de São João）河仍然注入大西洋，但是茂盛的绿色茴香田之地，如今已是马德拉首府丰沙尔（Funchal）的安静街道。马德拉发现者的雕像俯视着萨尔可大道，而由萨尔可妻子所矗立的圣卡塔利那（St Catarina）教堂位于以萨尔可命名的另一条街上，教堂旁侧即是促成探险队成行的航海家亨利王子的雕像。

马德拉岛的殖民始于1421年6月的这一天，此为欧洲探险历史的枢纽时刻。萨尔可是效命于亨利王子的骑士，意外发现了马德拉岛。1418年12月萨尔可（Zarco）与另一位效忠于亨利王子的葡萄牙骑士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Tristão Vaz Teixeira）受命考察葡萄牙以南三千多公里直至几内亚的非洲海岸，但是他们的船只偏离航线顺风吹到马德拉

岛东北60公里处的圣安唐(Porta Santo)，(2) 岛上满是鸣叫的海鸟与海狮。有一天夕阳西下之际，萨尔可在日落方向的地平线上侦查到一个点。一周后开始航行，以葡萄牙之王亨利王子与基督修道会之名，正式占领这片新的土地，且命名这座山峦起伏、茂密林木山林之岛为“马德拉岛”(Ilha da Madeira) 即“茂林之岛”。当萨尔可瓦斯和他们的同伴接到加官进爵的消息时，马上就兼程赶回葡萄牙受赏，而萨尔可被册封骑士且获得“狼窠伯爵”(Count of Cãmara de Lobos) 的封号。

亨利王子热切地赞同萨尔可殖民岛屿的计划，并资助另两个探险队，提供船只与货物。这座岛屿分为两部分，瓦斯管理北半部，萨尔可管理南半部。萨尔可另一个同伴巴尔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洛 (Bartolomeu Perestrello) 则被派往邻近圣港的岛上建立一个殖民地。但是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因为佩雷斯特雷洛的孩子有一只母兔子宠物，而在航向圣港岛途中产下一窝小兔，当殖民者定居此岛后，因无天然的食肉动物，兔子增长很快且无法控制数量，因而此岛很快地就沦为一个沙漠了。

相反的，马德拉岛的殖民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并清晰地展示出海外探险的厚利。亨利王子率先从克里特岛引进了葡萄与甘蔗，它们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中生长茂盛。产自葡萄园的著名马德拉葡萄酒出口到整个欧洲，而蔗糖生产亦显现出相同的巨大利润。企图心旺盛的商人争先恐后地群集到亨利王子的官廷，希望下一次有这样的好事，他们也能分一杯羹。葡萄牙的探险家启航踏上越来越危险的旅程，成为欧洲国家宰制世界500年领土扩张的先驱。

亨利王子是葡萄牙约翰一世 (King John I) 与皇后菲利帕 (Philippa，英国高特·琼〔Jone of Gaunt〕之女) 的第三个儿子。在英国协助之下，约翰于1383年起义，以一个效忠于他本人的新地主贵族议会 (House of Avis) 取代了旧葡萄牙贵族。约翰是一个谨慎且实事求是的国王，与英国谈判一个防御性的协议并与卡斯帝尔 (Castile) 达成艰难的停战协定。存在卡斯帝尔王国与阿拉贡王国的现有的合约使得整个半岛处于和平状态。约翰的外交政策一样也很审慎，他为了不要激怒卡斯帝尔王国，刻意避免介入该国在海外的势力范围。

这是整个半岛基督教信仰盛行的时代。6个世纪之后，摩尔人最终被逐出阿尔加维 (Algarve)，亦即他们在葡萄牙的最后堡垒。葡萄牙的国王圣裘奥一世 (Sancho I) 于1189年入侵阿尔加维，到1249年占领了全部地区，这样曾是尊贵的阿拉伯哥多巴哈里发的极西行省已落入皇家之手，

而使得首都由科英布拉（Coimbra）南移至里斯本。随着“光复”的完成，葡萄牙的军人就像他们的对手在阿拉贡的人一样，除了海已无路可行。

约翰国王与菲利帕皇后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他们却拥有欧洲最具文明的宫廷之一，也是学者与无视宗教者的中心。按理说，中国在科学、技术乃至文化上都领先欧洲数年。然而15世纪的葡萄牙已经开始兴盛，并快速地成长为探险与发现航行的最重要的欧洲中心。这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代，并且这对年轻的父母使亨利王子获得了良好的教育。1415年，亨利王子刚过20岁，即受命率葡萄牙军队攻击位于非洲北岸且鸟瞰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重要的阿拉伯港口修达（Ceu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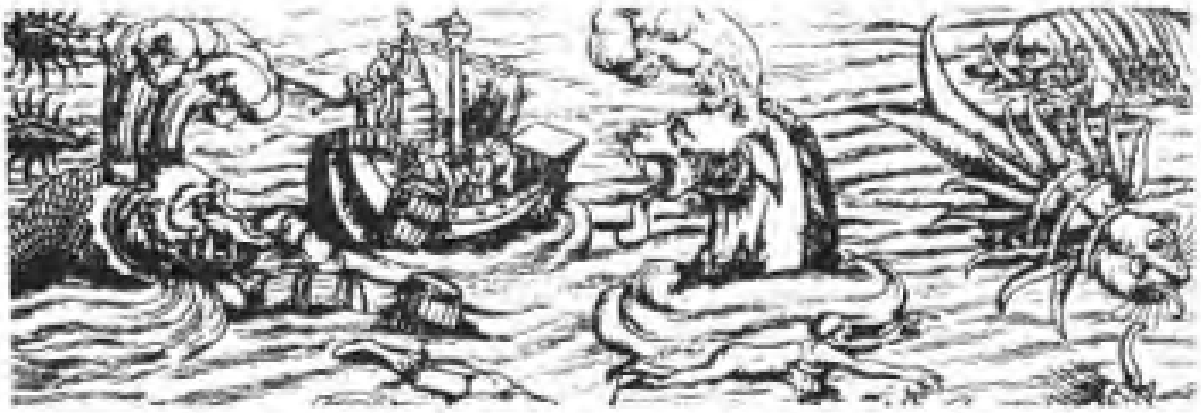
当菲利帕皇后身患重病时，计划仍在顺利地进行，她在弥留之际，交予亨利一把剑，并说：“亨利，我把这剑给你，它宛如你一般地强壮。我把所有的伯爵、骑士、乡绅与那些高贵血统者托付给你。”（3）她仍坚持亨利继续攻打修达，而非守候在她床边。

在过去数世纪，摩尔人用来自塞内加尔至阿拉伯的军队三次进攻西班牙，而伊斯兰的统治者仍旧控制着一个广大的帝国。对于大胆果决的亨利王子而言，攻击伊斯兰心脏地带是一项巨大的冒险，而欧洲人首次攻打非洲是早在800年之前的查士丁尼国王（Emperor Justinian）。亨利的军队来自欧洲各地，基督教徒的力量凝聚在一个新的十字军王子的旗帜之下。在攻击修达之前且用各种诈术来掩盖真正的计划，甚至向荷兰人宣战以分散误导摩尔人。当对修达的突袭开始时，亨利巧妙地指挥他的军队，使战役很快地结束。

占领修达是欧洲人在摩尔人土地上的首次胜利，具有提振精神与士气的重大意义。一个通讯兵迅速将胜利的消息通报给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西格门（Sigismund）与欧洲的王室们。由于亨利的胜利，欧洲各地请他挂帅的邀请如雪片飞来。教皇要他率领教皇军队、英国亨利五世领导十字军对抗异教徒——他拒绝所有的邀请，而选择作为他父亲在修达的代表，他以夺取该城的黄金贸易财富为基础，于此着手建构一个葡萄牙帝国。

地中海世界为了黄金而疯狂。阿拉伯骆驼商队横渡撒哈拉沙漠，从马利（Mali）至马拉喀什（Marrakesh），经费兹（Fez）与麦肯斯（Mekens）——荣耀的、极其繁荣之都市——抵达修达。占领修达给予亨利的军队在非洲土地上的一个安全的港口，从截获金银船运中获取利润，以及纵兵攻略摩洛哥城的财富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掠取阿拉伯人的钱财，使他们的商路更顺畅。

插图：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的《宇宙志》（Cosmographia）中的海怪，1546年。



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富有在很多方面得益于阿拉伯，且他们精于利用远方国度所提供的贸易机会。他们将叙利亚的工程师带到葡萄牙去灌溉阿尔加维的农田并改进稻米耕种，还开发阿连特茹（Alentejo）的玉米田，并引进了棉花和甘蔗。“波斯”地毯则在贝拉（Bera）与卡利纳（Calena）编织，中国制纸术亦移植到札帝瓦（Jativa），而于哥多巴制造的“摩洛哥”的皮革和织品，此处拥有13000名皮革工匠与织工。伊斯兰的船只将制成物从葡萄牙的塔古斯（Tagus）河口带到开罗和北非。

攻击修达之际，葡萄牙仍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度，满是迷信。到处可以看到描写海外广大的财富，等待着探险的特别挑战，以及伺机攻击他们的奇异民族与凶猛怪兽的书。至印度的途中，有个“很热的海，就像火上滚开的水，而且全是绿色；在那片海上有比鳄鱼还巨大的海蛇，有翅膀可飞行，非常凶恶，所有的人都因害怕而逃跑……因为（海蛇）生长于滚热的海中，火烧不了它，那片海有个漩涡，没有人敢去探险”。(4)印度是一个“有着各种野兽的国度，蓝色的龙、蛇与其他猎食各种东西的觅食动物。那里有许多大象，都是白色，有些动物是蓝色或是其他颜色，多得数不清。另有许多独角兽、狮子与可怕的野兽。”(5)在那些遥远的国度，头在人的胸膛中间，眼睛在肩膀上，“他们身上有两个小洞，都是圆形，来替代眼睛，而他们的嘴巴是平的而且无双唇”，女人把蛇藏在阴道中，“蛇咬着丈夫们的阴茎”。(6)夺取修达之际，亨利王子与其臣子才有机会了解事出有因的真相。在他居于此城的4年里，亨利对于非洲眩目的阳光、沙漠风吹时，空气中风沙的刺痛、以及酷热且尘土满布的街道、丁香的温和味、明澈的沙漠之夜已是熟稔于心了。

修达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吸引各种人种光临，而且是一个精致的

伊斯兰学府之家。阿拉伯人尊崇学术并且仔细地典藏希腊、罗马巨作，包括托勒密的地理作品。他们并不赞同那些关于地理的神秘与迷信，他们的贸易从大西洋做到了太平洋长达几个世纪。1315年，阿拉伯的地理学家阿尔巴洛威（Al Barouwi）画出从大西洋到桑给巴尔的北非与东非的地图，而1327年另一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阿尔迪明斯奎(Al Dimisqui)已经描绘有着正常人群的东方真实世界，并可经由自然海洋的海路航行到达。虽然阿拉伯人并未绘制出正确的非洲或是印度洋的地图，但是当哈马·阿拉穆斯塔法·戈萨密（Hama Allah Moustawfi Qazami）以托勒密的工作为基础绘出世界的地图（mappa mundi）之际，阿拉伯人早在1340年即已确实知道非洲、印度、中国和远东的相对位置。1342年阿拉伯人描绘至印度的海路，并于1391年制作出亚洲的百科全书，仔细描述主要乡镇、城市与清真寺。

得知阿拉伯人已经与已知世界贸易达数世纪之久，想必对亨利王子来说是一个一生的转折点，而他也仅能依循阿拉伯单桅帆船的航迹去发现那些相同的异国之地。如果他能够建立一个海洋舰队，整个世界就会在他脚下，要这么做，他必须先返回葡萄牙。1419年圣诞节之际，他选择葡萄牙西南的萨格里什（Sagres）为他永远的基地，于此航海家亨利王子在此建立了碉堡、教堂、医院与海事学校，这些为他带来名声并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里斯本海事博物馆内的一幅画，绘制着亨利的萨格里什朝廷，满是加泰罗尼亚船长、犹太海图绘制者、阿拉伯天文学家、葡萄牙骑士、武装者、制帆者、修士、造船工、外科医生、水手与朝廷家仆，他们在一起居住、祷告与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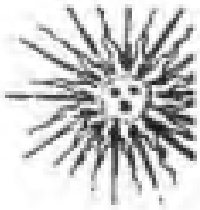
在有些海洋里水手是经由海洋的味道而知晓自己的位置。纽芬兰大浅滩是一例，马六甲海峡是另一个例子，但是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在温暖的夏夜，一股来自萨格里什松树的味道。这个香味使我常忆起东方的航行，因为萨格里什之后航道即转向东南方向的地中海以及更遥远的大陆。即便是今日，萨格里什还是令人心悸，矗立于大西洋200英尺之上，突出于海上，瞭望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过往船只不过模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下面则是一望无际的隆隆大海浪拍打着悬崖，而沉闷波涛拍岸的隆隆声是海鸟嚎叫的持续配乐。冬、春时节，悬崖被雨水冲刷，而其他多数时候都是蒙上浪花与海雾。陆上没有花，只有密密的灌木丛。辟自悬崖的石头组成一个巨大的灰墙守卫着人口，穿过一个黑色橡树门，即可瞥见一排的朴素房子与简朴的圣卡萨林(St Catherine)教堂。

一艘葡萄牙轻快帆船驶离大三角帆。

对于葡萄牙人而言，萨格里什是世界的尽头，就是“天涯海角”。(7)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将岬角作为基地是颇具灵感的选择。每年到冬天与春天，盛行的西北风吸收着大西洋大量水气，并倾泻在希耶拉蒙其奎(Sierra Monchique)的山区，除了炎热干燥的夏季之热——比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更南——这个地区以亚热带为特色。骑马的话一天即可来到茂盛青翠森林的山脚，尽是点缀在湿热中茁壮的软木、橡树、白色杏仁、夹竹桃、木槿、百合、天竺葵。深色松树林间的柑橘丛和柠檬树果实累累。卷心菜种植在枣椰树下面，而石楠灌木间是种植在格子棚架上的葡萄。大陆架的边缘离萨格里什仅数英里，这里再过去，就是通往3000公尺深海的陡峭海床。此海域拥有大量的鱼，圣文森特附近发现有上百种鱼种。小型船队捕获大量的鲔鱼、鲣鱼、沙丁鱼等用来晒干或腌制。峭壁是渔夫的屏障，小型的海港可以在这里安全地抵御季节性的北方暴风雨。

此处地处阿尔加维(Algarve)西南，航海家亨利已经为船队提供，

一位欧洲人确定纬度，取自1563年佩德罗·德·迈地纳(Pedro de Medina)的航海规章(*Regimiento de Navigacion*)。



ORIZONTE

准备且建造每一样必需物——无限量地供应建造船架的软松木、做板条用的脂松、制造龙骨和船舵的橡木、做塞子用的胶、制衣服的羊毛和皮革、做床铺与篓子的竹子与芦苇。提供足够两个月的航行——腌制鱼、米、麦、橄榄、柑橘、椰枣、柠檬与杏仁——充裕的供应。水手也需要酒，就像亨利的时代一样，他们用佩瑞奎塔(Periquita)葡萄酿成的质地纯正的葡萄酒，具水果风味且强烈的阿连特茹酒，发酵于厚重红土铸造的大型陶瓮内。

当亨利抵达萨格里什之际，加泰罗尼亚齿（Catalan cogs）——小型货船——正在形成良好的海洋航行船队，但是它们仍是方形的船帆。根据他在修达的经验，亨利知道朝向东方地中海的阿拉伯单桅帆船，多是航行在轻且风向多变的风中，且能迎风而行。方形船桅的船只，总是航行在风之前，通常并无舵。阿拉伯的单桅帆船具有舵，且阿拉伯人改良三角帆航行，因此两个人可以以一组简单的滑轮组提升三角帆，即可控制帆布的大区域。亨利把一个船尾舵加入他的新航行帆船的设计中，即加泰罗尼亚齿与阿拉伯单桅帆船混合的轻快航船——这个设计现在仍然存在——但是亨利所有的改进，并未超出他对阿拉伯三角帆的聪明的改造。后来的轻快帆船在后桅纵帆和主船桅处有三角帆，而方形的帆是在船首桅处，在航行中

可以转换成方形桅或是三角桅。水手可以从葡萄牙向南航行，在盛行风之前用方形桅，之后转换为三角桅向北驶入盛行风中。虽然比起中国帆船还要小些，但是轻快帆船却较为灵活与机动。

亨利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他的船长们能够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测量他们的位置。确定新发现的正确位置，并根据已知的纬度选择正确的航线找到回家的路，这些反过来要依靠罗盘。阿拉伯人在与他们经常交换航海知识的中国人处获此装置之后，已使用罗盘数世纪。然而，中国的航海、天文知识以及计算经纬度的方法，在永乐十九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伟大的宝船航行的最后达到完美，并维持独一。其他者，连阿拉伯人，尤其是欧洲人，在很久以后仍旧挣扎于他们的航迹年代与经度世纪。

亨利是一个专注的数学家，1460年后期，刚好在亨利逝世之后，他的天文学家在阿拉伯人的协助下，已经解决纬度问题。阿拉伯人亦具有古老文明，且是专注的数学爱好者。他们在亨利时比欧洲人受到更多的教育，并曾航行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上远离陆地之处。即使是今天，天上许多星星——“猎户星座”、“金牛座”、“密卡座”（Mikah）——皆为阿拉伯名字，而英国海军部航海图体现阿拉伯航海者的功劳之处的，就是使用他们的名字，例如拉斯·农格威（Ras Nungwi）与拉斯·阿尔海麦（Ras Al Khaimah）。阿拉伯航海者知道太阳穿越子午线的高度——每天中午在天空中的最高高度——由太阳与地平线成一直线而计算得知。不管是木制或是铜制装置均可做到，而最简单与最好的就是由亨利的船长之一的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nes）在1460年设计的。

太阳在一年内每天的最高高度皆不同，冬至的每日最高点与最低点之位置差即命名为太阳的黄道斜度，阿拉伯人发现太阳的黄道斜度，从日中高点减去，就得出北半球的纬度位置。(8) 1473年，威尼斯的天文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加入了亨利的朝廷，制造出《位置推算表》，指出太阳每日的磁偏角。而现在在远洋中的船长仅需测量象限仪——未充分发展的六分仪——太阳越过子午线的纬度，之后查阅表格即可找出当日太阳的磁偏角。从纬度减去磁偏角，水手即得知离家的南部多少度(即航行多少英里)。当一艘轻航船加上象限仪，从萨格里什返航则相对简单。而水手向北航行，依照晚上的北极星，并且调到与白天太阳正午位置相反的角度，直到他航行到萨格里什的纬度，在那里他转向东方，保持相同的纬度直到他看到圣·文森特角或是闻到空气中的松香味。

1420年时亨利已经设计并建造巡洋轻航船，且一次可持续停留海上数周方返行。他从阿拉伯人之处得知中世纪的怪兽传说与滚热海水之说皆是无稽之言，得知可以横渡海洋发现新世界。拼图的最后一块就是精确海图的绘制，足以使他的船长能够到达东方。1416年亨利的兄长唐·佩德罗（Dom Pedro）王子为在欧洲与西亚洲的主要国家旅行，从中获得启发的渴望所支配，(9) 开始从事一项长途的冒险航行，尽可能地收集地中海之外的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讯息。在与佛罗伦萨的联系上约翰国王已经投资庞大的数目，以支付他儿子的旅行花费，而西班牙国王提供他一批仆役、译者与学者。他游经西班牙、巴勒斯坦、圣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巴比伦伟大的苏丹）— 罗马、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丹麦、英国和威尼斯，唐·佩德罗王子在旅游了12年之后，于1428年返抵葡萄牙。(10)

他于占领修达的翌年离开，当时的葡萄牙被以基督教为主的整个欧洲所崇拜。所有的人都为亨利王子敢于冒险建造一个在非洲、伊斯兰心脏地区的桥头堡而兴奋，而此刻唐·佩德罗王子被视为将欧洲踩在脚下的征服英雄。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问任何他想询问的问题，且可获得招待者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在英国，他被授予嘉德骑士勋位、威尼斯总督亲自款待他、西班牙的国王赠予他大量黄金、西格门国王将位于威尼斯以北数英里的一个肥沃省分特雷维索（Treviso）的“马琪”的昂贵土地赠予了他，作为他于1421至1425年的基地。(11)

在许多方面，唐·佩德罗王子是其弟的理想补充。亨利是一个实际行动者，唐·佩德罗王子是一个梦想家与极具魅力的远见者，且惊讶于欧洲的冲突，他以他的理想点燃了他的东道主的激情，通过在非洲、印度和中国的发现之旅来统一基督教世界。他的12年冒险行程是一个卓越的成功，他于1428年返回葡萄牙时，带着“世界地图，它包含世界所有的部分与土地”。(12) 这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地图展现出“麦哲伦的海峡”、好望角，这比迪亚斯（Dias）的发现早了60年，比麦哲伦航行早了近百年。在它出现之前，大多数的欧洲世界地图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而边缘由野兽巡视。中国人在他们伟大的探险航行中努力获得的有关世界的新知识，成为欧洲人发现之旅的推动力。

像亨利一样，唐·佩德罗王子在一个开明的朝廷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并由威尼斯学者教导。当王子们尚在年幼之际，比萨议会（1409年）已经召集，主要是企图结束对抗的罗马与阿维农教皇之间的30年“巨大

的教会分歧”。罢黜对抗者并设立一个新教皇的目标失败了，它仅仅导致三个教皇取代两个教皇——葡萄牙派遣一个主要使团至此议会，然而唐·佩德罗王子与亨利王子对于议会的其他审议极感兴趣。他们险些错过了一个革命性的作品，托勒密的《地理学》，这个作品在欧洲早已被忘记，但是现在已翻译为拉丁文。它被带到会议上，并呈送到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nander V）那里。

《地理学》的再次发现在欧洲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它坚持认为地球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体——中国人早已知道的事情——并衍生出纬度与经度原理，据此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方位，这就是地球球体的新发现。最重要的是，托勒密再次被介绍到欧洲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这引起了制图学和探险事业的变革。但是《地理学》虽然卓越，它仍未包括地图，仅仅诠释了如何运用知识来制造地图。即当突厥人包围拜占庭之际，这种匮乏即有所改观，因为拜占庭的地图绘制者拉帕其诺（Lappacino）和博尼塞格尼（Bonnisegni）逃离了，于1415年定居威尼斯。他们带来数帧以托勒密《地理学》为基础的地图，展现出非洲、印度的正确位置。当唐·佩德罗王子参观国家旅途至威尼斯之际，至迟应于1428年得知这些地图，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探讨至迟应于1424年，即尼科洛·达·康提旅行返回时，已经知道了这些地图。

关于达·康提如何返回我们今日称之为意大利的地方有两种说法。一派争辩他已经于1424年从东方返回，但是由于怕丢名，并假借“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的化名（under nom de guerre）[①]，因为他已是背叛者，在严酷宗教迫害之下已皈依伊斯兰教，他希望能够避免像捷克新教改革者约翰·于斯（John Huss）仅于9年前因异端而被烧死的结局。(13)另一派主张唐·佩德罗王子指示一个著名的圣芳济各会的托钵修士阿尔伯托·德·萨尔特诺（Alberto de Sarteano）把达·康提从开罗带回。他藏匿于开罗，应允宣布赦罪。(14)萨尔特诺成功地护送达·康提回到佛罗伦萨，而唐·佩德罗王子立刻召唤代表至葡萄牙询问他与中国船队航行并执行任务的整体情况。

唐·佩德罗王子主要目标是连结葡萄牙与据说是由使徒圣·托马斯（Saint Thomas）建立的与东方隔绝的基督教社会，包围伊斯兰并发现去中国的新途径——这是一条极需探求的道路，因为唐·佩德罗王子曾

① 巴托罗缪为耶稣的12使徒之一。——译者

经游历，而同时埃及的边境由统治此国的马木路克苏丹封锁。到1421年末，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占据小亚细亚，且已包围拜占庭，并控制了通过亚洲的丝路的终点站。一道无法穿越的障碍已经矗立在东地中海和近东。

唐·佩德罗王子挽留住教皇的书记毛罗修士和波焦·布拉乔利尼修士，且通过询问背叛者尼科洛·达·康提执行任务的情况而形成了一个豪华的智囊团。这样他就掌握了达·康提（"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从印度到瑟尔帝角（Cape Cerde）、福克兰群岛、澳洲和中国，航行世界20年间所获取的知识。唐·佩德罗王子现在已经知道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与香料群岛。(15)

地图绘制者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公元1397～1482年）在与达·康提会面探询出点点滴滴的可以运用的零碎信息之后，发表了相同的宣言。他后来在给哥伦布的信函中道出此事：

> 我注意到你航向东方地区（中国）的壮丽且崇高的渴望。我送给你的海图中展现出的西方，在圆形的球体上会有更佳的展现……不仅证明航行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与确认的，可以获得数不尽的荣誉和……
>
> 我已有……关于那些长期于此地区贸易的商人、掌权者最完整详实的讯息。(16)

托斯卡内利寄给哥伦布一张地图展现出经由大西洋转经安地里亚的西向路线。他也把达·康提的讯息传递给替葡萄牙政府工作的波西米亚的贝艾纳（Behain of Bohemia，1459～1507年）。(17) 贝艾纳在他于1492年制造的地球仪和绘制的地图上都表明了从大西洋通向太平洋的海峡，而麦哲伦承认他在航行之前已经在葡萄牙看过这些地图。(18) 许多其他的报告描述麦哲伦在葡萄牙的财库中检视托斯卡内利的海图。可以想象这些以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中国人的航行为基础的海图给欧洲人带来的巨大冲击，欧洲人探索广大的边域和不知名的海域与地域，例如南美洲和南极洲，它们的存在在那之前则是无法确定的。

托斯卡内利给哥伦布的信函、麦哲伦的陈述与其日记员皮加费塔都证明早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葡萄牙人已经知道到达中国的最快方法就是向西航行，经过后来以麦哲伦的名字命名，但由中国人首次航行并绘制

成海图的海峡。这个讯息来自尼科洛·达·康提，即“曾旅行至此地区的商人”。(19)

随着尼科洛·达·康提的再次出现，使我觉得我几乎已绕了一个圈。自从我首次看到他的名字在古里（卡利卡特）港被提起的时候，已感觉这是一个长期且特殊的旅程，当时郑和宝船恰好经过该港口。

我追踪达·康提曾经形容过的中国人航行痕迹引导他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曾经阅读并听过相同的报告，并且因此受到影响而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发现之旅。

唐·佩德罗王子在1424年从达·康提之处得知海外新大陆的存在，他在1428年带回葡萄牙的世界地图展现出“世界所有的地方与土地”(20)——非洲、加勒比海(安的列亚)、北美洲和南美洲、北极洲、南极洲、印度、澳洲和中国，它所涵盖的讯息具有巨大的价值，在此后的一个世纪，葡萄牙人煞费苦心地防止它的信息传入到其他欧洲竞争对手那里。

伴随着亨利对航海和船只设计的改进，世界地图永远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探险事业，亨利知道如果他可以资助他的探险队，葡萄牙人就可以掌握世界。他需要庞大的资本，因为大量人员要供养与居住、医院要维持、教堂要捐助、轻快帆船要建造，且准备可能是数月航行所需之物品。

教皇1420年指派亨利王子为基督教团的首席院长，他的帆船即以红十字图案为装饰。该团以税收为基金，它的主要责任是保护葡萄牙且领导十字军对抗尤宗教者。尼科洛·达·康提和马可·波罗皆已描述了一系列延伸至印度的基督教国家。(21) 唐·佩德罗王子与亨利王子今日已掌握能使葡萄牙人到达那些基督教社会的知识，而基督教团因与之联系而可完成它的使命。

教团就是亨利基金的主要来源，然其庞大的财富也可能快速地耗尽在这些探索航行的资本投资中而无所回报。这个回报首先来自马德拉的殖民，有着沃土的无人岛屿，丰富雨水与大量阳光。就像我们已得知1421年6月若昂·贡萨尔维斯·萨尔可已宣称这是葡萄牙的岛屿，并开始种植谷物的工作，而此为葡萄牙的投资者产生庞大的利润，并且促使新领土的探索、运用与殖民的研究。

殖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马德拉的管理者被要求每月上交一份进度报告。虽然大片原始森林在居住者开始到达后很快被焚毁，但是它证明这仅是因祸得福。为清除森林并用碳酸钾使之成为沃土，而大火几乎加速一个以种植葡萄和甘蔗为基础的岛屿经济的成长，生产并出口

大量的糖与马德拉葡萄酒。

这个岛屿提供由成功探险而获得商业利润的鲜活例证，而且当大量的葡萄牙企业家前往亨利的朝廷以寻求资助的时候，探险航行变得更为容易了。早年资金筹募是基督教团资源的一大负担，也使亨利的精力耗损，但是在殖民马德拉之后，他获得财力的保障。葡萄牙现在可以经过海洋向西看得更远。如果一个小岛可以产生如此浩大的财富，那么海外新殖民将会产生数不尽的财富！那些陆地对于亨利王子与他的船长而言已不再是未知，因为他们已有中国海图指示和引导着他们。

第十七章 殖民新世界

葡萄牙人在越过大西洋向西殖民扩张寻找新领土之际丧失了一点时间：早在宣德六年（公元1432年）我们即得知航海家亨利王子派遣贡萨洛·威里奥·卡布拉尔（Gonzalo Velho Cabral）去寻找若昂一世地图上标记的岛屿，那幅图是国王之子，亦即唐·佩德罗王子于1428年从意大利带回来的。(1)

当他们的航行越来越远，亨利王子的轻快帆船一定很快地就发现了安的列亚（Antilia）——波多黎各（Puerto Rico）——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1436年的海图用葡萄牙语"梅之海"(mar de bagh)的名称来形容马尾藻（Sargasso）——这是他们抵达加勒比海的有利证据，因为马尾藻海的大片漂流海藻是世界独有的，只有曾经航行至此的人可以描绘得出，因为循环风与海流系统使然，所以极易从欧洲经由加勒比海到达。葡萄牙人应该不是展现这些陆地的首张海图的绘制者，而这地图当然是早于他们的航行。我猜想这些首批的葡萄牙移民是否见到了中国航行的遗迹——雕刻石头、瓷器碎片、器皿、人工器具。也许还包括一片昔日阡陌纵横，但早已荒芜多时的稻田。他们或可曾驻足一看？或仅是耸肩，忽略它们是当地奇物，

费迪南国王派遣哥伦布至新世界。朱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的诗歌描绘哥伦布就西班牙国王的第一封信于1493年印行。

并把心思从飘飘然中转向如何在这些土地上获得生存的现实的想法。

与瓜德鲁普不同，波多黎各曾是和睦相处者聚集之地。倘若葡萄牙人确实于1431年（亦即中国人访此之后的10余年）居于此，那么他们的后代应该曾经迎接过哥伦布或是后来的探险者。1493年哥伦布于第二次新世界航行中首次到达波多黎各并做了短暂停留。他先匆忙地抵达拉·维达（La Navidad）岛的西班牙驻防部队与“西班牙”（Hispaniola）之地的金矿处，而该地西侧邻岛即为波多黎各。哥伦布来到波多黎各的一个港口，仅待上数天，然而，他发现这是一座文明之港：

> 船队越过圣乌尔苏拉(Saint Ursula)与其一万一千座处女岛(维京群岛)，抵达波多黎各，这是大部分避难的被捕者(来自瓜达鲁贝的难民)与西班牙人之家。在西边尽头，他们发现一座丰富鱼群的优良港口，此地为土著村落，具有一个公众广场、一条主街、一个梯田——总之是一个有艺术想象力的像家一样的地方。(2)

当我深入挖掘哥伦布的记录时，发现另一则故事：(在恩里克斯〔D. Henriques〕婴儿时期〔航海家亨利〕，一场暴风雨使得船只停靠到七座城市之岛〔安的列亚 Antilia〕)。水手们受到当地居民欢迎，善良的葡萄牙人受邀出席神灵礼拜仪式，并被力邀留下直到他们的统治者现身。(3) 当然亨利王子在哥伦布航行之前早已过世。这个故事被16世纪葡萄牙历史学者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ão）所证实：

> 所以就在这一年，即1447年，意外地有一艘船经由直布罗陀海峡驶抵葡萄牙，这艘船是遇到大暴风雨，被迫向西航行，最后在一个有7个城市的岛上停泊，那里的人说葡萄牙语，而且建问是否摩尔人仍然干扰西班牙……船上的水手长带回一些沙子，售予里斯本的金匠，而他们从沙子中获得大量的金子。
>
> 唐·佩德罗王子了解这些，作为王国的统治者，他查询所有带回家园之物且公布之，并记录于法院。
>
> 而有些人为其看法陈述好的理由，认为这些葡萄牙人流落于此的岛屿就是安的列亚或是新西班牙。(4)

还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确有葡萄牙人于1431年居住在安的列亚，且

1447年仍在此处。而葡萄牙的摄政王唐·佩德罗王子肯定知道这座岛屿，因为它已经出现在由他亲自带回葡萄牙的1428年的地图里。我确信这些造访的轻帆船所发现的事物的记录一定还存世。因为想象他们已经航行数周，横渡海洋，来到一座人民说着葡萄牙语的岛屿，而继续航行下去但却未予记录这座岛屿和他们的同胞的生活方式，则是不合理的；此外，有可能于1431年已在波多黎各的一些民众希望能于1447年回到葡萄牙，其中有些人毫无疑问地思念他们的家园，渴望再次听到伤心且轻快地法朵民歌（Fado），而希望在自己的故土度过晚年。这些人也确实于1447年之后的航行返回，且一定给予制图者修正早先海图的必要讯息。

1424年海图的作者祖阿内·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展现出安的列亚，他从未绘制过另一幅海图而历史并未记录他的生平——我假设他于1440年代过世——而我再次回到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检视1447年之后绘制的首张海图。

这些证实了一个不寻常的讯息来源。把1448～1489年之间的海图，列出相连的一系列海图。(5) 在所有海图中，我审视哥伦布之前的7张海图，包括73个名字以及描写安的列亚和“撒旦之岛”（Satanazes）的特色。而且我期待这些稍后的海图会更正出较多的讯息，但是事实上1463年由格拉齐奥索·贝宁卡萨（Grazioso Benincasa）绘制的地图所具有的城市数目和匹兹加诺海图上的相同。仅有的改变是展现在稍早地图上的所有7座城市的名字在后来地图上被更动了。岛屿的绘制一模一样，除了安的列亚北部海岸多出一个港湾，以及西南和东部的海湾画得更加准确。我不明白为何海图绘制者重新命名所有的城市。另一幅1476年的海图加深了此神秘，此图上又产生出另一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断地更动这些城市的名字呢？

我坚信这些名字一定是中世纪的葡萄牙文，这些船是亨利王子派遣的轻快帆船，不可能是由外籍佣兵所操作，所以我查字典寻求解释。除了安的列亚之外，稍晚的海图上并无一个名字是中古的葡萄牙文的。他们是无法理解的。(6) 如果这些岛屿确实有人居住，为什么7座城市并非葡萄牙文而是神话故事的名字？

我向匹兹加诺地图的拥有者求教。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藏有由地图监护人卡罗尔·乌尔奈斯（Carol Urness）教授所撰写的小册子的影印本，(7) 它描述了历史学者在过去50年为解决这些岛屿问题而做的努力。小册子内容让专家甚是困惑，而我要在他们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的期待似

乎有些胆大妄为。我决定放弃我的寻求，离开这些谜团而转移他处。我从皇家地理学会返家，在最后的难关失败后满是沮丧，未能找到证据来证明在中国人发现这个岛屿之后，哥伦布航行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居住在波多黎各岛屿。

困难之际，我的习惯是向圣母马利亚祈祷以及啃咸肉三明治。就在这时，灵感来了。萨格里什是轻快帆船的基地，从那里到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Sanlúcar de Barrameda）的瓜达尔基维（Guadalquivir）河口湾仅需一日航程。1431年它是卡斯帝利亚（Castilian）主要的港口，会不会有任何卡斯帝利亚人从此港口搭乘轻快帆船？如果有的话，这些名字会不会是用中世纪卡斯帝利亚文书写的？我赶紧回到大英图书馆，找到6册卡斯帝利亚文字典，但是仅有A～D。但这不重要，因为格拉齐奥索·贝宁卡的1463年海图上的7个名字中有6个是以A字母开头。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在这巨大的中世纪字典中，这些名字不是卡斯帝利亚文，是来自阿拉贡吗？但是阿拉贡人是说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但是这些名字亦未出现在中世纪加泰罗尼亚文字典中。最后我拼命在巴斯克语与拉丁文字典中查询，终无所获，我毫无办法。

我离开阅览室踱步到图书馆外的中庭，绞尽脑汁但未成功。之后回到阅览室，收起字典，共计7本摊在我的桌上，当我合起中世纪辞源学辞典（Dizionario Etimologico）之际，我的眼睛被中世纪使用密码的章节所吸引。*y*意味“那里有”或“和”；而*a*意为“朝向”；*j*强调它之前出现或是之后的字母；而*an*在一个字之前，则是“相反于”；形容黑色，他们则会写成白色的相反（anblanco）。这就是我找寻的解答吗？

我返回到海图上。其中6个名字以*an*开始，即“相反于”。与其在字典中查询*ansollj*，还不如去查它的反义词*sollj*——*sollj*意为“太阳”。这太令人激动了，我查询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卡斯帝利亚和葡萄牙文字典，再与现代字典交叉查考。而现在有10个名字散置在桌上，其中一个确实是加泰罗尼亚文，少数是卡斯帝利亚文，但是大多数是中世纪葡萄牙文。我开始编制一个字母列表。73个名字中的63个名字是中世纪葡萄牙文，剩下10个名字中有4个是卡斯帝利亚，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而其他5个不可解。我估算剩下的5个是中世纪的威尼斯文——匹兹加诺来自威尼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仅一个是威尼斯文，3个是特雷维索的威尼托（Veneto）文，单是最后一个名字我就被打败了。

我在现代波多黎各地图上核对这些名字，在半小时内就找到门径：

这些名字不是7个城市的名字，而是对自然，以及人造之物所具特色的描绘。根据1448～1489年海图上的描绘，得知安的列亚就是波多黎各，这是毋庸争议的。对所描绘的安的列亚山岳、雨林、港口、河流以及盐田，确实就在波多黎各发现，诸海图上的根据并无差异：后者仅对前者补充叙述。有些卡斯帝利亚名字使用于稍晚的海图，但仍旧形容相同的地方。在整个世界上仅有两座岛屿符合这些描绘：波多黎各和瓜德鲁普。

*Con*标记在安的列亚——波多黎各岛的东南部分——皮科·德尔·埃斯特（Pico del Este）的圆锥形山岳。北部，地图绘制者写了*ansollj*“没有太阳”，精确地吻合埃勒·云格（El Yunque）雨林十分吻合，年降水量6100毫米。相似的热带的倾盆大雨的词汇——*choue*、*choue-due*、*cyodue*——皆展现在岛屿西部和中部的中科迪勒拉山尽头。此区年降雨量2500毫米，相对于欧洲标准而言仍很惊人。制图者在今日的马亚奎斯（Mayaguez）附近，即大阿尼亚斯科河（Grande Rio de Añasco）河口湾的船浸满水位处描绘的湿地。但是最有趣的描绘之一就是*antuub*或是*an tuub*，原文是“没有下水道管”，写在阿雷西沃（Arecibo）东边的北岸。今日这个区域仍是一大片满是蚊子的沼泽地，称之为谢纳加·提布尔尼斯（Cienaga Tiburones），而*Tiburones*是卡斯帝利亚文的*tiberon*或是“下水道”，依次源自葡萄牙文的*tubaro*。光彩夺目的红色和绿色的波多黎各鹦鹉*ansaros*被注记在西南——可推测葡萄牙人也像后来哥伦布的水手一样穿戴这些异国鸟类的羽毛。地图绘制者在博尼龙（Boquerón）的森林绘上这些鹦鹉，而这里至今仍是赏鸟者的天堂。缺少可耕的沃土，这一点被制图者鲜明地标示出来了(今日波多黎各的可耕地仍低于5%)：*ansessel*“无草”，出现4次，由*an sulol*“无可耕地”补充之，这是在狭窄的海岸平原发现的惟一的优点。

令我最难以翻译的是*asal*。我的字典(8)说明此字源自拉丁文*acinus*，意思是浆果，尤其指葡萄，或是任何草莓或是浆果种子，但是*asal*是放置在海图上的蓬塞（Ponce）后面的一个山坡。波多黎各的冬天对葡萄而言太热——葡萄需要非常寒冷的天气始能茁壮——但是asal写于今日波多黎各的“咖啡首都”尧科（Yauco）的上面，所以我怀疑葡萄牙人是在描述咖啡豆。这个理论在那些指导我的历史学家中引发热烈的讨论。有人指出咖啡是东非原产，经由西班牙人传入加勒比海，所以它不太可能描绘在西班牙人登陆之前的海图上。但是进一步研究（9）显示，在西班牙人抵达之前，于加勒比海发现至少19个品种的咖啡。咖啡生长于山坡

上，通常在3000～4500英尺的高度，热带温和的天气中，无风多晨曦。这些条件都在蓬塞后面的中科迪勒拉山的南坡上发现，此处就是在安的列亚的海图上标记为*asal*的地方。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末航行至此引进的吗？第二个引起热烈讨论的是对*cua cusa*的翻译——南瓜——出现在靠近纳古波(Naguabo)东面的沿海平原。南瓜和西葫芦确实生长于此，众所周知它们今日仍生长于此。为此书调研至波多黎各访问之际，我对着堆积在路边的20种不同瓜堆拍照，什么种类、形状、颜色都有，还有各种的南瓜、小黄瓜和茄子。(10) 它们品种繁多、茂盛硕大，这些都缘于波多黎各东部狭长海岸的特殊的阳光、火山土与适度的降雨。

翻译这些名字的真正令人兴奋之处就是：它们展现在哥伦布出航之前即已印制在海图上，而且他们所描绘的植物对波多黎各而言是国外的植物。咖啡是非洲原产、南瓜原产地是印度、芒果是东南亚。哥伦布亦发现原产于太平洋的椰子。不仅有人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加勒比海，对波多黎各的描绘精确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他们也从世界各地带来植物。这似乎对于我而言只有由海军将官周闻统帅的伟大的中国船队才有可能完成此事。

*Marolio*是另一个出现在1480年由艾伯诺·卡内帕(Albino Canepa)绘制的海图上的有趣名字。这个名字被置于匹兹加诺海图上与Marnlio相同的位置处。我假设o下面的边缘被擦掉了。*Marolio*是中世纪葡萄牙文“番荔枝科植物”——杨桃、甜的和酸的晚夏苹果、木瓜和凤梨。在这两幅海图上，地图绘制者皆把此描述放置在南岸中间的现代蓬塞之正北。这个地区仍旧是波多黎各热带水果产业的中心，盛产杨桃、酸的晚夏苹果和木瓜，而其果汁出口至全美洲，且成为观光客持续喜爱的兰姆拌汁酒的基本成分。这些水果全都原产于东南亚和南美。我再一次得出结论，是中国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把这些水果引进波多黎各的。

地图绘制者在描绘“撒旦”岛（Satanazes，瓜德鲁普）与波多黎各时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在后来的海图上把撒旦（Satan）或是魔鬼（Devil）岛改为野蛮岛（Saluagio）。(11) 而瓜德鲁普的后来海图仅补充叙述了他们从海上可以看到的——第二座火山(con)亦即1414公尺的卡迈克尔（Carmichael）山，以及此与拉苏富里耶勒火山（La Souffrière）之间的一个高原(silla)。瀑布从拉苏富里耶勒火山(卡卢可卡〔Karukeka〕和三河流〔Trois Rivières〕）东侧倾泻下来，有“蛋白牛奶酥”(duchal)和“天降之雨”(tubo deagua)之称。村落与耕作的田地(aralia y sya)

都展现在“大地”岛（Grande Terre）的西岸低地，就是哥伦布数年后航行至此所描述之地。“撒旦”岛是一个明显骇人之地，由艾伯诺·卡内帕总括为 *nar i sua* “只有炎热难耐”。但是对于萨扬（Saya）岛屿（拉斯·桑迪斯Les Santes）的描述是适合“任何一种热带鸟类”，而此座岛屿仍以它的鱼狗鸟、蜂鸟和蕉林鸟（bananaquits）闻名——小型飞跃的惹人怜爱之物掠过分隔岛屿之间的土耳其大海。

祖阿内·匹兹加诺写于安的列亚东南处，包括维克斯岛（Vieques）的最特殊名字是 *ura*，放置在稍后的海图上的 *con* 的旁边。Uracano是威尼斯文“火山爆发”、“爆发”或是“暴风雨”之意。1421年时，波多黎各东南岸的火山群已熄灭了很久，但地震则遍及岛的西边，近马亚奎斯；飓风恒久不变地从东边向西北咆哮，从维克斯岛至圣·胡安。我相信在6月～11月末的飓风季节之间，当中国帆船于11月抵此之际，中国的地图绘制者曾经亲眼目睹此现状。

所有这些名字，连同匹兹加诺海图上各岛之间非同凡响的物理相似性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安的列亚是波多黎各、“撒旦”岛是瓜德鲁普，而萨扬是拉斯·桑迪斯。虽然在中世纪加泰罗尼亚文或是卡斯帝利亚文的翻译的细枝末节上自会有争议之处，但是继续讨论关于安的列亚岛屿群的属性已经毫无意义了。这些名字与地图皆非模棱两可的证据，说明葡萄牙人于1447年之前直至哥伦布首次航行的1492年，持续地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对波多黎各而言是外国植物者都是在哥伦布航行之前即被带入。我以为这些证明就是中国人发现了波多黎各。

虽然有关这些岛屿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它们的位置与方向则不然。它们被标注在大西洋而非加勒比海，比它们正确的位置偏离了2000英里。而此错误被后继地图绘制者逐渐地修正。1448年这些岛屿是位于加纳利群岛之西1500英里远（误差1500公里），1474年它们已向西移动，仅有500英里之差。这个错误极易解释。1431年亨利的船长们还没有精良的星盘（六分仪），亦不了解磁偏角。直到1451年，葡萄牙航海家始知如何运用北极星，到1473年之后，使用磁偏角表，得以最终精确地确认纬度(托斯卡内利的1474年海图上的安的列亚位于正确的纬度)。经度持续是一个问题。哥伦布把美洲置于经度1000英里之外，纬度亦差20°。当他自第一次航行返回之际，哥伦布并不知道自己曾去过哪里、发现什么或是发现之地为何。他以为他已抵达中国。

15世纪葡萄牙人航行靠着罗盘，以及经由船首丢出测速仪测量船速

度。他们为岛屿定位是靠僵化的估计，是以通过水域的速度乘以航行天数。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航行的广大水域本身也是移动的，将他们带离他们僵化估计出来的位置。如同哥伦布一样，葡萄牙人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去过何处。当我调整他们从马德拉到瓜德鲁普的两周航行的水的活动之际，(12) 我发现葡萄牙人是把岛屿定位在他们正确的僵化估计的位置与方向上。

我觉得匹兹加诺海图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解决。第一个是关于岛屿的面积。在早期的海图中，安的列亚绘制的比波多黎各还要大，而“撒旦”岛也比瓜德鲁普大些。这个错误的产生，我相信是由于位置互换，不仅因为岛屿的错误位置，而且是岛屿的面积，在从较早（中国）地图转移至欧洲地图时。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匹兹加诺海图制造的时间和地点。似乎可能匹兹加诺是在唐·佩德罗王子指导下作业，而他的地图绘制者都在搜集有关新大陆的讯息，为的是替亨利王子创造一个世界地图。我知道神圣罗马国王给予唐·佩德罗王子位于离威尼斯北部15英里之处特雷维索的威尼托的可观的地产，而此处成为葡萄牙代表的基地。令我惊讶的是葡萄牙的地图绘制者可能在1424年于此遇见尼科洛·达·康提。而尼科洛·达·康提当然已在中国宝船队的帆船上度过许多年，亦即安的列亚的最初发现者。这个海图几乎可以确定是在特雷维索绘制，因为海图上出现的大多数“非葡萄牙文”的名字都是威尼托的方言而非威尼斯的。匹兹加诺也许曾是特雷维索圣尼古拉（San Niccoló）的伟大的黑袍教教团圣所的一名僧侣。

匹兹加诺海图中波多黎各绘制得如此地精确，核对这些讯息的人一定是这一行的大师。在那个时代，原始的海图绘制者意味着只能是中国人。这幅海图和那些晚出的海图有两层重要性：海图不仅提供中国人已先于哥伦布70年发现美洲的证据，亦展现出波多黎各已于1447年之前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葡萄牙居住地。而且海图上的名字一直提醒着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后早已存在的有关岛屿的描述。这些岛屿的位置也继续被修正，从1463年～1470年的海图涵盖关于安的列亚的丰富的额外讯息，包括西北和东部海岸的更多的港湾，且重新绘制更精确的海图时则稍微地夸大了西南顶端，但是位置更正确。波多黎各北方的亚马纳（Ymana）岛在后来的海图中绘制得也较好，而它的名字改为罗塞利拉（Rosellia）。当欧洲航海家发现磁偏角与纬度测量，且改进他们的六分仪与时间测量之际，海图上的岛屿位置则应移向西南。(13)

安的列亚和“撒旦”岛的确认使我能够在中世纪海图上指出它们周围其他的“岛屿”。以1448年安德烈·比安科的海图为例，包括了巴西东北海岸、克里斯托巴勒·索利戈(Cristobal Soligo)的1489年海图（14）展现出更多的7个“岛屿” ——西边的伊斯帕尼奥拉角、特里尼达(Trinidad)、维京群岛、圣文森特岛、圣卢西亚(St Lucia)、巴贝多和南方委内瑞拉的北岸——所有这些在哥伦布航行之前都已出现。

我回到波多黎各的海图，并开始寻求首次居住的可能地点。因为最常刮的风向之故，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一定都已从东南方来到。在匹兹加诺的海图上安的列亚南部和西部的海岸比北部或是东部的海岸绘制得更精确，于是我专注于此搜寻。

匹兹加诺海图上在西部有地名*cyodue*，意为“连绵的雨”，在西南有*ansuly*，意为“缺少沃土”，在东部有*ura*，意为“飓风”；并无一处令人感觉是特别诱人的居住之所。另一方面*marolio*“香甜味的热带水果”标注在蓬塞（Ponce）的正北方，而蓬塞海湾则在所有的海图上都明显绘制得很精确，展示出一个突出的岬角拉瓜乔（La Guancha），位于海湾东面。数世纪以来，这个岬角为因东风面停泊之船只提供庇护。海里具有丰富鱼群，蓬塞坐落在山中的背雨处，是目前波多黎各气候最佳之处。当我到达此地观看地面之际，我可以看到北部中科迪勒拉山(central Cordillera)突然来临的一片午后雷雨的紫色云彩，然而城市却是干燥的。蓬塞命名为“南方的珍珠”不无道理。可能葡萄牙人最初居住于此，而此处也是他们欢迎1447年航行的新来者，并邀请他们参观神灵礼拜。

从港口引导至旧城的河流仍旧维持葡萄牙河（Rio Portugués）的名字。我们白色的瓜德鲁普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Guadeloupe）矗立于它的岸边。一天傍晚，在我坐在蓬塞主广场，抿着波多黎各的苦黑咖啡之际，我留意到人们涌向大教堂望傍晚的弥撒。有些男人是红头发，女人眉清目秀、明显的肤色较北方人更淡。从面貌、生活方式、法朵歌曲与费拉佩拉（Ferrapeira）舞蹈上看来，今日的蓬塞人们与他们来自阿尔加维的葡萄牙人祖先很相似，是否有那么一天，能在瓜德鲁普天主教堂的地下发现那些很久以前从萨格里什起航并在新大陆殖民的首批欧洲人的遗骨呢？

葡萄牙人已经朝向中国人发现的新世界迈出第一步，但是虽然有了中国人绘制的海图抄本提供的证据，仍有一个障碍——心理的就像物质的一样——在葡萄牙帝国散布至世界之前人们有待继续克服。未知的恐

惧仍旧主宰着寻常葡萄牙水手的心灵，而终生的迷思、传说与迷信无法在一夜间消失。16世纪早期，当麦哲伦试图劝诱他的水手渡过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时，他仍在为让他的水手克服恐惧而努力。

1432年的夏天马德拉、亚述尔群岛（Azores）（由拉沙雷La Salle发现）和波多黎各已被沦为殖民地了。亨利王子召见了一个熟练水手与皇家仆人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nes），来到位于萨格里什的宫廷。埃亚内斯十前一年已被派遣到加纳利（Canary）岛执行一个任务，而现在亨利坚持无论如何他都要绕过今日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朵尔(Bojador)岬，抵达摩洛哥南部。这个岬具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水手未知世界的迷思，在大瀑布坠海之处，强烈的海流拖着船只直至毁灭，甚至海水本身也变成“红色泥浆”。

埃亚内斯小心翼翼地遵从了亨利王子的命令，从南面靠近可怕的博哈朵尔岬远远地待在海中，以避免传说的岬角瀑布，但是当他越过岬角数英里后首次登陆时，他并未发现海蛇或是大海怪。这块土地无人居住，海滩上甚至有少许花朵。埃亚内斯摘下一束花献给亨利王子：“我的主，因为我在这片土地，所以我想我应该带些礼物给您。我收集这些植物，于此我呈现给您端详，而在这个国度内，此物名为圣玛丽玫瑰（Rose of Saint Mary）。”(15) 往北返回博哈朵尔岬之际，埃亚内斯发现“永恒的急速水”不过是海中灰色鲱鱼的巨大鱼群。没有必要担心从地球的边缘掉落下去、“瀑布坠地之处”就是悬崖，好似从海上垂直地升起，而“海洋烤成红色泥浆”是由于红色撒哈拉沙漠的沙粒使海水变色。

埃亚内斯绕过博哈朵尔岬的成就完全改变了欧洲人对于航海的态度，一举粉碎数世纪的传说与迷信。如果一艘船能够安全地环绕博哈朵尔岬，人类就可以航行至各处，根本无需担心会从地球的边缘掉落。中国海图指引着葡萄牙的船长，使他们无需冒险，一旦他们说服他们的人去跟随着他们的引导，那么探索世界的极限仅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第十八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460年，亨利王子这位早期的航海探险家死去。也是在这一年，波多黎各闻名于世，而前往大西洋3个群岛——亚述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的3支葡萄牙人探险队的探险活动也完成了。在这3个群岛上到处是动物，而且成为了探险者们来往于南、北美洲和非洲之间的要道。恰巧的是，这3个群岛都处在季风的影响之下；故而，航行队伍在通向美洲的路上会经过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而回来时则会经过亚述尔群岛。渐渐地，欧洲人来到了这些中国舰队指挥官们曾经发现过的群岛上。

在这一年，随着其航海探险事业持续而又有条不紊的发展，探险家亨利毫不留情地命令他的船长们向更远的地方前进，一步又进一步，横渡大海。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扬帆驶向了好望角。他们关于北半球纬度的测量结果和中国人在多年前得出的结果一样的精确。

巴托洛梅·迪亚斯（Bart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是这条航线的领航人。1482年，他是船队的船长之一，这支探险船队经过海角前往黄金海岸和非洲。1487年，迪亚斯被任命为一支有3艘船的小型海军战队的指挥官，这支战队试图绕过非洲的最南端。无论是迪亚斯，还是他的上司都不知道这个海角向南延伸到了多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对前景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能够绕过海角，因为在他们掌握南半球纬度的测算之前，中国舰队就已经绘制出了非洲西部的地图。1428年唐·佩德罗（Dom Pedro）的地图描绘了一个三角形状的海角，而且在迪亚斯远航之前，葡萄牙国王给了他的使者佩罗·达·科维利亚（Pero da Covilha）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显示人们能够绕过海角到达印度。当迪亚斯适时地到达海角时，他发现：

> 昔日伟大而又著名的海角数百年来默默无闻。当它被发现的时候，不仅仅使其自身出了名，而且也使有着众多国家的新大陆出了名。由于危险、风暴的原因，迪亚斯和战队的其他成

员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他们把海角叫作风暴角。但是，在他们回国后，国王唐·若昂却赐给它一个十分奢华的名字——好望角。

跟随迪亚斯而来的是瓦斯科·达·伽马，他奉命绕过好望角继续前进，直至到达印度和香料的发源地。达·伽马从带着的那张标有好望角的航海图，列出了精确的磁偏的图表：(1)

太阳黄道倾斜度图表是由托勒密王室的亚伯拉罕·佐托古·宾·塞缪尔（Abraham ben Zacuto Samuel Zacuto）提供的，这些图表在前一年由希伯来语被译成了拉丁语，并于1473年在Leira出版，其标题为 *AlManach Perpetuum Celestium Motuum Cujus Radix Est 1473*（2）。达·伽马还有其他一些书籍和航海图……当然，在这些文件中也包括迪亚斯的航海日志和海图。

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他继续前进到达了非洲的东部海岸，发现了那些著名的港口：索法拉、基卢瓦、桑给巴尔、慢八撒和麻林地。几世纪以前，当印度洋上的贸易还异常活跃、有利可图之时，这些港口就被中国和印度的舰队发现了。在15世纪末，中国人关闭了通往其他国家的所有贸易路线。然而，葡萄牙探险者却在非洲东部沿岸发现了很多用大量青花瓷装饰的房子，探险者们认定这是早期中国访问者所留下的痕迹。当达·伽马第二次航海回来时，他知道了去东方的满剌加和香料群岛的路线。现在，世界的香料贸易在葡萄牙的掌握之中，任何反对葡萄牙的人都被清除了。事实上，达·伽马是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手里偷走了由他们在几世纪前发展起来的香料贸易。尽管达·伽马和在这之前的迪亚斯一样，掌握着丰富的航海技术。但是，他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当达·伽马在东方追逐香料贸易时，葡萄牙国王若昂派佩罗·阿尔瓦维·卡伯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前往南美洲，去找寻1428年世界地图上所标出的群岛。1500年，国王若昂（King Joao）的继承者——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命令卡伯拉尔占领印度西部。和迪亚斯、达·伽马一样，卡伯拉尔在南美洲海岸登陆前，将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先后作为他的基地。就在这前后，一小股探险者来到了南美洲。韦斯普奇（Vespucci）、平松（Pinzon）和德莱佩（De

Lepe）于1499年抵达南美洲。次年，门多萨（Mendoza）也来了。前三者在亚马孙河三角洲（the Amazon delta）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前进。

在任何一个欧洲探险家开始他们的航程之前，巴西东北部海岸就已经出现在很多地图上了。这些海岸是由中国人周满、洪保所率领的宝船队发现的。1448年安德烈亚·比安科（Andrea Bianco）的地图绘制出"Ixola Otintincha Xe Longa a Ponente 1500 mia"“向西距此地（非洲西部）1500英里的真实岛屿”。并且，前往巴西海岸有1500人的远征队的指挥官若昂·德·巴罗斯（Joao de Barros）确信这些群岛在早先的地图上就已出现，“这些群岛可能就是国王从佩罗·达兹·比萨古都（Pero Daz Bisagudo）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到的”。(3)“比萨古都”是人们给著名的探险家佩罗·达·库尼亚（Pero da Cunha）起的绰号，他曾经身怀一张葡萄牙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被派往非洲开拓殖民地，他所去的地方就是今天非洲的加纳（Ghana）。德·巴罗斯说，卡伯拉尔的远征队在1500年所看到的情况同在比萨古都的早期世界地图上所出现的内容之间的真正不同之处是：他，德·巴罗斯能够证明巴西已经有了土著居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确信：在他们的任何一支探险队前往南美探险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知道巴西这个地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葡萄牙国王约翰（King John）认为特立尼达（Trinidad）南面更深处是陆地。为了弄明白这话的意思，我希望向特立尼达南面更深处前进。”(4)

如此看来，安德烈亚·比安科、哥伦布和德·巴罗斯都认为：1500年第一支欧洲人的远征队远航之前，标有巴西的地图就存在了。在1428年世界地图上我们得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惟一有可能的来源是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的绘图员绘制的航海图。在源于1428年地图的皮里·雷斯（Piri Reis）绘制的地图上，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圣路易斯港(San Luis)，就连奥里诺科河(Orinoco)三角洲和亚马逊河三角洲（Amazo deltas）的纬度都精确无误。此外，对于那些中国旅行家在南美洲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痕迹，地图也没有漏掉。第一支欧洲探险队在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发现了亚洲鸡；而且，委内瑞拉(Venezuelan)的印地安人所属血型与中国西南部人的一样，该血型在中国西南部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绕过好望角和发现南美洲，对世界其他未被发现地区的探险活动紧跟而来。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人，这就是麦哲伦。费迪南德·麦

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公元1480～1521年）在10岁时成了孤儿，之后做了葡萄牙宫廷里的一个仆人，在那里他接受了航海术的训练。1505年，他被派往东非，在接下去的7年里，他在印度洋上为葡萄牙服务。麦哲伦参加了葡萄牙为了在印度建立殖民地而组织的远征队。1511年，在对满剌加的征服活动中，麦哲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满剌加早先曾是郑和航海船队的最早的基地。1512年，麦哲伦回国，并随同葡萄牙远征队一起到了摩洛哥（Moroco）。在那儿，他受了重伤。因为与军队指挥官意见不合，麦哲伦未经允许就离开了军队。这不仅使他名声受损，就连退休金也没了。

一怒之下，麦哲伦离开祖国到了西班牙。1518年，他被任命为一支舰队的指挥官，其探险目的是跨越太平洋，寻找向西到达香料群岛的路线。第二年，带着5艘船和241名船员，麦哲伦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河口开始了航程。在出发之前，麦哲伦就已经对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有所了解。原因在于麦哲伦随身携带了一张地图，在这张从葡萄牙国库中取出的地图上出现了这个海峡。(5)在寻找香料群岛的过程中，麦哲伦给当地的首领看了这张地图。(6)地图描绘出一条穿越麦哲伦海峡并且横跨太平洋的道路："整个航行包括从弗里乌角（Cape Frio）直到美洛居群岛（the Maluccas），但在麦哲伦的同伴们所绘制的地图上却没有标出任何群岛"。(7)

麦哲伦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第一个环绕世界航行一周的人。然而，他的航海事业仍然是一个奇迹。和中国人的巨船相比，麦哲伦的小船就像个玩具，而且葡萄牙人没有长距离远洋航行的经验，也不知道吃什么可以预防坏血症，但这些中国人都知道。麦哲伦、迪亚斯、达·伽马和卡伯拉尔都是技艺精湛的航海家，他们也很勇敢、刚毅，有着令人敬畏的领导才能。但是，准确的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发现了"新大陆"。当他们启航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航海地图，地图标着所要到的地方。而他们发现的所有地方都是近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已经发现过的。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不是发现美洲的人。在出航前，哥伦布一点也不害怕其舰队可能会在世界的边缘毁灭。正如他在航海日志的摘录中提到的那样，当哥伦布还在大西洋中部航行的时侯，他就很清楚他的目的地了：

九月　星期三　第十九日（1492年）

尽管海军上将知道无论往北和往南确实都有一些岛屿，但

是他不希望为了证实这一点而耽误时间去逆风前进，以便证实前面是否有陆地。他说："如果上帝有意，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顺便去考察。"这就是他的原话。

十月　星期三　第二十四日

关于如何去安的列亚岛（Antilia）的描述我应该向西南偏西方向航行才能到那儿……而且从我所见过的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上，该岛是处于这一带海域。

十一月　星期三　第十四日

哥伦布相信，这些岛屿就是世界地图上处于东方尽头的那些数不清的岛屿。(8)

这三条内容清楚地表明：哥伦布看到过标有大西洋上群岛的地球仪和海图；在哥伦布的意识里，这些群岛就在1492年9月19日他所在位置的北面和南面。波多黎各在1424年匹兹加诺（Pizzigano）的地图上出现过，坎提诺（Cantino）图上的新英格兰海岸、1448年安德烈亚·比安科地图上的巴西以及1489年克里斯托瓦尔·索利戈（Cristobal Soligo）海图上的许多西印度群岛——在哥伦布到达这些群岛前，所有这些群岛都被绘制过了。

1479年，哥伦布和圣港岛（Porto Santo）总督的女儿——唐娜·费莉帕·佩雷斯特雷洛（Dona Felipa Perestrello）结婚，圣港岛是靠近马德拉群岛（Madeira）由葡萄牙人建立的一个小岛。哥伦布那即将到来的婚姻使他有了足够的勇气写信给著名学者托斯坎内里(Toscanelli)，而后者即刻回了信："来函及物品均已收到，甚感欣慰。我关注您的宏愿—按照我给您的地图上所指出的道路从东向西航行(即向西航行到中国)。"(9) 在托斯坎内里给哥伦布的信中提到的"地图"已经失传，但是从托斯坎内里给葡萄牙国王的另一封信中，我们能重新绘制出这张地图，其中包括大西洋："从你所知道的安的列亚岛到遥远的呈岛状的齐潘戈(Cipangu)[①]，这两者之间有10个区域……因此，在未知的水域上再也没有剩下什么伟大的地方可被横穿了。"(10)

① 马可·波罗对日本的称呼，作者误解为中国。——译者

对于葡萄牙人而言，安的列亚岛的确闻名遐迩。1431年葡萄牙人在此定居，而1492年哥伦布航海时，葡萄牙人仍在这儿。但是，哥伦布对于美洲的了解在不断地加深。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哥伦布知道了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及巴西东北部海岸。(11)他看过标有大西洋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他也深知，绕过好望角向东方航行可以到达中国和香料群岛。因为，当迪亚斯告诉国王他在这一纬度绕过了好望角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弟弟巴托罗梅（Bartholomew）都在场。(12)通过向西到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航行，哥伦布借此而名声大振。

当然，哥伦布看了1428年的世界地图。这件事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在1513年皮里·雷斯绘制的地图的注释内容中，认为哥伦布已知道白天往南面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能到安的列亚岛；在哥伦布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他提到了南美洲的一些群岛，这封信是在葡萄牙探险者们发现美洲大陆的航程开始之前写的；还有，从哥伦布题在他自己的一本书边角上的注释，可以证实这一点，这本书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写的描述马可·波罗从中国航行到印度的过程。简而言之，哥伦布知道通过向西航行（像托斯坎内里的信中所说）或通过朝东走都能到中国。从1428年的世界地图，哥伦布一定明白了向东走的距离是最短的。

一定是上述的这些情况，使哥伦布恐慌地意识到：葡萄牙人正好在绕过好望角向印度洋航行的路上，从那儿他们可以随着季风到达中国。葡萄牙人顺非洲海岸而下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1485年，迪亚斯到达非洲海岸相当于南纬13°的地方。在这一时期，哥伦布不仅知道向西航行的路线，而且还在1477年航行到了冰岛（Iceland），他听人说过中国人曾到过冰岛。

1485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离开了葡萄牙，自从他结婚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待在那儿。正如鲁杰罗·马里诺先生（Senor Ruggero Marino）所说：在那段日子，哥伦布可能进行过一次由教皇提供资金的秘密的航行，其目的地是安的列亚。马里诺的假设大部分是基于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Ⅷ）坟墓上的铭文。英诺森八世死于1492年7月，在哥伦布去巴哈马（Bahamas）的首航之前。在教皇墓上的铭文写道“*novi orbis sou auroinventi gloria*”——即“熠熠发光的新世界凭借它的黄金正在被发现”。

作为绘制葡萄牙地图小组的成员之一，巴托罗梅·哥伦布留在了葡萄牙，直到从航行中传来有关新发现的消息。从1487～1488年，迪亚斯

顺着非洲海岸向更远处推进，并且到达了今天称之为好望角的地方。在1473年，葡萄牙人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太阳的黄道倾角来计算纬度，所以迪亚斯能够将好望角的纬度定在南纬34° 22′ 。而哥伦布兄弟都知道这一精确的纬度。

现在，哥伦布的“西航计划”陷入了困境，因为此时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向印度航行的航程即将开始。除非哥伦布行动迅速，否则将失去一次得到荣誉的机会。此时，天主教君主菲迪南（Catholic monarchs 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已经开始袭击在西班牙拥有最后一块领地的摩尔人。这块领地在环绕格拉纳达（Granada）的内华达山脉（Nevada）的南部。哥伦布无望从葡萄牙人那儿得到赞助，因为后者正专注于到中国去的东方之行。哥伦布知道，他惟一的机会就是天主教君主，因为天主教君主既没有1428年地图，也不知道东行到中国去的路程最短。所以，哥伦布费尽心机劝说菲迪南和伊莎贝拉相信到中国去最快的路线是向西走。笔者认为，这也是哥伦布偷盗、伪造文件的动机，而且克里斯托弗和巴托罗梅兄弟俩也确实这么做了。

时间如此凑巧，机遇来了。1492年，格拉纳达战败投降，天主教君主希望继续进攻摩尔人在海外的领地。如果哥伦布能够劝服菲迪南和伊萨贝拉相信他的计划是现实的，那么哥伦布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西航计划就将会被接受，并且能有机会赶在葡萄牙人之前到达香料群岛。

1963年，耶鲁大学地图管理负责人亚历山大·O·菲托尔（Alexander O. Vietor）向世人报道了一张由一位匿名捐赠者所捐的地图。地图大约长6英尺，宽4英尺（180 × 120cm）。这就是由亨利库斯·马尔泰卢丝（Henricus Martellus）署名的宏丽的世界地图。菲托尔接着说：

> 这幅地图是用色胶画在一些尺寸不同的零散的纸上的，整张图以一张加框的画布为底板，大部分是按绘画手法画的。在地图的页边还标有纬度和经度的刻度，这是第一张标有经度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齐潘戈（Cipango）处在离加那利群岛90°的地方。(13)

随后，菲托尔教授与阿瑟·戴维斯教授（Arthur Davies）取得了联系，后者其时正是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里尔登·史密斯地质学会（Reardon Smith的主席，公元1948～1971年在任）。同时，

菲托尔教授也向戴维斯教授提供了有关地图的红外线摄影图片以供后者仔细研究。这张被我称为“耶鲁马尔泰卢丝”（Yale Martellus）的地图比1489年绘制的另一张马尔泰卢丝地图尺寸大4倍。专家们，主要是指戴维斯和菲托尔，一致认为“耶鲁马尔泰卢丝”地图是真迹。而且1489年的马尔泰卢丝地图复印本尺寸是它的1／4大小。阿什雷·斯克尔顿（Ashleigh Skelton）也得出结论说耶鲁地图是真实的，它的作者就是马尔泰卢丝。我认为：这两张地图尽管都是真实的，但都有伪造的成分，而伪造者就是巴托罗梅·哥伦布。

1489年马尔泰卢丝地图所描绘的地理范围从加那利群岛扩展到了中国的东部海岸。尽管没有给出子午线和经度，但从地图的比例尺寸来估计：从里斯本到中国东部海岸的距离不会少于230°，可能是240°。向西中国海岸在里斯本西面大约130°左右的地方。关于东部的距离是极其夸大的。1376年卡特兰地图（Catalan）所标的从葡萄牙向东到中国的距离大约是116°，1457年热那亚地图（Genoese）所标的约是136°，而1459年弗拉·毛罗（Fra Mauro）则是120°。但是，从加那利群岛（Canaries）到上海的实际距离是141°，所以说1489年马尔泰卢丝地图将从葡萄牙东部到中国的距离夸大了将近100°。但是，哥伦布兄弟知道从里斯本向东到中国的真实距离，因为葡萄牙人拥有1428年世界地图。

或许马尔泰卢丝地图在1489年之前还未完成，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完全是1487年巴托洛梅·迪亚斯旅行发现的细节——在这一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洋。1488年11月，迪亚斯返回葡萄牙。于是，关于迪亚斯一年旅行的所有细节都出现在了在意大利绘制出的马尔泰卢丝地图上，其中也包括迪亚斯丰富的专业术语。在对这张地图的保密方面，葡萄牙国王费尽心机，他规定偷盗地图将被处以死刑。而葡萄牙政府的保密计划一下子被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人给揭开了，这个人知道所有的细节。

关于两张马尔泰卢丝地图的第二点伪造之处是，从赤道到南纬29°之间的马来亚半岛上又附加了一个很大的像狗尾形状的岛，此岛延展到了中国。这个半岛是如此的巨大和宽广，以至于看上去它使得任何来往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行都成为了不可能。简单说来，任何一个已经进入印度洋的人都无法继续向东进发。对于第三方，如手里没有1428年地图的天主教君主，它表明人们不能绕过好望角向东到达中国。

这两张马尔泰卢丝地图的第三点伪造之处在于：地图扩展了好望角向南的纬度，而这一纬度迪亚斯确定为南纬34°22′到南纬45°。巴托罗

梅·哥伦布对这点负有责任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就是他亲手伪造的。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的财产中发现有伊马戈海图(Imago Mundi)。在这张海图的页边以及有字一面的反面，都写有很多的内容。戴维斯教授毕生都在研究比较哥伦布兄弟的手稿的特点，他确信海图的第23页出自巴托罗梅之手。在这页上写道：

> 注意：1488年12月，由3条船组成的船队的总队长巴托洛米乌·迪亚斯，在奉尊贵的葡萄牙国王之命，探寻了几内亚(Guinea)境内陆地之后回到里斯本。他向国王报告说，他在那边的航程超过了600里格，即向南航行了450里格，又向北航行了250里格，还绕过了好望角(Capa de Buon Esperanza)。我们认为被迪亚斯称为好望角的地方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①]。迪亚斯还说，在那个地方，他用罗盘观测到他的位置处在赤道南45度的地方，而且这地方距离里斯本有3100里格。他记录下了这次旅行，甚至把所获知识一里格一里格地细细地标绘在一张海图上。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尊贵的葡萄牙国王能更清楚地了解整个航程。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都在场。(14)

巴托罗梅·哥伦布声称迪亚斯将好望角的纬度定为南纬45°，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那时候，除了哥伦布兄弟以外，在里斯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关于45°的说法，这是因为巴托罗梅在提出这一说法时，已经离开了葡萄牙。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哥伦布兄弟同马尔泰卢丝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或许马尔泰卢丝才是伪造者。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推测出他们之间的联系。第一，马尔泰卢丝是意大利人，但马尔泰卢丝地图的某些内容只有葡萄牙人知道。而且，早在数日前，就规定盗取这些机密会被处死。接触到被视为高度机密的地图的葡萄牙人肯定对马尔泰卢丝透露了一些内容。这表明告密者是巴托罗梅·哥伦布，或是值得信任的地图绘制小组的其他成员，比如波西米亚(Bohemia)的贝海姆(Behain)。

然而，巴托罗梅·哥伦布与马尔泰卢丝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来源于耶

① 今埃塞俄比亚。——译者

鲁的马尔泰卢丝地图的绘制组成。耶鲁地图的散页尺寸各异，这点就排除了它们是被印制的地图单页可能性，否则它们将不得不被制成统一的尺寸以适合装订。在亚历山大·菲托尔同戴维斯教授来往的私人信件里，菲托尔说：通过X射线检测，在这些散页上没有发现印刷的痕迹，而且耶鲁地图所有的内容都是手绘的，包括文字和上色。简单来说，这张图是摹拟而成。经过戴维斯教授的鉴定，确定是出自巴托罗梅·哥伦布之手。对这个让人震惊的断言，戴维斯教授做了如下解释：

1485年，哥伦布离开里斯本去西班牙时，巴托罗梅作为一个具有热那亚风格的绘图员，积累了丰富的绘图技巧。他待在国王约翰二世（King John II）设立的专门负责绘图的馆邑中。而在西班牙的哥伦布却致力于在唐纳斯·尼古劳斯（Donnus Nicolaus）和葡萄牙海图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一张更大的世界地图。就像当时所有重要的海图一样，这张大的海图被绘制在了零散的羊皮纸上，之后又被不留痕迹的缝合起来，用亚麻布托在下面。这张180cm × 120cm的巨大地图成为了标准的葡萄牙世界地图，而且上面还不断地增添了一些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包括康（Diogo Cão）和迪亚斯的发现。1489年年初，还在西班牙的哥伦布陷入到贫困和失败之中：1488年他的退休金被停了；此外，他不再从梅迪纳·塞利公爵（Medina Seli）或是马克思·德·莫亚侯爵（Marquess de Moya）处得到免费的膳食和住所。在这种情况下，巴托罗梅准备到西班牙去，和他的兄弟哥伦布在一起，并帮他实现他的计划。兄弟俩急需用钱，尤其是来自热那亚（Genoa）的圣乔治亚银行（St George）必需的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他们确实也得到了这些支持。钱可以从出卖葡萄牙秘密地图中得到，在离开里斯本之前，巴托罗梅复制了尺寸合适的地图。巴托罗梅不得不秘密地复制这张巨大而又标准的世界地图，从图的大小来看，他需要11张纸，要比羊皮纸便宜、要薄、要不引人注目。于是，耶鲁的马尔泰卢丝地图就这样由巴托罗梅亲手绘出了。1489年初，巴托罗梅离开里斯本。他首先到塞维利亚（Seville）去帮助他的兄弟哥伦布，这是他第一次到塞维利亚。在那儿，巴托罗梅通过替换图中的一页而更改了地图。这页原本将非洲正确地定位为纬度34°22′，被改成了南纬45°。镶有画框的马尔泰卢丝地图看上去更像是一幅画。地

图只画到了南纬41° 的地方。如果要把这个位置加到地图里，必须将图绘到南纬45° 。(15)

第二条线索是地图上在非洲东海岸处的一条文字说明，上面写着：Ultima navigatio Portuga A.D. 1489，意为“葡萄牙航海最远处，公元1489年”。在它上面，由于马尔泰卢丝地图将地理范围扩展到南纬45°，这条说明似乎表明了一点，即迪亚斯已经沿着南非东海岸前进，航向北，一直到纳塔勒省 (Natal)。但在这次旅行中，他并没有做到。说明文字所显示的地理范围是南纬33°到34°之间，这一精确的数据是依据迪亚斯所到之处——王子河 (the Rio de Infante)，在南纬34°的“大鱼河”(the Great Fish River) 而得出的。因为在地图上，非洲的地理位置延展到南纬45°，所以说明文字出现的地方就在纳塔勒省的北面了。巴托罗梅将地图改为南纬45°，但他却无法将说明文字挪走。

结合这三点伪造之处，表明它只不过是要排除从葡萄牙向东到中国的可能性。显然，马尔泰卢丝地图的目的不是去影响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人拥有1428年世界地图，知道确切的地理位置。马尔泰卢丝地图能影响的是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的天主教君主。从托斯坎内里的信可见，当时的一个纬度相当于50海里 (即90公里)。根据伪造的马尔泰卢丝地图来看，要想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人们需要从北纬39°航行到南纬45°，如再向北航行到印度则需要再航行45° 加 15°，所有这一切表明印度的航程有15000海里。此外，要想绕过非洲，船队必须航行到南纬45°以下的地方，通过被迪亚斯视为他所到过的最危险的海域，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几种方式伪造的马尔泰卢丝地图描绘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向东的航程。在从安的列亚向西到中国航行的过程中，西班牙的船队能够通过麦哲伦海峡，这胜过葡萄牙。那么，为什么葡萄牙人专注于从东面的路线到中国，而西班牙人却致力于经南美洲到中国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此。巴托罗梅·哥伦布窃取了葡萄牙政府的海图，之后又伪造了一张图。只有他和哥伦布知道这份海图是假的。他们拿这张假图和谎言去骗取热那亚的圣乔治亚银行以及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的金钱和支持。但是，哥伦布留给后代的真正遗产并不是关于美洲的发现，而是大西洋上的季风系统。这是哥伦布在他后来的几次航海过程中，通过卓越的分析和探索得出的。风和流动模式的知识对于准备和实施航海而言，其价值

是难以估计的；这些航行导致了以后几个世纪美洲的殖民地化。

最后，是有关于“那位机敏的航海人詹姆斯·库克船长这个才能卓越、声明显赫而且航海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16) 库克三次伟大航行的第一次开始于1768年，是到太平洋去探测关于贝努斯(Venus) 的路径。然后，越过了太平洋，而且发现了“新西兰”，他发现这是个很适合定居的国家，应该是极其值得英国人注意的目标。库克船长探察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而且以国王的名义宣称了对整个国家的权力。在他返航过程中，他路过了新几内亚（New Guiea）和好望角。

1722年，为了完成对南半球的发现，他第二次扬帆出海。库克到了新西兰，为了给将来到这儿来的探险者和定居者提供食物，他运来动物，种植蔬菜。接着，库克向南航行到南极的边缘地区。库克第三次到太平洋去航行的使命是寻找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去的北部通道。他又一次访问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接着又向北美驶去。探察了从俄勒冈(Oregon) 向北的海岸。库克驶入了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发现了一条无冰阻碍的路线，最后返航。1779年2月14日，因为与土著居民发生争执，库克在夏威夷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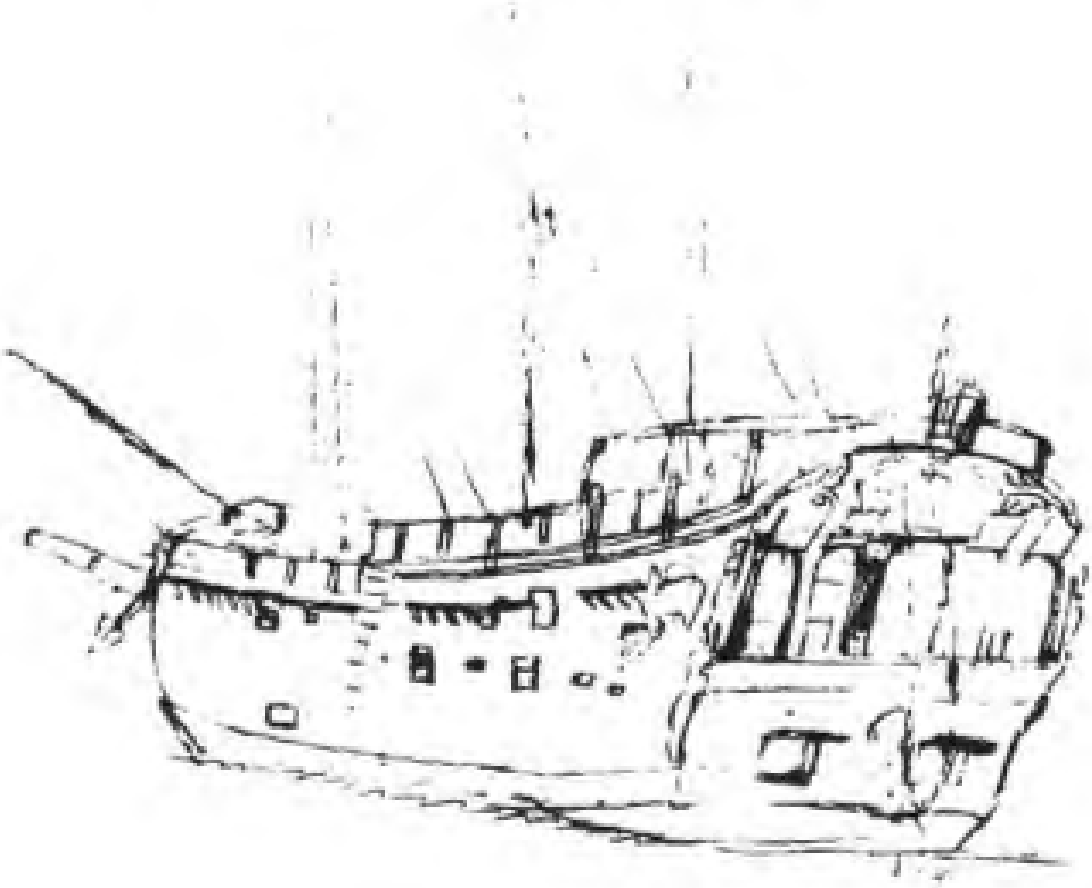
库克是一位伟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但他既没有发现新西兰也没有发现澳大利亚。在他开始航海生涯的两个多世纪前。迪耶普学校的一组地图十分清晰地标出了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当库克开始航行时，让·罗茨地图为英国政府所有；与库克同行的约瑟夫·班科斯(Joseph Banks）却拥有一张更好的地图，“哈尔莱海图”（the Harleian)，这张图绘出的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和罗茨地图一样精确。这位海军上将也知道迪耶普书院里的德斯利安（Deslien）和德塞利耶（Desceliers）地图。后来，库克船长在奋进号海峡（Endeavour Reef）被困。这个海峡与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库克镇港（Cooktown Harbour）一起，都被清楚地绘在了那些早期的地图上。当库克从奋进号海峡脱险后，直接驶向了库克镇港。因为，库克镇港是这1000里海岸线上惟一的港口。“尽管这个港口没有我以前听说过的那样大，但它对我们的航海计划将起到良好的作用。”(17) 从德斯利安的地图来看，库克镇港确实不小。这是因为，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当海军上将周满绘制地图的时候，海平面很低。

库克船长返航后，宣称已经发现了澳大利亚。但是，英国海军总队地图绘制部门的负责人——达尔林普尔(Dalrymple)却著文极力反对这

一说法。詹姆斯·库克船长为人非常勇敢、坚决，而且还很正直，但他终究没有发现大陆。海军总队所拥有的地图早在250年前就绘制出了澳大利亚。

虽然哥伦布、迪亚斯、达·伽马、麦哲伦、库克以及其他来自欧洲的探险者们都很勇敢，并且意志坚决。但是他们航海时都带上了地图，这些图描绘出到达目的地的路线。他们应将一切归功于第一批探险者，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进行了史诗般航海事业的中国人。1421年5月9日的一场大火焚毁了紫禁城，这对于中国是何其不幸。欧洲人得以重新“发现”了最初只为中国人及尼科洛·达·康提所发现认识的几乎整个世界。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者们所使用的航海图、船只及海洋导航系统有很多都得自于航海探险者亨利和他的兄弟唐·佩德罗，更多的是得自于中国皇帝——朱棣，以及他的勇敢且极富航海经验的宦官舰队司令官——郑和（以及他的助手）、周满、洪保、周闻及杨庆等。

库克的“奋进号”船图，1770年6月悉尼·帕金森所绘。



瓦斯科·达·伽马并不是第一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并没有发现美洲，麦哲伦也并不是第一个环绕地球的人。还有澳大利亚早在库克船长到达之前3个世纪，南极早在欧洲人最初尝试占取之前4个世纪就已经分别被人发现了。所有这些事实的公布对于那些勇敢且航海技术娴熟的探险者的拥护者来说，可能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甚至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疆理图、匹兹加诺、皮里·雷斯、让·罗茨、坎提诺和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的航海图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这些航海图包含有仅能得自于富于开拓精神的中国舰队上的制图员的信息。尼科洛· 达·康提登上了从欧洲到达澳洲的船只；唐·佩德罗又从达·康提那里得到这一信息，并把这一信息体现在地图上从而展示了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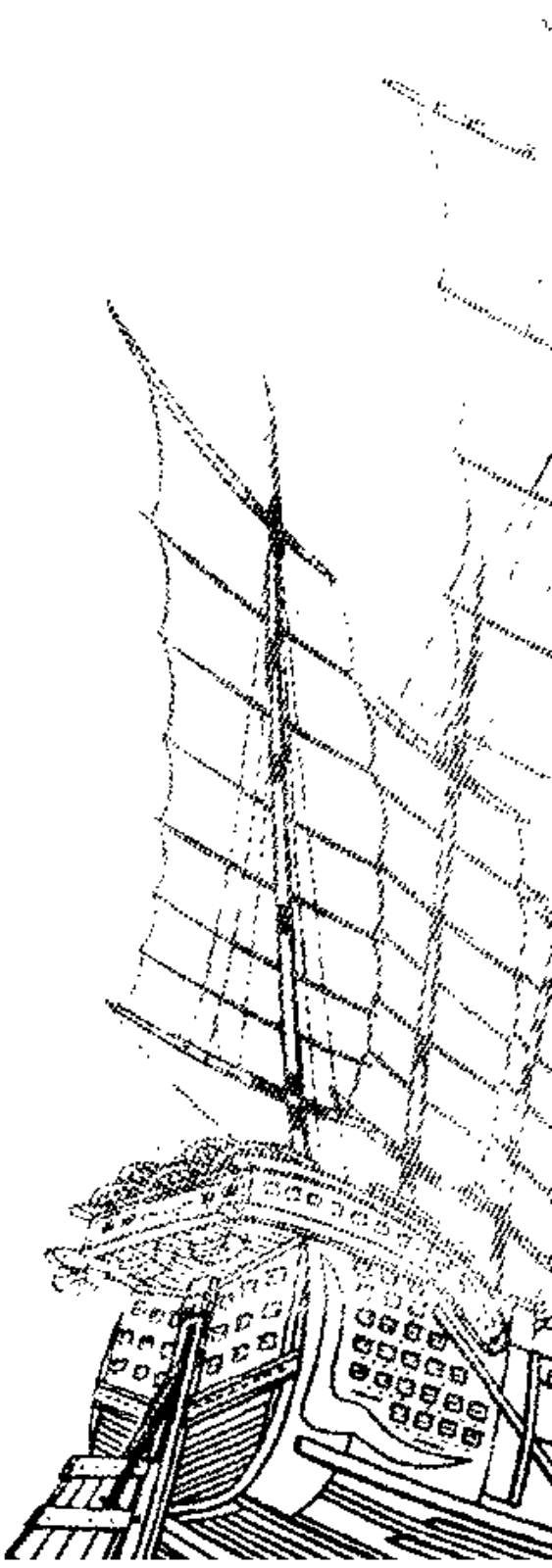
托斯坎内里说服了哥伦布，使他相信自西航行也可以到达中国；当麦哲伦告诉他那群发动骚乱的船员说他航行前曾于葡萄牙财政部的地图上看到现在众所周知的“麦哲伦海峡”时，他几乎就是在述说着事实。事实也可以比小说更奇妙。

坐落在萨格里什(Sagres)的航海探险者亨利王子的墓志铭上究竟记载了些什么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一生所做出的牺牲和成就呢？他开辟了将要征服世界的欧洲探险之路，而现在除了一座倾颓的日晷仪埋没于荒草乱石之间外别无所有。

位于中国江苏省西部牛首山（Bull′s Head Hill）的郑和墓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墓穴被乱涂乱划并且四周杂草丛生。他的纪念馆也因缺少人们的关心而被迫关闭了。上天有灵，这些伟大的探索者们将会在天堂里得到安慰。

结语

中国人的遗产



当中国处于黄金时代，她的权势和影响从日本扩展到非洲乃至整个世界，而这一时期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保存着。从马六甲到科贝(Kobe)，中国的佛教建筑装点了亚洲的地平线。从非洲到日本都可以发现中国明朝的丝绸。从澳大利亚到满洲（Manchuria)，可以发现精美的青花瓷器。在全球很多地方的墓葬里都能看到那一时代的玉制珠宝。即使是到东南亚的最老于世故的旅行家都必定会对中国遗迹的普遍性感到震惊。从苏门答腊到帝汶岛（Timor）到日本，很多社会依然与中国联系紧密，依靠着从中国继承来的贸易、宗教和文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方圆4000公里内中华帝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是一个巨大的印迹。

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她的广度一样令人感到钦佩。三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铸铜技术，并且在上面刻上了简单但令人震惊的图案。到秦朝（公元前221～206年）时，它的陶器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了，秦朝兵马俑中矫健的马匹和姿态优美的士兵就是其代表。当我们的欧洲祖先衣衫褴褛时，生活在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富裕的中国人正在用镶着凤凰和龙图案的金盘用餐，用镶着奔腾马匹图案的银杯饮酒。水果放在白玉碗中。商人的妻子们身披精美的绣花丝绸，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波斯香料的香气。她们的耳朵、脖子和手腕上都装饰着精美的玉饰和金饰。

中国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着1000年的经验和专门技术。公元前305年，土壤保护和谷物轮种一直是写给帝王书信的主题。朱棣的巨大船只和不可思议的远航使八百年来海上航行发现达到了顶峰。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的船队在当时到达了澳大利亚。当郑和率船队出海时，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已经有600年了。他所率领的巨大船队甚至让两百年前的忽必烈汗（Kublaikhan）的船队相形见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领先于世界几百年，万里长城代表了他们先进的军用和民用工程技术。万里城墙所提供的稳定和保护确保了在所有伟大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独存下来。它最显著的国家象征是她的不朽的历史著作，以及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顺应力及忍耐力。

尽管在经过几个世纪后，中国人海上探险的证据大部分已经丢失或损坏，但是今天有一种确实的证据处处可见：中国船队将动物和植物带到新的土地上，同时又把新土地上的动植物带回中国和东南亚。中国对文明最大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植物的栽培和传播。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世界植物的全球传播开始于1492年哥

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后。英国在特拉法尔加角战争（the Battle of Trafalgar）后奠定了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这也加速了这一传播进程。实际上，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搜集了很多植物，但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农作物在哥伦布开始他的第一次航海时就已经在世界上传播。欧洲不仅仅拥有了向他们展示通往新世界的航海图，而且当他们到达新世界时，他们发现很多重要的农作物已经在那里繁荣生长。至少有27种重要的已知农作物已经被带到夏威夷群岛，它们来自于印度、亚洲、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美洲甚至非洲。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夏威夷时，甘薯、甘蔗、竹子、椰树、竹芋、山药、香蕉、姜黄、姜、胡椒、面包果树、草莓、葫芦、木槿、石栗树已经在那里生长，但它们没有一种是土生在那儿的。

在波利尼西亚以及从新大陆到复活岛（Easter Island）去的中途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那儿，第一批到达加勒比海（the Caribbean）的欧洲人发现了源于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的托托拉(totora)芦苇，源于南美的西红柿、野生菠萝和甜土豆，中北美洲的烟草，非洲的葫芦，中美洲的番木瓜果，东南亚的山药，南太平洋的椰子。第一批到达加勒比海的欧洲人也在那里发现了椰子。麦哲伦在菲律宾（Philippines）装载了原产于中美洲的玉米，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玫瑰；南美洲则有来自亚洲的小鸡。至少有94种仅在南美和澳大利亚生长的动植物在这里生存；另外还有74种，包括其中的108种独特的生物种，仅在西非和美洲热带生长的动植物在这里随处可见。(1)

有人认为这些大量的植物有可能依靠自然的力量来传播，种子依靠洋流和风的力量或者鸟类的帮助将它们带到这里。椰子可以漂流，在理论上，它们可以从南太平洋穿过印度洋、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最终到达加勒比。当然，有一些种子的传播是从岛屿漂流到岛屿，而另一些种子和孢子无疑是通过风的携带。但是，认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设想是荒谬的。玉米和甜西红柿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它们的种子不能漂流。对于鸟类来说，甘薯的种子太重了，无法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在最近30年，一批著名的植物学家对所种植物的起源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于植物分类的进一步了解，植物学家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些植物栽培和起源地的观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椰子，早期的欧洲探索者在中美洲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发现了它。

椰子被认为是起源于新大陆的植物，因为在那儿有其他的

生物种。然而，现在椰子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物种，与其最相近的物种生活在非洲。从椰子的化石标本和它的变异及穿过海洋的范围来看，椰子的起源不是从东方到西方，而是源自西太平洋，从西向东传播。(2)

对普遍生长在非洲和南美洲以及澳大利亚的植物的分析表明：所有这些植物都是顺着风和洋流的方向传播的，简单地说，就是依靠人力划动的船传播的。人们还不知道曾经有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的船离开过太平洋进入到印度洋和南大西洋。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前，植物的传播就已经开始了。只有一个国家的船只有可能携带了这些动植物环游全球。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船只携带了这些植物和它们的种子——在萨卡拉门托（Sacramento）的中国式帆船中能够发现它们。中国的船只不仅环游航行了世界，而且为已经发现的曾经发生过的植物传播的路线，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印度，再到非洲，接着穿过南大西洋到南美洲，最终到达澳大利亚。

稻米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也许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品种最多、适应性最强的作物之一。中国人培育了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的稻米可以在干旱的山坡上生长，而有的则需要浸泡在水中；有的品种需要几个月才能成熟，而有的却只要两个月；有的对温度很敏感，而有的则对阳光敏感；有的杂交品种十分耐盐，以至于常常被用来改良海边的沼泽地。稻米是一种理想的食用作物，它味道好，有着豆类产品的风味，同时它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稻米易储藏，易于煮食，经济实惠。稻米单位产量也比其他谷类作物高。直到20世纪，稻米的每公顷产生的热量是其他谷类作物的7倍，(3) 而中国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国家。

10亿以上的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以稻米为主。作为养活了众多亚洲人口的理想粮食作物，稻米比西方社会的面包享有更高的地位。在中国，一个人丢掉工作叫“打了饭碗”。婚姻和生意也以米酒表示庆贺。在西方，我们撒播作为米的象征的五彩纸屑，以便为婚礼带来好运。当日本儿童仰望夜空，他们在月亮中看到的不是一名男子，而是一只正在做米糕的兔子。

在明朝，中国主要通过望加锡（Makassar）——在现代印度尼西亚基拉特（Selat）向太平洋地区出口稻米。运稻米的船伴随着载满珠宝的舰队。人们在萨卡拉门托的中国式帆船中发现了稻米。(4) 但是中国也进口植物。在利用他们在遥远的陆地上发现的作物方面，中国人展现了他

们的创造才能。东南亚的气候带——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是重要的作物源头。一个例子就是一些重要的作物例如小米、稻米、山药都是在这个地区驯化的。后来引进中国的作物包括甘蔗、香蕉、生姜和一些品种的柑桔、棉花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是郑和的船队从美洲带来的玉米。

除了稻米，玉米是世界上最高产的作物。与小麦相比，在同一地区，玉米的产量至少是小麦的三倍。而且，玉米能在酸性大的干旱地区和潮湿的丛林、海平面或者海拔12000英尺（3600公尺）的高度生长。玉米原产中美洲，却被第一位到达菲律宾的欧洲人麦哲伦在那里装运上船。现存的中国史料记载，郑和的船队带回了“大量的大穗谷物”。玉米适合生活在中国山区的人，因为它有很长的根，能够避免被暴雨冲走。种植在山坡上能够将霜打的危险减到最小。对于中国南部的苗族来说，引人产量极高的玉米有着很大的好处。今天，玉米——世界第三重要的植物，已经在亚洲传播开来，并且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食品。中国人带来的第三类食物是芋头、山药和甘薯。甘薯原产于炎热、潮湿的南美洲。随之它也成为温暖的亚热带国家的重要的根茎作物。在库克船长到达新英格兰时，甘薯已经成为毛利人的主要食物。他们称之为“库马拉”(kumara)，这个名称几乎与仍在沿海秘鲁的利马(Lima)地区使用的库马拉相同。真正的山药原产于非洲和东南亚，然而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夏威夷时，它就已经在那里生长了。芋头也是原产于东南亚，并且也是早于欧洲人到达夏威夷的。这些作物属于海芋属家族，像土豆一样，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可以溶解的淀粉酶。芋头在太平洋地区被广泛地种植，从南部的塔希提岛（Tahiti）——大片的芋头向离开塔希提岛机场的参观者招手致敬——到北部的夏威夷都是如此。

可以说，起源于不同地方的稻米、玉米、甘薯、芋头、山药为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它们的传播给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人类现在有能力在各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种植和收获作物。

中国人也在其他经济作物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丝绸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而且也在其他纤维作物的生产上担当着领头角色。几千年前在印度河谷首次被使用的棉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占世界农业产量的5%。开始，科学家和学者对于南美洲棉花的染色体结构迷惑不解，但是通过一系列艰苦的试验，专家们现在认为：毫无疑问，美洲棉花的一个母体是亚洲。第一批欧洲人在美洲

发现的野生美洲棉花同来自印度的棉花有同一基因。棉花从印度被带到了广东（Canton），公元八世纪时开始种植。在明朝之前的蒙元时期，棉花被广泛地种植。明朝的舰队在航行中携带了大量的棉花。（5）柯枝（Cochin）王十分感谢皇帝朱棣："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屋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6）

椰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坚果类作物。它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批到达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太平洋海岸的欧洲人发现了它。在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Srilanka）、加勒比有350万公顷种植地。椰子生长在热带，但能经受轻微的霜冻。椰子除了可以提供美味的果肉和椰子奶外，从干的白果肉中榨出的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于烹饪和煎炸以及制造肥皂、化妆品和润滑剂。榨过油后，干椰子仁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可以用来饲养牛以及作为儿童的食品。它的树干可以制成房梁，椰壳的纤维能够制成绳子。明朝的船队广泛贩运椰壳。

香蕉原产于东南亚。早期的欧洲开拓者在夏威夷也发现了它，随后将它带到印度、非洲、美洲的热带地区。同葡萄、橘子、苹果一样，香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果类作物之一。在整个热带地区，香蕉的亲族——富含淀粉的芭蕉被作为一种蔬菜食用。菠萝原产于炎热、多雾的南美大西洋海岸，但哥伦布在他1493年的第二次前往西印度的航行中发现了它。今天，有关中国宝船航行的证据在我们四周毫不夸张地增加着。

沿着十五世纪伟大的中国探险家足迹的漫长旅行之初，我了解到有一块纪念碑，它是由郑和建立的，矗立在中国扬子三角洲的一个海湾。你可以看见铭刻在上面的碑文。这是中国大陆惟一保存下来的可视证据，它见证了宝船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这些碑文由于遭到官员们的清除，只有少量保留了下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 "皇帝……命和等（郑和、周满、洪保、周闻和杨庆——原著者注）统帅官校骑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宣德化而柔远人……奉使西洋……大小凡三千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即40000英里）。"①

在我开始这次耗费我数年的航海发现之初，我对这些铭文很困惑。现

① 此碑即位于福建省的长乐碑。——译者

在，我回来了，通过旅行我得出的结论，我相信我发现的证据能够推翻西方世界长期接受的历史观念。我发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由郑和、周满、洪保、周闻和杨庆率领的中国的船队在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中到达过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他们穿行过62个列岛，共17000个岛屿，并且绘制了几万里的海岸线图。郑和海军元帅宣称访问过3000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看来是真的。中国的船队穿过印度洋来到东非，绕过好望角来到佛得角群岛，通过了加勒比海到南美和北极，接着向下绕过合恩角、南极、澳大利亚、新西兰，跨越太平洋。在整个十万里航程中，也许在南极，宝船才可能遇上狂风或逆流。

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伟大航行之前，朱棣已经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包括韩国和日本纳入到中国封贡体系中。丝绸之路的东端已从中国重新打开，最远到达波斯。中亚也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印度洋由中国的舰船控制。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宝船队之行扩展了这个已经很辽阔的贸易帝国。他们沿着北美和南美的太平洋海岸，从加利福尼亚到秘鲁建立了永久殖民地。在澳大利亚、整个印度洋地区和东非也有定居者。他们还建立了供应基地，首次直穿太平洋将美洲和中国联系在一起，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中国之间也建立了供应基地。这些基地覆盖了广大的地区：从复活岛到达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通过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和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到塔希提岛、西萨摩亚（Samoa）的萨拉伊岛（Sarai）、汤加（Tonga）、所罗门群岛（Solomons）的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hristobal）、南马多群岛（Nan Madol）、加罗林（Carolines）的雅浦岛（Yap）和托比岛（Tobi）以及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的赛班岛（Saipan）。今天，在这些群岛上，我们还能看见简陋的石制营房、码头、房屋、水库以及观测台的遗迹。郑和的庞大舰队和供应船将所有的定居地和供应基地联系起来。

我认为中国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所谓“迷失年代”的航行是依靠《疆理图》、皮里·雷斯、让·罗茨、坎蒂洛、瓦尔德塞米勒、匹兹加诺的航海图。没有人对它们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文兰航海图曾经受到过质疑，但是根据我的证明（参看第十四章），我相信它通过了真实性测试。匹兹加诺、让·罗茨和坎提诺的航海图描绘了整个南半球，包括数千万平方英里的海域，数千个岛屿，以及从南极地区到赤道的几万英里的海岸线。他们所展现的陆地只能被早于欧洲

航海大发现、到达南半球的船队所看到，而这只能是中国人。

这里有许多有关这些伟大中国航海的实物证据。在菲律宾的潘达南岛(Pandanan)上的中国式帆船生动的证明了，中国同印度洋地区、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范围。在东非的海岸线，波斯湾和澳大利亚发现了明朝的瓷器，在开罗发现了明朝的丝绸。新西兰和南澳大利亚出土了中国船队的遗骸。在这些国家也能够发现中国人曾经去过的大量证据。越过印度洋，在佛德角群岛、新西兰和南美洲，树立着很多石刻。中国的小鸡被带到了南美洲，玉米从南美被带到了中国。在拉穆群岛（Lamu Archipelago)、达尔文岛（Darwin）以及新西兰的鲁阿普基岛海滩（Ruapuke)，人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的用于还愿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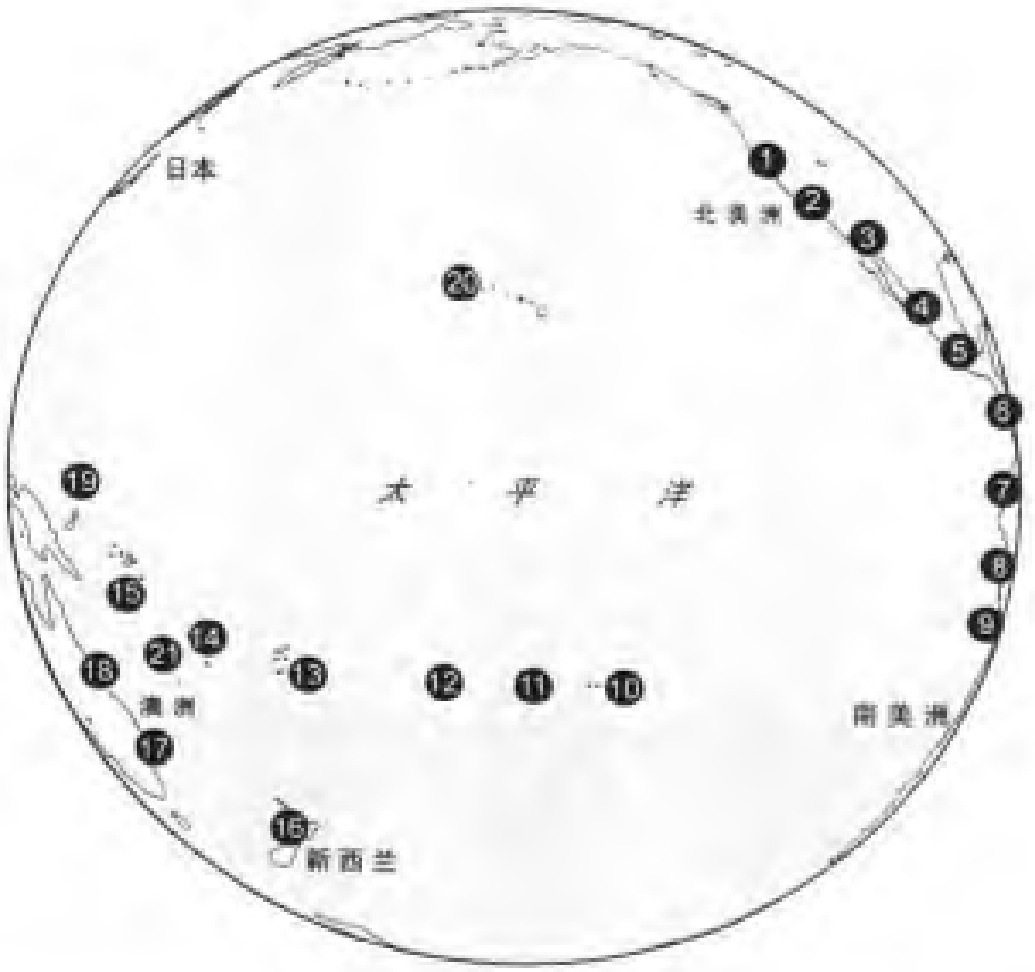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证据的广泛、深入和多样才使得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中国伟大的航海如此令人信服。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桃木残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印度商人旅途中无意留下的，但是几块遗骸再加上中国式的还愿的供品、瓷器和横口斧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当地土著的民间故事、壁画和清晰可辨的早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的几百年前就已绘制的巴里尔礁（Barrier Reef）地图，进一步确证了故事的真实性。印度洋地区发现的中国明朝的瓷器，也许是来自失事的葡萄牙船队的货物。但是证据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有很多黄皮肤的人、中国还愿的供品和第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发现的中国丝绸。这里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详细的海图，这些海图在葡萄牙殖民人考察印度洋之前就画的如此详细。为什么南极洲在地图上出现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这儿的时间还要早400年呢？对于这个疑问的唯一解释来自于埃里克·冯·达尼肯（Erik von Daniken）和查尔斯·哈普古德（Charles Hapgood)。前者认为是来自外层空间的侨民所画的，后者认为是法老统治前的埃及文明的成果。

麦哲伦在出航前看过绘有“麦哲伦海峡”和太平洋。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有人在他之前曾经通过海峡横越过太平洋。并且画了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动物，而当时还没有哪个欧洲人知道它们。这些图片于1430年出版。动物画、他们所沿路线的中国制品和现存中国地图上的大陆都证实这些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船、专门的技术、资金和时间来从事一次非同寻常的环游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无疑在那个时代，没有别的国家的人可以这样做。

这些观点无疑是令人感到吃惊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冷静的立场来看，

穿越太平洋的中国基地

1 萨卡拉门托
2 洛杉矶
3 加利福尼亚港
4 墨西哥——米乔阿肯
5 危地马拉
6 委内瑞拉
7 厄瓜多尔
8 北斯锐鲁
9 南斯锐鲁
10 复活岛
11 皮特克恩岛
12 塔希提岛
13 基里巴斯
14 萨摩亚
15 加罗林群岛
16 新西兰——怀卡托河
17 新南威尔士
18 金皮
19 密克罗尼西亚
20 夏威夷群岛
21 诺福克群岛



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拥有更古老、更辉煌的航海时代。当朱棣船队1421年出航时，中国人至少有6个世纪的海上探险和星象导航的历史。当迪亚斯和麦哲伦出航时，葡萄牙人一定在赤道南部有准确的导航资料。朱棣满载珠宝的船队是大规模造船计划的产物，这只有在中国经济强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迪亚斯和麦哲伦的轻快帆船同中国船相比就像小舢板一样，直到4个世纪以后拿破仑造出它的巨型帆船东方号

时，没有其他木制船能与这些巨型的宝船相比。这些巨型船显示出中国人航海技术的高超和他们在海上的统治地位，甚至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的欧洲战船的尺寸、范围和火力也不能接近中国的帆船。郑和那可以搭载28000个人、为数一百多艘的舰队，令尼尔森最多30艘、可以搭载18000个人的船队相形见绌。其珠宝船的长度是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的两倍，大梁也比它多出3倍。这些船队可以经受更大的破坏，能提供后勤支持，它们在海上呆的时间更长，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呆上几个月。

中国的船队绘制了世界地图。它们可以通过月食测量地球的经度。通过比较地图，它们可以解决任何经度差异，并且完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但是，这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只有四艘洪保的船和一艘周满的船返回中国，仅在这两支船队中舰队就损失了50艘船。人员伤亡也巨大：周满舰队的9000人中，只有900人在1423年的10月随他们的海军归来。一共有3/4以上的人死在途中或是被抛弃在散布在全球的定居点。

在全球共发现了24艘舰船的残骸。更多的携带数千吨珠宝的舰船还有待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海将必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有关沉船的迹象。迄今为止，人力和财力的消耗无法估量，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无法支撑这样的损耗。但是朱棣派出的舰队取得了成功。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在人类航海史上是独一无二、无法比拟的。

朱棣的征服计划是：探索和绘制整个世界的面貌，通过贸易和外交政策将整个世界纳入中国的封建政权之下。这项计划本来可以成功，因为整个世界现在处在中国的脚下。当死里逃生的满载珠宝的舰船在1423年秋天颠簸着回国时，朱棣一定感到十分自豪。然而，我们发现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已经永远的改变了。朱棣奄奄一息，高级官员们渐渐地解散了几乎由他刚刚创立的世界帝国的舰队。这里不再有封贡体系，不再有科学实验，不再有史诗般的航海贸易和探险。中国进入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的漫漫长夜。宦官船长被解职，船只要么被凿沉，要么任其腐烂。地图、航海图和数以千计记载航行的珍贵资料被销毁。朱棣的伟大功绩被抛弃、忽略，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淡忘。

历史上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假设：假如闪电没有在1421年5月9日击中紫禁城，大火没有烧毁皇宫和王座，会发生什么事？皇上最喜爱的妃子会活下来吗？皇上会继续保持勇气吗？他会命令郑和的舰队继续它们的航行吗？他们会在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建立永久殖民地吗？纽约会

被称为新北京吗？悉尼会有一个英语居住区而不是一个中国居住区吗？儒教而不是基督教会成为新世界的宗教吗？

文明的中国人被教导要怀柔远人，但取代中国人的是残忍的、几乎是野蛮的基督教徒，这些人成了这里的殖民者。通过冷血般的屠杀5000名印地安人，弗兰西斯科·皮扎罗（Francisco Pizarro）从因克萨（Incsa）得到了秘鲁。如果在今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战犯。

实际上葡萄牙人使用中国的地图找到了前往东方的道路。然后他们窃取了香料贸易，中国人和印度人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建立这种贸易。任何可能阻止葡萄牙人的人都被消灭。当达·伽马到古里时，他告诉他的人将印度囚徒游行示众，然后各取他们的手、耳朵、鼻子。所有被割下来的器官堆积在一艘小船上。历史学家加斯帕尔·科鲁亚（Gaspar Correa）描绘了达·伽马的下一步行动：

> 当所有印度囚犯被处死的时候，达·伽马命人把他们的脚给捆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手来给自己松绑了。为了防止犯人们用自己的牙齿咬开绳子，达·伽马命人用棍棒敲了他们的牙齿，还让它们吞下去……（7）

然后从古里来了一名求和的使者。“勇敢”的达·迦马割掉了他的嘴唇和耳朵，换上狗耳缝在上面。

似乎可以肯定郑和的船队下一步航行本来可以到达他们以前没有到达但是已经画好的地方——欧洲。北京发生的动乱结束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谁又能说如果中国装满珠宝的舰船在15世纪20年代出现在欧洲地平线上，随后的世界历史会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帝国的臣民没有随着朱棣退到排外和封闭的状态下，中国，而不是欧洲将成为世界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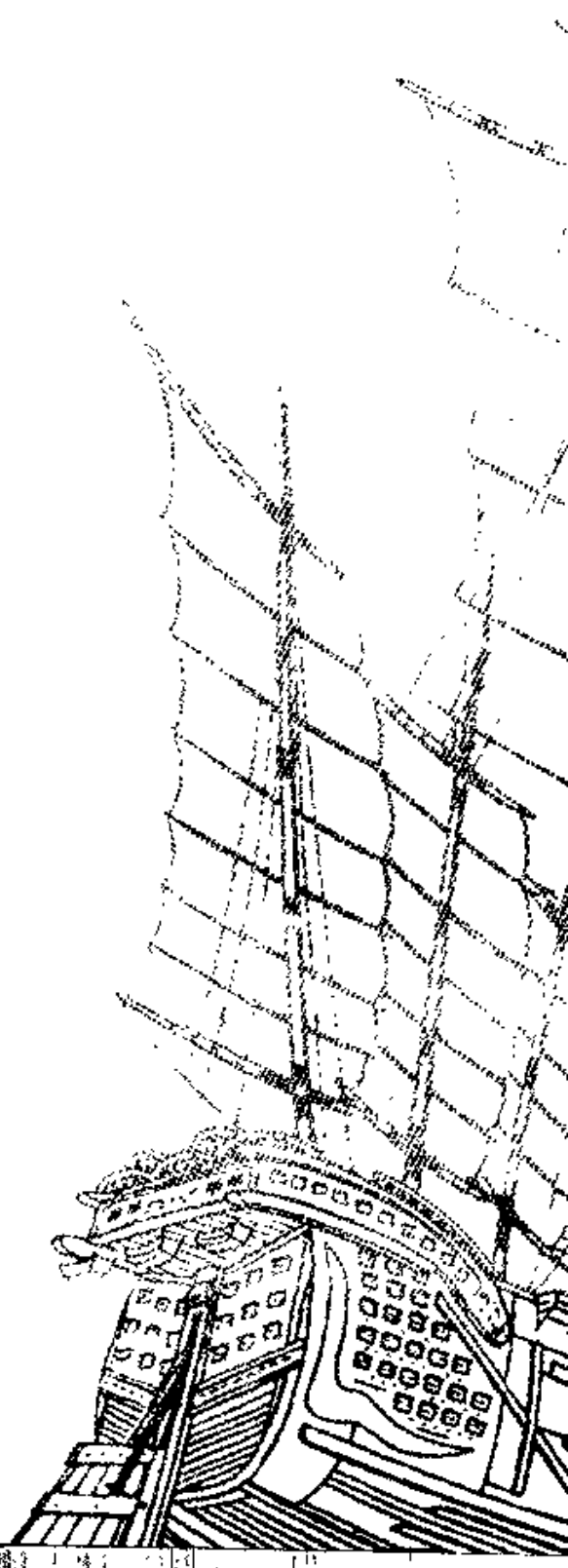
紫禁城仍然作为怀念伟大朱棣真知灼见的纪念堂矗立着，但是更适合的墓志铭应该是马背上的皇帝。他指向西方，指向扶桑、美洲，那片土地是他勇敢和技艺高超的海军所探索过的地方。当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身，放弃朱棣的雄心壮志时，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填补他们所留下的空间。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沐浴在本应属于别人的荣耀中。现在，最终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公正，将荣誉归属到它应属的地方。

确认中国人首先发现新世界和澳大利亚，并不是要抹煞对达·迦马、哥伦布、麦哲伦和库克的功绩和记忆。这些勇敢、技艺高超的航海家们的探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现在应该褒奖那些很长时间被模糊了的人了。那些伟大的中国航海家比达·伽马早66年绕过好望角，比麦哲伦早98年通过麦哲伦海峡，比库克船长早3个世纪发现澳大利亚，比第一批到达南极和北极地区的欧洲人早四个世纪。伟大的海军将领们郑和、洪保、周满、周闻、杨庆值得我们称赞和歌颂。因为他们是所有航海家中第一批、最勇敢的、最敬爱的人。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不管成绩有多大，都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的。

我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完成这些有关中国伟大航海的研究，最终在2001年的圣诞节完成了。我把它分发给世界各国的专家征求意见。当他们的修改意见被收编后，我准备在2002年3月1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上将我的发现公布于众。它将被宣传于36个国家的20亿人中。在各个大陆上从事研究的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证据。有些证据已经在这本书中采用。而更多的证据络绎不绝的每天到来。很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例如萨卡拉门托的帆船、比米尼的沙堆、罗德岛（Rhode Island）上的塔，都已经得到彻底的检验和评估。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我们大家应当一起分享这些成果。

附录一

1421~1423年间中国人的环球航行：有力的证据



第一部分：欧洲人没有发现新世界

1．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提供的证据2002年3月15日

2．在1428年整个世界已得到准确的绘制

3．第一批欧洲航海探险家们是用这幅图来显示他们目的地的

第二部分：只有中国舰队能够在欧洲人之前发现新世界

4．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

5．发现的关键——确定了纬度

6．中国人对经度的确定

7．中国船只的大小、底座和航行

第三部分：证据

9．幸存下来的中国地图和星图

10．被第一批欧洲人发现的中国人或亚洲人

11．中国舰队所到国家的证据

12．一个洲特有的植物被带到了另一个洲

13．一个洲特有的动物在另一个洲被发现

14．被第一批欧洲人发现的采矿和其他活动的证据

15．在中国舰队航行之后发现的一些古老、巨大、尚未识别船只的残骸

16．人工制品和提供的一些物品

17．石建筑，观测平台和石雕

18．语言学／语言

19．习惯和游戏

第四部分：线粒体的DNA分析

20．DNA分析

21．当地人的牙齿

第五部分：参考书目

第一部分：欧洲人没有发现新世界

1．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提供的证据 2002 年 3 月 15 日

——在网站 WWW.1421.TV 上

2．在 1428 年整个世界已得到准确的绘制

结论

● 在 1421 年 3 月至 1423 年 10 月之间，4 支庞大的中国舰队环海航行了世界

● 在穿越太平洋时，一些水手和他们的侍妾在马来西亚、印度、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些岛屿上定居了下来

● 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他们都有这样的地图，即能够指明他们前行目的的地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们遇到了一些中国移居者

● 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现了并在新世界上定居。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指路，欧洲人是不可能“发现”新世界的。

证据

（1）这世界地图是谁绘制的呢？

● 在欧洲人航海之前，匹兹加诺（Pizzigano），毛罗修士（Fra Mauro），皮里·雷斯（Piri Reis），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瓦尔塞米勒（Waldseemüller）和让·罗茨（Jean Rotz）已经绘制了整个世界。

● 在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他们参考了一些更早时期的地图；哥伦布、迪亚斯、加布拉尔（Cabral）、达·伽马、麦哲伦和库克的日记就是有利证据。

● 在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在地图上，那些国家就已经标明了。

北美——出现在瓦沃尔德塞米姆勒（Waldseemüller）、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的图上

加勒比——在匹兹加诺（Pizzigano）、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和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图上

南美——在皮瑞·雷斯图上

非洲、印度和东方——坎提诺（Cantino）在欧洲人能测量经度之前，该图上的非洲东部的经度是相当准确的

南极洲——皮里·雷斯（Piri Reis）

北极洲和西伯利亚——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

澳大利亚——让·罗茨（Jean Rotz），德斯利安（Desliens），瓦拉尔德（Vallard）、德塞里耶（Desceliers）

中国和远东——让·罗茨（Jean Rotz）

（2）葡萄牙人的声明

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ão）叙述到一幅世界地图于1428年被葡萄牙皇太子唐·佩德罗（Dom Pedro）从威尼斯带了回来，唐·佩德罗是葡萄牙国王的长子，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来到了意大利，游览了罗马和威尼斯；在那里他买到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图上有着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描绘。在该图上面，麦哲伦海峡被称作龙的尾巴；好望角（Boa Esperanca）海峡是非洲的最前面等等。

加尔旺还说道："在1528年法国的德·索萨·塔法尔斯（Francis De Sousa Tavares）[①]告诉我，唐·费南多（Don Fernando），也就是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给他展示了一幅图，这幅图是在阿尔库巴扎（Alcobaza）[②]研究中心发现的，在这幅图被发现之前，它已经被绘制了120年，正如我们的地图后来所画的那样，像带有好望角（Boa Esperanca）海峡的东印度已经绘在上面了。凭借这幅图表明了在古代有很多甚至是比现在更多的发现。"

但是是谁绘制了该图呢？据作者称唐·佩德罗说是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于1424年在佛罗伦萨（Florence）绘制的。达·康提曾经随着中国舰队从印度一直航行到澳大利亚和中国。

——《*Niccolo Da Conti*游记》(*Travels Of Niccolo Daconti*)

① 此处乃音译。——译者

② 此处乃音译。——译者

3．第一批欧洲航海探险家们是用这幅图来显示他们目的地的

这涉及到了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宣称他们发现并到达的土地：

● 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在托斯卡内里（Toscanelli）写给哥伦布的信中写道："我注意到你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想往东方航行的渴望，向西航行到中国……就像我送你的图上面显示的那样……（图是在1428年显示了安的列亚（Anitilia）[①]那幅世界地图的摘要）。"

在托斯卡内里（Toscanelli）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提道（在哥伦布航行之前）："……从你所知道的安的列亚（Anitilia）岛是波多黎各（Purtorico），于1421年由中国人发现的……到Cipangu（中国）……"

在1492年10月24日星期三在西大西洋上哥伦布的记录："我应该向西——南——西的方向航行，到达那里（到达Anitilia）……我已经见过了这个半球，在地图上面，它就在这个地区。"因此，根据哥伦布的论述，在他航海之前，加勒比（Caribbean）海出现在了葡萄牙的那幅世界地图上。

● 加布拉尔（Cabral）对南美洲的探险——第一个到达南美洲的探险家诺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rs）[②]写信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Manuel）道："国王陛下可能在由佩罗·达斯·比萨格都（Pero Daz Bisagdo）呈上来的世界（Mundi）图上见过这些地方。"

因此，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起航之前，巴西就已经在葡萄牙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出现了。

● 迪亚斯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迪亚斯的编年者在描写他们到达好望角时写道："他们看到了那个数百年来被隐匿的伟大而著名的海角……"这个海角画在了1459年的法莫拉（Fro Mauro）的平面球形图上（在当时Fro Mauro在葡萄牙政府工作）。

因此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该海角之前，南非就已出现在法莫拉（Fro Mauro）的图上的，该图是为葡萄牙人准备的。

● 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在进入麦哲伦海峡之际，麦哲伦平定了一次叛乱："海军将军说他知道有另外一个海峡，能驶出（到达太平洋），他已经在葡萄牙国王的海军图上见过了……"后来麦哲伦穿越了太平

① 此乃音译。——译者

② 此乃音译。——译者

洋，遇到了利马萨瓦（Limasava）国王。麦哲伦的编年人提醒道："他（麦哲伦）向他出示了那张海军地图……告诉了他，他是怎样发现麦哲伦海峡到达这儿的……"

因此，根据麦哲伦，所谓的麦哲伦海峡与太平洋一样，在他航行之前都已经出现在了葡萄牙人的地图上了。

● 库克"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幅出现澳大利亚的"皇太子"地图（Dauphinmap，公元1536）属于一位名叫爱德华·哈利·约瑟夫·班克斯（Edward Harley Joseph Banks）[①]的英国海军大臣（the First Lord of the British Admiralty）所有，他和库克船长一起出行，是他买到这幅图的。自从亨利八世（Henry Ⅷ）起，英国政府就拥有了让·罗茨图，在这幅图上同时也出现了澳大利亚。

因此，在库克船长航行之前，对于海军部而言，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得知关于澳大利亚的信息。

● 库克船长在皮瑞·雷斯图与皇太子图上所显示的暗礁处搁浅。这时他率领奋进号（HMS *Endeavour*），径直驶向现在被称为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这是延绵千里海岸线上惟一的港口）。在关于他踏上该港口的日记中写着："这个港口太好了，太适合我们了，只是它没有听说过的那么大而已。"

① 此乃音译。——译者

4．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

● 于1430～1431年所造矗立刘家港（北纬31° 7′ 、东经121° 35′ ）和江苏（北纬26° 、东经119° 35′ ）的石刻上面记载着郑和到达了3000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Duyvendak的翻译）。

● 在更远的一些地方，如锡兰／斯里兰卡（Ceylon/Srilanka）、印度洋、刚果(Congo)三角洲、佛得角、北美、巴西和新西兰都有石刻树立在那里。

● 在《武备志》中有一幅完整的中国星图保留了下来，该图显示了他们在哪一颗星辰之下。该图可能是根据北极星的起落来测量的。

● 一些地图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疆理图（Kangnido）（非洲的东部、南部和北部）；茅坤（印度洋）、台湾瓷器图（澳大利亚）；玉器饰物（南极洲）。

● 中国和波斯的一些幸免于劫的记载也给出了一些信息，在日期方面记道：于1421年出发，于1423年返回：《明史》（*Ming Shi*）、《明实录》（*Mingshilu*）、《西洋番国志》（*Hsi Yang Fan*）、《国榷》（*Kuo Chih*）、《新校明通鉴》（*Hsin Chiao Ming T' ung Chien*）、《明纪》（*Ming Chih*）、《历史之精华》（*Zubadatu's Tawarikh*）

● 印于1430年的中国的绘图本《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Strange Countries*）显示出在印度有狮于和大象，在非洲有斑马和长颈鹿，在南美洲有犰狳、美洲虎和磨齿兽（Malodon）。

● 印于1597年的中国小说《西洋纪》（*His Yang Chi*）中描写了郑和舰队的经历。

● （南京）卫教授后期的作品《中国人发现美洲》（在中国大陆尚未发表）（*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 卫聚贤(WeiChu-Hsien)教授的书《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ustralia*）（中国—东方艺术出版社，牛津）。

5．发现的关键——确定了经度

● 皮瑞·雷斯图南面部分的巴塔哥尼亚海岸、福克兰群岛、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桑得威奇（South Sandwich）群岛绘制得相当准确。

● 不但海岸线绘制的很准确，而且南美洲特有的动物——美洲鹿（Huemil）、南美驼马和磨齿兽（Malodon）都在图上出现了（它们同时也出现在《异域图志》中）。

● 皮瑞·雷斯图是绘制在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前的，它上面也显示出安第斯山脉一直向北延伸到厄瓜多尔（Ecuador）。

● 联系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从赤道到南极洲的海岸线范围内的精确性，这只可能意味着该图的绘制是被这样的人完成的，即他们是同时乘坐了许多船只，甚至是在南极洲高纬度的地方他们都能判断出纬度的一群人。

除了有着600年海洋航行经验的中国人，还有谁能够到达南极洲呢？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也宣称中国人到达了北极点（30次）和南极点（5次）。中国的航海图和星图是否也提供了答案？最显著的书是《武备志》，但在悠长的岁月里，这本书已经做了修订，不是所有的修订本的日期都能够确定的，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些修订本的日期呢？

在《武备志》的航行说明上提供了在栋德那角（Dondra Head）（锡兰／斯里兰卡Ceylon/Srilanka）和苏门答腊之间的路线。机缘巧合，它的航线也是向东的。航线的轨迹的水流纬度是北纬6°。然而，有人建议中国航海家把北极星放在地平线上的一尺上面。这意味着在修订本上北极星的位置和它的实际位置是相差3°40′。运用微软的星夜（Starry Nights）软件（使用该软件能够计算出近两百万年以来在晚间星星的位置），我推算出《武备志》成书的时间该在公元1420～1430年间（由于地球的自转，每175年北极星的位置就会变化一度）。

由于知道了《武备志》的日期，我就能够利用星夜软件比较在它上面的星辰。这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能够估算出在皮瑞·雷斯图上罗盘位置（福克兰岛的西南），老人星在90°的仰角上。绘图者花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观测巴塔哥尼亚海岸，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据老人星的起落，而老人星正好在他们的头顶。中国人的记载中也表露了需要对老人星的位置“修正”，况且南十字星的构象在中国天文学家那里早就被提到了。为了获得这个结果，皇帝命令船队往南航行（一个在南京的学术会议将要重点强调对老人星的早期论述）。

所以经得起否证的证据也将会被发现，在那里老人星的主要星星就在90° 的仰角上。在皮瑞·雷斯图上，这种情况是得到了准确的反映。迷幻岛和利文石（Livingstone）岛上山峦的位置是相当准确的。在南纬62° 49′ 、西经60° 38′ 的地方，中国人观测了它们，那是南十字星座主要星球十字阿尔发的偏差位置。

现在中国人已能够判断出南极点的真实位置，也能够减去磁场的变化影响（在南纬68° 以下，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变成了极圈）。同时通过利用在老人星和北半球北极星的相互参照，在南半球他们也能够判断出纬度。如果配置几个船队，中国人就有能力测绘整个世界了。那么他们可能去何地从事这项工作呢？

在南纬52° 40′ ，即老人星的偏角，这时老人星恰好位于所有船只的正上方，从这同一基线出发，所有的都能观测到了。中国人的航行的确是沿着南纬52° 40′ 进行的，这些证据在巴塔哥尼亚、克尔格伦(Kergulen)和坎贝尔岛（Campbell，该岛在皮瑞·雷斯图上很准确的绘制了出来）都能够发现的。

在北纬28° 30′ ，此地在地平线以下，老人星是看不到的。在此纬度上环游世界时，证据是能够找到的。

在北纬3° ，此地在1421年时，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也是看不到的。在中国人的航海中，这样的证据也能找到的。

在公元1421～1423年，被中国人使用过的观测平台

蓝本为墨西哥听伽巴托（Tingambato）依华特齐奥（Ihuatzio）与密和阿坎（Michoacan）的金字塔（Pyramid）

南美到澳大利亚

马尔萨斯（Marquesas)[特莫（Temoe)][①]	西经134° 29′ 南纬23° 22′
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大溪地（Tahiti)]	西经149° 0′ 南纬15° 50′
博拉·博拉（Bora Bora）	西经151° 0′ 南纬15° 30′
西萨摩亚（West Samoa)[萨瓦伊（Savai)]	西经172° 42′ 南纬13° 30′
汤加·塔布（Tonga Tabu）	西经175° 4′ 南纬19° 43′
金皮（Gympie)[澳大利亚]	东经152° 42′ 南纬26° 12′
高斯福德（Gosford)[新南威尔士州NSW]	东经151° 13′ 南纬33° 26′

① 此乃音译。——译者

南美到印度尼西亚

大溪地 (Tahiti)	西经 149° 0′ 南纬 23° 22′
摩敦 (Malden)[基里巴斯 (Kiribati)]	东经 157° 43′ 北纬 1° 55′
所罗门 (Solomons)[圣克里斯托瓦尔 (San Cristobal)]	东经 161° 51′ 南纬 10° 26′
加罗林 (Carolines)[南马杜尔 (Nan Madol)]	东经 158° 21′ 北纬 6° 51′
马利亚纳 (Marianas)[塞班 (Saipan)]	东经 145° 45′ 北纬 15° 9′
加罗林 (Carolines)[雅普(Yap)]	东经 138° 9′ 北纬 9° 31′
新几内亚 (New Guinea)	东经 143° 38′ 南纬 3° 35′
南京 (Nanjing)	东经 118° 45′ 南纬 32° 6′
北京 (Beijing)	东经 116° 25′ 北纬 39° 55′

6．中国人对经度的确定

参见附录4“经度的确定”，这是所有证据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7．对世界一些地方的观测

● 印度洋（坎提诺）

90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数以千计的岛屿。假定船只之间间隔15英里，以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每天进行10个小时的观测，那么30艘船只将在印度洋上航行18个月。

● 南美和南极洲（皮瑞·雷斯）

总计60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大约二十艘的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 北美和北冰洋（坎提诺）

总计12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大约四十艘船只

● 远东

不能少于20艘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 澳大利亚

不能少于20艘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综上所述，应该需要不少于130艘的船只，需要花费1年半的时间完成该任务。能够为绘图家皮瑞·雷斯、坎提诺、让·罗茨、瓦尔德塞米勒和匹兹加诺（Pizzigano）提供信息去绘图并有能力组建如此巨大船队

的惟一国家只能是中国。

8．中国船只的大小、基地和航行

（1）船队

“在明王朝的全盛时期，大约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朝的海军力量远远胜于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亚洲其余国家的海军，在同时代，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甚至他们联合起来也比不上明朝海军的力量。在永乐年间，水师所有的船只加起来大约有3800艘，1350艘巡逻船和1350艘战船去保护着各个驿站（卫和所）或者岛屿基地（寨）。在南京附近的新江口驻有一支400艘大型兵船的舰队和400艘运粮船。除此之外，大约还有超过250艘的“珍宝船”，或者称之为“宝船”（Pao Chuan），在船上的乘员从大约在1403年是450人，到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增加到690人，而船只的最大容量很明显能超过1000人。有超过3000的商人随时作为辅助力量，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型船只起着来回载人和传达命令的作用。这种宝船的发展始于1130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达到了它的顶峰，后来由于政策的相反，海军衰落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它的增长速度，因此到16世纪中叶，那昔日的辉煌几乎没有什么留下来了。”（李约瑟〔Needham，1954，Vol.4，Pt3，P.484〕）

（2）基地

随着郑和舰队的发展，他们建立了海外基地。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底，中国人在环印度洋已经有了基地，沿着东非海岸能到索法拉（Sofala）。穿过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中国人已经有了广泛的海上网络。

（3）经验

自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中国人已经有了5次航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次比一次有冒险性。在第四次航行时，中国人已经分派了他们的舰队一直航行到了东非海岸。

第三部分 证据

9. 幸存下来的中国地图和星图

书名和修订本日期	主题／相关内容
《武备志》大约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只有一小部分被翻译成英文）	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由郑和带来的广泛的信息，它提供了在中国和非洲以及在其他大洲间的航线。
茅坤约永乐元年至永乐二十年（公元1403～1422年）	克尔格伦(Kerguelen)，印度洋和岛屿，东非海——航行路线。
《疆理图》(1403－1473)①	亚洲东部和南部和西部非洲，包括大西洋的亚述尔群岛（Azores）。
星象图（茅坤），大约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	北极星和南十字星以及人马兽身的阿尔法（Alpha）星的比较。
利玛窦(MattroRicci，大约1588)《万国舆图》	澳大利亚（利玛窦修士在中国时所制的图）。

10. 被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发现的中国人或亚洲人

● 加勒比

哥伦布（古巴 Cuba）

●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斯蒂芬·包尔斯（Stephen Powers）（Sacramento/Russian River）

● 北美

维拉札诺（Verrazzano）纳拉甘塞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

德拉巴热（Delabarre）教授(纳拉甘塞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

● 巴西

加布拉尔（Cabral）（有着“白皮肤”的人和玛约鲁那（Mayoruna）印地安人）

● 委内瑞拉（Venezuela）

① 实际成图时代早于此。——译者

阿连兹（Arends）和伽连古（Gallengo）（1964）（中国人的转铁蛋白）

● 秘鲁

讲中国话的人

● 印度洋

汪涛（Wang Tao）教授（出自郑和舰队水手的墓）

● 太平洋

汪涛（Wang Tao）教授（出自郑和舰队水手的墓）

● 巴拿马（Panama）

马希·达里安（Marsh Darien）的经历，1924年

● 爱尔兰（Ireland）

哥伦布（尸体（Bodies））

● 格陵兰岛（Greenland）

哥伦布（来自中国（Cathay）的人已经拜访了那里）

● 亚述尔群岛(Azores)

哥伦布（来自科尔沃（Corvo）的尸体（Bodies），希望在佛罗勒斯（Flores）登陆）

● 南美

阿里亚斯十字（Arias-Cross）

● 太平洋

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udovico De Varthema）

● 澳大利亚

瓦兰布尔（Warrnambool）

● 太平洋

巴干维尔（Bougainville）

卡地亚（Cartier）

华莱士（Wallace）

● 非洲

蒙克拉罗修士（Fr Monclaro）——派特（Pate）

● 新西兰

库克（Cook）

11. 中国舰队所到国家的证据

（1）当地人涉及到的中国人或"黄种人"是早于欧洲人航海大发现的。

● 非洲（Patc，东岸）：中国人在他们之间居住了——证据包括在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献给中国的长颈鹿；蒙卡拉罗（Monclaro）神父的论述；汤姆·皮雷（Tome Pires）[①]的日记。

● 北美：哥伦布相信他遇到的人是中国人；维拉札诺（Verrazzano），罗德岛（Rhode-island）遇到的亚洲人；印地安人（纽波特（Newport）描述道："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放着炮驶向上游"，教皇（Pope）的信中也描写到野蛮人的船从北美到达了格陵兰岛。

● 加利福尼亚："像大房子一样的船"离开海岸。

● 墨西哥：在欧洲人来临之前，纳蜡伊塔（Narayit）部落的人就涉及到亚洲的船只拜访了他们。

● 南美：阿里亚斯（Arias）神父告诉西班牙国王："浅皮肤的人从南美穿过了太平洋。"

● 南极洲：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②]（Ludovico De Varthema），来自中国的船只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来到了南极洲，此地白天很短，天气很冷。

● 太平洋：巴干维尔（Bougainville）和卡尔特莱特（Carteret）发现在太平洋岛屿上浅色、黄皮肤的人很像中国人。

● 斐济（Fiji）（亚萨瓦群岛Yasawa Islands）："黄皮肤的人拜访了我们。"

● 澳大利亚（关联到山地人）：杨格里（Yangery）部落，瓦兰布尔（Warrnambool）——黄皮肤的人从船的残骸中下来，在他们之间定居了；特韦德河（Tweed River），昆士兰（Queensland）——穿着宝石衣服的人试图开采黄岭山（Mount Warning）地区；贝龙（Byron Bay）地区，新南威尔士州（NSW）——外国水手的大屠杀；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外国水手的大屠杀；弗雷泽（Fraser）岛，离开金皮（Gympie）——小船离开大船（J.格林—Green，1862）；格莱涅（Glenelg）河，安享地(Arnhem Land)——"蜂蜜色的人在安罕姆地定居，穿着马裤的女人都披着丝绸，男人们穿着长裤；金皮——"文化英雄"号（cultureheroes）航行到金皮港，带走了一些岩石然后离开；达姆瑞（Dhamuri）人——奇怪的人登上了陆地，修建了金字塔（观测平台）。

● 新西兰：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有两艘大船已到来了；马利斯

① 此乃音译。——译者
② 此乃音译。——译者

(Maris)，北岛（North Island）——浅皮肤的人在他们之间定居了，并抚养了孩子；南岛——奇怪的沉船残骸（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2）在艺术上显示的早于欧洲人的外国人

● 澳大利亚：霍克斯贝利(Hawkesbury)河——穿着长袍奇怪的拜访者；格莱涅河，安罕姆地——中国轮船和穿长袍的中国人（政府官员加利〔Grey〕的记述）；青兰（Qinrans）——人们从马上下来；库克镇的北面〔Grey〕——外国船只。

● 墨西哥：尤卡坦的亚麻（Lienzo De Jucutáto）显示了外国人的到来；古埃瓦·平塔达（Cueva Pintada）——1054年7月巨蟹星云（Crab Nebula）的超新星和木制固定的日期1400至1512年在一起，外国人的画给弓箭刺穿了。

（3）在欧洲关于澳大利亚地图绘制的出版是早于范·达曼（Van Diemen）和库克

● 让·罗茨关于安罕地的记载中有很好的记述和插图，它的地理和矿藏、树木和湖泊。显示了东海岸和西海岸到天鹅（Swan）河。

● 瓦拉尔德（Vallard）：马群被牵引到安享陆地（Arnhemland），土著的房子，动物群，（罗马）花神。

● 托斯坎内利（Toscanelli）1474：澳大利亚及其河流。

（4）早于欧洲人的岩画艺术

● 豪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外国的船；对外国人葬礼的描写。

● Ruapuke海滩：泰米尔人的书法（Tamil Calligraphy）。

● 库克镇（Cook town）：外国的船。

● 格连奈勒提（Glenelty）河（SA）：外国的航海家。

● 墨西哥（Mexico）：螃蟹星云爆炸（Crab Nebula Explosion）（中国人记录于公元1054年）。

● 新英格兰（NewEngland）：外国的船和船的残骸（DightonRock）；外国的船（马萨诸塞的切勒姆福德〔Chelmsford〕）

● 北美洲（NorthAmerica）：马的雕刻品和绘画（在那里被损毁，公元前1000年）；密西西比平原（Mississipiplains），科罗拉多（Colorado），威斯康星（Wisconsin），路易斯安那（Louisiana），俄克拉荷马

(Oklahoma)；齐陈·依特札（Chichen Itza）（尤卡坦 Yucatan)；塞伦(Salem)（纽约New York)

(5) 同时代史学家的记载

作者	描述	写作时间／刊行
陈诚（中国人）	《西域行程记》中国皇帝与波斯交往之序幕及有关重开地中海贸易的描述	1405～1414年（1414）
马欢（中国人）	《瀛涯胜览》。所有对大洋海岸的考察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中国舰队	1416～1433年（1433）
费信（中国人）	《星槎胜览》中国舰队到达非洲而后到距澳大利亚300英里的达东帝汶（东印度尼西亚East Indonesia)	
伊本·塔赫里·比尔的IbnTaghri·Birdi(埃及人)	Nujum（埃及史）。中国舰队到达红海（Red Sea）和吉达（Jeddah)	1431年
黑牙都丁·那葛什(口述哈肥子·阿卜鲁(Hafiz Abru)，波斯人	《编年史之精华》*Ghiyash D Din Naqqash Zubdatu't Tawarikh*皇城的就职典礼，1421年2月2日，使团之抵达与返回	1419～1422年
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威尼斯人)	《尼科洛·达·康提游记》，称自己已达澳大利亚。描写了横渡印度洋的中国舰队和他到澳洲和中国	约1424（1434）年
毛罗修士（FraMauro)	平面天球图笔记(Planisphere notes)。描写大型中国舰队不停歇地穿越印度洋（大约1420年底)，绕过好望角到佛得角群岛和“无名群岛”(“obscuredi slands”)	约1424（1459）年
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	《伊本·巴图塔游记》描写了印度洋上庞大的中国船队。	约1325～1354(1356)年
《海药本草》（中国人）①	海外南国的活动，名著《山海经》Chui Hiao(外国地图“Atlas of foreign Countries”)描写了从印度和东南亚带来的药物；土著的飞去来器，皇后岛的侏儒。	公元前330年

①《海药本草》为书名，非人名，作者此处误。——译者

12. 本土植物从一个大陆带到另一个大陆

(1) 在欧洲人探险航行之前

从中国传到：

● 澳洲（Austrilia） ——莲花(lotus)和纸草(papyrus)。

●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稻、罂粟籽、“卡特连里亚”(Kateleria)、玫瑰（R.Laevigata)。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 ——桑树。

● 南美洲（South America） ——稻。

从热带亚洲传到：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 ——芋头、山药、香蕉、姜黄、西葫芦。

从马来西亚传到：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 ——竹芋（pia)。

从印度传到：

● 北太平洋群岛（North Pacific Islands） ——甘蔗、生姜。

● 中北美洲（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棉花。

● 太平洋（Pacific） ——棉花。

从非洲传到：

● 中太平洋（Central Pacific） ——西葫芦。

从南美洲传到：

● 中国—玉米。

● 东南亚（South-east Asia） ——玉米。

● 新西兰（New Zealand） ——“古梅拉”(Kumera)。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 ——山药、甜马铃薯。

● 澳洲（Australia)

● 菲律宾（Philippines） ——马铃薯、玉米。

从南太平洋传到：

● 北太平洋（夏威夷） ——竹子、椰子、“卡瓦”(Kava,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产的一种灌木,由其根所制的酒)。

●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 ——椰子。

从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传到：

● 坎贝尔岛（Campbell） ——诺福克松树。

从印度尼西亚传到：

● 中国——香料。

从菲律宾传到：

● 中国——胡椒。

从北美洲传到：

● 中国——玉米、阿马兰斯(Amaranth，苋属植物，紫红色)。

从墨西哥传到：

● 菲律宾（Philippines） ——烟草、甜马铃薯、玉米。（麦哲伦作为欧洲人第一次见到）。

可能还有菠萝、竹芋、花生、“李档”（Lima，狐贝属）、“叶姆豆”（yambeans）、“巴林兵”（Balimbing） ——木薯、Chico（藜科灌木）、番木瓜、zapute、西红柿和南瓜。（麦哲伦没有说他看到这些）。

（2）欧洲人在夏威夷第一次看到：

● 热带美洲（Tropical America） ——甜马铃薯。

● 印度（India） ——野生姜。

● 太平洋诸岛（PacificIslands） ——竹子、面包果树、桐树、“希比斯科斯”（hibiscus）（芙蓉属植物）、卡瓦（Kava，波利尼西亚产的一种灌木，由其根所制的酒）。

● 热带亚洲（TropicalAsia） ——芋头、“提树”（tiplants）、山药（五片叶的）、香蕉、姜黄。

● 马来亚群岛（Malayanarchipelago） ——竹芋。

● 东亚（EastAsia） ——胡椒、桑树。

（3）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即在复活岛发现的有：

● 南美洲（SouthAmerica） ——“托托拉”（totora）芦苇、西红柿、烟草、甜马铃薯。

● 南太平洋（SouthPacific） ——椰子。

● 东南亚（South-eastAsia） ——山药。

● 中美洲（Mesoamarica） ——番木瓜。

13. 一个大陆上的本土动物在另一大陆上被发现

（1）南美洲的亚洲鸡。到达南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的那些鸡与他们家里的那些鸡完全不同。美洲印地安的鸡下的蛋带有蓝色条纹，有亚洲式的名字，鸡蛋并非用来食用，而是用于宗教活动。他们的鸡冠、羽毛、脚刺、大小、体型、腿、脖子、头部都不一样，名字也是马来鸡、乌骨鸡、卷毛鸡还有柯枝鸡。迟至1600年，地中海的人们还没有也不知道在美洲发现的亚洲鸡的风采。亚洲鸡不会飞，有人在欧洲人到那里之前就把它们带到了美洲。

（2）马——北美洲。骨头和骷髅—密西西比排水地区和加拿大。北美洲、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尤卡坦的马的图画、雕刻品。

（3）中国船狗——墨西哥、南美洲、南部非洲、东南亚、太平洋、福克兰群岛和新西兰、塔希提岛（库克岛）。

（4）海獭在新西兰被发现（来自印度）。

（5）中国皇帝的动物园中有来自印度的狮子、大象和老虎；来自非洲的长颈鹿、犀牛、鸵鸟和斑马；来自澳洲的袋鼠（Kangaroos）。

14. 最早的欧洲人发现的采矿和其他活动的证据

(1)采矿

● 澳大利亚

金皮（Gympie） ——金矿。

安享（Arnhem）大陆——石墨。

● 斐济（Fiji）

铜矿（Lasawa）

● 北极（Arctic）

冶炼的青铜、铁、铜——德文岛（Devon Island）和巴瑟斯特岛（Bathurst）。

●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纽波特（新港，Newport） ——煤。

● 墨西哥（Mexico）铜、金

(2)中美洲的前哥伦布的（Pre-columbian）冶金术、漆器和染料。

在墨西哥一个很小的区域（米乔阿肯－巴勒萨斯河〔Michoacún-

RioBalsas]）发现了以下前哥伦比亚人的项目和活动（这个区域在瓦尔德塞米勒〔Waldeseemüller〕航海图中出现）。

古代的船的残骸。

尤卡坦（Jucutácato）左右支索（从船上下来人的图画）。

运用复杂技术的铜矿。

利用中国技术的漆盒制造业。

用中国技术从昆虫、贝、树叶、树根中提炼的燃料。

与传统的佛教设计相同的哈库埃拉斯（Hachuelas）。

与喇嘛教设计相同的镜子。

15．非常古老、庞大且未被确认的船只残骸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安南

● 菲律宾“潘达南”（Pandanan）

● 加勒比海

● 澳大利亚：西海岸——珀斯；珀斯——南海岸；东海岸——拜伦湾（Byron Bay）；北海岸——锚。

● 新西兰：康贝尔岛（Combell Island）；鲁阿普克海滩（Ruapuke Beach）；微暗的声音。

● 美洲：太平洋海岸，内坎尼（Neahkanie）海滩；旧金山，萨卡拉门托（Sacramento美国加州首府）舡；洛杉矶，锚；大西洋海岸，纳拉坎塞特（Narragansetet）海湾。

● 墨西哥：中国布料

● 中国：南京

● 厄瓜多尔：锚

16．人工品和奉献的祭品

(1)瓷器

● 东部和南部非洲：在绵长的东部非洲海岸的统治者的宫殿里，明前期的瓷器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发现。

● 澳大利亚：在“布拉消”（Bradshaw）、“埃莱乔”（Elecho）岛、“依尔卡拉”（Yirrkalla）、“温切勒海”（Winchelsea）岛、约克角、金皮

(Gympie)、塔斯马尼亚发现明朝早期的瓷器。

● 美洲、太平洋海岸：明朝的瓷器。

● 墨西哥“文华塔尼和”(Zihuatanejo)。

●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麦哲伦的记载说身着丝绸的统治者拥有明朝早期的瓷盘。

(2)奉献的祭品

● 东部非洲派特（Pate)：青铜狮子。

● 阿佐雷斯科尔沃（Corvo)：朱棣的雕像，被首先到达那里的陆地的欧洲人发现。

● 澳大利亚（NSW)：缟玛瑙雕刻成的甲虫，妈祖的头（ShaoLin’s Head）石头的头像；皇后岛－翡翠佛像，“加内士”(Ganesh)、印度猴神、缟玛瑙雕刻成的甲虫；安罕姆陆地——玉雕“寿老”。

● 新西兰：蜿蜒的水（鲁阿普克海滩)；中国滑石小雕像（奥克兰的“毛库” —— Mauku)。

● 墨西哥（Mexico)（危地马拉边境)。

其他东西

● 墨西哥，佩特（东部非洲)：根据中国传统制造的漆盒。

● 加罗林群岛：粉红色的珠子和来自墨西哥的黑曜石。

● 豪环礁（Hao Atoll)（土阿莫土群岛)：绿宝石环。

● 乔路卡（Joluca)（墨西哥)：罗马半身像。

● 萨尔瓦多（El Salvador）／危地马拉边境：埃及画像。

● 秘鲁：带有中国铭文的青铜和陶器。

● 纳斯卡（智利)：带有中国铭文的青铜和陶器。

●“泰奥提华肯”(Teotihuacan)（墨西哥)：中国玉制大奖章(jademedallion)。

● 恰帕·德·科尔左（Chiapade Corzo)（墨西哥)：中国玉制耳坠。

● 新西兰：“科连索”(Colensobell)。

17.石头建筑、观察平台和有雕刻的石头

(1)观察平台和观察者

● 澳大利亚：蓝山西面的潘里斯（Penrith)，新南威尔士中部海滩的金皮（Gympie)，阿瑟顿（Atherton)。

● 北大西洋：纽波特圆塔（Newport Round Tower）；卡那里斯（Canaries）；凯恩盆地（Kane Basin北极）。

● 太平洋：土阿莫土（Tuamotu）群岛；塔希提岛；马克萨斯(Marquesas)群岛；卡罗琳岛—莱莱（Lele），波那派（Ponape），南马达勒（Nan Madol），亚卜（Yap），托比（Tobi）；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吉尔伯特（Gilberts）群岛—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圣克里斯托巴勒（San Cristobal）；马拉（Mala）；新几内亚（5），马尔登（Malden）岛；麦格奈提克（Magnetic）岛。

这些相关联表明它们是由一个随风航行的舰队建造的。

(2) 记录航行的雕刻的石头

● 中国—刘家港（福建省）[①]

● 马来亚—马六甲

● 锡兰／斯里兰卡

● 印度——古里（卡利卡特 Calicut）、科钦（Cochin）

● 非洲——马塔迪（Matadi）瀑布（刚果）

● 佛得角群岛——贾涅拉（Janela）

● 南美洲——圣·卡特利那（Santa Catarina）

● 新西兰——鲁阿普克海滩（Ruapuke Beach）

● 北美洲——戴顿石(Dighton Rock)，“萨卡拉门托石”(Sacramento stone)

(3)指示方位的石头

● 北美洲——圣·匹博迪（S.Peabody）、罗亚斯通（Royastone）、巴列（Barre）、舒特斯别丽（Shutesbury）、方柱石（Chelmsford）、厄普顿（Uoton）、康科特（Concord）、沃尔瑟姆（Waltham）、柯立斯（Carlisle）、艾克顿（Actom）、林恩（Lynn）、科哈塞特（Cohasset）、纽波特（Newport）、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4)各色各样的石砌的住处

● 北美洲——纳拉干塞（Naragansett）海湾，在旧金山湾（中国村）

① Liu—Chia—Chang 应该是 Liu—Chia—Gang 之误，应该在江苏省，而不是福建省。——译者

之东

● 高纬北极地（High Arctic）——纽芬兰（New Foundland），拉布拉多（Labrador）、凯恩盆地（Kane Basin）

● 澳大利亚——比坦加比湾（Bittangabee）、纽卡斯尔（Newcastle）、悉尼（Sydney）

(5)用来指示方位的石头标记

● 纽芬兰（New Foundland）

● 拉布拉多（Labrador）

● 凯恩盆地（Kane Basin）

● 外赫布里底岛（Outer Hebrides）

纽波特的圆形塔——天文学的排列

现在对该塔进行的碳14测定的最早年代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威廉·本哈罗（Willian S.Penhallow）和艾米瑞特斯（Emeritus）已经得出结论：该塔是一个圆柱体，数个拱门列于8个石柱上，石柱上切割出窗户，可以在春分和冬至对太阳、月亮、北极星、杜波星进行天文学观察。从这些窗子的排列中，发现了用月蚀测定经度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塔的东北角的构件已经找到并进行了考察。作者要求对该塔进行灰泥分析，以判定它是否含有米浆或石膏。这些都是中国人加入灰泥中以加固建筑的东西。前述17（1）和17（4）中所要求的泥浆分析将被执行并贴在网上。

18．语言学的语言

(1)语言学

中国人、东部非洲（巴淮 Bajun ——意谓“蜂蜜色的人”）和澳大利亚（巴淮尼 Bajuni ——意谓“蜂蜜色的人”）的土著人用相同或相似的名字；在新西兰称红薯为库马拉（Kumara），在墨西哥称为库马尔（Kumar）；还有在南美洲把筏称为巴尔萨（Balsa），称小船为三潘（Sampan），在中美洲把鸡叫作kik-kiri-kee，和在中国一样。

(2)加利福尼亚人说的汉语，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鲍威尔斯

Powers）和秘鲁村。

19．习俗和游戏

(1)墨西哥(李约瑟教授的描述)

● 复杂的祈雨仪式，小到每一细节都相同。

● 特波那斯特列鼓象木鱼。

● 三足陶器。

● 双重可置换的历法。

● 在颜色和动物等方面表现的象征性的关联,在中国和阿兹特克有相同的“月兔”的故事。

● 游戏“帕罗里”(Parolli)。

● 计算设备“瑰普”(quipu)(印加)。

● 带有复杂信仰排列的玉。

● 造纸（阿兹特克)。

● 用灰泥的路和大墙（印加)。

● 音乐——超过50%的美洲乐器在缅甸内地被发现。

● 利于脖子休息的枕头。

● 中国运输撑杆。

(2)加利福尼亚——在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和萨卡拉门托河(Sacramento)之间（鲍沃斯少校征服报告)

● 云顿(Win Tun),波模(Pomo),尤基勒(Yukil),麦度(Mai Du)部落：在语言上与中国的相似性；赌博、戏剧表演；女人的服装和发型；诱捕野禽的圈套；归葬祖籍；农民，而不是猎人；蓄胡须的男人；复杂化的陶器；装饰精美的碧玉刀；灌溉沟渠和石砌村落。

第四部分：线粒体遗传基因分析

20．遗传基因分析

● 加利福尼亚－萨卡拉门托／俄罗斯河（云顿〔Win Tun〕，波模〔Pomo〕，尤基勒〔Yukil〕与麦度〔Mai Du〕部落）

● 墨西哥——米乔阿肯（Michoacan）群岛（太平洋海岸）

● 危地马拉——靠近萨尔瓦多边境的太平洋海岸的印地安人

● 达里安（Darien）半岛——白色印地安人（马什的达里安探险）

● 委内瑞拉西部的印地安人（特拉帕·帕劳加诺〔Trapa Paraujano〕与马科塔〔Macoita〕人）

● 巴西——马约鲁阿纳（Mayoruana）印地安人。

● 非洲（佩特）——巴准尼人

● 澳大利亚的安罕姆——土著人

● 太平洋－塔希提（Tahiti）、博拉·博拉（Bora Bora）、基里巴斯（Kiribati）、卡罗琳（Caroline）、马利亚纳（中国水手的坟墓——汪涛〔Wang Tao〕教授）

● 北美洲——纳拉干塞（Narragansett）湾印地安人（德拉巴雷（Delabarre）教授）

● 新西兰——鲁阿普基（Ruapuke）和奥克兰（Auckland）之间的毛里斯（Maoris）

可望得出结果并在网上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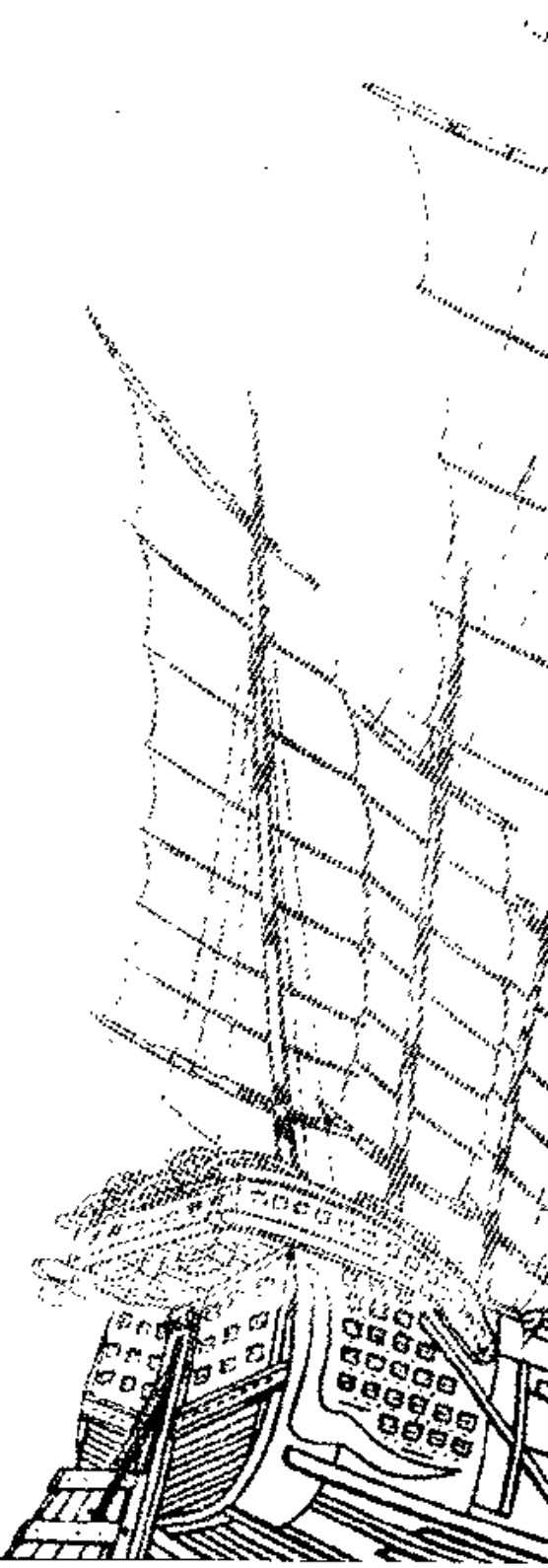
21．原住民的牙齿

从克里斯帝·特纳教授（Christy G.Turner Ⅱ）获得的建议，可望获得结果并在网上公布

第五部分：参考文献选

迄今最完整的文献目录见Sorenson, JohnL., and Raish, Martin H., *Pre Columbian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s Across the Ocea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odleian Library, Oxford。两位教授列出了几千本书，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李约瑟著（Joseph Needham）教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lilisation in China*）也是件相当可观的成就。

附录二 目击者之记录



以下是经过筛选的同时期的记载。每一项，都包括原文的题目和其他信息资料，然后是英译本的细节。如果没有注明出版地，则为伦敦。

紫禁城

哈菲兹·阿布鲁（Hafiz Abru）：《诸史之精华》（*Zubdatu' t Tawarikh*）

写于1419～1422年，出版于1424年

K·M·麦特拉（K. M. Maitra）译：《一个出使中国的波斯使团》（*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拉合尔（Lahore），1934年

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游记》（*Travel of Marco Polo*）

写于1271～1295年，出版于1297年

T·沃（T. Waugh）译，1984年

丝绸之路

长春（Ch' ang Ch' un）：《西游记》（*Hsi Yu Ki*）

写于1405～1414年，出版于1414年。①

A·韦利（A. Waley）译：《从中国出发的旅行》（*Journey from China*）

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游记》（*Travel of Marco Polo*）

同上

哈菲兹·阿布鲁（Hafiz Abru）：《诸史之精华》（*Zubdatu' t Tawarikh*）

同上

① 此处有误，似指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乃丘处机之号，金末人。——译者

中国航海帝国

马欢（Ma Huan）：《瀛涯胜览》（*Ying-yai Shenglan*）

写于公元1416～1433年，出版于1433年

J·V· G·米尔（J. V. G. Mills）编辑、翻译：《海外世界总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

费信（Fei Xin）：《星槎胜览》（*Xingcha Shenglan*）

写于1405～1431年，出版于1436年

J·V·G·米尔斯（J. V. G. Mills）英译：《从星星筏子上看到的绝妙景象》（*Marvellous Visions from the Star Raft*），威斯巴登（Wiesbaden），1996年

巨人的陨落

哈菲兹·阿布鲁（Hafiz Abru）：《历史之汇集》（*Majma al-Tarawikh*）

同上

帖木儿（Tamerlane）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Al-Ta' rif*）

写于1405年，出版于1405年

W·J·费舍尔（W. J. Fischel）译：《伊本·赫勒敦在埃及》（*Ibn Khaldun in Egypt*），伯克利（Berkeley），1967年

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帖木儿》（*Tamerlane*）

写于1435年，出版于1440年

J·H·桑德斯（J. H. Sanders）译，1936年

克拉维约（R. Gonzales de Clavijo）：《出使帖木儿朝廷》（*Embassy to Court of Tamerlan*）

写于1403～1406年，出版于1406年

G·勒斯特兰杰（G. le Strange）译，1928年

伊斯兰商路

伊本·赫勒敦（Ibn Kbaldun）：《历史》（*Al-Ta' rif*）

同上

伊本·台格利·比尔迪（Ibn Taghri-birdi）：《1382～1469年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W·波普（W. Popper）译，伯克利（Berkeley），1954年

艾哈迈德·马克里兹（Ahmad al-Makrizi）：《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E·伯劳舍（E. Brochet）（法国人）译，巴黎（Paris），1908年

印度和中国的贸易

阿布杜拉·拉扎克（Abdul Razak：《行纪》（*Travels*）

R·H·梅杰（R. H. Major）编辑、翻译：《十四世纪的印度》（*India in 14th Century*），1857年

叶哈雅·西尔忻地（Yahya Sirhindi）：《穆巴拉克史》（*Tarikh I-Mubarak*）

写于1400～1421年，出版于1421年，加尔各答（Calcutta）1931年重版

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帖木儿》（*Tamerlane*）

同上

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da Conti）：《行纪》（*Travels*）

写于1424年，出版于1434年

R·H·梅杰（R. H. Major）编辑、翻译：《十四世纪的印度》一书中的尼古拉·达·康提的行纪（*The Travel of Niccolo da Conti' in India in 14th Century*），1857年

印度的海外贸易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行纪》（*Travels*）

写于1325～1354年，出版于1356年

S·李（S. Lee）译：《白图泰行纪》（*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1829年

Ludovico de Varthema：《行纪》（*Travels*）

出版于1506年

J·W·琼斯（J. W. Jones）译：《Varthema的行纪》（*The Travels of L. de Varthema*），1863年

马欢（Ma Huan）：《瀛涯胜览》（*Ying-yai Shenglan*）

同上

费信（Fei Xin）：《星槎胜览》（*Xingcha Shenglan*）

同上

适合的中东商路

艾哈迈德·马克里兹（Ahmad al-Makrizi）：《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同上

伊本·台格利·比尔迪（Ibn Taghri·birdi）：《1382～1469年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同上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Al-Ta' rif*）

同上

奥斯曼人（Ottomans）包围了拜占庭（Byzantium）

Bertrandon de la Broquiere：（*Voyage d' Outremer*）

写于1421～1432年，出版于1455年

G·R·克里讷（G. R. Kline）翻译、编辑，纽约，1988年

H·杜卡斯（H. Dukas）：《土耳其－拜占庭关系史》（*Historia Turco-Byzantina*）

出版于1455年

H·J·马构里阿斯（H. J. Magoulias）：《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下拜占庭的衰落与灭亡》（*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

toman Turks)，底特律（Detroit），1975年

佩德罗·塔富尔（Pedro Tafur）：（*Andanzas y Viajes*）
写于1435～1439年，出版于1439年

G·法兰茨（G. Phrantzes）：《编年史》（*Chronicles*）
写于1460～1477年
I. Bekker编辑：（*Chronicon Maius*）（德国），1838年

俄罗斯

佚名（Anon）：《中世纪俄罗斯的史诗、编年史和故事》（*Mediaeval Russian Epics, Chronicles and Tales*）

写于1380～1422年
S·曾考夫斯基（S. Zenkovsky）编辑，纽约（New York），1974年

Bertrandon de la Broquiere：（*Voyage d' Outremer*）
同上

佚名（Anon）：《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
写于1240年，出版于1368年之前
F·W·柯立甫（F. W. Cleaves）编辑、翻译，哈佛，1982年

神圣罗马帝国

詹·胡斯（Jan Huss）：（*De Ecclesia*）
写于1413年，出版于1413年
D·S·夏弗（D. S. Schaff）译，纽约（New York），1915年

亨利五世（Henry V）

佚名（Anon）：《理查德二世到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不确定记载的编年史》（*Incerti Scriptoris Chronicon Angliae de Regnis Ricardus II… Henricus VI*）

写于1377～1470年

J·S·戴维斯（J. S. Davies）编辑：《理查德二世到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英语编年史》（*English Chronicles of Reigns of Richard II… Henry VI*），1856年

佚名（Anon）：《财政部红皮书》（*Red Book of the Exchequer*）

写于1192年

H·霍尔（H. Hall）编辑，1896年

J·威克里夫（J. Wycliffe）：《光明之窗》（*The Lantern of Light*）

写于1405 年

L· M·斯温本（L. M. Swinburn）编辑，纽约，1971年

M. Kempe：（*The Boke of Margery Kempe*）

写于1435年，出版于1450年

L·斯达累（L. Staley）编辑，密歇根，卡拉马祖（Kalamazoo，Michigan），1996年

V·劳伯里（V. Loberia）：《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is de Gaul*）

写于1405年

R·索西（R. Southey）编辑、翻译，1972年

文艺复兴与技术革新

《诺曼底征发登记簿》（*Register of Confiscations in Normandy*）

写于1420年

国家档案局（Republic Record Office）

J. de Bethencourt：（*Canarien, livre de la Conquete et Conversion des Canaris*）

R·H·梅杰（R. H. Major）译，1872年

J·罗茨（J. Rotz）：（*The Boke of Idography*）

H·沃利斯（H. Wallis）编辑，牛津，1981年

航海家亨利王子发现新世界

加尔旺（A. Galváo）：《发现世界》（*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出版于1568年

R·哈克路特（R. Hukluyt）译，纽约，1969年

美洲文明

Bernardino de Sahagun:《新西班牙（美洲）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na*)

A·J·O·安德森（A. J. O. Anderson）、C·E·第伯尔（C. E. Dibble）翻译、编辑:《新西班牙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盐湖城（Salt Lake City），1970年

B. Diaz del Castillo:《征服墨西哥信史》(*The Tru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写于1568年

A. Idell译，纽约，1957年

Juan de Betanzos:《印加人史》(*Suma y Narración de los Incas*)

R·汉密尔顿（R. Hamilton）、D. Buchanan译:《印加人史》(*Narrative of the Incas*)，Austin，1996年

Ayala Felipe Huamán:《新Cronica和良好的统治》(*Nueva Cronica y Buen Gobierno*)

写于1613～1615年

P. Cieza de Leon:（Crónicas)

H. de Onis:《*Pedro Cieza de Leon*的印加人》(*The Incas of Pedro Cieza de Leon*)，俄克拉荷马（Oklahoma），1959年

Garcilaso de la Vega:《印加王室纪事》(*Commentarios Reales de Los Incas*)

出版于1605年

R·汉密尔顿（R. Hamilton):《印加王室纪事》(*Royal Commentary of the Inca*)，德克萨斯·奥斯汀（Austin，Texas），1996年

阿雷基帕[①](Arequipa)方济各修道院(The Franciscan Monastery)档案

图路·休(Tulul Xiu):《休氏家族文献》(*The Xiu Family Papers*)

写于1419～1942年，尤卡坦·梅里达（Mérida，Yucatán)

迪亚哥·德·兰达（Diego de Landa)：《尤卡坦历史叙述》(*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Yucatán*)

写于1566年

W·盖茨(W. Gates)译:《被征服前后的尤卡坦》(*Yucatan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quest*)，巴尔的摩（Baltimore)，1937年

综合

Codex Borbonicus

写于1507年

G·G·威兰特（G. G. Vaillant）编辑:《阿兹台克人的神圣历书》(*A Sacred Almanac of the Aztecs*)，纽约，1940年

Codex Borgia

G. Diaz、A·罗杰斯(A. Rodgers)、B· E·比兰得(B. E. Byland)编辑，1993年

《门多萨书》(*Codex Mendoza*)

写于1541年

F·伯登（F. F. Berdan)、P·B·阿纳瓦尔特（P. B. Anawalt)编辑，伯克利（Berkeley)，1992年

F·迪亚哥·杜兰（F. Diego Duran)：《新西班牙和特雷费默群岛印地安人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 de Nueva-Espana y Islas de Terre Firme*)

写于1570年

① 秘鲁南部城市。——译者

D·哈伊顿（D. Hayden）：《新西班牙印地安人史》（*History of the Indies of New Spain*），俄克拉荷马（Oklahoma），1996年

H·考茨（H. Cortes）：《关于礼节的资料》（*Documentos Cortesianos*）

J·L·马丁茨（J. L. Martinez）编辑，墨西哥（Mexico），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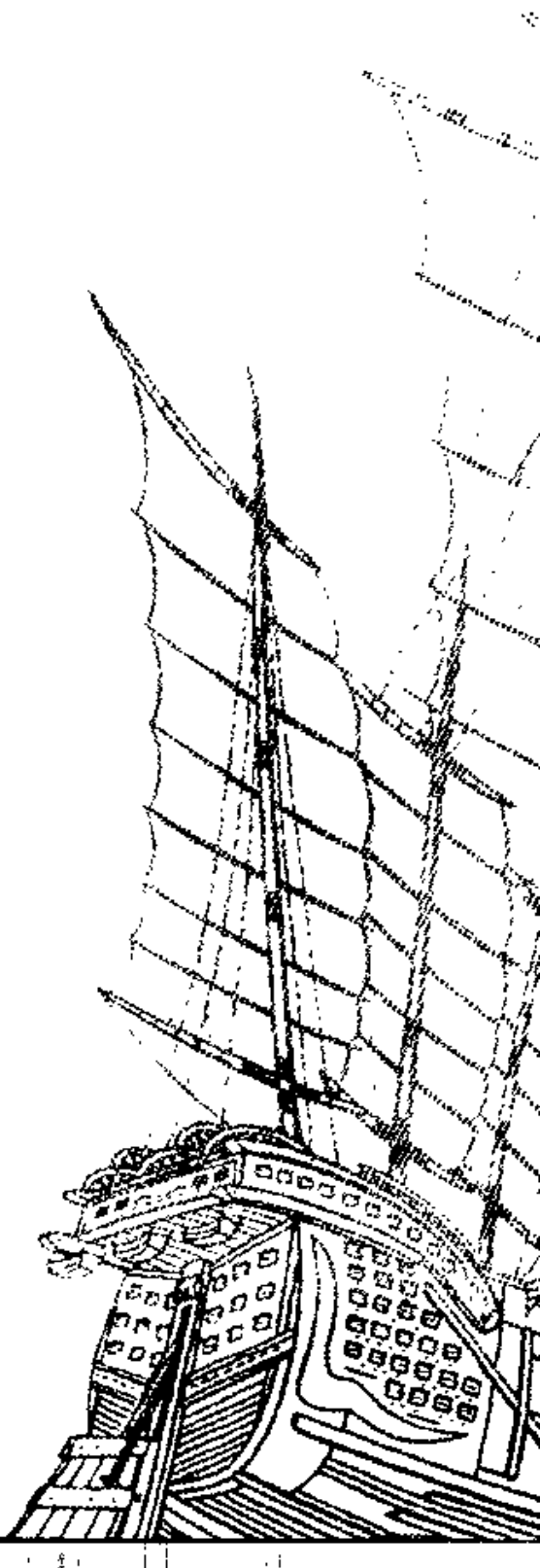
附录三

描述首次环球航行的重要海图

年代	地图名称	最早的绘制者	现在的收藏地
1404～1470	疆理图 (Kangnido)	中国人和朝鲜人	1470年的复制件收藏在日本京都的龙谷(Ryukoku) 大学
1513	皮里·雷斯 (Piri Reis) (土耳其的海军上将) 地图	中国人，然后是葡萄牙人，一定程度上基于1428年的世界地图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宫 (Topkapi Serai) 博物馆
1540～1542	让·罗茨 (Jean Rotz) (Dieppe cartographer) 海图	中国人，然后是葡萄牙人，一定程度上基于1428年的世界地图	英格兰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1420	《武备志》海图	中国的航海针位记录	北京的中国政府
1422	茅坤海图	中国人，以插图的形式将郑和在印度洋上的航线表现出来	北京
1502	坎提诺 (Cantino) 地图		意大利的摩德纳 (Modena) Estense图书馆
1505	卡韦里欧 (Caverio) 地图	中国人，然后是葡萄牙人	明尼阿波力斯 (Minneapolis) 明尼苏达 (Minnesota) 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 (James Ford Bell) 图书馆
1424	1424年海图		
	匹兹加诺 (Pizzigano) 海图		
	瓦尔德泽米勒地图 (Waldseemüller)		美国国会图书馆

附录四

15世纪初中国人确定经度的方法



各项如下排列：
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教授，佛罗里达大学天文学系的教授、副主席。（JO）
马歇尔·佩恩（Marshall Payn）先生（MP）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之年》一书的作者（GM）

各项如下排列：
介绍
1421年中国人的天文学知识
中国人对花费时间的测定
中国的天文台
蚀
在一次月蚀期间所经历的过程
在一次月蚀期间用消耗的时间去测量经度
理论的证明
实际的运用

介绍（GM）

GM认为在它的第六次航行期间（公元1421～1423年），中国的舰队完善了测定经度的方法。这被中国人制成的关于非洲东部海岸经度的精确图表所说明。随后，在坎提诺（Cantino）地图（1502）上也被注明。而3个世纪之后，约翰·哈里森（Harrison）才发明了天文钟。开普敦（Cape Town）和吉布提（Djibouti）之间的非洲东海岸的经度（这一段距离是7000海里）在20海里的范围内是正确地（20秒的时间）。得出中国人是最早的勘测人员，而且他们的创造在被用于绘制了坎提诺（Cantino）地图。这个结论的详细理由在本书的第6章能看到。

1421年时中国人的天文学知识（GM）

到他们第六次航行的时候，郑和的船队已经掌握夜晚绘制星图的技术，这一技术在中国已有600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记录下了脉冲星、类星体和中子星长达数个世纪，自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人也能预测和记录哈雷彗星的每一次回归。他们也知道地球是个球状体，并且把经度和纬度分成365又1/4份（一年中的天数）。经度的位置是根据相对于北京的球面距离计算的，纬度不是从赤道的位置算起的，而是从北方的北极星和南方的拱极星中间点算起的。最终获得的结果和后来欧洲人得的到是相同的。伴随着大太监洪保于1422年年初的南极之航，中国人知道南极的准确位置。他们还能够消除磁性的变化，并能计算出南半球的纬

度位置，就像在北半球依靠北极星计算纬度一样。在明代早期，北京的天文学家将每晚天上出现的1400多颗星记录下来绘成星图，这是在朱棣皇帝掌握政权之后。中国人还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

中国人对花费时间的测定（GM）

测量经度最必要的要求是精确地测量出已花费的时间。中国人通过太阳的阴影来测量时间的花费。

现存最著名的天文台是700年前建造的周公台(Zhou Gong Tower)。它就像被削去顶端的金字塔，其顶部面积约25平方英尺。楼梯从第一层可以一直通到顶端的平台。其顶部有一个3间屋子，备有一个日圭，即垂直的杆子，对着北方、视野开阔、有40英尺高。天文台里还有一根细长的垂直杆子，是为了观察从这经过的子午线。每一个房子都装备了一个漏壶，即大水钟。

台的北侧沿地面铺设了120英尺的石板，是测量太阳阴影的装置。在两侧设置了水槽，以保证石板铺设的水平。

40英尺高的日圭伸向天空。这使得太阳投射的阴影能够通过这根杆子被测量。举个例子，在赤道二分点的位置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在西方落下去。正午时，太阳正好通过天文台的正上空，因此它没有投影而只是一个点。最长的阴影是在太阳升起或落下的时候。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日子，根据阴影的长度可以知道时间。

回到公元721年，中国人意识到太阳的阴影不光是随着一天中的时间而变化，同时也是随着一年中的每一天在变化。同时。它还依赖观察者的纬度位置。他们在17° 20′ N 和 40° N之间做了一个实验。沿着这条子午线，有数千英里长，在冬至和夏至的时候，他们用一个标准的8英尺日圭同时测量阴影的长度。结果是阴影的长度在纬度上每隔四百英里便会超过3.56 英寸。这样他们就可以据此修正他们的位置。

他们同样也得宜于阴影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在一次成功的测量中，夏至的阴影长度是12.3695英尺，到了冬至则变成了76.74英尺。这使得他们能够像根据阴影确定地球上的不同地点一样，确定每一年中具体是哪一天。

最后的调整是要纠正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时被地球轨道的离心力和赤道与黄道之间的不同而引起的不规则运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时差”。它引起了太阳时间和绝对时间的差异。在2月时它能达到最大14分钟30秒

的正面差异，在11月能最大造成16分钟30秒的负面差异。然而中国人精确地测量出了时差，正如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写道："中国人在1277～1280年所做的观察由于具有很高的精确性，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黄道倾斜角的减小和赤道与黄道之间地球轨道的离心力而具有很高的价值。"（李约瑟Needham，1954，vol.3，p.398） 这突出的精确性被他们对一个太阴月有29.530591天的估计所证实——其误差小于一秒。

中国的天文台（GM）

中国人复制的周公台（Chou Kung[①] Tower），最初是在南京。随后，当1421年首都往北迁到北京时，又把它搬到了北京。稍后，如第4、8章所记载的那样，他们在全球都建造了天文台。我们从《元史》中的一份清单可以知道天文台里有哪些仪器（李约瑟Needham，1954，vol.3，p.369）。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仪器：

浑天像（Hun thien hsiang） ——天球仪（利玛窦所说的第一件工具）

仰仪（Yang i） ——半球形的日晷

高表（Kao piao） ——高的日圭，40英尺，就像在阳城（Yang Cheng）[②]的那样

立运仪（Li yun i） ——经纬仪

证理仪（Cheng li） ——检验测定太阳和月亮接近黄道时的精确位置的工具

景符（Ching-fu） ——图像放大器

日月蚀仪（Jih yueh shi yi） ——观察日蚀和月蚀的工具

星晷（Hsing kuei） ——星刻度盘

定时仪（Ting shih） ——确定时间的工具

候极仪（Hou chi） ——观察北极星的工具

九表悬（Chiu piao hsuan） ——铅锤线

正仪（Chengi） ——矫正工具

正像要看到的那样，这些仪器是用来认识天空中的星（天球仪）、测量太阳阴影的长度（很高的日圭）、测定发生蚀时太阳和月亮的精确位置（证理仪）、放大太阳阴影的图像（景符）、观察月蚀（日月蚀仪）、观察北极星（候极仪）。

---

① 前面提到时作Zhou Gong，用的是汉语拼音，此处用的是魏托马－翟理斯（Wade-Giles）拼写系统。——译者

② 位于今洛阳东南50里的告成镇。——译者

其中一些仪器需要解释。中国人早已知道太阳的阴影越长（也就需要越大的日圭），所测量的时间就越精确。然而，阴影越长，它就会变得越细、越模糊。在明代的早期，中国人就设计了一个“暗箱”，在观察室屋顶顶端开一个小洞，这个洞能产生一个锐利的阴影。他们通过安放一块放大镜来加强这种效果。这使得百分之一英寸的长度都能被测量出来。

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上述的测时装置就失效了。在黑暗中测量时间就得依靠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水钟——漏壶来完成。这些仪器在白天时依靠日圭已经在它们的身上刻上了刻度。漏壶有几种类型，其中最好的一种是一个秤杆类型的秤漏（cheng lou）。它带有补偿器装置，既能考虑大气中空气的压力也能考虑钟内本身水的重量。这些钟有一些在潘达南（Pandanan）的中国沉船的残骸中被发现。我们看到会为这种装置的巧妙构思而惊叹不已。这种装置在1478年印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事林广记》（*Shi Ling Guang Ji*）中有图例和说明，此书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概括的讲，到1421～1423年航海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有能力用他们建立在全球各地的观察平台来测量时间。

蚀（GM）

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和太阳的蚀发生在太阳、月亮、地球彼此处于同一条线的时候，也就是围绕着地球转的月球轨道和绕着太阳转的地球轨道在同一平面上的时候，这称为日蚀和月蚀。当这些星体不在一条线上的时候，那便是新月或是满月，而不是蚀。

日蚀

日蚀时，排列如后页图所示：

月亮遮住太阳的光线在地球上形成了一小块阴影区，使得这块区域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变得如同晚上一样。当月亮绕着地球运转和地球自身旋转的时候，这个暗影，一个黑暗的点，也随着在地球上移动。因此，观察者在不同的位置上能看见不同时间的日蚀。

月蚀

在一次月蚀的过程当中，地球是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因为地球比月亮大许多，那么由地球射过来的投影自然也很大。正如在天文观察的范围内所提到的那样，最大的不同是在一次月蚀中，这一现像能被半个地

球范围内的观察者同时看到。然而，在一次日蚀现像中，在任何时候，只有地球的小块区域能看到。

观察一次月蚀的关键是（i）确定当月蚀穿过地球时，能被人们同时看到的经度；（ii）当月蚀被看到的时候，地球还在旋转，这样看上去就有种天上的一切好像都在往地球相反的方向运转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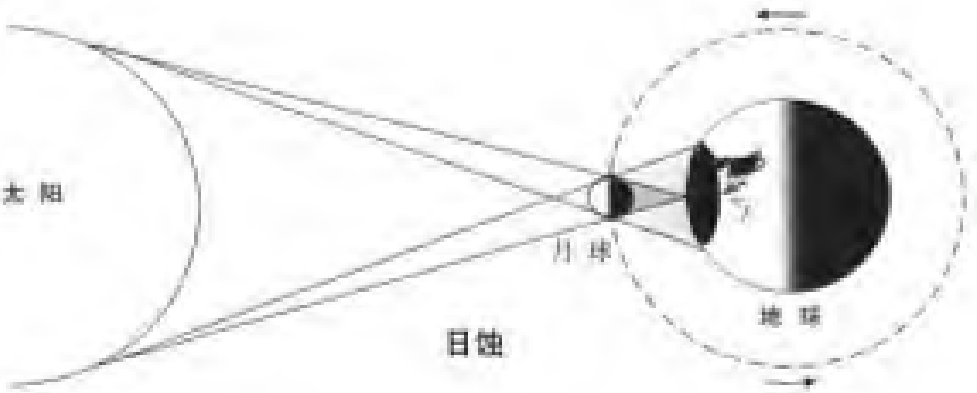
在一次月蚀期间所经历的事情（JO 和 MP）

在一次蚀期间有四件主要过程：U_1——初亏，当月亮刚进入阴影的黑暗中时；U_2——二亏，当月亮刚好完全进入阴影（完全的覆盖）的时候；U_3——三亏，当月亮最初开始从阴影边缘浮现的时候；U_4——四亏，当月亮完全出现的时候。这一过程在自西向东横穿 180° 的范围内都能被观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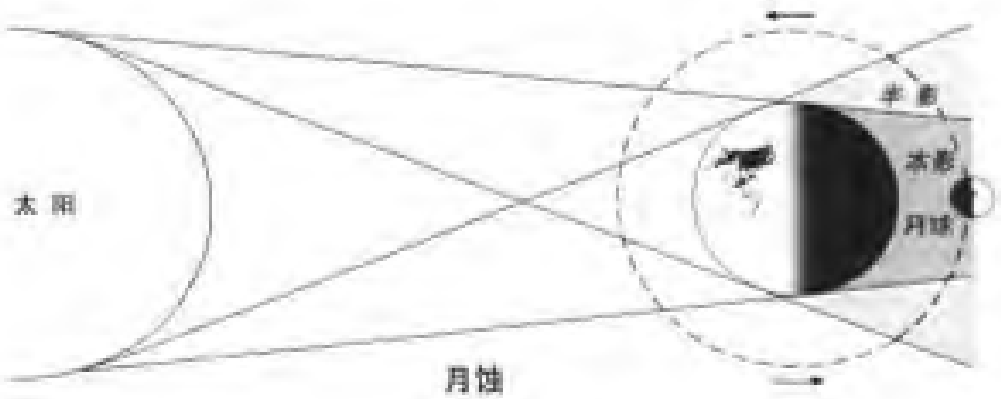
在月蚀中用花费的时间测量经度（JO 和 MP）

用日圭和水钟，中国人能测定经历的时间，一分一分，贯穿白天和夜晚。他们也能够预测到一次完整的月蚀发生的时间——大约每六个月

日蚀原理
月蚀原理



日蚀



月蚀

某个地点穿过地球。给航海家和天文学家的指示如下："在未知的领土中登陆之后，从下一个完整的蚀开始的时候，要一直等到第三个过程发生和黑暗开始消失。也就是当第一束光线出现的时候，月亮开始从它的月蚀过程中出来的时候。在新领土上的观察者和在北京的天文学家同时观察夜空，确定一颗通过当地的子午线的主要的星。"这条子午线是一条在天球仪上想象的线，它从观察者的天极以北的位置一直延伸越过观察者的头顶（观察者的顶点），终点在观察者南端的天极。沿着这条想象的线，观察者选择一颗穿越这条线的已知的星。这一点是所有观察者的关键点。

当那些新发现领土上的天文学家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和在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比较记录。从国外回来的人的记录中显示：在月蚀第三个过程的时候，阿尔发星（alpha）从当地的子午线通过。而北京天文学家的记录显示：当月蚀第三个过程的时候，贝它星（beta）也从当地的子午线穿过，两者都是众所周知的星。他们现在已经弄出了时间保存装置。它们是从日圭上刻下来的。他们等阿尔发星穿越天顶时，开始用他们的时间测量装置测量直到贝它星穿过他们的天顶。阿尔发星和贝它星穿过天顶所消耗的时间就是地球在两个观察者之间旋转的距离——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地球每24小时旋转360°。因此，如果我们假设阿尔发星和贝它星相继通过的时间间隔是6个小时（它花费地球旋转的四分之一时间），那么北京和新发现土地之间的经度差异也是全球总经度的1/4，也就是360°或90°的1/4。

GM的注释：这种精致的设置被月蚀U_1、U_2、U_3和U_4四个过程所描述并能运用一些平均数去减少一些错误。

理论的证据（JO和MP）

我们决定通过观察2000年7月16日、17日的月蚀来证明我们的理论。我们从塔西提岛（Tahiti）横穿太平洋到新加坡都安排了观测小组。非常巧的是，我们选择的地点正是古代中国人建立观测平台的地点。

2000年7月16日、17日关于月蚀的观察。正如所看到的那样，单个观察的误差一般是正负1.5°或者更小。因为一度相当于4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个误差相当于6分钟。两个观察者联合起来的误差被2除之后就更小了，大约只有正负1.0°。

这就是从无论什么星经过当地子午线的春分点被测量出来的天球经度的观察表格。一条直线从北方越过观察者的头顶伸向南方。天球上的经度是沿着星图上赤道测量出来。因此，在339°（塔西提）测量出旋转的圆筒型星图的方位。在U2到U3这个过程所消耗的时间能够通过这个圆筒型星图从339°往后旋转到360°到368°——这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平均误差：塔西提1.1°，新西兰0.1°，墨尔本0.1°，新加坡0°。我们观察者都是业余的观察者；但随着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经验，我们得出的误差会逐渐降低。

	地点	塔西提岛的帕皮提	新加坡	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	新西兰泰卡波(Tekapo)	新西兰的纳尔逊
	经度	−149°	−103.8°	145°	170.5°	173.1°
	是否可见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所得	U_1			258°	284°	285°
	U_2	339°	235°	275°	301°	305°
	U_3	0.8°		301.5°	329°	330°
	U_4		276°		343°	345°
当地的恒星时间	LST_1			258.4°	284.4°	287.0°
	LST_2	341.2°	234.0°	274.7°	300.7°	303.3°
	LST_3	08.0°		301.5°	327.5°	330.1°
	LST_4		277.1°	343.8°		346.4°
观察所得于相当恒星时的差异	U_1			−0.4°	−0.4°	−2.0°
	U_2	−2.2°	−1.0°	0.3°	0.3°	1.7°
	U_3	−0.0°		−0.5°	1.5°	−0.1°
	U_4		−1.1°		−0.8°	−1.4°
误差	平均	−1.1°	0.0°	−0.2°	0.1°	−0.5°
	范围	±1.5°	±1.5°	±1.5°	±1.0°	±1.6°

实际的运用（GM）

结果中有着令人吃惊的内容，因为经度是从在东面的塔西提66海里的误差到在西面的新加坡没有经度的误差被计算出来的。在新加坡和新西兰之间有6海里的经度误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则没有。横穿了地球几乎 1/3 计算出来的经度，其误差是 66 英里。

古代中国人已经测出的经度和奥利弗（Oliver）教授小组所测的一样精确。这个方法非常卓越，不像纬度的计算，不需要六分仪，也不需要时钟，惟一所要的仪器是精确测量消耗时间的装置，即日圭。

由于精确地测定了马六甲（新加坡）的经度，中国人的船队现在可以在印度洋周围——苏门答腊（Semudera）（Sumatra）、安达曼群岛（Andamans）、栋德勒角（Dondra Head）、锡兰／斯里兰卡、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非洲东部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和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 archipelagos），这些土地上使用他们的观测平台和日圭。所有这些地方都表现在《武备志》（*Wu Pei Chi*）图里，这些都得归功于郑和提供的信息。考虑到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在从事测量工作，怀疑横穿印度洋的经度怎能在一次蚀中就被测定是没有理由的。我认为这就像在坎提诺（Cantino）图中看到的结果那么巧，非洲东部的海岸看上去好像是在海洋卫星的帮助下描绘出来的。

郑和的天文导航术的卓越之处不仅来自于其专业性，还来自每支舰队，每支舰队对整体的贡献要比各自的成就大得多。

确立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阿尔法星与贝它星的正确位置，使得中国人能够把它们当作参照点来用，就像利用北极星一样（参看《武备志》图中对苏门答腊〔Semudera〕和栋德勒角〔Dondra Head〕之间的通道的描述）。当他们向北航行时，他们测出了北极星的纬度，使得中国的航海者们能够计算出地球圆周的一半。从赤道向正北航行到北纬40° 的距离是2400海里（10000里），因此，向北极星再航行50° ，那就是12500里，那么，地球的圆周必定是100000里。因为他们知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他们就能利用地球的尺寸去测定南极的准确位置（南极是极地的星星的中心——低于南纬68° 的地方，老人星成为了拱极星）。因此，他们能够测定南磁极的位置，进而确定真正的南北方向。

现在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绘制精确的世界地图所需要的所有要素：纬度、经度、大小、方向。他们打算凭此去精确地绘出每一块大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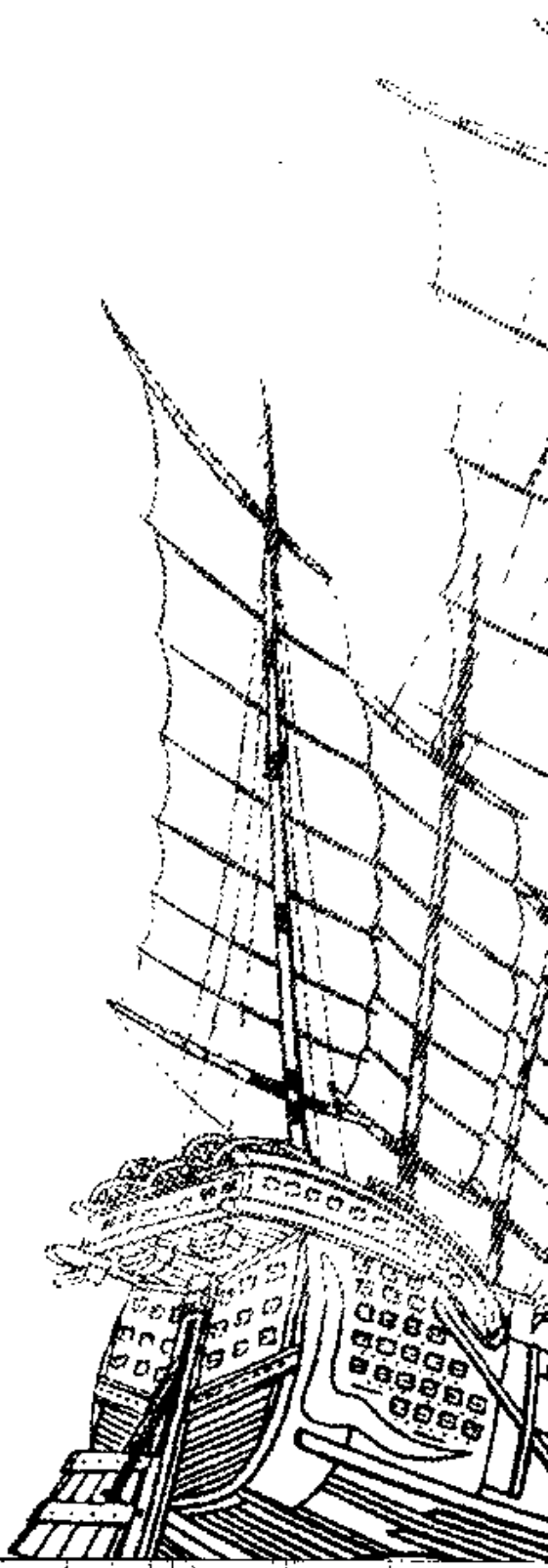
的劳动果实经由达康提（Niccolòda Conti）传到了欧洲，使得欧洲人带着以中国人的地图为基础绘制的地图，沿着中国人的发现之旅开始了他们的航行。

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使用的观测地点

太平洋，由西向东		
马尔盖萨斯（Marquesas）	140° W	9° 30′ S
塔西提（Tahiti）	149° W	17° 50′ S
社会群岛 Society Islands（博拉博拉 Bora Bora）	151° W	17° 30′ S
基里巴斯（吉尔博特 Gilberts，菲尼克斯 Phoenix）群岛（Kiribati Islands）	160° 4′ W	0° 24′ N
鲁阿普基海滩（Ruapuke beach）	174° 47′ E	37° 56′ S
南马道（Nan Madol）	158° 21′ E	6° 51′ N
金皮（Gympie）	152° 42′ E	26° 12′ S
戈斯弗德（Gosford）	151° 13′ E	33° 26′ S
新几内亚（New Guinea）	143° 38′ E	3° 35′ S
雅浦岛（Yap Island）	138° 09′ E	9° 31′ N
南京	118° 45′ E	32° 6′ N
北京	116° 25′ E	39° 55′ N
印度洋		
满剌加／马六甲（Malacca）	102° 15′ E	2° 11′ N
Semudera（班达尔·亚齐 Bandar Aceh）	95° 19′ E	5° 32′ N
尼科巴群岛（Nicobars）（波洛·迈洛 Polo Milo）	93° 42′ E	7° 27′ N
安达曼群岛（Andamans）（拉帕提 Lapatte）	92° 47′ E	9° 22′ N
锡兰／斯里兰卡（Ceylon/Sri Lanka）（栋德勒角 Dondra Head）	80° 13′ E	6° 02′ N
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	75° 49′ E	11° 16′ N
马尔代夫（Maldives）（马累 Male）	73° 30′ E	4° 07′ N
塞舌尔（Seychelles）	55° 29′ E	4° 36′ N
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马哈赞加 Mahajanga）	46° 14′ E	15° 45′ S
桑给巴尔（Zanzibar）	39° 11′ E	6° 11′ N
索法拉（Sofala）	39° 44′ E	20° 09′ S

附录五

因特网上的进一步信息



1 1421年12月中国人的船队穿越加勒比海的航线的再现

2 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地图上地名的翻译

3 1459年毛罗修士（Fra Mauro）平面球形图上的用语

4 中国人的船队从福克兰到南极区的航线的再现

5 皮里·雷斯（Piri Reis）地图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动物和植物词旁的说明文字的翻译

6 中国人的船队从南极到澳大利亚的航线的再现

7 让·罗兹（Jean Rotz）地图已确定今地的地名的翻译

8 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上确定今地的地方

9 坎提诺（Cantino）地图上确定今地的地方

10《武备志》（*Wu Pei Chi*）里的中国星表的摘录

11 纽波特圆型（Newport Round）塔——天文学校正和日形容器的细节

12 萨卡拉门托[①]（Sacramento）发现的中国帆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参考书目

13 比米尼[②]（Bimini）发现的中国帆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参考书目

14 鲁阿普基（Ruapuke）发现的中国帆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参考书目

15 瓦南布尔（Warrnambool）发现的桃花心木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参考书目

16 潘达南（Pandanan）发现的中国帆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参考书目

17 作者和普塔克（Ptak）教授之间的通信

18 有关DNA分析的纲要

19 关于栋德勒角（Dondra Head）、马塔迪（Matadi Falls）、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胡利安（San Julian）的石刻的进一步说明

20 最新的证据概要

21 有关东方人和太平洋沿岸美洲人联系的书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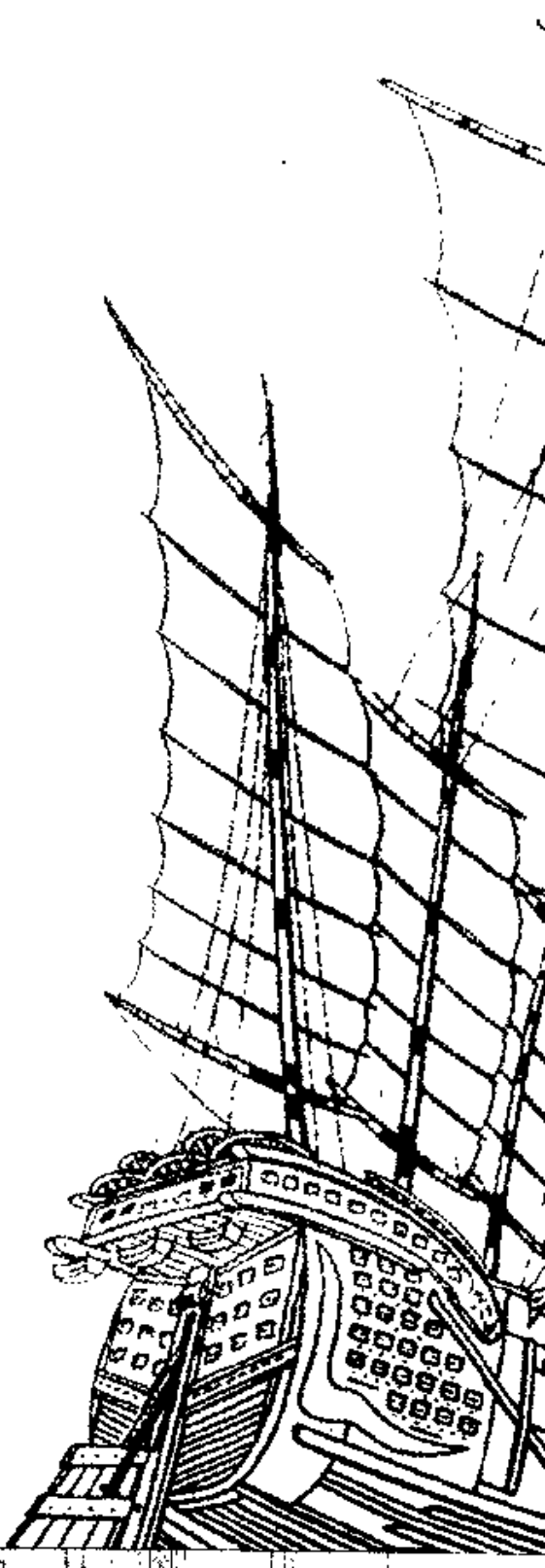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译者

② 巴哈马群岛。——译者

中国发现世界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附录六 图版一览表



明成祖（朱棣），绢本，明代无名氏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修筑于15世纪早期的北京紫禁城天安门，据Werner Forman Archive；15世纪早期天坛祈年殿，据盖茨堡图像（Getty Images）/图像库（Images Bank）；北京附近的长城，据Getty Images/Telegraph Colour Library；从景山公园看到的紫禁城全景，据Getty Images/Tony Stone。

瓷质道教神殿，1406年浙江龙泉出产，大英博物馆藏；神道上的麒麟，Jane Taylor和Sonia Halliday拍摄（Jane Taylor/Sonia Halliday Photographs）；北京附近明陵神道上的武将，Jane Taylor和Sonia Halliday拍摄；神道上的文臣，据Christine pemberton和Hutchison的图像图书馆；神道上跪着的大象，Jane Taylor和Sonia Halliday拍摄（Jane Taylor/Sonia Halliday Photographs）。

青花瓷碟，饰以瓜果，明永乐间（公元1403～1424年）江西景德镇出产，大英博物馆藏；青花瓷瓶，饰以荔枝，明永乐间（公元1403～1424年）江西景德镇出产，大英博物馆藏；玉雕卧犬，14～15世纪，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槌棒形漆瓶，可能为15世纪早期，据克里斯蒂的图像（Christie's Images）；丝织物，饰以婴戏图，13～15世纪，伦敦织物陈列室藏。

沈度（Shen Tu，公元1357～1434年）所绘带有随员的进贡麒麟图，绢本彩绘，费城艺术博物馆藏，约翰·T·多伦斯（John T. Dorrance）捐赠。

毛罗修士地图，绘于1459年，威尼斯基督教马西昂修行派的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藏，据Foto Toso；权近（Ch'uan Chin）和李荟（Li Hui）所绘的1402年疆理图（Kangnido），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暴风雨天气下的好望角，版权为Nik Wheeler/Corbis所有。

加勒石碑，据Dominic Sansoni；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据Chris Caldicott；印度喀拉拉邦科钦使用的中国鱼网，据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桑给巴尔的海岸，据Chris Caldicott；坦桑尼亚的基卢瓦（Kilwa）的堡垒，据Werner Forman Archive；坦桑尼亚昆杜士的石柱墓，据Werner Forman Archive。

皮瑞·雷斯地图，绘于1513年，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皮博物馆藏。

南极洲南奥克尼群岛（the South Orkney Islands，Antarctica）的景色，据John Nobel/Wilderness Photographic Library；南极洲"南洋"的一块扁平的冰山，据John Nobel/Wilderness Photographic Library。

14世纪的青花瓷碗，饰以缠枝莲花，中为跳跃的凤凰和麒麟，发现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潘达南（Pandanan）沉船，此图的使用得到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允许。

让·罗茨（Jean Rotz）地图，绘于1542年，大英博物馆地图部藏。

漆箱，Dámaso Ayala Jiménez1997年制作，Fomento Cultural Banamex，A．C.的收藏品，据Rosa laevigata.，版权为Dr．Koonlin Tan所有；青铜炮；中国铜镜；朱棣统治时期（公元1403～1424年）的钱币；两盘中美洲的石磨，均发现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Pandanan沉船，图片的使用得到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允许。

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绘于1507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藏。

匹兹加诺（Pizzigano）海图，绘于1424年，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詹姆士·福特·贝尔图书馆藏（James Ford Bel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

从海中所见的瓜德鲁普群岛（Guadeloupe）中的Souffriére岛、巴斯特尔岛（Basse Terre）和Sanites 岛，图片的使用均得到Gérard Lafleur的允许。

文兰（Vinland）地图，据新港Beinecke善本书和手稿图书馆；比米尼（Bimini）石路上的潜水者，据Lynne Sladky/Associated Press；水下所见的比米尼石路，据Vade Pemberton；金字塔、Guimar岛、Tenerife岛、Ganary岛，图片的使用均得到Casa Chacona博物馆的允许。

坎提诺（Cantino）世界地图，绘于1502年，摩德纳12埃斯坦斯（Estense）图书馆（Biblioteca Estense，Modena）藏。

16世纪雕刻画中的卡利卡特，据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14世纪加泰罗尼亚语13地图册的细部，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热那亚Museo Navale di Pegli的里道尔夫·吉尔兰得瑞（Ridolfo Ghirlandari，公元1483～1561年）所绘的哥伦布像，据Photo Scala；一幅1558年的葡萄牙语手稿中的达·伽马像，纽约皮厄朋特摩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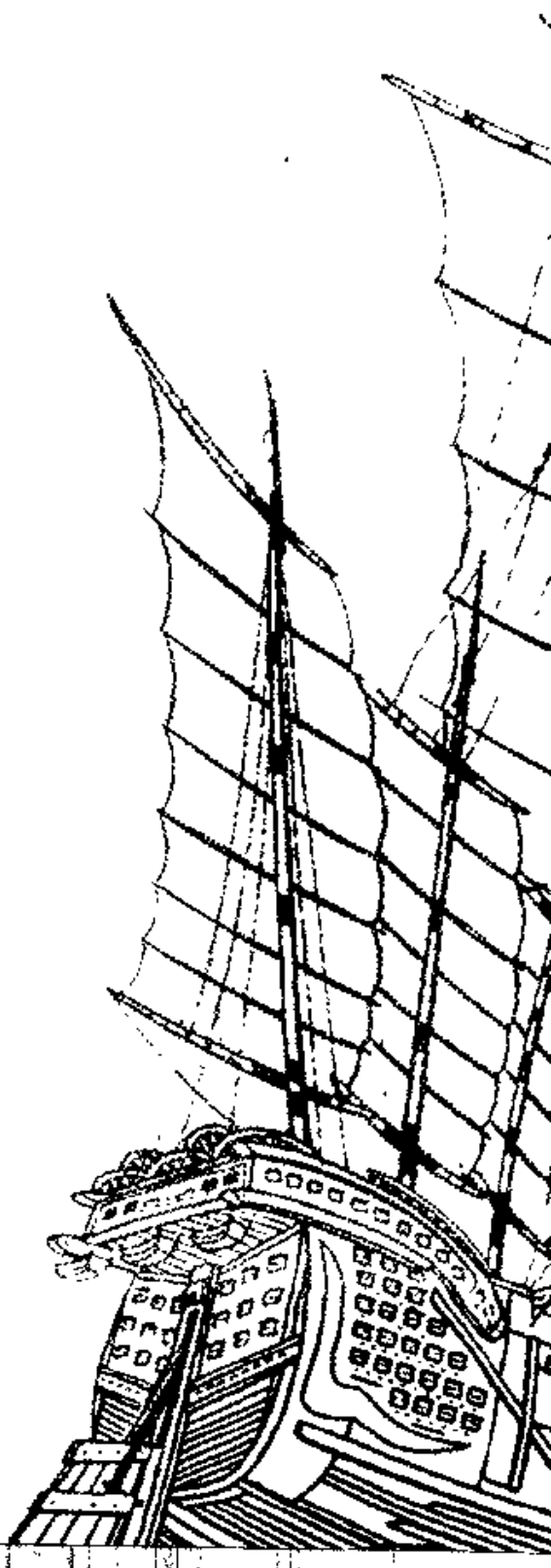
(Pierpont Morgan) 图书馆藏，据 Photo Pierpont Morgan Library/Art Resource/Scala；现代匿名者所绘麦哲伦的肖像，据 Photo Scala；1771 年约翰·哈密尔顿·莫蒂默所绘的“库克船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桑威治大人和其他的两个人”图，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版权为 Bridgeman Art Library 所有；“成功湾参观劳作者汲水”图，绘于 1769 年，大英图书馆藏，版权为 Bridgeman Art Library 所有。

航海者亨利像，为里斯本贝勒慕 (Belėm)“发现之碑”中的一部分，版权为 Dave G. Houser/Cobris 所有。

其他一些线图的来源如下：第 71 页的图据 Bridgeman 艺术图书馆；第 104 页的图据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156 页的图据 Honoriouś Philoponus 的 Nova typis transacta Navigatio (1961 年)，第 184 页的图据纽波特历史协会 (页 2278)，第 210 页的图为马克·哈尔顿 (Mark Halton) 和黛比·福尔福德 (Debbie Fullford) 所绘，据马克·哈尔顿 (Mark Halton) 的《Shanga 东非海岸穆斯林社区考古》(东非大不列颠学会，1996 年)，第 232 页的图据 Heritage Images，版权为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所有；第 256 页的图为大英图书馆地图部所藏。

扉页插图与两张跨页地图由尼尔·高尔 (Neil Gower) 所绘；其他的地图由杰尔·福勒 (Jerry Fowler) 和朱莉娅·劳埃德 (Julia Lloyd) 绘制。

附录七 参考书目



第二章

(1) Hafiz Abru, *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1421,trs.K.M.Maitra, Lahore, 1934, pp.113～115.

(2) Ibid., p.115.

(3) Ibid., pp.115～117.

(4) Ibid., p.117.

(5) 商传《永乐皇帝》,北京,1989年,第214～215页,引自the Cochin tablet《太宗实录》第236章。

(6) S.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88, p.292.

(7) Abru,op.cit.,p.108.此段译文引自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明时中国与波斯各地之交通。

(8) Quoted in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Oxford UP, Oxford, 1944, p.159.译文出处同前。

(9) Ellen F. Soulliere, *Palace Women in the Ming Dynasty*, Princeton University doctoral thesis, 1987, quoted in Levathes, op. cit., p.226.

(10) Levathes, op. cit., pp.163～164.

(11) P. B.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96, p.278.

(12) Quoted in L. Csrrington Goodrich (ed.),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Columbia UP, New York, 1976, p.338.

(13) See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3,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 525; and J.J.L. Duyvendak,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Probsthain, 1949, p.27, and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XXXIV, pp. 395～398.

第三章

(1) 原件在北京,英国图书馆有复制品。

(2)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sec. 20,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230.

(3) Ibid., Vol.4, Pt3, pp.565ff.

(4) Ibid., Vol.6, Pt1, pp.365ff.

(5) Ibid., Vol.6, Pt5, pp.19ff.

(6) Ibid.

(7) Antonio Pigafetta, *Magellan's Voyage*, trs. R. A. Skelton, Yale UP, New Haven, Conn., 1969, p.56.

(8) 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1961, pp. 308ff.

(9) Ibid., P.125.

(10) Ibid., p.265.

(11) Ibid., p.133.

(12) Ibid.

(13) Ibn Taghri-Birdi, *A 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AD, Berkeley, California, 1954.

(14) 马欢,《瀛涯胜览》,北京,1433年。J.V.G. Mills, Cambridge UP (for Hakluyt Society), 1970, p.108.

(15) Ibid., p.143.

(16) Ma Huan, op. cit., trs. Paul Wheatley in *The Golden Khersones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uala Lumpur, 1961, p.143.

(17) Ma Huan, op.cit., trs. Mills, p.104.

(18) Ibin. A slightly different translation is quoted by Richard Hall in *Empires of the Monsoon*. Harper Collins, 1996, p89.

(19) F.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s. Sian Reynolds, Fontana, 1985, p.130.

(20) Ibid., p.131.

(21) Zheng He, quoted in Dorothy and Thomas Hoobler, *Images across the Ages: Chinese Portraits*, Raintree, Austin, Texas, 1993.

(22) 指挥第三支舰队的海军将领的身份未完全准确确定,但是与慕尼黑大学的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通信后,我认为周闻是最有可能的领导者。

第四章

(1) See ch. 3, n.22.51

(2) Stone inscription in the Palace of the Celestial Spouse at Chiang—Csu, dated 1431,trs. J. J. L. Duyvendak,"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 oung Pao*, XXIV, P.347.

(3) Stone inscription in the Palace of the Celestial Spouse at Liu-Chia-Chang, dated 1431, trs. J.J.L. Duyvendak, *China' Discovery of Africa*, Probsthain, 1949, p.29.

(4) Professor Needham, Richard Hall and Louise Levathes.

(5)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HarpeCollins, 1996, p.550, has splendid illustrations.

(6) Ma Hu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 Beijing, 1433, trs.J.V.G.Mills, Cambridge UP (for Hakluyt Society), 1970, p.138.It can be seen that Muslim people are ruling Hindus.

(7) Ibid., pp. 140~141.

(8)Poggio Bracciolini, The Travels of the Niccolòda Conti, 1434, partial translations in R.H. Major (ed.), *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kluyt

Society, 1857.

(9) The Travels of the Niccolòda Conti, quoted in Hall,op. cit., p.124.

(10) J. H. Parry,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 Elek,1979,p.45.

(11) I understand that a book written by the late Professor Wei will be pulished at the conference,claiming that Zheng He' s fleets discovered the Americas.

(12) 100000 *li* equals 40000 nautical miles.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globe is 21600 nautical miles.

(13) As translated by J.Needham 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Pt 3,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572.

(14) Ibid.

(15) Quoted by Eannes de Zuzara,*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trs. C. R. Beazley, Hakluyt Society, 1896~1899.

(16) Hall, op. cit., pp.124~126.

(17) Vice-Admiral Sir Ian McIntosh, letter to the author,2001.

(18) Chuan Chin, one of the Koreans who organiz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Kangnido.

(19) The work of M.Chevalier and his colleagues.

(20) Antonio Galvão, *Tratado Dos Diversos e Desayados Caminhos*, Lisbon, 1563. The translation I have used is that of Richard Haykut, 1601, pp.23~24, quoted by F.M.Rogers in *The Travels of the Infante Dom Pedro*, Harvard UP, Cambridge, mass., 1961, p.48.

(21) Ibid.

(22) H. Harisse, *The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1892, p.272.

(23) [British] Admiralty, *Ocean Passages of the World*, third edn,1973.

第五章

(1) Bibliography in J. Needham, *Science and 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3, sec.29,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542.

(2) Note Vll on the Pirt Reis map,translated by G.C.McIntosh in *The piri Reis Map of 1513*,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Georgia, 2000, p. 46.

(3) Charles R. Darwin, *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Visited by HMS Beagle,1832~1836*, Henry Colburn, 1839, pp. 54 and 124.

(4) Autonio Pigafetta, *Magellan' s Voyage*, trs. R. A. Skelton, Yale UP, New Haven, Conn, 1934, p.54.

(5) Note XXIII, in McIntosh, op. cit, p.44.

(6) Note XXIV, ibid.

(7) Ibid.

(4) Ibid.

(5) Ibid. p.49.

(6) Ibid., p,57.

(7) Professor C.H.Hapgood,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Chilton Books, New York, 1966,pp.193ff.

(8) Erich von Daniken, *Chariots of the Gods*, trans. M. Heron, Souvenir, 1969, p. 20.

(9) British Admiralty Chart 554.

(10) Ludovico Varthema, *Travels of L.de Varthema* (1510), trs.J.W. Jones, Hakluyt Society,1863, p.249. 'He told us that on the side of the said island [Java]...there are some other races who navigate by the said four or five stars opposite to ours [the Southern Cross] and moreover...beyond the said island the day does not last more than four hours, and that it was colder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11) Ibid.

(12) Longitude 70° W.

(13) Latitude 60° S.

(14) Latitude 64° S.

(15) The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mbridge has kindly provided ice charts for the Antarctic.

(16) As may be verified with the Microsoft computer program *Starry Night*.

(17) See Note VI on the Piri Reis map, translated by G.C. McIntosh in *The Piri Reis Map of 1513*,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Georgia, 2000, pp.16 and 17.

(18) L.Carrington Goodrich (ed.),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Columbia UP, New Youk, 1976, p.1365.

(19) Ibid., p.199.

(20) Zvi Dor-Ner, *Columbu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Grafton, 1992, p.10, and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HarperCollins, 1996, P.92.

(21) Vanessa Collingridge, *Captain Cook, Obsession and Betrayal in the New World*, Ebury, 2002.

(22) K.G.McIntyre, *The Secret Discovery of Australia*, Souvenir, Melbourne, 1977, p.268.

(23) Ibid, p.269.

(24) Ibid, pp.271ff.

(25) Ibid.,p.275.The wood is now said to be i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 Canberra.

(26) Ibid.,P.289.

(27) Professor Wei Chuh-Hsie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Hong Kong,1961.

第七章

(1) 这份图的南半部分的描绘是基于1501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s)所抓获的一个西班牙海员所携的一幅海图。

(2) 《西洋记》(*Hsi-Yang-Chi*)，此据J. J. L. Duyvendak "Duyvendak Notes on the Hsi-Yang-Chi"，《通报》(T'oung Pao)，XLII，1953，页 20ff。

(3) Don Luis Arias, letter to the King of spain, quote in A. W. Miller, *The Straits of Magellan*, Portmouth, 1884, p.7.

(4) F. Fernandez-Armesto(ed.), *Times Atlas of World Exploration*, Time, 1991, p.167.

(5) Lin Dao, *Sui Shu* (关于隋朝的官方正史), AD636, ch.82.

(6) 32° 40′ S，152° 11′ E.

(7) 43° 42′ S，146° 32′ E.

(8) Rex Gilroy, *Pyramids in the Pacific*, Gympie, Australia, 1999.

(9) 1422年的中国人的星图表明北极星的位置比今天要偏离3° 40′；这表明北极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以每175年运动1° 的速度在移动。

(10) Robyn Gossett, *New Zealand Mysteries*, Auckland, 1996, p.31.

(11)Gilroy, op.cit; Brett J.Green, The *Gympie Pyramid Story*, Gympie, Australia, 2000, and Gossett, op.cit., p.148.

(12) B. Hilder, "*The Story of Tamil Bell*", in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84, 1975.

(13) Eldon Best, "Note on a Curious Steatite Figurine Found at Mauku, Auckland", in *NZ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II, 1919, p.77.

(14) Gossett, op. cit.

第八章

(1) K.G. McIntyre, *The Secret Discovery of Australia*, Souvenir, 1977, and 'Early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ustralia', 未公开发表，页11。

(2) 中国占据29%，印度占有16%，参见 Angus Maddiso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and Pakistan since the Mughuls*, Allen & Unwin, 1971。

(3) 利玛窦教士和其他早先入华的耶稣会士所见之记录；Chui Hiao《番国图》(Atlas of Foerign Countries)，以及6世纪的卷宗，谈及世纪时大量的中国帆船航向澳大利亚，及《山海经》。见 *Rex Gilroy, Pyramids in the Pacific*, Gympir, Australisa, 1999。

(4) 硝石、铜、碳酸盐、赤铁矿、石英、紫水晶、矾和辰砂构成第一类。第二类由硫、汞、长石、硫酸铜、磁铁矿、石青（Azurite）与雄黄。第三类包括石笋、铁、铁锈、碳酸铅。第四类氧化铅、锡、玛瑙及硅藻土。见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 sec.25,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643.

(5) 同上书，页653以下。

(6) Warren, Dclavault, Hawksworth and others, Ibid., p.678。

(7) 李约瑟上引书，页653以下。

(8) 至于这条资料，应向Brett Green致谢。他的家族记录了这片海岸土著民的歌谣与传说。参见Brett J.Green, *The Gympie Pyramid Story*, Gympie, Australia, 1998, 以及Gilroy上引著述。

(9) 李约瑟上引书。

(10) 参见Gilroy上引书与Green上引书。

(11) Green上引述。

(12) A. Grenfell Pike (ed.), *The Explorations of Captain James Cook in the Pacific*, Limited Editions Club, New York, 1957, p.77.

(13) 迪耶普学校 (Dieppe School) 的其他绘图者所绘海湾有所不同：德斯里安斯 (Desliens) 所表现的较之所应有者更狭窄，而德塞里尔 (Desceliers) 绘出来的就接近其真实尺寸。这暗示迪耶普的绘图员用了一张以上的葡萄牙海图—皮里·雷斯 (Piri Reis) 地图的一条注记就提到4张葡萄牙世界地图 (mappae mundi)。

(14) 格雷总督 (Governor Grey) 之言论，见McIntyre, *Secret Discovery*, p.79。

(15) 对于此造像的年代，最近有争议。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技史》卷4第3部分，页537与图表991中认为："此像属明与清初风格，有理由考虑与郑和是同时代的。"他在537页中又说："卫聚贤书 (4) 页99 (此条是有关香港1960出版的《中国人发现澳洲》) 亦持同样看法。"李约瑟教授又引H. Doré的《中国的迷信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Vol.XI, p.966,以及P.M. Worsley的《早期亚洲人与澳大利亚的交往—过去与现在》(Early Asian Contacts with Australia), in *Past and Present*, No.7, 1955。现今陈放此雕像的悉尼技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则称："本馆倾向于认为此像为19世纪初物品。"

(16) Admiralty sailing instruction,cook.op.cit.

(17) Cdr A. W. Miller, RN, The Straits of Magellan, Griffin, Portmouth, 1884, p.7.

(18) Don Luis Arias, letter to the King of Spain, quoted, ibid.

(19) John Merson, *Roads to Xanadu*,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9, p.75.

(20) 关于在菲律宾发现玉米的问题：M.D.W.Jeffreys,'Pre-Columbian Maize in Asia', in Carroll Riley et al.(ed.), *Men across the Se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 pp.382ff.; E.L. Sturtevant, 'Notes on Edible Plants',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7th Annual Report, 1919, p.616 ('In 1521 maize was found by Magellan at the island of Limsava'), H.W. Krueger, 'Peoples of the Philippin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r Back-

① 此处汉文记载原文据《明仁宗实录》，卷②。——译者

ground Studies No.4, Washington DC, 1942, p.23 (Pigafetta observing maize cultivation on Limasava); W.Richardson,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Made by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ards during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uies*, 1789, p. 486 ('The islanders invited the General into their boats in which were their merchandise viz cloves...and maize'; C.O.Saver, 'Maize into Europe', in *Accounts 34th int.Cong.Amer.*, Vienna, 1960, pp.777～788 (Pigafetta's 'miglio' translated as maize); Antonio Pigafetta, *Primo Biaggio intorno al Mondo*, MS version of c.1524 translated in E.H.Blair and J.A. Robertson, The Pholippine Islands 1493～1893, 1906, pp.164 and 182 (cakes of 'riso e miglio' on island of Zubu [Cebu]); Pigafetta, op.cit., p.154 ('ears like Indian corn...shelled off like lada'); J.J.L. Duyvendak,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Probsthain, 1949, p.32.

第九章

(1) 北纬11°。

(2) Peter Whitefield, *New Found Lands: Maps in the History of Exploration*, British Library, 1998, pp.54～55.

(3) Article by Dr.Tan Koonlin in *The Ro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ose Society), Vol.92,Pt.4,R.E.Shepherd, *History of the Rose*, Macmillan, New York, 1954; E. Wilson, *Plant Hunting*, Vol. 2, Straitford, Boston, Mass.

(4) Sacramento Bee, 26 January 2001, and *Enterprise Record of Chico*, 23 January 2001.

(5) Carey McMilliams, *Factories in the Fie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0, pp.68～80.

(6) Stephen Power, 'Aborigines of Califoria: An Indo-Chinese Study' in Atlantic, Vol. 33,1874, and Stephen Powers, *Contributions to North American Ethnology*, Vol3, Department of Interior, Washington DC, 1877.

(7) Powers, *Ethnology*, p.417.

(8) 均见同上书，引言及页146～434。

(9) All ibid.,introduction and pp.146～434.

(10) Fra Bernardino de Sahagún, *The Glorentine Codex: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1325～1550*,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Santa Fe, 11 vols, 1950～1969.

(11) Bernardino Diaz del Castillo,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New York, 1956.

(12) Barbara Picksgill,'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the New World", *Nature*, 268(18), pp.591～594.

(13) Alberto Ruz Lhuillier, "The Mystery of the Temple of the Inscription", *Archaeology*, Vol. 6, No.1, 1953, as quoted by Charles Gallenkamp in

Maya: The Riddle and Rediscovery of a Lost Civilisati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87, pp. 93～104.

第十章

(1) Fra Bernadino de Sahagun在*The Florentine Codex: General History of Affairs of New Spain* 1325～1550 (trs. A. J. O. Anderson and C. E. Dibble, Salt Lake City, 1970) --书中描述了用漆工艺。

(2) Ma Huan, *The Overall of the Ocean Shores*, trs. J. V. G. Mills, Cambridge UP (for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1970.

(3) H. Mertz, *Gods from the Far East: How the Chinese Discovered American*, New York, 1972, pp. 72～73.

(4) Stephen C. Jett, 'Dyestuffs and Possible Early Contacts between South Asia and Nuclear American', in *Across before Columbus?*, NEARA Publications, Edgecomb, Maine, 1998, pp. 141ff.

(5) Ibid., p.146.

(6) De Sahag , op. cit.

(7) 正在设法比较Michoacán狗和沙皮狗的基因(DNA)。结果会公布在网上。

(8) Nicolás Leó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of Michoac : The Lienzo of Jucut ato ', in *Smithsonia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C, 1889.

(9)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t.3,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p. 540–543.

(10) The Peruvian historian Pablo Padron, 'Un Hauco con Caracteres Chinos', Sociedad Geográfica de Lima, Vol. 23, pp. 24～25.

(11) Carl Johannessen and M. Fogg, 'Melanotic Chicken Use and Chinese Traits in Guatemala', in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Vol.93, 1962, p.75.

(12) W. C. Parker and A. G. Bearn, *Annal of Human Genetics* 25, 1961 (227).

(13) Padron, op. cit.

(14) 这只是从《异域图志》译出的一部分，由Viviana Wang翻译，在此我向她表示感谢。

(15) *In the Atla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on., AD265～316, China.

(16) K. G. McIntyre, The Secret Discovery of Australia, Souvenir, Melbourne, 1977.

(17) J.L. Sorenson and M. H. Raish, *Pre-Columbian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s across the Ocean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ovo Reasearch, 1990.

(18) George E. Carter, 'Fusang: Chinese Contact with American', in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f Canada*, 14, No. 1, 1976.

第十一章

(1) [British] Admiralty, *Ocean Passage of the World*, third edn, 1973.

(2) Armando Cortesão, *The Nautical Chart of 1424*《1424年的航海图》, University of Coimbra,Portugal, 1954年。105、110页。

(3) Bartolomeu las Casas, *Historia de las Indias*,Lisbon, 1552.

(4) Antonio Galvão, *Tratado Dors Diversos e Desayados Caminhos*, Lisbon, 1563, and Cortesão, op. cit., 页73。

(5) 切昂卡(Chanca),见J.H. Longille, *Christopher Columbus*, Inscribers, Washinhgton DC, 1903, p.184.

(6) 切昂卡 (Chanca), 上引, 页187。

(7) 同上书, 页184。

(8) 上引Syllacius书, 页184及以下。

(9) 切昂卡 (Chanca), 上引, 页181和182。

(10) 参见网页,可获更详尽资料。

(11) 见于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与作者2002年7月6日至7日交换的信件。

(12) Syllacius书, 见上引Lingille著作, 上引Syllacius书, 页184及以下。上引Syllacius书, 页184及以下。页184。

(13) 同上书, 页185。

(14) 这一点在网页解释得更为详尽。

(15) J. J. L. Duyvendak所译碑文, 见*China' s discovery of Africa*, Probsthein,1949年, 页28[1]。

(16) 编号4403,3912和2710(更详尽的材料参见网页)。

(17) 编号3912。

(18) 西经77°30′, 北纬23°10′与23°50′之间。

第十二章

(1) 编号2710, 3810和3912。

(2) F.L.科夫曼 (Coffman) 珍宝地图集 (Atlas of Treasure Maps),纽约, 1957年。

(3) F.L.科夫曼 (Coffman) 珍宝地图集 (Atlas of Treasure Maps) 的编号序列为26, 61, 63和64。

(4) F.L.科夫曼 (Coffman) 珍宝地图集 (Atlas of Treasure Maps) 的编号序列为27, 28, 29和30。

(5) 彼得·马特 (Peter Martyr) 引自E.W.劳森 (Lawson) 的《佛罗里达

① 这段文字并非出自《婁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而是出自《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参见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之附录二。《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 中华书局2000年, 第53页。——译者

及其发现者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1946年，第8页。

（6） 彼得·马特（Peter Martyr）引自同上书，页11。

（7） 《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的海底世界》和电视系列节目《寻找阿特兰提斯洲（Alantis）》，是由伦纳德·尼默（Leonard Nimoy）播送的，播于（英国）4频道以及（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8） 戴维·津克博士（Dr·David Zink）的发现特写于以下两本书中：巴顿（Dutton）1979年著的《古石的言说（*Ancient Stones Speak*）》和W.H.阿伦（Allen）1978年著的《阿特兰提斯洲的岩石》（*The Stones of Atlantis*）。

（9）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54年，页669。

（10） 津克（zink）博士所送的样品已被弗吉尼亚大学验证。

（11） Alemanide,rhaotide and celtide

（12） 在克里斯蒂（Christie's）拍卖行。

（13）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著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生活和航海》，转引于洛伦·科尔曼（Loren Coleman）的《神秘的美洲》，Faber，1983年，页218。

（14） 费迪南·哥伦布（Ferdinan Columbus），*La Historia della Vita di Cristoforo Columbus*，Milan，1930.

第十三章

（1） 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x I，King of Verrazzano）致韦拉扎诺（Verrazzano），转引于D.B.Quinned.）编著的《北美洲的发现》（*North American Discovery*），Hanper & Row，1971年。

（2） 韦拉扎诺（Verrazzano）航海的记述见于他在1524年7月8日写给弗朗西斯一世的信。

（3） Ibid.

（4） 苏珊娜O·卡尔森（Suzanne O.Carlson）的证据在2002年3月4日刊布于因特网上，网址：www.neara.org/carlson/atlantic.html。

（5） F.J.波尔（Pohl）教授著《哥伦布之前穿越大西洋》（*Atlantic Crossings before Columbus*），纽约W.W.Norton，1961年，页185ff。

（6）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R.李提默（Latham）译，Penguin，Harmondsworth，1958年，页237。

（7） 威廉·彭哈络（WilliamP. Penhallow）著《哥伦布航海之前'在纽波特（Newport）塔的天文准线'？》，NEARA出版，缅因（Maine）Edgecombe 1998年，页85ff。

（8） 此点在15章中做更全面的说明。

（9） E.R.斯诺《大西洋海岸的传说》，Redman，1962年，页19。

（10） 同上。页26ff，注释23。

（11） 马萨诸塞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戴维·博登（David Borden）和他的朋友弗雷德·切斯特（Fred·Chester）在戴顿岩石（Dighton Rock）公园附

近长大，他们给我提供这一信息。

（12）戴维·博登（David Borden）向我提供。

（13）戴维·博登（David Borden）向我提供。

（14）所列的布局以及图片可以参看我的网站。

第十四章

（1）Manuel Faria de Souza, *Epítome de las Historias Portuesas*, Madrid, 1683（我对它的中古卡斯提里安语文本的译本）—译者注：英文原本此处无注解符。此系译者查核后补入。

（2）Rebecca Catz,'Spain and Portugal and the Navigators'，未出版论文，1990 年 9 月 25 日提交，华盛顿特区。

（3）大约西经51°40'。

（4）据 Farley Mowat, *The Farfarers: Before the Norse*, Seal Books, Toronto, 1998, 页 176 引文。

（5）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引自《圣经》第 308 页。

（6）Peter Schlederman, *Voices in Stone*, Calgary, Canada, 1996；以及 Mowat 上引著作。虽然我的结论与 Peter Schlederman and Farley Mowat 不同，我对他们的研究依赖甚重，否则本章是无法写成的。

（7）Schlederman 上引著作，页 127。

（8）Canadian Gevernment maps of the Canadian Arctic (Hydrographid and Map Service of Canada, Map X1734)；*Eskimo Maps of the Canadian Eastern Arctic* by John Spink and D.W. Moodie (1972)；*the Sea Ice Atlas of Arctic Canada*, pubulished by the Ottawa Department of Energy, Mines and Resourses, 1982, and *the map of Greenland* drawn by the Geo Daetisk Institut of Copenhagen, 2000.

（9）Ferdinand Columbus, *La Historia della Vita di Cristoforo Columbus*, Milan, 1930, 引文引自一份其父现今已亡佚的备忘录，目的是用于证实北极可居住。

（10）Catz, Translation of Columbus's note in a copy of Pope Pius II, *History of Reemarka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My Time*, in op.cit.

（11）J.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P , Cambridge, 1954.

第十五章

（1）Antonio Galváo, *The Duscoveries of the World*, Hakluyt Society, 1862, 页 369。

（2）The Portuguese historian Castaneda.

（3）Eric Axelson(ed.), *Dias and His Successors*, Saayman & Weber, Cape Town, 1988, 页 66。

（4）The Jesuit Father Monclaro, 1569, 此据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 Simon & Schuster, 1994, p.198.

(5) N.Puccioni, *Giuba e Oltre Giuba* ("The River Juba and Beyond"), Florence, 1937, p.110.

(6) Levathes上引著作，页198。

(7) H.D. Howse, *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1980, p.2.

(8) J.Needham.citing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 Pt2, sec.20,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54, p.398, 及La Place calculations, p.299.

(9) 同上书，页369。

(10) 同上书，页392。

(11) 那些希望见识这些精巧仪器的人，可以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一部图说百科全书类型著作《事林广记》，1478年刊本。

(12)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s.R.Latham,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58, 页288。

第十六章

(1) Francisco Alecaforado, report of proceedings to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2) Gomes Eannes de Zuzara, *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trs. C.R. Beazley, Hakluyt Society, 1896～1899.

(3) E.D.S. Bradford, *Southward the Caravels*, Hutchinson, 1961,页8。

(4) Vasco Lobeira, Amadis de Gaul, ed. And trs. R.Southey, 1872.

(5) Malcolm Letts (ed. And trans.), *Mandeville's Travels*, Hakluyt Society, 1953, 页116 (Egerton文本), 页321 (Paris文本). 曼德维尔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英国绅士，他栩栩如生地描述从未访问过的地方。

(6) 同上注。

(7) Camões, Os Luciades ('The Luciads'), Lisbon, 1572.

(8)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要想精确尚需加上大地的斜度与曲率。

(9) 参见F.M. Rogers, *The Travels of the Infante Dom Pedro of Portugal*, Harvard UP, Cambridge, Mass., 1961中的引文。

(10) 同上注。

(11) 我一直使用奥立弗·马丁的年表，但唐·佩德罗的旅行细节不同的史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混乱是因为许多国家使用不同的历法，且因为唐·佩德罗1416～1428年进行了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旅行。很可能他在1419年再一次离开了葡萄牙去访问西吉斯蒙德皇帝 (the Emperor Sigismund)，并在皇帝与奥斯曼的战争中效力。他后来在特莱维索定居下来，并在1421年夏天在皇帝与威尼斯的另一次战争一结束之后，就访问了威尼斯。而后他于1424年前往埃及，经过英格兰 (1426年) 并再一次经过威尼斯 (1428年)，回到葡萄牙。

(12) Antonio Galváo, *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Hakluyt Society,

1862. p.107.

(13) 关于尼科洛·达·康提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 the Florentine) 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 F.M. Rigers上引书，页42及264； Gustavo Uzielli, *La Vita e I Tempi di 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 Rome, 1894, and W. Sensburg, *Poggio Bracciolini und Niccolòda Cibtu*, Vienna, 1906.至于Toscanelli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 the Florentine) 之间的联系问题，参见Gustavo Uzielli, *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 Iniziatore della Scoperta d' America*, Florence, 1892; Sidney Welch, *Europe' s Discovery of South Africa*; Arnold J. Pomerans, *The Great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 1958, 页18, and P. Kermann, *Zeigt Mir Adams Testament*。至于Toscanelli and 唐·佩德罗 (Dom Pedro)，参见 Uzielli, Toscanelli: Iniziatore, 页76. 至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 (Bartholomew the Florentine) 与Martin Behaim的关系，参见F.M. Rogers, *The Quest for Eastern Christi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2, 页42和95。

(14) 关于尼科洛·达·康提，参见：

1) G. Uzielli, *La Vita e i Tempi di 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 Rome, 1894, 页10,11,63,90,122,141,154～75,189～92,228,246,386,566～567；

2) *The Travels of Niccolòda Conti*, 在R.H. Major (ed.), *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kluyt Society, 1857有英文摘译；

3) W. Heyd, *Histoire*, Vol.I, 1885, p.378,380；

4) V. Bellemo, *Nicolo da Conti*, 1882,pp.331～347；

5) C. Desimoni, Pero Tafur, 1882, pp.331～347；

6) F. Kunstman, *Afrika vor den Entdeckungen der Portugiesen*, Aufrosten der Academie, Munich,1853.

关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 (Bartholomew the Florentine)，参见：

1) Uzielli, *La Vita e i Tempi*, pp.63,165～166；

2) T. de Mura, M. Behaim, Treutel et Wurz, Strasbourg, 1802,pp. 33～35；

3) P.Amat (ed.), *Studi Bibliografichi in Italia*, Pt 1, Ed.2, Rome, 1882, pp.123.

至于教皇 Eugenius四世(Gabriele Condulmaro)，参见Uzielli, *La Vita e i Tempi*, 页166：'Gabriele Condulmaro poteva essere a Venezia nel 1424, ma non era ancora Papa, essendo stato assunto alla tiara soltanto nel 1431'。

关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 (Bartholomew of Florence) 的旅行，参见 Uzielli, *La Vita e i Tempi*, 页63："Ecco ciòche ne dice maestro Bartolomeo Florentino che tornòdale Indie nel 1424 e che accompagn a Venezia il Papa Eugenio IV, e al quale raffontòci aveva veduto e osservato in un soggiorno de ventiquattro anni in oriente."

(15) 参见注文 (13) 中有关尼科洛·达·康提与"佛罗伦萨的巴托罗缪" (Bartholomew the Florentine) 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注文。

(16) Paolo Toscanelli, *Letter to Columbus*, in H.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Sands, 1902, pp.322~323.

(17) 也称为Behaim和波希米亚 (Bohemia) 的Martin。参见本章注文 (13)。

(18) Antonio Pigafetta, *Magellan's Voyage*, tr.R.A. Skelton, New Haven, Conn., 1969, pp.58ff.

(19) 参见本章注文 (13) (14)。

(20) 参见本章前注，及页63。

(21) 参见本章前注文 (14)。

第十七章

(1) Antonio Galvão, *Tratado Dos Diversos e Desayados Caminhos*, Lisbon, 1563, and Antonio Cordeyro, *Historia Insulana*, Lisbon, 1717, Quoted in H. Harrisse, *The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1892,p.51.

(2) J. H. Longille, Christopher Columbus, Inscribers, Washington DC, 1903,p.191.

(3) 选自哥伦布的笔记,参见Bartolomeu las Casas, Historia de las Indias, Lisbon, 1552。

(4) Galvão上引书，页370。

(5) 包括：Andrea Bianco于1448完成的；Grazioso Benincassa 绘于1463，1470 和1482的；Andrea Benincasa绘于1476以及Albino Canepa完成于1480和1489的。

(6) 参考Armando Cortesão, *The Nautical Chart of 1424*, Coimbra, 1954,页106。

(7) Carol Urness, Portolan Charts,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8) 里斯本科学院 (Lisbon Academy of Sciences) 出版。

(9)关于在波多黎各欧洲大航海之前的咖啡,参见D. Maclellan,'Coffee Varieties in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Agriculture Station Bulletin* No.30, Mayaguez, Puerto Rico, 1924; P.C. Stanley, *The Rubiaceae of Central America*, Chicago, 1930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otanical Series Vol.7,no.1);E.C.Hill, Coffee Planting, Higginbotham, Madias, 1877, 页1~3 and 17~19;E.R. Thurber, *Coffee from Plantation to Cup*, American Groc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ew York, 1881, 序言及页4~5。

(10) 在Mayaguez农业站 (Agricultural Station) 所摄产品照片。

(11) Albino Canepa: the domain of saluagio viúade (nom vulgar des Alguns brasilieros), the common name for people coming from Brazil, the Caribs.

(12) 使用海军司令部的Ocean passages of the World 和相关海军司令部导航资料所描述的流量的平均值。

(13)至今我只研究了尤素福·卡迈勒亲王的编目，来考察对安的列亚(Antilia)

已经做了多少更正工作和增补工作。这揭露出在哥伦布出航之前有过14次：Beccarios的两次(1435～1436)，Andrea Bianco的两次(1436～1448)，Parreto的一次(1455)，Benincasas的四次(1463，1470，1476～1482)，Toscanelli的一次(1474)，Canepas的两次(1480～1489)，Jaime Bertram的一次(1482)and Christofal Soligo的一次(1489)。

(14) Prince Youssuf Kamal,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 16 vols, Cairo, 1926～1951.此编目登录了为数可观的极有价值的现存展现欧洲人与中国人在西非探险的海图与地图的藏品。

(15) 引用于E.D.S. Bradford, *Southward the Caravels*, Hutchinson, 1961. 页107。

第十八章

(1) Joăn Barros致未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勒信件(letter to the future King Manuel of Portugal)，引述自Eric Axelaon, *Dias and His Duccessors*, Cape Town, 1988, 页3。

(2) K.G.Jayne, *Vasco da Gama and his successor 1460～1580*, Methuen, 1970, p.36.

(3) Joăn Barros致葡萄牙国王信件(*letter to the King of Portugal*)，1500年5月1日，引述自Jaime Batalha Reis, *Estudios Géográphicos Históricos*, Ministry of Colonial Affairs, Lisbon, 1941, 页286。

(4) S.E. Morison, *Portuguese Voyages in Americ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rvard UP, Cambridge, Mass., 1940, 131.

(5) 第五章、第六章，在那里这些问题有详尽讨论。

(6) 同上，并见第八章。

(7) Sebastian Alvarez, the King of Castile' s factor，引述自Cdr A.W. Miller, RN, *The Strait of Magellan*, Griffin, Portsmouth, 1884, 页7。

(8)*The Journal of Columbus*, trs. Cecil Jane, revised and annotated by L.A. Vigneras, Anthony Blond and Orion Press, 1960, pp. 12, 43 and 62.

(9) H.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Sands, 1902, p. 323.

(10) Toscanelli, letter to the King of Spain, 1474，引述自J.H. Parry, *The Discovery of South America*, Elek, 1979, 页48。

(11) 皮里·雷斯(Piri Reis)地图注7，G.C. McIntosh英译，见*The Piri Reis Map of 1513*, University Georgia Press, Athens, Georgia, 2000, 页46。

(12) Authur Davies, Behain, Marcllus and Columbus,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3, p.454.

(13) A.O. Vietor, A Pre-Columbian Map of the World circa 1489, *Imago Mundi xvii*, 1963.

(14) Davies上引书。

(15) Davies上引书。

(16) Lord Palliser, Captain Cook's commander.

(17) K.G. McIntyre, *Early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ustralia*, 未发表的论文，页12。

结语

(1) Barbara Pickersgil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the New World*, Nature 268 (18), pp.591～594.

(2) R.A. Whitehead, *Evolution of Crop Plants*, Longman, 1996, pp. 221～225.

(3) E.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sations*, trs. R.Mayne, Penquin, 1994, pp.158～159.

(4)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教授 (Prof. of Ge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Judith A. Carney写了一部精彩的著作，*Black Rice: the African Origin of Rice Cultication in Americas*, Harvard UP, Cambridge, Mass. 2001。此书介绍了稻米在美洲真正起源的历史，并提出通常所相信的那种标准说法，即欧洲人将稻米介绍到西非，然后将其培育知识带入美洲是一种根本上的错误。

(5)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Calicut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Envoys and Tribute Emissarie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9, St.447；并见Ptak教授与笔者之间交换之函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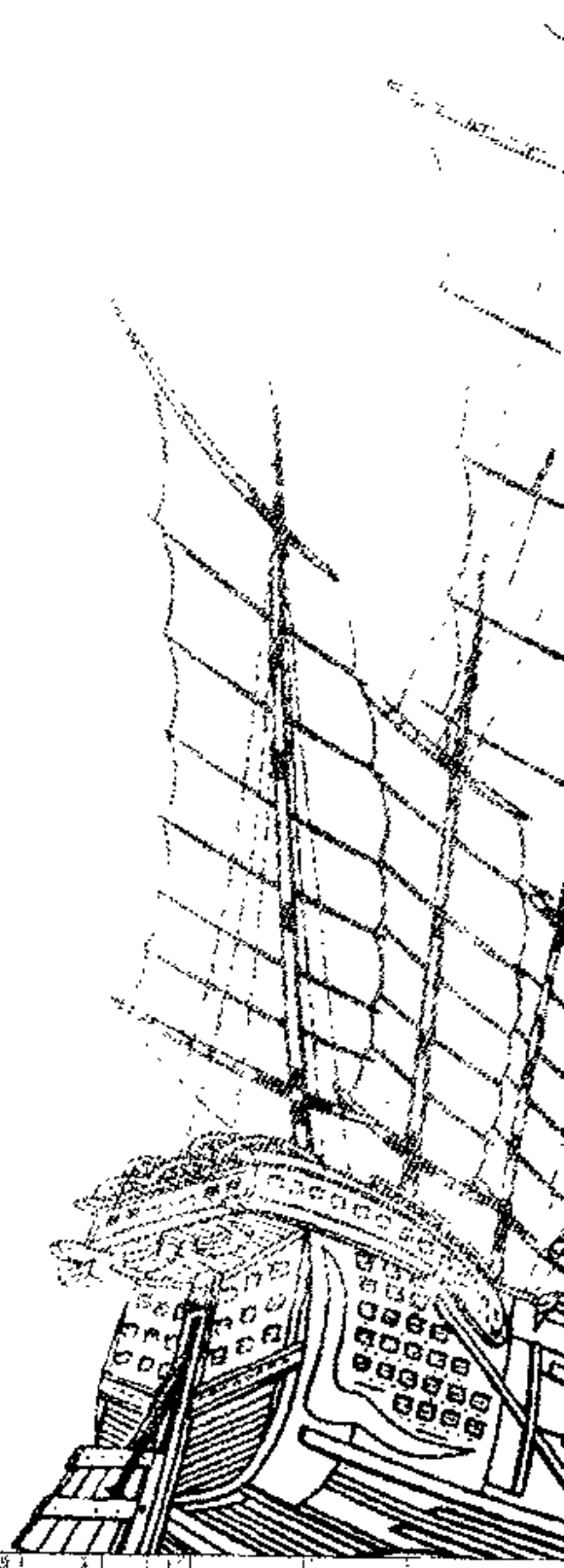
(6) 柯枝表文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83，此据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Oxford UP, Oxford, 1996, 页145。

(7) Gaspar Correa, *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Cama*, trs. H.E. J. Staney from *Landas da India*, 1869.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中文简体字版附录



一部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书

2002年3月，从伦敦传出了一个惊人的学术信息，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一个有两百多人参加的发布会上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消息传出，世界为之震惊！连我国学术界也有些意外。这意味着，中国人将把所有早已闻名遐迩的航海家抛在后面。

许多人似信非信。但后续报道陆续传来：孟席斯不是信口开河，他经过了14年潜心的研究，做了大量调查，把14年的退休生活变成了拼命工作的14年。妻子玛塞拉忘情地支持和帮助他，成为他新的事业的同伴和助手。他们结伴而行，追踪了郑和船队在全球的航线，先后到达120个国家，访问了九百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还到中世纪末期世界各主要港寻访船队的遗迹，然后返回自己在伦敦北部伊斯顿的家中，潜心进行研究和写作。他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

他把全部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书中，书名表明了他的主旨：《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年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年代。可是，书待出版，人们一时还不知底里。

南京，是郑和第二故乡。这里造出了下西洋的宝船，是船队的始发地；这里也是郑和长时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包括他的住所和基地。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专门从事郑和研究和有关郑和资料的搜集，郑和府邸所在的白下区政府积极支持郑和研究事业，在研究会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从事郑和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和热心于郑和研究事业的有识之士。他们急盼读到孟席斯的著作，了解他的研究成果，解开众多的惑疑。

机会终于来了。在南京市政府的关心和白下区政府的支持下“迎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中旬在南京举行。受邀的孟席斯夫妇带着刚出版并散发着墨香的著作来到金陵。10月19日，在众人的期盼下，孟席斯作了学术演讲，首次向中国听众宣布了他的惊人发现，引起了众人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提出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

人们问得最多的是：你凭什么说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也就是说他早于西方航海家绕过好望角到达美洲，之后又抵达澳洲。如此说

来，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达·伽马也没有发现好望角，库克到南半球探险也算不上创举，麦哲伦更不是第一个作环球航行的人。孟席斯回答说，他的结论来源于由中国人绘制的第一张世界海图的发现。他在威尼斯做研究的时候，别人让他看了一幅1459年绘制的平面天球图，图中包括了南部非洲和好望角。而此前人们一致认为，好望角是1497年由达·伽马发现的。他对这幅图产生了兴趣，仔细地研究它。他注意到，这张平面天球图提到1420年有一次绕过好望角的航行。这次航行是由谁完成的呢？旁边有一张船的图画，那不是中国的舢板吗？这无异于一个注释，告知人们是中国人完成了这次航行。孟席斯兴奋不已，他感到自己将会有重大发现。

他发现，是中国人首先绘制了世界海图。他认为，无论是考古发现，或是同时期的文献记录，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1421～1423年间中国人绘制了世界地图。这项工作由率领船队下西洋的郑和及他的部属完成的。虽然这些实物几十年后被反对远航的大臣们连其他档案一起毁掉，但他们积累的知识却部分留了下来，并传扬出去，关于绘制世界地图的知识就是。这些知识通过葡萄牙人和另一位参与郑和船队远航的意大利人尼科洛·达·康提传播到西方，接受了这些知识的人再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郑和一行只有作了环球的航行，才能绘制出世界地图，西方人借助他们的知识绘制出自己的地图，引领自己的航海家去闯荡世界。

对于自己的结论，孟席斯非常自信。因为，他确信他提供的证据“无可置疑”，完全可以映证他的结论。他告诉我们：在他的新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他对所有证据有着全方位的展示和详细的叙述。在这些证据中，他不过是费力去寻找而已，其实，大多在中国人的书籍中。说到此，他显得格外谦逊：“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事实都摆在那里——它们全都是前人讲过的。”他认为，有关中世纪中国人探险的书籍大约有六千种。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使这些由中文纪录的信息很少为西方人知晓。现在，他把这些信息采集起来，告知西方人，告知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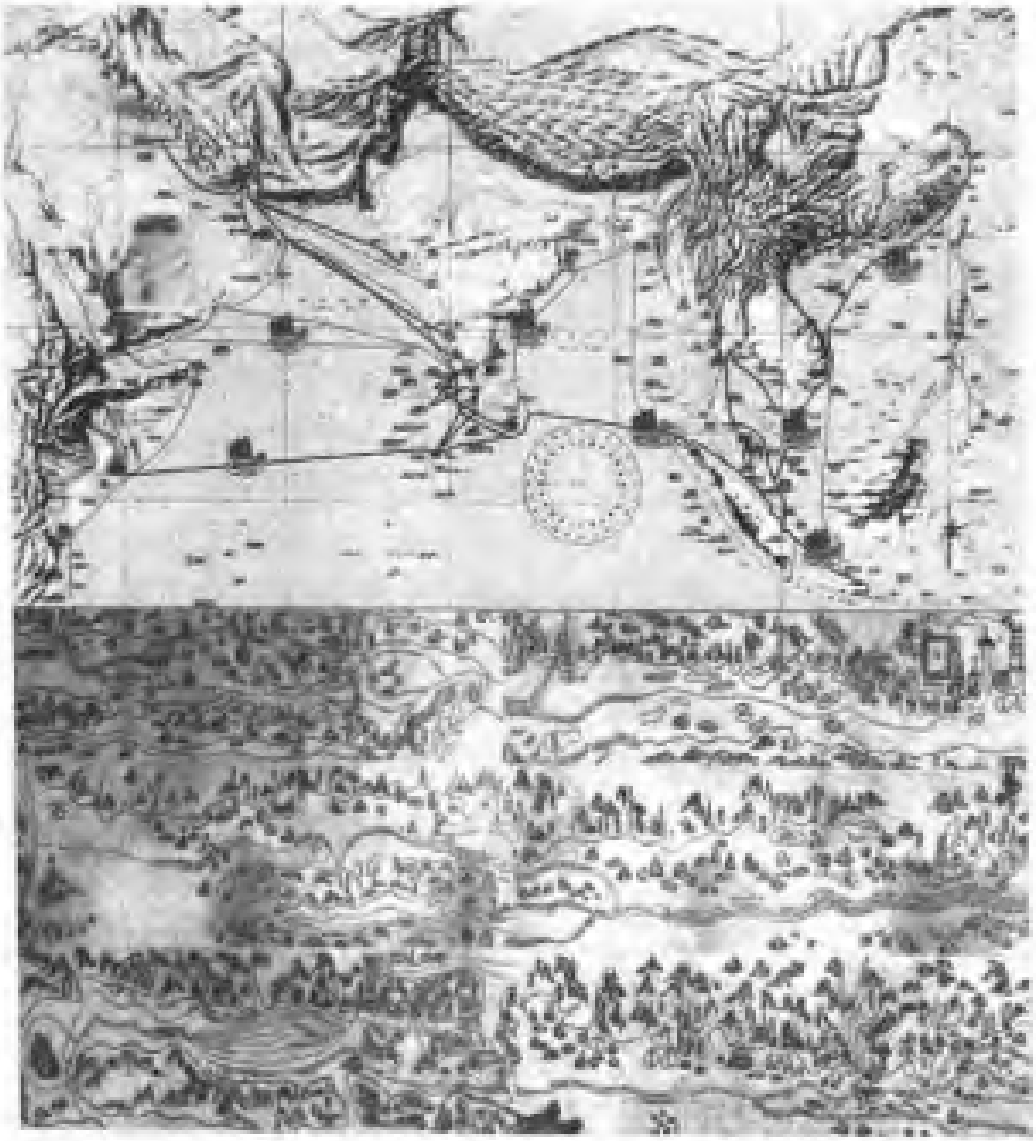
孟席斯石破天惊的议论一出，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尤其在西方，评论界引发了是否需要改写世界历史的讨论。一直由西方开辟航海通道的世界历史，要改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件事情。那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不少人转不过这个弯子，改变不了早已形成的观念。而孟席斯认为，原有的观念必须改变，因为它是“非常扭曲的”，不真实的。他希望他的书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孟席斯执意要为中国航海“正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对他的执着精神和科学态度深表敬佩。他们在文章和讨论中对此加以肯定。他们在会场上与孟席斯面对面交流的热烈场面表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进一步的意见，待阅读了他的著作后再发表。

目前，这部520页的著作仅有英文版，如果中文版早日问世，会让更多国人了解这部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新著。

陈显泗

（原文载《郑和研究》2003专刊）



“郑和航海图”原载于明《武备志》，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是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记载亚非海域内容最丰富的地理图籍（下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海军和海事界专家，进行古今对照地研究测绘，将郑和七下西洋航线反映在世界地图上（上部），更直观地显示这一历史性航海壮举。

（图片提供：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

我所知道的孟席斯其人

（一）海军出身　海洋情结

加文·孟席斯，1937年8月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当时已是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因为部队调防到中国，他才出生14天，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威海卫，并请了一位中国阿妈来照看他。1939年他父亲调回英国，这位中国阿妈和他全家一起回到伦敦，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才离开他家回到中国。孟席斯对这位善良慈爱的中国妇女非常思念，因为她曾在他婴幼时期给予了良好教育。二战后，他父亲担任过英国航空母舰舰长和编队指挥员，并授予准将，后于1968年去世。当时他已有妹弟各一，家境并不富裕，所以他在读完中学后，也于1953年参加了皇家海军，进达特默斯海军学院学习4年。毕业后1957年在“钻石”号驱逐舰上服役于地中海海域。1959年在“纽芬兰”号巡洋舰上服役于新加坡等远东海域，都是担任航海官。1960年调到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等海域服役。1965年调到“决心”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任作战官。1968年调到“鲣鲸”号常规潜艇，任艇长，授海军中校，执行了全球航行访问任务。在整个服役期间他有幸亲自航行经历了世界上几位伟大航海家的历史航程。1970年，因不赞同英国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从皇家海军辞职，时年33岁。他曾经说起过在海军服役的两段故事：（一）当他的潜艇驻泊在新加坡期间，他曾经上报请求邀请全部艇员的夫人们上艇参观，获得批准，这些夫人们都汇集到了新加坡，乘坐交通艇上了潜艇，而后一起出了海。这些夫人们开始都站在自己的丈夫身后观看操作，然后一个个战位逐渐换由夫人代为值守，最后全艇都由夫人们操纵，丈夫们站在身后监控。当他做为艇长宣布这个状态时，这些夫人们都惊叫起来，而潜艇已经在大海中潜航了；（二）本来他的潜艇上有八十多位艇员，其中大约有十几位是亚非裔人，他在艇上执行一视同仁的政策，但如果在南非上岸，有色人种可能遭到歧视。孟席斯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他的海军上级支持他的观点，但政府不同意并取消了他所在潜艇去南非的访问，他也因此提前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海军。

他这次来中国访问时多次讲到没有皇家海军的训练、实践，他不可能有郑和航海史研究的愿望和基础。在访问中国期间接触到中国海军和

海事界人士都显得特别高兴而友好。他在赠送其专著给我时题字为："送给郑明将军，一位初级海军军官向高级海军军官致敬"。我也向他回赠了载有我的论文的《郑和与海洋》文集。

（二）夫人贤惠　家庭支持

孟席斯在1966年与意大利籍的玛塞拉·玛伦果结婚，先后在1970年和1974年生下两个女儿。当他离开海军后曾先后在英国的银行、中东的建筑公司和英国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多次前往亚洲旅游。在80年代，萌生了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愿望，并逐步开始研究中国明代历史，他在80年代末期和夫人一起来中国度假纪念银婚时，参观了中国的长城、故宫、天坛……发现每个重大建筑都和明代永乐皇帝和1421年有关系，给了他强烈的印象。回英国后，他曾写了一部《15世纪，马背上的两个皇帝——朱棣与帖木儿》书稿。但当他又接触到一幅1421年Pizzigano编绘的世界地图时，又勾起他的海洋情结，使他从1990年前后放下了原来的书稿，把注意力集中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史上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围绕着1421年的郑和航海，执着地研究了十余年。终于在2002年10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专著。

孟席斯介绍他的研究和写作是在访问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专著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亲爱的夫人玛塞拉，她伴随我一生，并和我同舟共济地去过与本书有关的世界各地。"实际上玛塞拉从1983年起经营伦敦一个大型商业中心逐步有了起色，才使他从1988年有了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条件。有的记者问孟席斯，你的研究资金从哪里来？他回答，是家庭的支持。有的记者向玛塞拉问起这事，她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尽量不让他超支。孟席斯认为，玛塞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妇女，懂得意、法、西、葡、英等多国语言，对孟席斯的写作和研究，从物质到精神上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三）敬佩郑和　对华友好

当有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地研究郑和，他带着敬佩的语调说，郑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不计较个人不幸遭遇，有宽广胸怀，无限忠诚于代表国家的皇帝，冒着巨大风险率领着并没有经过严格航海训练的舰队，驰骋在海洋上，建立了辉煌的成就，是海军军人的榜样。在出访中友好地对待所有的大小国家，传播交流文化和技术，造福了人类。世界人民都应当纪念他。他还说因为自己婴幼时期生活在中国，在海军

服役时又长期活动在东南亚，以后又来中国旅游参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热爱的。中国既有陆上丝绸之路，也有海上丝绸之路，他自己都去实地经历过，是了不起的和平的国际贸易航路，很值得研究和发扬。他还认为郑和在准备远航中体现出卓越的有远见的组织才能，在南京建立了语言学校培养了多达17种外语翻译人才；整个舰队的后勤保障要确保在大洋上连续航行，因此在船上有猪圈、养青蛙、种菜，还能打鱼，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到了哪个国家，所需求的供应补给，就带动了那里的生产和经济，形成了国际贸易。

孟席斯开始研究写作后，没有和中国有关专家学者接触，难免在引用中文文献上遇到困难，甚至在研究中走些弯路。今年10～12月先后访问了中国南京、太仓、昆明、北京等地，还参加郑和研究有关会议，做学术交流，和中国研究郑和的学者有了初步直接接触，认识中国不少对明史与郑和研究很有造诣的中国学者，得到了友好热情的接待，也使他得到了很多启示。他深感荣幸地被云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还在考虑申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他诚恳地表示将争取和中国学者一起深入研究郑和航海史。

（四）继续研究郑和　推向全球

有记者到孟席斯家中去访问，他领记者上楼到他的书房，只见书架上满放着文件盒。他说，平常早上5点30分起床，在家工作4～5个小时，之后去大英图书馆工作到下午3点回家，每天都激情地工作直到疲劳不堪。现在虽然专著已出版，但是一包包的信件和一大堆电子邮件从全世界涌来，促使他要继续进行郑和航海史的研究。

据孟席斯讲，他在郑和研究方面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2002年英国首批已出版他的专著71000本，到12月初已销售44000本。他认为这只是序曲。2003年，从年初起他要亲自到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去推动‘扩大出版发行他的专著。另外已招标，由英、美、中、日、法等国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4集电视文献片，其结构大体是：第一集反映明代中国社会、郑和身世、造船技术水平等以及为什么永乐皇帝下决心派郑和下西洋，以郑和首次下西洋结尾；第二集反映郑和第二次到第五次下西洋，沿所到的国家地区，看中国文化影响以及考古发掘的史迹证据；第三集反映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其几个船队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再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海岸等情景，要利用世界地图、海图做说明，还要实拍有关证据；第四集继续反

映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对北美和北极的考察情景以及哥伦布在其航海探险与发现美洲新大陆时是如何得到和利用郑和时代的世界地图、海图。最后以郑和船队回中国后的命运来结束整个电视片。这部电视片用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放映，将把郑和航海的史事传遍全世界。

他要开设郑和研究的网站，已定名为www.1421.tv。还要到处游说，推动世界有关地区和大学建立郑和研究的学术团体。他认为在已出版的专著中有的证据只是线索或是推断，希望有更多的中外学者来收集郑和航海的史料与证据，开展深入考证研究工作。总之，他认为郑和是世界的，世界应当研究郑和。

他已和云南大学商谈合作用DNA技术研究郑和时代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的实际情况。他打算大约在2003年4月份再来访问中国，去福建、北京等地参观调研。他希望中国有语言文字学专家来共同分析南美洲与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他非常希望中国能复原仿造郑和宝船来重走郑和环球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沿线有关的港口来组织学术文化交流和科技经贸合作。他表示可以协助在海外筹资，配合中国郑和全球环航工程。

我衷心希望孟席斯的这些工作不仅会得到中国朋友热情的支持，也会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响应。

郑 明

（原文载《郑和研究》2003专刊）

作者注：我和孟席斯先生于2002年10月、12月两次共同参加在南京和昆明有关郑和的研讨会，得到他的赠书，听过他的介绍，并组织邀请他来北京访问座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应中国人民海军主办的“当代海军”杂志主编之邀所写，原名《我说孟席斯和孟席斯的故事》，刊载于2003年第2期“当代海军”。随后适当压缩改名为《我所知道的加文·孟席斯》。

郑和——环球航行第一人？
——访业余历史学家、英国前海军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

关于“郑和远航最远到哪”这个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史料记载，郑和至少到过东南亚和南亚沿岸，再远还到过东非沿岸，可能还绕过了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然而，2002年3月，从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传出了一个令各国学者震惊的论点：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在北美大陆留下的足迹比哥伦布早72年，而且郑和的船队很可能进行过环球航行，比麦哲伦环球远航的记录早了一个世纪。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媒体和公众都将目光投向提出此说的人——英国业余史学家、前海军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

前不久，在南京“郑和学术研讨会”上，记者采访了孟席斯先生。

孟席斯其人

当孟席斯提出他的观点时，很多人在吃惊之余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怀疑，为什么一个英国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孟席斯抵达南京的当天晚上，研讨会主办单位南京白下区政府便为与会人员安排了晚宴和丰富多彩的活动。然而，孟席斯在晚宴结束后就赶回宾馆，他要为第二天的报告做准备工作——这是一个认真的人。

孟席斯尽管做学问十分严谨，但为人却很风趣，还具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采访中，无论多么细小的问题，他都会查找随身携带的相关资料，以使人信服。遇到不同意见时，他总是先耐心地听完，然后才阐述自己的观点。

英国业余历史学家的中国情结

孟席斯只是一位普通的英国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业余历史学家”。然而，他却对郑和这位中国历史人物情有独钟，并潜心研究了14年之久。这种热情和执著令人不得不佩服，让人不禁想探究这份热情和执著的产生之源。原来，孟席斯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他的心中，深藏着一个中国情结。

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孟席斯出生两周后便被带到了中国。因而，对

于他来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便具备了故乡般的亲和感。年幼时，父母又为他找了一位中国保姆。这样，孟席斯从小便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自然别有一番感情。

至于为何研究郑和航海路线并得出上述惊人观点，说来还有一段小故事。孟席斯和妻子为庆祝他们结婚25周年，特意来到中国旅游。在攀登长城时，孟席斯想到明长城的主体是在1421年建成的，不禁联想到，1421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英法之间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终于结束，法国女王成为英国女王。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在1421年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孟席斯由此萌发了一个念头：将人类世界在1421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整理成书。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孟席斯无意中发现一幅于1459年的南非地图，注明在1420年曾有船只由好望角驶往佛得角（根据历史记载，达·伽马是在1497年发现南非好望角的），并且，在那幅地图的一旁边还画有一艘中国船，而郑和曾于公元1405～1433年之间进行过7次远航。疑点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孟席斯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又阅读了大量的航海史资料，并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研究，最终推断出郑和的船队曾到过非洲的好望角。

郑和船队环球航行?

一开始，孟席斯也被自己的结论吓了一跳，他执著地要将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在研讨会上，孟席斯简要论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船队第六次远航到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最后抵达澳大利亚，实现了环球航行，但郑和本人并没有亲历环球，是他的两个随从在第六次出航时把远航进行到底的。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地图、星象图、航海图等资料，例如，根据孟席斯的研究，意大利、葡萄牙古代航海家在远航的时候，根据一幅被葡萄牙国王视为国家机密的航海图对航行路线进行规划。这张航海图据考是从意大利旅行者尼科洛·达·康提那里获得的，绘于1428年，现已大部分遗失，而在孟席斯看来，只有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船只的中国人有条件绘制这张地图；二是当地的有关记载和遗留下来的实物，例如，据孟席斯称，在佛得角上发现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表明中国人或亚洲人曾先于欧洲人到过此地；三是物种的相似，据孟席斯称，有两位秘鲁专家通过研究发现，美

洲土著人的DNA与广东人相似，同时，明代中国皇宫里出现过袋鼠，而且在中国还出现美洲的玉米等。

针对孟席斯的论述，许多中国学者纷纷质疑：这些地图和文字记载的原件在哪？是否可靠？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根本不同于西方，如何能判定那些地图出自中国人之手？仅凭物种的相似性便断定这些物种出自同一地是否有些牵强？面对这些怀疑，孟席斯一方面进行简要的回答，另一方面指出，关于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都会有详细论述。

陈菁闻

（原文载《中国交通报》2002年12月13日）

福建长乐显应宫巡海大神神龛　1992年6月，福建长乐东北部闽江口以南的一处海滨，一座掩埋地下的庙宇被挖掘出土。考古报告指出，该庙现存建筑构件多为明、清两代。其中前殿两个神台，东侧神台上供奉的主神是妈祖天妃。西侧神台供奉7座神像，居中者坐像高88公分，人们称之为"巡海大臣（神）"。专家们从塑像形成时间、雕塑手法、人物特征、服饰特征，以及当地历史、庙内供奉诸神特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考证，一致认为，这尊塑像大约形成于明万历年间，头戴银金三山帽，身着簇新蟒龙袍，腰系玲珑白玉带，脚穿文武皂朝靴，完全是明代宦官特有服饰，确实就是统率舟师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

（图片提供：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政府）

郑和研究的一块丰碑

几年前，英国海军退役军官孟席斯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布了他的惊人观点：郑和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今天他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集大成者《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中译本又展现在我的面前。这是郑和研究的一件大事，是郑和研究的一块丰碑，可喜可贺。

孟席斯的观点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郑和研究的组织和郑和研究的专家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了解孟席斯的观点，孟席斯被应邀来华交流。郑和的故乡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和云南大学也以“郑和与世界”为题，在昆明召开“第二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请孟氏作专题报告，以后又数次邀请他到昆明与同行专家切磋。为了鼓励孟席斯对郑和研究的努力，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昆明市政府的官员接见了孟席斯，昆明市政府授予他昆明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云南大学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云南郑和研究会聘请他为顾问。作为感谢，孟席斯表示身后将把他研究郑和的资料赠送给云南大学和云南郑和研究会。孟席斯的研究，其意义，其研究方法，其敬业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我国的郑和研究，如果从梁启超著文开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重视到重视，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近20多年间，我国对外开放呼唤催生着郑和研究，郑和研究的规模、水平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郑和家世、航海动机及其意义、航海过程、航海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京、昆明、北京、香港、台湾等地郑和研究会应运而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学术研究队伍壮大，以纪念会、学术研讨会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一门新的学说——郑和学逐步形成。今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把郑和研究推向高潮，郑和研究正在朝着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闭关锁国与郑和下西洋是格格不入的。郑和下西洋“嘎然而止”，与其说是经济或政治原因，不如说是思想原因。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对外面的世界本质上是排斥的。个别开明的国君也许会打开国门窥视一下外面的世界，但一有风吹草动或朝代更替，就会毫不费事地把门关上，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并进行清算。郑和下西洋这面对外开放的大旗被砍

倒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海禁”恢复了，焚尸灭迹般地把档案销毁了，从此，郑和下西洋无人问津，郑和其人及郑和研究沉寂了数百年。虽然近百年来郑和研究逐渐复甦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成果、其影响仍然是很有限的，与郑和“海上巨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郑和研究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基本上还是中国化的概念。从学术层面上看，研究的视野不广阔，参与的学科门类少，研究方法单一，手段落后，文献研究多，出国实地考证少，国内学者参与多，国外学者尤其是非洲和欧美学者少。从社会层面看，郑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仍然有限，国民对郑和知之甚少，历史教科书只有只言片语。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广泛，主要限于东南亚。

孟席斯的研究带来一股清风，他不畏艰难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广阔的学术视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他撑起了国外研究的半边天。他年轻时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曾先后沿着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达·伽马、麦哲伦和库克船长的航线行遍世界。退役之后潜心郑和航海研究，多次重访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他凭据多年丰富的航海经验，以独特的视角，从研究一张早期地图开始，展开了他广泛的、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在还没有卫星导航的时代，我们要用天上的星星指引航路……星星在我正要揭露的这个非凡的故事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我在海军学到的星座导航经验，这本书就永远也不能写出来。面我得到的发现或许还会继续埋没很多年。”①孟席斯的研究不局限于天文学和航海学，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他寻访了120个国家，查阅了90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等许多有关学科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如此执着，令人惊叹。

孟席斯创造性的研究是近百年来郑和研究不断扩展、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严格地说，郑和船队到达美洲之说在孟氏之前国内外早有人论及，其依据是郑和船队有强大的实力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可以到达美洲，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此说猜想的成份多一些，所以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孟氏则进了一大步，“究竟谁是那些发现并测绘新陆地与海洋，事后除了这几张神秘的地图，就不留下半点痕迹的航海大师？……有一张图……从北到南，由厄瓜多尔到南极半岛，距离相当遥远，需要一整个庞大的舰队才能胜任，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那样的物力资源、科学知识、船舰以及航海经验足以发动如此壮阔的发现之旅，那个国家就

是中国。”②他不仅看到了15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领先世界，从而有能力到达美洲，并绘制航海图，还从郑和航海有关的遗迹收集了许多证据。正为如此，他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石击起千层浪，我们高兴地看到，孟席斯的研究给郑和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一种新的学说观点总会面临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对于孟席斯的观点，可以不同意，但我们无法否定，因为他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我们无法去否定赖以支持他观点的那些论据。因此，不是靠事实，而是靠一种主观的臆测，闭眼一想断然说“不可能”，甚而讽之为“大话西游”，进而怀疑其动机，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综观科学史，许多所谓“不可能”总是被“可能”所代替。郑和下西洋是业已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纯科学猜想，郑和研究持续至少有近百年，可我们还不能说郑和船队到过什么地方我们都一一搞清楚了，也不能以所谓史书是否记载为准。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可谓空前绝后。28000人的庞大舰队28年七次下西洋的漫长岁月，漂洋过海历经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跨度，这是发生在600年前的事。换位思考，许多问题至今令人难以置信，就如同金字塔一样不可思议。同样不可思议的是，郑和下西洋嘎然而止之后接踵面来的是朝廷官员刻意毁掉那段期间几乎所有的地图与文件。得到那么多的海外大发现之后，中国非但不拥抱世界，反而闭关自守，任何纪念当年积极对外扩展的记录，都从档案之中消失了。档案的消失给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和不解之迷。这说明后人对郑和下西洋还有许多的未知领域，郑和研究任重而道远。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史学研究观念和方法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郑和研究需要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席斯不容质疑地开了个好头。孟席斯以其不畏艰难的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弥补了郑和研究的不足，同时撑起了郑和海外研究的半边天。营造一种宽松的研究环境，多学科的介人，各种不同方法和手段的采用，包括假说、猜想在内的多种观点的提出，更多人包括中国学者、外国学者和一切有识之士等的参与以及经费的投人和有力的组织领导等等，是破解郑和研究诸多难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郑和研究，我们要为创造这些条件而努力。

高发元

（回族，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郑和研究会会长）

①、②均见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文版（台湾繁体字版）。

《天妃经》卷首图　刻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全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是参加第五次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留的资财发愿刻印的。其插图描绘了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海神天妃护佑的情形。画中郑和船队图像计5列，每列5艘，船型、尺度基本相同，与《龙江船厂志》上所附该厂曾建造的早期四桅海船形制基本相合，这也是现在复制二千料海船的一个重要依据。

郑和海船复原模型　明静海寺残碑记载“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经复原研究该船长61米，宽13.8米，排水量约1100余吨。体量小于太和殿，但在15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也是郑和下西洋舟师中的主力船型，被称为郑和六桅宝船。

(图片提供：郑 明)

福建长乐显应宫巡海大神塑像

福建长乐显应宫巡海大神塑像

福建长乐显应宫巡海大神塑像